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张宗逊回忆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张宗逊回忆录

## 第一章

## 大革命的风暴

## 少年时期

我于一九一八年二月七日出生。少年时期，是在我的家乡陕西渭南县的赤水镇堰头村度过的。

我的家庭属于富裕农民，祖父、父亲都没有念过书，一直参加农业劳动。叔父张浩如毕业于西安的高等学堂，后考进了广东韶关云南讲武堂。

我的胞兄张宗适，比我大两岁。他自幼聪慧，全家都器重他，认为他有天赋，前途无量，想方设法供他上学读书。我六岁那年，母亲病逝。外祖父家境小康，他没有儿子，只有我母亲这个独生女。我母亲的去世对外祖父的打击甚大，他老人家对我们兄弟俩特别疼爱。每逢母亲的冥生日，外祖父都要接我俩到他家，设母亲的灵位祭奠她。宗适很懂事，为了安慰外祖父，他常用毛笔在墙上写字画画，使外祖父开心。外祖父为了散心，还常常带宗适和我去官路（潼关和西安之间的驿道）上看过往的洋人和行旅。回家的路上，宗适要我和他一起学洋人的动作逗外祖父高兴。我们兄弟俩自幼非常友爱，宗适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是无微不至的。我的家乡渭南县地处关中平原，位于渭水之滨，历来物产丰富，交通方便。但是，在旧社会，因为受军阀的黑暗统治，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比北京、天津和南方各省份较为缓慢，文化教育也比较落后。我七岁开始在本村的私塾念书，读的是《三字经》、《小学韵语》、《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只有一个先生，教年龄大小不等，程度参差不齐的二三十个学生，光教认字背书，不作讲解。这时候，在我的家乡，民主革命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在民众之中传播，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使我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我寻找人生的方向起到很大作用。一九一八年，我十岁的时候，我们村里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民国初年，关中一带曾经种植罌粟，生产鸦片烟土。以后，人们就陆续不种鸦片，恢复粮食和其他作物生产了。那年清明过后，突然县里来了几个什么“查烟委员”，他们在地里巡视一番，拔了几棵过去留下的零星罌粟籽冒出的小苗，就说村里有人偷种鸦片，要罚款。人们被逼急了，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在一起议论：“查烟委员”不讲理，欺负人。有几个不怕事的硬汉子，把村里的狗都赶拢来，以撵兔子为名，把狗轰向：“查烟委员”，还喊着：“赶‘查烟委员’！‘查烟委员’滚蛋！”一下子就把他们撵散了。后来，听说村长被县里传去了，但是村民没有人挨罚，人们为此乐了好久。这事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只要人们心齐，那些压迫人民的官儿都不可怕，可以把他们轰走。一九一九年，我的叔父张浩如从广东韶关的云南讲武堂毕业回乡，他在亲友中宣传五四运动和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我在一旁听到这些新鲜事，很感兴趣。一九二〇年，张浩如在赤水镇法济寺小学当教师，我跟他到这所小学读书。法济寺小学比本村的私塾规模大，学生多，并且是按学生不同程度分班教课，教员连张浩如在内共有三人。张浩如发扬五四精神，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采用新法教学，经常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这一年的五月九日，学校举行了一次“国耻纪念日”活动，张浩如带领全校师生，到赤水镇的街上游行，同学们手持写有反帝爱国口号的三角小旗，沿途高呼“反对媚外军阀！”“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口号。那天正逢集市，

围观的人很多。张浩如就站在板凳上向赶集的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听众都很受感动，同学们的心情也很振奋。这件事轰动了赤水镇，一时在群众中传开，人们好久还在议论。这一年，宗适随在武昌中华大学学习的王尚德到湖北武汉学习。宗适当时只有十四岁，高小还没有毕业，到武汉以后，王尚德请李求实帮他补习英语，并介绍他到浚新小学补习数学半年。以后，宗适就考上了董必武任校长的武汉中学。一九二二年七月，王尚德在武昌中华大学毕业。董必武和党团组织委派他回渭南工作，进行宣传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王尚德同志是赤水镇人，一九二一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的团员之一，曾同恽代英、肖楚女、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一起，创办了“互助社”，“利群书社”等组织，学习、讨论革命理论和国内外大事。他回到赤水镇以后，和已经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回乡度暑假的张宗适共同介绍张浩如和刘建侯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赤水镇开始有了共产主义的细胞。这一年，王尚德和张浩如一起，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社，并集资在法济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了赤水职业学校。王尚德把家里的财物拿来资助学校，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我当时也转到职业学校读书，是第一班的学生，全班同学共十六人。王尚德和张浩如对我们这个班下了很大功夫，他们向学生灌输了不少革命知识。王尚德给我们讲解什么是阶级斗争，讲解社会进化史、近代史，还定期报告时事；张浩如给我们选讲了《共产党宣言》和《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等党团机关刊物的重要文章，都很受学生欢迎，给学生们的思想影响很大。他们两人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师。学校还办了一个小图书馆，藏书虽然不多，但进步书籍、报刊却不少，我记得的就有《向导》、《中国青年》、《湘江评论》、《共进》、《西安评论》、《武汉中学月刊》等。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籍，也是王、张两位老师的经常工作。王尚德经常发动赤水职业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一九二二年冬天，渭南县发生了十万农民以抗捐抗税为目标的“交农”活动。“交农”是陕西地区农民串连在一起，进行“罢农”的一种传统形式，过去是为了反抗地主压迫剥削，当时，军阀混战，统治陕西的直系军阀刘镇华，趁机横征暴敛，派粮派款，搞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老百姓稍不服从，军警就入乡“拴人”。农民苦不可言，逼得没有办法，不得已暗暗酝酿“交农”，起来抗捐抗税。农民要请有文化的人帮助写传单，王尚德就暗暗发动职校学生和老师支持“交农”活动。农民的传单上写明：某月某日实行“交农”，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带着农具到县政府去请愿抗捐税。每张传单都逐家传递，若是谁家不往下传递，或者到时不派人去，就要受到群众的惩治。这次“交农”到了约定的那天，各村各乡的农民都按时集合，人们带着各种不同的农具蜂拥地从四面八方方向渭南县城进发。我家由父亲代表前去，看着乡亲们扛着锄头、耙子、铁铲、铁叉等农具出发的场面，我振奋不已，真是声势浩大啊！农民到了县城，把县政府团团围住，呼喊口号，要县知事出来答话。县知事知道躲不过，不得不由几个劣绅簇拥着出来见群众。这个县知事吓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地讲好话，答应将各种捐税一齐免掉。谁知那几个劣绅在一旁打横炮，说只能减

免一半。这一下就炸了营，群众被惹恼了，大家围着这几个劣绅，你一锄、他一耙地把当地有名的劣绅田德全当场打死，其他几个劣绅也被打了一顿。农民还不解气，趁势又打站在一边的警察和差人，把这些家伙打得抱头鼠窜。县知事见势不妙，害怕挨打，慌忙叫人取来大印，当堂写了一份布告，申明各种派款一律豁免。农民欢呼胜利，把县政府围到天色将晚，才解散回家。这次十万农民的“交农”活动取得胜利，使我感受到团结的巨大力量，认识到组织农民运动的重要性。

## 在赤水团的特别支部

按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的规定，须有三名以上团员方能建立团支部。所以，赤水青年团的活动虽然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就开始，但是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春，刘建侯从临潼三育学校转到赤水职业学校任教以后，才正式成立赤水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由王尚德任支部书记，张浩如任宣传委员，刘建侯任组织委员。当时，陕西还没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省委和特委组织，赤水团支部是陕西省党团最早的一个支部，是直属设在上海的团中央领导的特别支部。这年五月，赤水团支部开始在赤水职业学校的学生中发展团员，我是第一批加入青年团的学生之一。当时我十六岁。赤水青年团特别支部成立以后，政治活动开展更为活跃。在一些重要的纪念日，如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五马克思诞辰、五九国耻纪念日等，都举行形式不同、规模不等的纪念活动，利用这些机会来教育和发动群众。特别支部还组织了“平民教育服务团”等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在赤水镇周围的农村办了十几处平民夜校，教农民识字、给农民作时事报告，组织起几个农民协会。在学生工作方面，充分发挥各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作用，如由赤水职业学校学生自治会发起、在渭南高等小学组织讲演会等活动，起到了团结教育青年的作用。一九二四年冬，王尚德等联合渭南县一些中小学教职员，组织“教育促进会”，提倡教育民主，要求教育局实行委员制，并利用旧政府的内部矛盾，成功地驱逐了渭南县教育局反动局长王述道。这一年冬天，张宗适由武汉中学毕业回家。在武汉的时候，他为武汉中学创办了《武汉中学月刊》，董必武很器重他。宗适回乡以后，在一九二五年春，也到赤水职业学校任教，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工作。他还经常给《中国青年》、《西安评论》等革命刊物写通讯，宣传渭南地区的农民和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春，王尚德根据党的指示，在赤水职业学校指导青年团成立“三民主义研究会”，公开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着又发起成立“陕东国民会议促进会”，发表宣言、印发传单，给北京各报馆（主要是《晨报》）发出快邮快电，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上，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的活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王尚德又组织赤水职业学校和渭华一带的中小学师生和各界群众，召开悼念大会。张浩如在职业学校除了讲其他课以外，还专门安排了操课，给我们讲一些军事常识，教我们操练，教我们怎样看地图、怎样利用地形等等，我们对这些都学得很认真。一九二五年春，传说国民二军（陕军胡景翼，隶属冯玉祥）准备向西安进军，发动驱逐直系军阀陕西省长兼陕西督军刘镇华和继任督军吴新田的斗争。这个消息震撼了直系军阀对陕西的多年黑暗统治，一时群情振奋，老百姓奔走相告。刘镇华和吴新田以及他们的爪牙极为惊慌，赶紧在陕东一带赶修防线，企图阻挡国民二军的进攻。渭南一带成了吴新田部队的前哨阵地。我们办水镇。座落在南北流向的赤水河东西两岸。吴新田的部队就在赤水河西岸构筑阵地，想利用赤水河作天然屏障，进行固守。这时，赤水团支部就积极进行工作，组织群众，准备配合国民二军的进军。张浩如负责组织赤水职业学校的师生，去侦察吴新田部队设防的情况。当时，吴新田的部队在赤水河的每个要点都驻兵防守，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同学们每人分管侦察一段阵地情况，遇到吴军询问就回答是去走亲戚的。我们通过吴军阵地附近，就装得象小孩好奇似的，慢慢蹑跖，仔细察看吴军各处阵地构筑情况。有多少兵，住在什



么地方，有些什么武器装备等等，都牢牢记在脑子里。回到学校——向张浩如老师汇报，张浩如把情况汇总在一起，写详细报告寄给国民二军。后来，吴新田的部队在国民二军到来之前就撤走了，在赤水河两岸的仗没有打成。这次侦察活动，却成了我第一次军事斗争的实践，久久不能忘怀。这一年发生五卅惨案，王尚德又领导赤水职业学校师生参加“沪案”后援会，他还和其他同志一起，发起召集全陕学生代表大会，抗议帝国主义惨杀中国工人的暴行，募捐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一九二五年，王尚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共青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派吴化之未陕整顿团组织和筹建党组织。吴化之曾到赤水镇指导工作，使赤水团组织得到加强，并成立了中共党的特别支部。王尚德改任党的特支书记，由张宗适接任团的特支书记。当时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决定：为使国民党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凡是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可以为之建立，中共党团员在国民党组织内起骨干作用。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共党组织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王尚德在临时省党部担任领导工作，并在渭华一带帮助国民党组建党部，团结国民党左派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也根据组织决定加入了国民党。自一九二四年以后，赤水职业学校的教员多为中共党团员和进步人士。到过赤水职业学校工作的中共早期党员不少，据我所知，其中有武止戈、王复生、王懋廷、吴化之、耿炳光、方干才（方仲如）、张兆丰（国民三军团长）、潘自力、张秉仁、高克林等。赤水党团特别支部的许多同志后来都成了陕西党团组织的骨干，他们进行的革命活动，使渭华地区成为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高涨的地区之一。王尚德等在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了渭南东张村农民协会，这是陕西最早的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对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进行斗争。农民协会的发展，为后来爆发党领导的震动西北的渭华起义打下了基础。

#### 参加黄埔军校和北伐

一九二五年冬，中共中央通告各地党团组织，选派党团员到广东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那年暑期我已经从赤水职业学校毕业。王尚德得知黄埔军校在河南开封招生，就通知赤水团特别支部，派我和姚俊明前去报名。他为我们筹足了路费，办好了团组织介绍信，行前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说：“你们是团员，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做个光荣的先锋战士。”一九二六年一月，我们怀着学好本领、献身革命的热切愿望从家乡出发。宗适怀着既高兴又难舍的心情，伴送我走到赤水镇以东的遇仙桥上，他叮嘱我，革命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要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奋斗到底，我们分手时，他一直站在桥上望着我远去。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同胞弟兄的最后离别。和我一起去河南报名的有苏士杰（中共党员）等四人。当时，统治陕西河南两省的是冯玉祥的国民二军，这个部队同情革命（军长胡景翼，一九二五年春病故），所以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只是陇海铁路向西刚修到陕州，还没有正式通车。我们由赤水镇到潼关是雇的人力车，走了一天半；从潼关到陕州是走水路，乘的是旧式民船，沿黄河而下，走了两天；从陕州到开封才坐上火车。到了开封，我们赶到黄埔军校招生办事处办好入学手续，然后到中共豫陕区委在开封的接头处河南书店办理转团的组织关系。接头处的同志告诉我们说，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再转一次介绍信。我们在接头处办理了给中央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继续乘火车去上海。在上海停留了一个

星期，通过在上海大学学习的姬国贞（华县人）找到团中央机关，办好去黄埔军校的团组织介绍信，然后乘上海到广州的日本货轮“山东丸”，在海上航行了大约一个星期，于二月上旬才到达黄埔港。我到黄埔军校报到后，被编入第五期入伍生二团二营五连。黄埔军校本部在黄埔岛上，岛上有长洲要塞，南临虎门，是控制珠江口和拱卫广州的门口。我们入伍生团则驻在广州市近郊沙河镇的旧兵营里，在那里进行军事训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创建的。目的是培养革命的军事与政治人才，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组建国民革命军，用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来完成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许多杰出的领导人都曾在黄埔军校担任领导工作或任教，如：周恩来和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恽代英曾任政治总教官，聂荣臻、肖楚女、张秋人等曾任政治教官，叶剑英曾任教授部副主任。共产党还选派了不少党团员到军校学习，黄埔第一期学员中就有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周逸群、左权、许继慎、周士第等同志，他们当时都是军校革命的骨干力量和活动分子。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发扬“黄埔精神”，在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几次战争中，在两次北伐战争中，都以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英勇善战闻名，对保证革命战争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建校初期，孙中山先生亲自兼任军校总理，伪装革命的蒋介石被委任为校长，第一任国民党党代表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反革命分子刺杀捐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汪精卫继任党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只有党的组织，没有青年团组织我一到黄埔军校报到，党组织即通知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五连学员中有中共党员五人，即余陶、廖昆、葛志坚、姚俊明和我，小组长是余陶，由他和上级联系，那时忙于操课，党小组没有其他活动。我们大约每两周去一次广州市东校场的广东省农民协会，听周恩来的政治形势报告，每次听报告的党员大约有一百多人。周恩来当时是中共粤区军事部负责人，他讲话生动，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同志们都爱听。陈赓是报告会的工作人员，很活跃，开会前他在会场上走来走去，口中笑话不断。那时，广东国民政府的任务是巩固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中共党组织对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党员只要求在学习和遵守纪律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没有提出其他任务。一九二六年三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宣布广州戒严，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和部队的党代表数十人，并收缴罢工委员会枪械，监视苏联顾问住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阴谋排挤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这实质是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次阴谋政变，陈独秀等对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事变后，蒋介石提出军校跨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或共产党。于是，党组织指示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不再保留双重党籍，由党员自行决定保留共产党或国民党党籍，并向国民党公开。我当即在军校发的表格上签写退出国民党。这次共产党员公开身分的结果，给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屠杀黄埔军校中共党员提供了一份名单，由于后来我随政治科到了武汉，才避过了那场惨祸。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这时入伍生部抽出部分学员组建了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工兵营，开赴前方参加北伐战争，其余入伍生均调往东江，担任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我们二团二营负责东

莞、石龙的防务。当时正处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以后，英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在广东沿海一带到处骚扰破坏，斗争异常尖锐，我们担负的巡逻、警戒和搜捕任务相当繁重。军校党组织除要求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积极执行军事勤务、英勇作战外，还要求大家搞好政治学习，学好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 ABC》，方法是自己阅读，小组讨论。那时一般不发展党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个别地秘密地发展党员。如一九二七年冬，在井冈山曾任过工农革命军团长的陈浩就是这时入党的。此外，我们抓紧一切机会、运用各种形式，动员群众支援北伐战争。我在东莞执勤期间，有一天突然接到王尚德从军校本部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同陕北的白明善和华县的陈述善来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我见到信后非常高兴，立即请假到校本部看望离别半年的王尚德老师。我见到王老师就兴奋地向他报告了自己的学习情况，他风趣地对我说：“陕西现在是‘亡省’了。”原来，一九二六年春，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刘镇华率十万匪军再次入陕，围攻西安，在渭华地区通缉王尚德等共产党人。王尚德等只得化装离陕，几经周折，与恽代英取得联系，调到黄埔军校工作，我在校本部住了三天，便返回东莞。一九二六年九月，入伍生团由东江开回黄埔，学员升入本科学习。校本部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六个部。军校第一期只有步科；第二期分步、炮、工、辎、宪五科；第三期增设骑科；第四期又加政治、交通、无线电、航空等科。按照当时一般军官学校教育，培养一个初级军官约需三年功夫。但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急剧的发展，学制大大缩短，而且还是开门办学，学员执行战斗勤务和参加战斗。我被编入政治科，和黄埔第四期新政治科合编在一起。政治科有三个队，一、二队属第四期，三队属第五期。经过考试，我被编入第四期第二队。这一时期，政治学习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主课，其他还有各国革命史等课程。在这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前线节节胜利，十月占领武汉，十一月占领南昌。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声势浩大，工农群众积极参战，不少旧军阀部队也迫于形势易帜拥护国民革命军。由于国民革命军迅速扩大，前线急需大批政治干部，北伐军总政治部命令黄埔军校政治科调往武汉。我和政治科全体教职学员一起，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出发，从广州乘火车到韶关，换乘民船到乐昌，由乐昌徒步行军经九峰到湖南郴县，又乘民船经耒阳到衡阳，换乘较大的民船从衡阳到长沙，再乘火车到武昌。沿途所到之处，特别是在湖南境内，受到湖南工农学各界群众热烈欢迎，每到一地，需换乘船车作短暂停留的时候，都举行军民联欢大会，一片热火朝天的革命景象，使我们倍受鼓舞。当火车经过湖北省咸宁县的汀泗桥、贺胜桥车站时，政治科的领导组织我们下车参观北伐军攻打两桥的战场，还能看到部分野战工事的遗迹。政治科到达武汉以后，驻扎在武昌长街两湖书院旧址（今解放大道中段），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筹备处给每人发了冬装。半月后，正式开始军政训练。一九二七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习惯上仍称黄埔军校分校），分校校长蒋介石，教育长张治中，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下辖政治科、炮兵科、工兵科和新生部（入伍生部）。政治科主要由广东调来的黄埔军校第四、五期政治科组成，除原有的三个队以外在武汉又招收了一个第四队（属第五期）。张鸿儒任政治科大队长，徐向前任第一队队长，吴展任第二队队长。炮兵科、工兵科则由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参加北伐战争的炮兵团和工兵营组成。新生是分校成立后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河南、

安徽等地招收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女生大队。校部、政治科和新生(入伍生)、包括女生大队驻武昌两湖书院，女生大队单独有一所校舍，另有一个大门出入、炮兵科和工兵科驻武昌文昌门。武汉分校的政治科目，增设了有关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内容，政治教员除恽代英还有张秋人、施存统、沈雁冰、周佛海、樊仲云等。每逢星期一，照例整队前往国民政府做纪念周。听大报告的次数没有一定，接到通知就随时集合参加。张国焘在武昌的一所小学里，为分校的中共党员作过两次报告，他戴着一副墨镜，穿着长袍马褂，说话哼哼哈哈的，讲什么已记不得了。我们除了上课以外，有时还要担任外勤，上街参加群众游行，做政治宣传工作，政治活动比在广州时要活跃得多。原黄埔军校第四期的两个队，即政治科的第一队和我所在的第二队，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毕业。第五期政治科的第三、四队和第五期炮兵科、工兵科在同年七月毕业。新生(入伍生)在七月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武汉分校的不少学生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据我记忆，幸存的同志后来在红军中担负工作的有：许光达(炮科)、陈龙鹤(朝鲜人、炮科)、谭希林(工科)、张金泉(政治科)、罗瑞卿、陈伯钧、徐彦刚、王良、游雪程、刘型(以上为入伍生)等。

## 武汉七一五政变前后

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蒋介石密令反革命分子，土豪劣绅和青红帮流氓，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假冒群众组织，镇压工农群众运动，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四月中旬，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各界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讨蒋大会。军事委员会撤销了蒋介石分校校长职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为校务委员会制，直属军事委员会领导。军事委员会任命谭延闿、邓演达、徐谦、恽代英等五人为校务委员。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我在武汉分校毕业以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师（师长李云杰）、第九团（团长周希武）的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任干事兼第二营政治指导员。

当时，军事干部和政工人员分属两个系统，政工干部直属集团军政治部领导，团以上单位的政工人员大部是中共党员，少数是国民党左派，营连政治指导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左派，三师的政治部主任王文海，九团政治指导员张天一，都是中共党员。九团指导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只有张天一和我两个人，全团也只有我和他是中共党员，团里还有刘一鸣是共青团员，因为他没有组织介绍信，当时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九团的团部和第一、三营驻防在湖南岳阳县城关。二营驻防在城陵矶。城陵矶地处长江较窄的一段，又是洞庭湖出口与长江的汇合处，军事位置很重要。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之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也接着发生了反革命的大屠杀。四月十五日，在广州黄埔军校里的中共党员几乎全部遇害。这时，湖南的革命形势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存在着：“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势力的斗争。我初到岳阳时，表面上看当地还有点革命气氛，还象个北伐军后方的样子。其实斗争已经激烈地展开，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愈来愈嚣张。随着武汉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日趋反动，陈独秀投降主义又步步退让，过了一个月以后，斗争便逐渐公开化了。四月下旬，奉系军阀势力从河南威胁武汉，武汉国民政府组织第二次北伐，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大部开到河南和奉军作战。五月十日，驻防在湖北宜昌、沙市一线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受蒋介石指使，率领所部叛变革命，乘武汉兵力空虚之机，沿长江东下，经过第八军第九团的防区，向武昌进攻。我所在的第九团第二营营长涂卓，瞒着我在深夜秘密乘船从城陵矶去同叛军联络，原来第九团是计划地配合夏斗寅行动的。在这危急关头，叶挺指挥武汉卫戍部队和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中央独立师，奋勇抗击，仅两天功夫就将夏斗寅叛军的进攻击溃。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团长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他指挥长沙的军警，把在押的土豪劣绅全部释放了，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农革命群众，长沙一带一片白色恐怖。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的许多领导人都被枪杀。这是蒋介石指使两湖反动军官进行的又一次反革命行动。马日事变以后，岳阳的政治形势也变得严峻，驻岳阳的第九团团团长周希武表面伪装中立，好象夏斗寅的叛变和马日事变等都和他无关，暗中却积极支持地方反动势力。国民党岳阳县政府以各种借口逮捕共产党员，当地的中共党团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团体都被迫转入地下。在华（容）南（县）安（乡）地区的反动豪绅则配合许克祥的叛乱，纷纷反攻倒算，恣意捕杀农

民运动积极分子，这一地区许多农民运动干部经岳阳向武汉转移，如农协总指挥欧阳键、何长工、杨运北、蔡协民等都是经岳阳走的。但是也有不少同志路过岳阳时，在旅馆里被反动县政府公开逮捕，如后来在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做政治工作的杨岳彬就是因故离开旅馆，得以幸免的一个。这时，第九团政治指导员张天一也离开岳阳到武汉躲避，第四集团军总政治部任命我代理团政治指导员。第九团的政工人员（多数是由武汉分校分配到第九团工作的，个别是同周希武有某种关系的国民党员）没法开展工作，只得抱着混日子的态度等待上级指示。六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取得第二次北伐战争的胜利，北伐军在“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声中主力部队回师武汉，开往江西、安徽方向。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以第二军谭延闿部和第六军程潜部为主力，以第八军第三师配合，组织西征军，由程潜指挥，进行鄂西战役，向夏斗寅残部和配合夏斗寅进行反革命叛乱的四川军阀杨森、贵州军阀陈渠珍等部进攻。岳阳的形势表面上有所缓和，第九团政治指导员张天一又从武汉回到部队，第九团的政工干部才逐渐恢复工作。第九团奉第三师命令，沿长江向西进攻，部队路经湖北的监利、石首、公安前进，因为杨森部和陈渠珍部从监利一直向四川、贵州撤退，所以第九团沿途没有和敌军发生战斗。七月十日前后，第九团到达湖南的澧县、临澧地区，和第三师主力会合。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在武汉市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七月十六日，第三师政治部接到中共中央自武汉通过有线电报局发来的密电（当时军队还没有无线电通讯），政治部主任王文海马上向我们作了传达。电文的内容大意是：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党中央要求共产党员，除少数可以继续留下做隐蔽工作外，其余陆续撤离国民党军队。我听了传达后想，我到国民党军队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在部队中也并不太“红”，不太引人注目，但是我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曾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是黄埔四一五事变的幸存者，如果继续隐蔽，以后会有麻烦。我把自己的想法报告了王文海，他同意我迅速离开国民党军队，前往武汉找党中央另行分配工作。这时，第八军第三师里除共产党员外，其他人员还不知道汪精卫叛变。

我立即向营长涂卓和各连连长说，我父亲去世，家中有困难，需要我回去料理后事，集团军总政治部已批准我回家。我在七月十七日离开国民党军队，行前部队派了一连人列队为我送行。当天我由澧州到津市，在那里同张天一会合，住了一夜。津市驻的是第八军第三师的后方部队，我在那里看到了军阀部队的的生活真相，他们接待过往的军官，真是花天酒地，糜烂透顶。津市只有去长沙的客轮，而长沙被许克祥控制，还在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到长沙去有危险，我和张天一商量，决定搭客轮半路到沅江县下船，再换乘长沙开往武汉的客轮。就这样，我们先到了沅江，等了两天才搭上由长沙去武汉的船，在七月二十日到达武汉，临时住在张天一的岳父（中央银行职员）家里。根据党组织的通知，党中央的联络处，设在武昌黄土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留守处政治部。我去那里报到，请求组织分配工作。这时，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问题要作出抉择：一是到哪里去工作，是回西北还是继续留在南方？回西北，固然有些有利条件。因为我是西北人，对西北地区的风俗人情比较熟悉，但是也有不利的因素，当时在西北的冯玉祥也同蒋介石、汪精卫一样反共，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都被他“礼送”出境来到武汉，西北的革命力量不如湖南、湖北发展快，权衡利弊，我决心留在南方。

再一个问题，是否仍继续做政治工作？回顾我在第八军三师搞了三个月的政治工作，尝尽了苦头。在旧军队里做政治工作困难重重，你要想接近士兵群众做点教育工作，连长就会疑心你挖他的墙脚，“动摇军心”，给你白眼看。同时我也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掌握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当时我们党掌握的军队实在太少了，共产党员需要做军事工作，有了枪杆子就有办法。这样一想，我决心向党组织要求改做军事工作。我去报到时，就向党组织汇报了我的想法。党组织根据我的要求，分配我到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任中尉排长。我在办理组织手续的时候，遇到徐向前也在办理转党的关系，那时我认识他，他还不认识我，因为在武汉分校时，他是政治科一队队长，我是二队的学员。

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总共只有一个新兵营，新兵的成份多数是马日事变后逃到武汉的湖南农民和农运干部，在新兵营当排长的杨立三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武汉的政治形势处在革命和反革命各自加紧组织力量的阶段。武汉国民政府表面上还要举行东征，讨伐新军阀蒋介石，部队继续向江西、安徽开去。而汪精卫暗地里正和蒋介石秘密商议合流反共。唐生智则另有打算，他的部队已控制了汉口和汉阳；李品仙当了武汉警备司令。中共党组织在汉口、汉阳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转入地下，在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领导下的汉口工人纠察队却向汪精卫国民政府缴了枪。在武昌方面，中共党员占优势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学员（黄埔军校第五期）已分配完毕；武汉分校的入伍生改编成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教导团的团长由任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兼任，这个团也准备开往江西。这时，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部队正陆续向江西南昌转移，受共产党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第二十四师留守处机关是最后一批离开武昌的部队。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致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面对大革命失败的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我所在的第二十四师新兵营编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三营，我任第十连副连长。警卫团团长沙德铭是中共党员，黄埔第二期毕业生，他已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警卫团迅速赶到南昌和第二十四师会合。部队临近出发时，卢德铭又接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命令，要警卫团到九江集中。卢德铭断定，警卫团如果到九江去，就会被黄琪翔吃掉。于是决定，七月三十一日晚紧急出发，部队连夜从武昌登船，沿长江东下。八月一日，部队在湖北大冶县黄石港附近登岸，走陆路取道湖北阳新向江西进发。八月三日，到达阳新，乘了一程船到龙港。这时，传来贺龙、叶挺部队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消息，卢德铭立即率领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经江西武宁、靖安，昼夜兼程赶向南昌。部队到达江西奉新县时，了解到南昌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向临川方向开去，同时发现赣江对岸樟树镇一带有国民党朱培德部队驻守，不易通过赣江。卢德铭估计已不可能追上起义部队了，决定放弃原定和贺、叶部队会合的计划，由他和团政治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去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由第一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把部队带到修水县休整待命。余洒度也是中共党员，黄埔第二期的毕业生。他在军校学习时主要搞政治工作，常给《黄埔潮》写文章，但

缺乏带兵作战的经验。卢德铭走后，余洒度为了隐蔽目标，派人到南昌和朱培德交涉，把部队番号改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余洒度担任师长，警卫团编为第一团，钟文璋担任团长。部队到修水以后，一面整顿组织、进行训练，一面筹备钱粮物资，惩办了几个大的土豪劣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收缴了修水县地方武装的枪百余支。我带第十连到武宁县收缴该县地方武装的枪支六十余。警卫团当时虽然有不少党团员，但是很少召开党的会议研究政治形势和部队行动问题。从武昌出发时，第三营营长是韩壮剑，到修水时他装病不愿干工作，余洒度把他调到团部任团附（旧军队的团附相当于现在的副团长），三营营长由十连连长金文生担任，我接任十连连长。在修水的时候，部队还抓紧扩充兵员，并和平江县农民自卫军余贲民部取得联系，将自卫军补编到第一团，余贲民任副师长，分管财经工作。接着又和驻铜鼓县的浏阳农民义勇队苏先骏部取得联系，并将该部编为第三团，派警卫团第十一连连长伍中豪带十一连去加强第三团。后来，罗荣桓率领的鄂南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也来到修水，编为师部特务连。



## 第二章 红旗插上井冈山

## 参加秋收起义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中共中央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革命基础好的省份，发动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武装起义。八七会议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各省相继举行上农武装的秋收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他担任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决定卢德铭返回部队，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在他们没有赶到部队以前，八七会议的精神已传到部队，大家听到中央的指示都非常振奋，紧张地进行起义准备，迎接伟大革命风暴的到来。起义军由余洒度负责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第一团除警卫团、平江农民自卫军以外，还补编了湖北崇阳和通城县的农民自卫军，团长仍为钟文璋；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井队，醴陵、安福、莲花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团长王新亚；驻铜鼓的浏阳农民义勇队加上警卫团和平江农民自卫军各一部组成的第三团，团长苏先骏。此外，还收编了邱国轩部几百人，编为第四团，邱国轩原是贵州军阀王天培部，因为军阀内部矛盾，反蒋失败后流落在鄂南、赣西北一带为匪，当时驻在湖南平江长寿街以北的农村，余洒度将其收编。这四个团的部队，只有原来的警卫团服装是一律的灰布军装、大盖帽，其他都是原来的工人、农民衣服，湖南的农军头上都包个大包布，为了便于识别，每人都发一条红布条系在脖子上。装备也不一致，有些人只有大刀、梭镖。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在“攻打长沙”的口号下，师部率第一团由修水县出发，第二团由安源出发，第三团由铜鼓出发，以长沙为攻击目标，分路前进。一路上惩办上豪劣绅，消灭地主武装，声势浩大。我所在的第一团分两个梯队由修水出发，团部率第二、三营为第一梯队，九日从修水县出发；师部率第一营为第二梯队，晚一天出发。第一梯队出发后，第一天在渣津宿营，枪毙了几个当地的恶霸地主，将没收的财物分给农民群众。第二天继续向平江县长寿街前进，以第三营（缺十一连）为前卫，我率第十连为尖兵连。部队进到长寿街的金坪，和第四团的邱国轩部联络时，却遭到邱匪的暗算，他派人送来假情报，说前边小河对岸发现有敌人，我立即奉命率领第十连，徒涉过河向前搜索，结果扑了个空，而邱国轩却带着他的队伍从两侧高地袭击第一团团部和本队，（我们的部队在行军中猝不及防，遭到很大损失。结果，团长钟文璋和第三营营长金文生等一些军官有的失踪，有的跑散：第九连打得很英勇，连长黄赞失踪；第三营十二连和第二营都损失一部，团部的辎重和行李、炊事用具全部损失。当初收编邱国轩部的时候，我们没有派部队进去做工作的经验，只简单地派一个参谋去邱部作联络员，这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邱匪“反水”时被杀害了，以致师部对邱匪的动向事先一无所知，毫无防范，造成了金坪失利。邱匪伏击本队时，我带领第十连在前边搜索，听到后边突然响起枪声，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当我们返回去的时候，本队已经被打散了。我们第十连除了司务长带着伙夫班随着团部的大行李辎重行军被打散外，全连战斗人员没有伤亡。当晚，我们收容了其他连的一些失散人员，退到附近山上的一个地主家里，布置警戒，住了一晚。第二天，师部派参谋胡景玉（陕西蓝田人）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才知道由武汉奉党中央命令赶回部队的卢德铭已率领师部

和第一营从修水赶来。胡景玉通知我立刻带第十连到龙门厂附近一个叫天主堂的地方和主力会合。我们赶到天主堂，卢德铭宣布他就任起义军总指挥，把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番号正式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扯掉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军旗，高举镰刀斧头的红旗，这面旗帜是在修水预先做好的。然后对第一团进行整编，把第一团受损失的第二、三营和其他失散人员合编为第一团第二营，我任第六连连长，何长工任第六连党代表。整编时，枪毙了两个死心塌地拥护蒋介石的反动军官。第一团在天主堂整顿了三、四天，卢德铭曾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计划以第一、二营反击邱国轩，进攻长寿街，后来因为情报弄不准确，未能实现。卢德铭遂改变计划，带第一团，向第二、三团靠拢。第二团由安源出发后，曾一度占领了醴陵县城，又主动撤出，后来攻占浏阳县城，因为等待第三团到浏阳会合，被敌军包围而失败，他们始终没有和师部联系上。第三团由江西铜鼓县出发，向浏阳县攻击前进，在占领了东门镇以后，遭到敌军反扑，因为寡不敌众，被迫撤出，转移到浏阳县东南的文家市。第一团在九月十九日在文家市和第三团会合。由于当时整个革命形势已趋向低潮，敌强我弱，起义军的指挥员又大部缺乏实战经验，应变措施不当，起义接连受到挫折。九月二十日上午，全师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外面的一块草坪上集会，师长余洒度在队前宣布：请毛泽东委员讲话！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马上回想起这年春天在武汉分校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的情景，顿时感到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这时，毛泽东健步走到队伍前面，他身穿蓝色粗布的农民服装，脚穿草鞋，神采奕奕，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委员，他是随第三团到文家市的。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向部队讲了话，他讲话的大意是：不久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决定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目前，我们的军队力量还不大，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能继续打长沙，待以后人民武装力量壮大了，我们一定会打开长沙的。大革命由于投降主义的领导暂时失败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局面没有改变，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不会停止。广大工农群众中蕴藏着深厚的革命积极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的革命高潮必然会到来，革命队伍一定会逐步扩大，革命终究会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讲话不断地被指战员的欢呼声、口号声所打断，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起义部队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部队在文家市休息了一大，继续往南前进。当时前委认为南昌起义部队是主力，想向他们靠拢，但又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只能往南开，以便相互呼应。九月二十二日，部队经桐木到芦溪附近，没有在芦溪街上住，在芦溪南面的山地宿营。第二天拂晓，部队继续向南行动，行军命令规定第一团第一营为前卫，师部率第一团第二营为本队，第三团为后卫，余洒度师长在师部前面走，卢德铭总指挥跟在部队后边。部队开始行动以后，担任后卫的第三团突然遭到朱培德部和地主武装的袭击。在这危急时刻，卢德铭带胡景玉参谋就近指挥，掩护部队转移。在激烈的战斗中，卢德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胡景玉也同时阵亡。卢德铭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一贯坚定地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最终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全体指战员都为他的牺牲感到悲伤和惋惜。

部队继续前进，从芦溪开往莲花。九月二十五日，部队占领莲花县城，俘虏了莲花县的国民党县长，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武装，缴枪数十支。打开莲花县城以后，部队在莲花县城和城南的桥头镇休息了三天。九月二十八日，

部队开往永新县境内。

### 三湾改编

部队从莲花县出发，开到永新县三湾村。三湾是个小村子，只有十来户人家，座落在永新县西乡的山区。部队到三湾后，分散在以三湾村为中心的几个小村子里宿营，毛泽东同志就住在三湾村的一户农民家里。秋收起义后，部队遭到几次挫折，战斗减员很大，加上长途行军转移，病员很多，特别是当时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军心涣散。从莲花到三湾一路上看到部队很乱，尤其是第三团更乱，伤病员掉队的多，只有第一团第一营还比较整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三湾召开前委会，决定再次对部队进行整编，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前委会是在三湾村中间一所大房子里开的，我们听到屋里大声争论，苏先骏还用手使劲地敲床板，说没办法安置伤病员。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到三湾后的第二天，部队在三湾村边一片已经收割了庄稼的农田里集合。毛委员到队前宣布，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团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毛泽东对大家说：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革命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还有这样干把人的队伍，都是志愿结合在一起的，有这样一支有觉悟的革命队伍，只要大家齐心奋斗，还怕革命不能成功吗？听了毛委员的讲话，同志们精神大振，不约而同地议论说，有毛委员领导我们还怕什么！

这次改编，全团缩编为七个连，五百多支枪。第一团辖第一营和第三营，缺第二营，每营编三个连，另单独编有一个特务连（不是修水时的师特务连）也叫第四连；团直属队有团部、政治部、辎重队和卫生队等单位。从武昌出发时，警卫团曾编有一个军官队，成员多是从各地投奔到武汉找党分配工作的革命骨干和党员干部，以后他们陆续分配了工作，有的因病因伤掉了队，也有个别的人自行离了队，三湾改编时就不再编军官队了。到一九二八年初，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才成立了教导队的组织，先是训练班长的军士队，以后才是训练班、排长的教导队。

改编后，第一团团团长是陈浩，团附是韩壮剑（原名韩毅），参谋长徐庶；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辎重队队长范树德；卫生队队长记得是姓王，党代表何长工。我调到团部任参谋（团部共有两个参谋），谭政任文书。

三湾改编中，确定党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了政治工作。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沿袭下来的制度是每团只有一个党支部，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直接管连队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只做宣传教育工作，因而政治工作没有群众基础。当时士兵里党员很少。党支部建在连上以后，排和班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把团、连政治指导员的制度改为团、营、连党代表制。同时，特别注意了在班长、战士中发展党员，这样党和士兵群众的联系便更加紧密了，大大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三湾改编中，还决定废除雇佣兵制度。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官长不得打骂士兵，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和批评权，从而调动了士兵的革命积极性。因为行军的关系，以上这些决定是在部队离并三湾以后才逐步贯彻执行的。团的首届士兵委员会也是离开三湾以后才选举产生的，参加团士兵委员会的学生兵有熊寿祺、刘炎、郑重、胡本田等同志。

部队经过改编以后，组织精干了，连队充实了，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

呈现出新的气象。广大干部、战士反映，这一下可好了，革命有奔头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以师长余洒度和第三团团团长苏先骏为首的一些人经不起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竟以种种借口离开了革命队伍。他们大都是不辞而别的，有的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闹暴动；有的悲观消极，逃避斗争，回了家；有的则去投降蒋介石、汪精卫当了叛徒。总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走了，部队不但毫无损失，反而更加精干，更坚强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县古城镇。三日，前委在古城镇文昌宫召开活动分子会，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并且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到有党员几十人，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自从文家市会师以来，毛委员一直随部队活动，一路上除确定部队大政方针以外，每到一地都设法找到当地党的同志，了解本地和周围地区各方面的情况。所以，古城活动分子会除军队干部外也有地方党的同志出席，毛委员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永新县委的刘真和宁冈县委的龙超清。部队在古城镇休整了一个星期，把伤员病员安置在宁冈县的茅坪休养，然后继续向南走，经过宁冈的耒市、酃县的十都，一直开到酃县城郊。酃县县城里驻有挨户团，紧闭城门坚守，工农革命军没有攻城，只在城郊休息了两天。这时，我从团部调到第四连（即特务连）任副连长，四连驻在县城附近的板上村，连长是曾士峨，他是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的学员，秋收起义时在第三团当过连长，三湾改编时到特务连当连长，党代表是罗荣桓。

部队在酃县城郊休息了两天以后，前进到水口圩。

在水口圩部队休整了一个多星期，特务连住在一个祠堂里。有一天，下着濛濛细雨，我带领战士们在宽敞的祠堂大厅里教练使用步枪瞄准。忽然，毛委员走了进来，我当即按军队的习惯喊了“立正”口令，迎上去向毛委员敬礼，报告了人数和练习科目。毛委员微笑着摆摆手。说了声继续操练，就走到战士中间看射击预习。他和蔼地问大家：“能打中敌人吗？”“能打中！”大家齐声回答。毛委员又问：“能打中多远的敌人？”大家纷纷回答，这个说能打中三百米，那个说能打中四百米！毛委员听了很高兴，鼓励说：“很好！就这样练，把本事练好。”随后他便找罗荣桓党代表谈话去了。

就在水口圩休整期间，我们为毛委员收集报纸，从报纸上才知道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的消息。

大约十月中旬，前委决定，工农革命军就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罗霄山脉位于湘、赣、粤、鄂、诸省交界，其北段靠长江，又有武汉和南浔铁路；南段交通也方便，但都不理想，只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是湘、赣两省结合部，两省军阀有矛盾，各自保存实力，给我们以回旋余地。而且这个地区反革命的统治比较薄弱，交通和通信都很落后，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后方，伤病员也就可以有个落脚点。

根据侦察，在井冈山地区有两支农民武装，一支在山上，一支在山下，由王佐、袁文才领导，他们也叫农民赤卫军，并不是共产党领导，而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在这个地区他们有群众基础，得到穷苦百姓的拥护。当时，有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不同意，认为应该团结、争取他们，并立即派人去做王佐、袁文才的工作。后来，毛泽东还亲自和王佐，袁文才谈话做教育工作，并送给他们一百多支枪，袁、王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王佐还参加了共产党，为红军的发展，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工农革命军离开水口圩向遂川县的大汾圩前进。离开水口圩前，前委派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带领两个连，打着国民党军旗伪装成国民党军队，绕过酃县，袭击茶陵县城。第一营在清早时分开进茶陵县城，城门口的岗哨弄清是什么队伍，还举枪敬礼，城里只有少数反动武装，第一营把他们全缴了械。第一营还在茶陵国民党县政府里没收了一批银洋，从那里直接送上井冈山。

##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离水口圩开往遂川大汾圩。在行军路上一次大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走到我跟前，和我打招呼。他用帽子垫着坐在田埂上，让我坐到他身边，随后和蔼地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怎么样参加革命的。我逐一做了回答。毛委员听了幽默地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接着又说：“我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有不少陕西省籍的学生。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中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他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毛委员这番话使我心中豁亮。

十月二十二日，工农革命军主力进占大汾圩。当天晚上，毛委员来到第四连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他先向连党代表罗荣桓询问了新党员的情况，然后，让罗党代表召集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地点就在第四连宿营地一家地主的房子阁楼上。参加入党仪式的除八名新党员外，还有连党代表罗荣桓、连长曾士峨和我三个党员干部。屋里的气氛很庄严，桌子上点了一盏小煤油灯，光线虽然不很亮，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墙上挂着一面党旗，这是一小块红布，上面临时写上“CCP”三个大英文字母。毛委员亲自主持入党仪式，他先向大家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大意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反帝反封建，领导民主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最高纲领是为实现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要起先锋模范作用。他讲话后，带领新党员面向党旗宣誓：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服从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这次入党宣誓仪式的情景，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里，终生难忘。

十月二十三日大将破晓，部队突然受至饭动地主武装肖家壁部的袭击，由于不了解敌人情况，部队临时紧急集合，撤出大汾圩。撤退时，又因联络不够严密，团部带直属队和第一营一部走向井冈山，第三营却向南走到桂东方向。第三营后来在崇义县上堡和朱德、陈毅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直到十二月中旬才在茶陵和团直属队、第一营会合。

在撤离大汾圩时，毛委员跟我们特务连一道向井冈山前进。曾连长和罗党代表命我带特务连的一个排，负责警卫护送毛委员。由于连续长途行军，毛委员的脚背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战士们都要求绑个担架来抬毛委员，我把战士们的意见报告了毛委员，毛委员坚决不同意，他自己拄着竹棍子坚持和大家一道步行。我们是走荆竹山、双马石这条路上山的，走了一天就遇着王佐从井冈山派出来搞侦察的朱诗柳（后来担任过红四军三十一团便衣侦察队队长），他足本地人，情况很熟，毛委员就一路上和朱诗柳亲切交谈起来。当天晚上，天下着濛濛细雨，山上已有几分寒意，我们就在黄坳靠近荆竹山的路上宿营，那里有一栋独立房子，屋里只有一张床铺，主人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在这所简陋的房间住了一晚，我把床铺分给毛委员，毛委员让朱诗柳同他一起在床上睡，我同二十几个战士就在地铺上铺上禾草，睡在床的周围。毛委员睡下以后继续同朱诗柳交谈，我听到毛委员问朱诗柳，井冈山上有几个村子，多少人口，部出产些什么东西，从井冈山到五斗江、拿山、黄坳各有多少路，都经过一些什么地方，这几个地方各有多少人口等等。还问了附近遂川的肖家壁、李士廉等反动地主武装备有多少人 and 枪，他们压迫人民的情况等等。毛委员向朱诗柳这样一个衣衫褴褛，一看就知道抽大烟的人作调查，一直谈到深夜，而且在谈话中对他表现得很尊重。



我在一旁听着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十月二十四日，我们护送毛委员到达井冈山。上山之后，毛委员和我们特务连都驻在大井村。团直属队和第一营驻在大井、茨坪整训了半个多月。井冈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一座高峰，方圆五百五十里。周围有十五个市镇，山上有一片平地 and 许多梯田，王佐带领一支队伍住在山区的中心——茨坪；袁文才带领一支队伍住在茅坪。他们把守着通向井冈山的七条道路，五大哨口。十月末，井冈山上的天气已经很冷，战士们还穿着一身单衣，晚上睡在门板上或地上，用禾草当铺盖，我和罗党代表、曾连长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共盖一条栽绒的老虎毯子。当时，部队的衣着是靠上山前沿途打土豪来补充的，搞到什么穿什么，五花八门。饭食主要是山上出产的红米和南瓜，干部和战士吃的完全一样。生活虽然很艰苦，但由于大家都有一股革命热情，以苦为荣，也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了。训练、工作之余，罗荣桓从一个土豪家里找到一本《野人记》，我们三个人轮流青看，这是当时唯一的消遣。十一月中旬，工农革命军下山攻打茶陵。这次战斗，毛委员因为磨伤脚背还没有痊愈，不能随部队行动，留在井冈山上养病。部队由团长陈浩，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我们第二次打茶陵，县城里仍然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地主武装“挨户团”，这些家伙听见枪声就跑，不堪一击，工农革命军很顺利地占领了茶陵县城。随即派谭淬生任第一任县长，谭是安徽人，曾任安徽省某县县长，四一二事变后投奔武汉，是鄂南暴动的领导人之一，暴动前在武汉政府的通城县政府任科长。他同罗荣桓熟识，常来第四连聊天，所以我也认识他。全国解放后我到南京参观时，才知道谭淬生后来牺牲在南京雨花台。谭淬生领导的县政府，只能按旧政府那一套方法办事，款子靠商会派，没有发动群众。后来，毛委员写信告诉他们要选举成立工农兵政府，要有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经过选举，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当选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由士兵组织宣传队分头下乡，组织农会、工会、妇女会，在茶陵县周围各乡部建立了革命组织。在部队向茶陵县城前进，途经坑口村的时候，同少数地主武装打了一仗，我腿部负了伤，伤势虽然不算太重，但不能行走，行军靠骑牲口，随时都有掉队的危险，但这已是天大的幸事。秋收起义时的伤病员，由于没有随军医疗的条件，多半部在行军转移途中掉队失踪，只有少数有计划地安置在群众家中；有的负伤干部有条件回家疗养或到城市就医，就发给足够的费用，设法送出去安置。我负伤后能够随队医疗，这在秋收起义后还是没有先例的。从此时起我离开工作岗位，过了三个月的伤员生活。我军建军初期的医疗条件是很差的，当时部队编制没有正式的医生，只有两名在长沙医院做过看护的同志负责医疗工作，他们只会给伤员上药，而且药品也很少，也没有什么医疗器械，就用竹子削成竹签代替探针来上药，他们也不懂得严格消毒，虽然每天照例给我换药、换纱布，但我的伤口不见好转。后来，在茶陵县城找了一个江湖中医给我治疗，这个人也没有什么真本事，还闹了不少笑话，他说什么鸭毛最干净啦，用冰片撒庄伤口上就清凉啦，吹嘘他准能治好我的伤口。经他这样一折腾，我的伤口反而越治越坏了。直拖到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攻打茶陵，面对数倍于我的优势敌人，为了保存实力，我军在一天傍晚退出茶陵，将我转送到工农革命军设在宁冈县茅坪的医院。茅坪的医院其实算不得什么医院，只是把伤员集中起来治疗的一个点，后来在小井建立的红军医院才稍微象个样。当时，茅坪医院里有几位井冈山本地的好中医。他们用自己在山上采集的中草药给我治疗，这种草药颇有效，

敷在伤口上，很快就把脓血吸了出来，然后再换贴一种土膏药，不久我的伤口就痊愈了。

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以后，毛泽东总结了茶陵战斗和工农兵县政府工作经验，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工农革命军退出茶陵县城的前一天，第三营由桂东回到茶陵归队，他们带来了南昌起义部队一部来到湖南的消息，第三营指战员也全部换上新衣服。部队退出茶陵的时候，和国民党湘军第八军吴尚部的一个团打了一个消耗战。部队从茶陵半夜撤到湖口，团长陈浩、团附韩壮剑、参谋长徐庶私下议论，要把部队往南带，可以投降方鼎英（湖南军阀，曾在黄埔军校当过入伍生部主任）。他们的议论被宛希先听见了，正巧毛委员下山赶到湖口，宛希先就向毛委员报告了陈浩等三人的情况。毛委员第二天就把部队带到宁冈的砦市休整，在那里住了几天，把陈浩等要叛变的事情弄清楚，就召开大会，宣布了陈浩等三人的叛变投敌罪行，并立即执行枪决。陈浩被枪决后，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由第三营营长张子清担任。部队随后从砦市回到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工农革命军打开遂川县城，建立了遂川县工农政府，并在宁冈、遂川周围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使党的影响日益扩大。二月十八日，攻克宁冈县城（新城），全歼赣敌一个营。接着，在宁冈大陇将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实际上带兵的是王佐。同时，成立了宁冈县工农政府。

我在二月下旬从茅坪医院伤愈出院。回队后，我先在茅坪八角亭的团部休息了几天，组织上调我到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二连任副连长，连长是谭希林。

##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建立

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旬，湘南特委要求工农革命军取消前委，军队不管地方工作，并指示工农革命军开往湘南，配合湘南暴动。于是，毛泽东同志任第一师师长、率第一团和第二团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湘南进军。这时，江西国民党军队一个团进到宁冈县（新城）向井冈山进攻，当时在该团的罗炳辉带先头营尾追革命军，工农革命军以第一团一营为后卫，在酃县沔渡抗击敌人，击伤了罗炳辉，阻止了敌人追击。后来罗炳辉起义当了红军，还经常谈起这件事。在沔渡战斗中，敌人俘去我军在新城战斗中负重伤的排长李耀灵（中共党员）和战士五、六人。李耀灵是云南人。被俘伤愈后在罗炳辉部当传令班长，后来在吉安和地下党取得联系，罗炳辉在吉安起义的时候，他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起义执行任务时，李耀灵同志不幸壮烈牺牲。大约在三月十日前后，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进到酃县中村圩工作了十多天。在这期间，部队派出宣传队到附近村子做地方工作，毛泽东给排以上干部上了一次政治课，讲课的题目是《关于无产阶级》，目的在于使干部们懂得无产阶级是产业工人，不是无产游民；提高干部政治水平，自觉地抵制和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湘南暴动中“左”倾盲动主义者提出烧杀政策的理论是：“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它会使革命斗争变成恐怖行动，把自己孤立起来，反而帮助了敌人。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教育，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所到之处，很少烧杀行为，受到广大群众拥护。

第一团在中村工作的时候，团士兵委员会还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向全团指战员报告士兵委员会三个月的工作情况，宣布了给团教导队一位排长的处分决定。这位排长因为和教导队队长吕赤（四川人，黄埔四期毕业生）擦拭打土豪收缴来的手枪时，不慎走了火，吕赤同志不幸中弹身亡。毛泽东知道这件事以后，指示士兵委员会去处理。经士兵委员会讨论并经毛泽东同志批准，决定给这位排长打四十下手板的处分，以示惩戒，通过这件事也体现士兵委员会在部队中的地位。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三湾改编”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度，发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以后又加上军事民主，称为三大民主），部队的建设有了很大加强。通过士兵委员会的活动使广大干部，战士懂得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亲身感受到士兵委员会是代表士兵利益的，部队的作战和工作不但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为整个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利益而奋斗。士兵委员会在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克服军阀主义残余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部队从旧军队沿袭下来的雇佣思想和生活习气，也得到一些纠正。因而部队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干部、战士都自觉地遵守纪律，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努力完成各项任务。士兵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大约是同年的三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在桂东县韩岭坳打垮了地方地主武装胡凤章部，并进驻桂东的沙田圩。部队在沙田圩停留了半个月，主要任务是做地方工作。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以班、排为单位，组织工作组，到各村去调查阶级斗争情况，宣传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地主豪绅剥削穷人的罪恶，宣传劳动大众不起来闹革命一辈子也不能翻身的道理，启发、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经过深入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当地的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打土豪、打劣绅，分田地、分浮财，并建立了工农政府和共产党的组织，赤卫队和游击队也同时组织起来了。我们第二连每天的工作情况是

由各工作组组长向连党代表蔡钟汇报，再由他向毛泽东同志作综合汇报。毛泽东同志及时指出我们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推广好的作法，使全部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在沙田圩短短十多天的实践，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部队初步学会了群众工作的方法，懂得了干革命光靠军队不行，而要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才能壮大人民革命武装，发展红色政权。

在部队结束了沙田圩工作，准备向汝城行动之前，毛泽东在沙田圩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征求大家对地方工作的意见，研究部队下一步行动的方向。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讲了“插牌子分田给农民”（在竹牌上写明某田，地多少亩，分配给某人）的重要性，建立红色政权和武装群众的必要性，还讲了在沙田圩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可能性。以后形势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见是十分英明正确的。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重新强调了一九二八年一月间在遂川宣布的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即：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并且第一次宣布了六项注意，即：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公布和实行这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当时是彻底改造雇佣军制度，建立真正的人民军队的重大措施。在此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为我军光荣革命传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四月上旬，工农革命军第一团配合湘南起义部队行动，进占汝城县城。县城里没有敌人正规军，只有地主武装何其朗部，他们在我军到达之前即闻风逃跑了。部队在汝城工作了一个多星期，汝城较桂东繁华，我军筹集了一批经费和物资，以后就主动撤离汝城向资兴方向行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对于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的领导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在湘南暴动中一些盲动主义的作法影响下，也有些人主张烧杀的，这些人盲目地认为，烧杀政策是党中央的精神。四月十日前后，部队退出汝城县城的时候，在一天夜晚，上级就曾命令我带一个排去烧房子，由于有毛泽东同志在中村圩的教导，我当时只是敷衍了事地执行任务，没有挨户去烧，只找了两家大一点的商号去烧，并且在放火之前先把主人从床上叫醒，我们一边放火，主人就一边灭火，我们走后，火很快就扑灭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这种大烧大杀的“赤色恐怖”后果是严重的。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坚决抵制，井冈山周围凡个县才没有搞烧杀，避免造成群众损失。

四月中旬，由于湘、粤军阀范石生和何键的部队进逼，朱德和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由永兴、耒阳、资兴向酃县井冈山地区移动。毛泽东同志得到消息以后，立即率领工农革命军经八面山彭公庙回井冈山，和朱德同志率领的部队在酃县地区会师。这时湘敌吴尚部紧紧尾追朱德的部队，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坚决掩护朱德部队的转移，毛泽东同志命张子清团长带一个营担任阻击任务，迫使敌人停止追击，保证了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张子清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张子清同志是湖南益阳人，在湘军讲武堂毕业，中共党员，当时他年纪稍大一些，秋收起义时在第三团当营长，这次负伤以后，长期医治不好，一九三一年就去世了。

朱、毛两支部队先后抵达宁冈砦市。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这天风和日丽，巍峨的井冈山显得特别清新青翠。在山明水秀的砦市南边一个大草坪上，

用门板和竹竿搭起一个主席台，周围红旗飘扬，军号嘹亮，鞭炮声不绝于耳，一片人山人海，两支革命部队在这里举行胜利会师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大会执行主席陈毅首先讲话，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来开大会庆祝会师，有特别的重要意义。接着他宣布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和毛泽东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红军的光明前途，现在我们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他们希望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红军一定要保卫群众分田的利益，保卫红色根据地。他们的讲话使大家增强了取得革命胜利的信心，全场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由陈毅担任。朱部编为第十师，朱德兼师长，下辖由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编成的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湘南宜章县起义农军编成的第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毛泽东兼师长，下辖第三十一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张子清负伤，由朱云卿代团长；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部改为第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湘南起义的其他各县农军编为第十二师，陈毅兼师长，这个师实际为群众性的武装组织，不是正规战斗部队。从此，进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新历史阶段。大会开完以后，朱德在主席台旁集合第三十一团连以上干部讲话，这是第三十一团干部第一次听朱德同志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帝国主义国家要瓜分中国，他们各支持一派军阀，因而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不会结束，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就有办法了，红军可以占领几个州、县“蹲起来”。朱德那年四十二岁，脸盘黑黝黝的，身材魁梧，看起来很精神，说话老是乐呵呵的。他身穿破旧的军衣，腰间系着皮子弹带，肩上斜挎着驳壳枪，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红四军成立以后，朱德军长率领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向遂川方向行动，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五斗江打垮了赣敌一个团，乘胜追击，在五月七日首次进占永新县城。红三十一团第一营奉命单独行动，由营长负一民、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到茶陵县的高陇收集报纸。当时还没有无线电联络和电讯广播，红军的情报主要靠派人出去侦察和收集研究报纸获得。毛泽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茶陵县的高陇是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家乡，这里上层人士文化程度较高，豪绅地主多与外地有联系，所以红军选定到高陇去收集报纸。在这次执行任务中，收集报纸的任务是完成了，但是第二天和湘敌吴尚的第八军一个团遭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第一营在这次战斗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营长负一民（山西平陆人）阵亡，三连连长张金泉（河南安阳人）负重伤后牺牲，第二连的排长韩伟和徐扬两同志负伤。我带二连一个排在高陇村边隔河守住一个桥头，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最后掩护部队和伤员撤出战斗。五月中旬，红三十一团第一营在永新西乡和红四军主力红二十八团等部队会合。在永新县草市拗和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杨如轩师的第七十九团遭遇，把这个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敌人全部歼灭，敌团长刘胡子也被击毙。部队乘胜第二次攻进永新县城，敌师长杨如轩在逃跑时被击伤。永新是敌人进攻红军的基地，这一仗，迫使敌人全部向吉安撤退。随着新区工作的深入发展，各县部组织起地方武装。我在草市拗战斗后，调往永新县任游击大队长。永新县的地方武装发展最快，农民中的活动分子能离开家的都积极参加游击队，游击大队迅速扩展到三四百人，并从敌人散兵那里搞到几十支枪。各乡的游击队和赤卫队也发展到几千人，这些地方武装的性质和红军一样，脱离生产，以

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辗转于永新县内作战，有时也到外地和敌人作战，这些地方武装对于巩固新区起到很大作用。

## 参加保卫井冈山的战斗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军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联合组织第一次“会剿”。江西军阀朱培德以杨池生带五个团进到永新，红军主动退出永新山二一县城。敌人占领永新县城以后，向宁冈县推进，永新到宁冈要经过七溪岭，而经七溪岭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叫老七溪岭，另一条叫新七溪岭，敌人分两路走，企图袭击宁冈新城。朱德同志指挥红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红二十九团在新七溪岭阻击敌人。令红二十八团从老七溪岭向龙源口迂回，抄新七溪岭敌人的后路。我带领永新县游击大队连夜赶往龙源口，配合主力行动。永新县的其他游击队和赤卫队也带着梭镖前去助战。

战斗从早上打响，群众把山上许多树放倒，把敌人的后路堵住，敌人进了新七溪就退不下来了，红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红二十九团在前边把敌人拦住，红二十八团很快包抄敌人的后路。红二十八团战斗力比较强，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敌人走新七溪岭的一路有三个团，被红军歼灭了一个团，另两个团溃不成军，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一起追击，打到下午三点多钟，红军一直冲进永新县城，这就是“龙源口大捷”。我们永新县大队收缴了被红军击溃的敌人百余支枪。红军粉碎了湘赣敌人的第一次“会剿”，第三次解放了永新县城，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自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工农革命军从打下遂川和新城之后，毛泽东同志就一再强调优待俘虏政策，这对于瓦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之前，有的部队把俘虏杀了，以图报复。新城战斗后，实行优待俘虏政策，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家。这次龙源口大捷，俘虏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伤兵，毛泽东同志命令把他们都送到红军医院治疗，治好以后把他们放回去，有的俘虏被感动了，坚决要求留下来当红军。那些放回去的俘虏都成了红军“宣传员”，以后还经常有些国民党兵跑过来当红军。江西军阀杨如轩、杨池生的部队原来比较反动，后来受了我们优待俘虏政策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这样，我们红军的士气越来越高涨，而敌人的士气却越来越低落。六月二十五日，部队驻永新城郊三门前村，我被调到红三十一团第二连当连长，原来的连长郑立平因为在新七溪岭战斗中作战不力，被撤职。我带第二连开到永新县最东边的石灰桥地区做地方工作，并向吉安方向游击警戒。当时的地方工作主要是打上豪分田地，这个工作从一九二八年春天就开始了，我们没收地主的田地和富农多余的田地，进行平均分配，那时还没有土地法，插牌分田以后，农民保田的积极性很高，国民党军队一来进攻，农民就真心实意地帮助红军。七月上半月，我们第二连奉命单独行动，到莲花县配合县委坚持游击战争，第二连以县城附近的吾塘村为中心，经常以班、排为单位，向茶陵方向的九路冲或经莲花县城向福安方向活动，对巩固莲花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好的作用。八月上旬，我们又奉命开到永新县的小江区，并指挥红三十一团特务连，以小江区九陂村为中心，坚持永新西南西乡的游击战争。小江区在井冈山北面，背靠九龙山，这里的形势可以发展成很好的游击根据地。当时第二连的干部是：连长张宗逊，连党代表谭国清，副连长韩伟，排长赖毅、魏协安（以后任红军师长，第五次反“围剿”中阵亡）、洪楚材，司务长蒋芳，文书沈联雄（以后任红军团政委，第四次反“围剿”中阵亡）。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高自立。

龙源口大捷以后，湖南省委来信要红军到湘南去活动。毛泽东同志在永新召开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毛泽东同志分析了

当时的形势，认为江西军阀杨如轩、杨池生部被我们打垮了，江西的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采取攻势；而湘南的部队和农军、地方党组织全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加上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烧杀政策，湘南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这一带已成了白区，所以不宜到湘南去；当前，应该把部队分下去，象永新那样，把附近几个县的群众也组织起来。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并形成决议“红四军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继续巩固与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后，毛泽东同志继续留在永新地区组织群众武装，布置后方各项工作，并指挥红三十一团到永新、莲花一带做地方工作；朱德和陈毅同志率领红二十八团和红二十九团进到湘敌盘踞的酃县、茶陵做地方工作。红二十八团和红二十九团到了酃县以后，红二十九团一些同志又要求到湘南去，他们是湘南的农军，家乡观念较重，认为湘南空虚，很容易占领。由于毛泽东同志不在，虽然有些同志力争要遵守联席会议决议，但错误意见还是占了上风，加上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坚持要红军去湘南，周而两个团部去了湘南。结果，两个团打郴州，打开了郴州城。不久敌军进行反扑，在优势的敌军进攻面前，红军退出郴州。在退出郴州以后，红二十九团的下级干部和士兵家乡观念重，跑散回家了，只剩下一些骨干，被红二十八团收容。红二十八团知道孤军深入很不利，才退往井冈山，在桂东县境里活动了半个多月。这时，毛泽东在永新夏幽指挥红三十一团，在永新县广大群众支援下，将江西军阀部队十一个团，围困在永新县附近达二十五天之久，并坚持了莲花县的群众斗争，使莲花县境内全无敌踪。八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得知红二十八团和红二十九团下山去湘南的消息，预见到形势不利，立即带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湘南方向寻找，终于在桂东找到红二十八团。在毛泽东同志带着部队从桂东返回井冈山地区时，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他擅自带第二营离开大队，团长王尔琢赶去追回第二营，但他却被袁崇全打死。当时称这次失败为“八月失败”，这个教训是很深重的，说明毛泽东同志反复倡导的建设革命根据地不能脱离群众的思想，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掉。回顾红军在永新县的斗争经验，我们几次解放永新，甚至把敌人十一个团围困赶走，靠的就是永新县广大人民群众。那时一直是敌强我弱，红军的兵力很少，但是群众感到红军是靠山，有了红军他们就能赶走地主豪绅，红军保护他们的田地和财产，群众的斗争性增强了，不但积极支援红军、甚至直接参加作战。龙源口战斗，敌人有一个师，人多武器也强，由于游击队、赤卫军和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战，使敌军摸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兵力，但见满山都是人，结果张惶失措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没有群众有组织的支援，红军是不可能打败这样强大的敌人的。毛泽东同志去湘南以后，红三十一团代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率领团直属队和第一营的第一连、第三连到宁冈县去活动，并向酃县方向警戒。以蔡会文为书记临时组织的行动委员会，率领红三十一团第二连和特务连以及地方武装，依靠永新县小江区根据地，坚持永新西南区和莲花县的游击战争。在此期间我听蔡会文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术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感到这些原则完全符合当时作战的实际，是十分正确的。八月三十日，湘敌吴尚部想趁红军主力在湘南未回井冈山之机，抢在赣敌前边孤军占领井冈山，向井冈山发起进攻。红军坚决还击，发生了有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讲到黄洋界战斗时，他说：“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就是指红三十一团第一营缺我



们第二连，将敌人打退。当时防守黄洋界的部队是红三十一团第一营两个步兵连和团部机炮连，机炮连实际上只有二十多人，有两挺旱机关枪，两门迫击炮只有几发炮弹。由团长朱云卿和团党代表何挺颖、第一营营长陈毅安指挥。第一连连长王良，连党代表刘型；第三连连长曾士峨，连党代表黄益善；机炮连连长冯鸣钟，这个连没有党代表。黄洋界是五大哨口之一，在井冈山西北面，海拔一千三百多米，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其他地方都是悬崖陡坡，地形险要，但是山上缺少粮食，更缺枪支弹药。何挺颖把山上军民甚至伤员都动员起来，加修工事，架起上炮，埋设土地雷和竹钉，采取各种手段来对付敌军。敌军发起进攻时，先用炮轰，给红军造成一点损失，但是当他们用步兵向山上冲锋时，却尝尽了苦头，被红军和赤卫军的土枪、土炮和土地雷杀伤了不少。我们仅有的几发炮弹，都命中敌人的指挥所。湘敌是越过湖南边界“进剿”的，他们得不到江西地方的支持，补给困难，在遭到红军迎头痛击之后，连夜仓皇逃回湖南境内。我们第二连接到赶回井冈山作战的命令，星夜由永新小江区往回返，当我们在八月三十一日到达黄洋界的时候，敌人已经在头一天夜里逃走了。黄洋界战斗之后，红三十一团第一营就在宁冈县的茅坪村地区休整待机。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由桂东经遂川县城回到井冈山地区。这时，盘踞在宁冈县新城的赣敌周浑无旅一部，伙同当地地主武装靖卫团，企图偷袭湘赣边党政机关所在地的茅坪。红军获得情报之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在十月一日秘密赶回茅坪，全部红军在敌人必经之路布置了一个口袋阵，伏击了敌军大队，将周浑无部击溃，红军乘胜追击，歼敌一部，进占新城，收复了宁冈县全境。十一月九日，红军在新七溪岭又击溃周浑元旅一个团，并向永新方向追击，乘势一直追到永新县城下。至此，红四军击败了周浑无旅，迫使赣敌转入防御，湘敌也不得不退守酃县一带。敌人费尽心机组织的湘赣第二次：“会剿”又被粉碎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恢复。但是，井冈山上的粮食越来越困难，每人每大几分钱的菜金也保证不了，穿的是把打土豪得来的衣服改一改，把长袍子改成短衣服，真是五颜六色，穿什么的都有。为了解决山上粮食问题，朱德军长亲自带队下山挑粮。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红三十一团第一营到遂川县左安地区做地方工作，主要进行筹款。十二月上旬，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到莲花县和红四军部队会合。十二月十一日，在宁冈新城城墙外举行了红四军和红五军胜利会师联欢会，毛委员、朱军长、彭德怀军长、滕代远党代表在会上讲了话，红三十一团参加了这次大会。以后，红五军部队就开上井冈山。此时，湘赣两省军阀又纠集重兵，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会剿”。为了粉碎湘赣敌人的“会剿”，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六日，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会议。毛委员分析这次敌人未势很猛，我们不能死守，应该以一部分守山，一部分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分散敌人的兵力。会议决定，红五军并指挥红四军后方单位和红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行动，调动和分散敌人兵力，以便将其各个击破，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月十四日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我们从此离开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是红四军下山，没能达到把敌人调开的目的，敌人派一部分兵力追赶红四军，依然调动了湘赣粤三省大军围攻井冈山。一月十七日，敌人开始分路向井冈山猛攻，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团以及井冈山群众和敌人进行了七天七夜战斗，大量杀伤敌人。最后，彭德怀同志为了保存红军实力，除留少数部队在山上坚持游击战争，红五军

主力从井冈山上撤退突出敌军重围。到三、四月间，爆发蒋、桂军阀战争，井冈山上的反动军队下山投入军阀混战，红五军主力又返回井冈山。

### 第三章 进军赣南闽西

## 开辟赣南

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进军。当时，前委知道东固地区有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在活动，这是赣西、赣南起义建立的革命武装。赣南一带是山区，回旋余地大，物产也比较丰富，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前委计划和这支红军会合，但是走哪条路线好呢？经过研究，认为走泰和与万安之间渡过赣江的路线有点冒险，决定绕过赣江天险走赣江的上游，和红二、四团会合。

红四军以红二十八团为前卫，途经营前圩、崇义县城，在一月二十三日出敌不意，一举攻占大庾县城，沿途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一月二十四日中午，赣敌李文彬旅等部由遂川向大庾县进攻。红四军在大庾县南边的平顶坳和敌军打了一仗，由于敌众我寡，红军退出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红三十一团第一营代营长周航同志（湖南耒阳人）阵亡，红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部队退出平顶坳战斗转移的时候，由于红二十八团团团长林彪失职，致使抬着何挺颖的部分后方人员走错了方向，部队向南，他们向东，和部队失掉联络，路上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何挺颖不幸牺牲。何挺颖是陕西南郑人，上海大学学生，是一位优秀的团党代表，他作战勇敢，工作深入实际，在部队中威信很高。他牺牲时才二十四岁，是红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平顶坳战斗以后，红四军经广东南雄、江西信丰、虔南（今全南）龙南、定南、安远等县的农村，为了摆脱敌人，部队每日平均急行军九十里以上，时值严冬，沿途饮食、住宿都十分困难。二月二日，红四军进到江西寻乌县的吉潭圩和以南的项山地区，原来打算在赣、粤、闽三省交界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二月四日，突然遭到赣敌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两个团的袭击。林彪指挥警戒部队，在敌人进攻时，抵抗不坚决，致使红四军军部和军直属队被敌人冲击，遭受损失，朱德军长也险遭不测。朱德军长亲自指挥部队边阻击敌人，边撤退，朱德军长的夫人吴玉兰被敌人俘虏。

由于赣敌重兵跟踪，红四军刚到寻乌地区，情况不熟悉，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遂放弃了原来在赣、粤、闽三省交界地区建立游击区的计划。我们利用敌军封建割据、互相未经高级协商谁都不能跨越省界行动的弱点，在三省地区用行动来迷惑敌人。红四军先从江西进入广东，再由广东进到福建，两天走了三省的地界，很顺利地把江西的敌军甩掉了。在红四军下井冈山时，衣服本来穿得不够，这时连日急行军，衣着得不到补充，有的指战员赤着双脚踏雪爬山，很是艰苦，但是从没有人叫困难的，大家团结一致，终于渡过了难关。为了隐蔽红军的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前委在项山地区做出决定：将红四军的团、营、连番号改为纵队、支队和大队。红二十八团改称红四军第一纵队，红三十一团改称红四军第三纵队。因为红二十九团在“八月失败”时散掉了，红三十二团没下井冈山，当时实际只编了两个纵队。离开项山地区以后，大约是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由军直属特务营、独立营和第二十八团的两个连组建了第二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第二纵队司令员由朱德兼任，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每个纵队都编有两个支队。我在项山地区，即由红三十一团第二连调到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九支队（红三十一团第三营）任副支队长，支队长是陈正春（湖南平江人），党代表罗荣桓。红四军离开项山地区以后，沿闽赣边境向北，走出山地，经福建武平县所属的农村，折向江西瑞金县郊区。我们第三纵队九支队担任前卫，我奉命带一个大队（连）进入瑞金县城内，到邮政局收集报纸和检查有关军情的邮件，从中得到了赣

敌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肖致平团尾追红军到瑞金附近的消息。我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军部，军部认为这部敌军是孤军冒进，决定红四军转移到大柏地地区诱歼这股敌人。

二月九日，红四军进到大柏地地区，十日在大柏地休息了一天。十一日正是大年初一，红四军大部在大柏地附近一个谷地两侧，隐蔽地占领了有利地形，中间是敌军必经之路。上午，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我们设伏地区，红军立刻发起攻击，一部从正面攻击敌人，一部绕到敌人侧后包围敌军。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我们第九支队是军的预备队，战斗打到关键阶段，我奉命带一个大队上去增援，由正面向敌军冲击，配合友邻将敌人打垮，一口气追击了二十多里路。这次战斗，红军打死打伤了敌官兵不计其数，俘虏了敌团长肖致平及其以下八百余人，缴获许多武器。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战斗结束后，朱德军长集合部队讲话，他首先表扬全体参战部队这一仗打得好，鼓励大家争取打更大的胜仗。接着，他严厉地批评了二位支队长在战斗中向军部要求补充子弹的事。朱德军长说：军部哪里有子弹来补充部队呢？这完全是斗志不坚决的表现嘛。

当晚，部队返回大柏地附近宿营。到达宿营地已是深夜了，部队住得很乱，我把自己带领的部队安排住下以后，便带着两个传令兵和传令班长去找支队部的驻地，但是找了很久，没有找着。打了一天仗，我们又饿又疲劳，走到一座桥上，有间看桥人住的小屋，主人逃跑了，我们四个人就到屋里过夜，看到主人放着过年的食品，传令班长就动手点柴禾来做，我们四个人把食品吃光，柴禾也烧掉了。这是一件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后来我一直记着，避免重犯。大柏地战斗以后，敌情暂时有所缓和。红四军经长胜圩、宁都县城，在二月十七日到达吉安县的东固地区。中途在宁都县城休息了两天，城里的地主武装在红军到达之前溜走了，我们向商会筹了些款。东固是红军独立二团、四团的游击根据地，当时他们多是分散进行游击活动，红四军在东固很快就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二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和红二、四团召开会师联欢大会，毛泽东和朱德红二、四团的领导李文林及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红四军在东固休息了一个星期。这时，赣敌李文彬旅追到宁都县城，但是鉴于肖致平等部惨败的教训，他们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前走，几天才逼近东固。前委曾经考虑和红二、四团共同在东固附近歼灭这股敌军，但又想到红二、四团没有和敌军主力作战的经验，只好作罢。红四军把伤员安置在东固地区，把一部分多余的枪支交给红二、四团，然后经藤田圩、苦竹圩到达广昌县城，在那里又休息了两天，并筹了一些款。后来又经赤水、驿前在三月九日进到石城县附近，县城里有地主武装坚守，红军没有进城。就在这个时候，第九支队队长陈正春被敌人冷枪击中牺牲，我奉命接任支队长，周昆任副支队长，支队党代表仍是罗荣桓。第九支队所属第二十五大队大队长孙玉卿，第二十六大队大队长徐扬，第二十七大队大队长赵剑吾。各大队的党代表姓名已记不起来了。

这时，红四军前委鉴于赣敌逼近，并得知井冈山的红五军已向赣南转移，即向福建边境前进。

## 转战闽西

三月上旬，红四军经任田市、瑞金城东十余里处（没有进瑞金县城），向东越过福建省边界，进到长汀县的四都地区，接着向长汀县城前进。驻守长汀县是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队，郭凤鸣急忙派一个团在长汀县城南长岭寨山地设防，另一个团在三月十三日由长汀向四都攻击红军。长汀县城没有城墙，敌人在距离长汀二十里路的长岭寨也没有修筑什么工事。三月十四日，我们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担任前卫，伍中豪司令员跟在第九支队后面行进。走到长岭寨山下，我们发现山上有少数敌人活动，伍中豪司令员立即下命令向山上敌人发起攻击，部队只一个冲锋，就占领了长岭寨的制高点。原来这是郭凤鸣部从长汀开往四都的先头部队，他们没想到红军来得那么快，敌人先头部队被打垮了，后续的部队扭头就向长汀县城溃退。我们红军的后续部队也上来了，随即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第三纵队在左翼，第一纵队在右翼，紧紧咬住敌人追杀。红军一直打到长汀，占领全城，在战斗中击毙了郭凤鸣，全歼该旅二千余人，缴获大量弹药和各种枪支千余支。这一胜利，震动了闽西，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红军在长汀休整了半个多月，部队在长汀城周围做群众工作。长汀的条件比山区各县强多了，我们没收了地主豪绅的粮食和物资，从富裕商户处筹建了一笔军费。在长汀正式改换了纵队、支队和大队的旗帜，全军每人发了两套灰色新军装，一顶缝有红五星的军帽，还有两块银洋的零用钱。这是自井冈山斗争以来，红四军在物质生活上最好的时期。

三月间，蒋桂军阀战争爆发，蒋介石为从李宗仁手中夺取湖南和湖北的地盘，把驻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调到九江一带，向武汉进攻，赣南敌情空虚。红四军前委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应趁军阀混战之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四月一日，红四军离开长汀乘势向赣南发展，分兵占领了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城和临近各县广大地区，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有的地方还建立公开的农会和游击队。红四军经过瑞金县城的时候，和由井冈山突围一度攻占于都县城来到瑞金的红五军会合。在此期间，我们第九支队奉命到赣州县的江口圩地区筹款，做群众工作。这时，由中共广东省委介绍回湖北的郭天民同志在江口圩参加了红军。第九支队在江口圩地区活动了十多天之后，又分别到会昌、寻乌、安远等县的广大农村地区筹款和做地方工作。

大约四月初，红四军前委收到党中央自上海写给毛泽东、朱德同志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形势做了悲观的估计，指示红四军：隐蔽部队目标，朱毛离开部队，把部队分散到农村去。这个消息很快在部队中流传开来，政治部还专门拟了一个到苏联去学习的干部名单，大队以上的上干差不多都上了这个名单。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红四军前委给党中央写了复信，指出：粤湘两省敌军强大，湘省更因我党的盲动主义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闽浙三省敌军最弱，我党的盲动主义错误较少，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我们要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红军要利用军阀混战的机会。在更大范围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红四军前委在部队中进行宣传教育，消除了“二月来信”的悲观情绪在红军中的影响。四月十一日，红四军前委在于都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彭德怀和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地区，建立以井冈山为基础的湘赣边苏区。红

四军主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继续在赣南地区进行了四十五天艰苦的斗争，在兴国、于都、宁都等县相继建立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其他县、区群众斗争也有了很大发展。四月底，蒋桂军阀在两湖的混战以桂系军阀退出武汉而告结束。江西军阀朱培德又集中三个旅向于都、兴国、宁都、瑞金推进，企图进攻红四军。到五月中旬，粤桂军阀又开始混战，闽西军阀陈国辉、张贞加入粤军讨桂阵营，其主力开赴潮汕作战，一时闽西空虚，龙岩只有陈国辉的留守部队。闽西特委将敌情变化通告红四军，要求红军再到闽西活动。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避开赣敌的进攻，在五月二十日第二次入闽，在长汀、武平和上杭等广大乡村地区筹款和做地方工作，消灭地主武装。这次入闽情况和上次情况不一样了，群众热烈欢迎红军，虽然福建的天气已经很炎热，但部队的情绪特别高涨。五月二十三日，红四军隐蔽集中在龙岩的大池、小池地区，然后直扑龙岩，陈国辉部留守的敌军不堪一击，残部逃往漳平、永福，红四军进入龙岩，这次歼敌两个营。为了把陈国辉的主力部队从广东引回龙岩加以歼灭，红四军在当天下午离开龙岩，南下坎市。逃往漳平、永福的龙岩守敌残部一面急电请陈国辉返回闽西。一面窜回龙岩。六月三日，红四军第三纵队二打龙岩，诱敌主力回援，守敌再次弃城逃跑。果然，陈国辉率其上力部队急如星火地从潮汕返回闽西。红四军第二次撤出龙岩，第三纵队和闽西红军会同第二纵队在大池集结，第一纵队离开坎市向上杭大洋坎集结。减轻陈国辉部回龙岩大路的威胁，以迷惑敌人。等陈国辉带着部队回到龙岩，红四军前委决定奔袭歼灭陈国辉部。

六月十九日拂晓，红四军和闽西红军从北、西、南三面突然向龙岩发起进攻。第三纵队主攻西北面，第一、二纵队主攻东北方向。龙岩没有城墙，工事也不多，陈国辉部队老兵痞子多，有一定战斗力，但这时还没有睡醒，没有防备。我们第九支队和第七支队在当日拂晓第一次冲锋就消灭了龙岩北面敌人的连、排哨，占领了控制龙岩的制高点，接着配合友邻向城内进攻。敌人依托民房逐屋和红军进行巷战，激战到下午两点，陈国辉化装带着几个人由南面向漳州方向逃跑，陈国辉部第一混成旅二千多人全部被歼。战斗结束以后，朱德军长骑着缴获敌人的自行车，到城里各处视察，战士们高兴地争着看军长骑自行车。这时候，闽西已经没有大股军阀部队存在了。

红四军在龙岩休息了一个多月，以龙岩为中心，分兵做群众工作，形成了包括龙岩、永定、上杭、长汀县南部广大农村和龙岩、永定两座县城的闽西根据地。我们第九支队进到永定的坎市地区做群众工作，当地盛产烟叶，是“建条”烟原料的产地。这时，闽西特委领导的红军，上升为正规红军，在新泉成立红四军第四纵队。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城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红四军自井冈山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不同认识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首先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呢？还是按照北伐军的老一套做法。军队只是单纯打仗，军事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仅仅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呢？在讨论发言中，多数同志，特别是军官同志多主张，仍按北伐军的经验办事。有的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有的主张由司令部出布告，办理民事，命令商会筹款等。在建设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有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应走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多数同志主张还是主要搞游击战，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等待全国总的起义，并认为走这一条路可以改善军队的物质生活。由于领导同志的

认识不一致，对这些争论的问题，会上没有得出结论。在组织上经过民主选举，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我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没有发言，回想起来，当时在政治上还很幼稚。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养病，陈毅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红四军工作由朱德主持。



## 古田会议

红四军在闽西的胜利，使敌人非常震惊。六月，蒋介石命令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但是，这三省敌军派系不同，互相不协调，行动缓慢。

七月下旬，赣敌一部经长汀进到河田，闽敌一部进到龙岩以南的适中。这时，红四军前委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福建省的福鼎地区有共产党活动。为了粉碎敌军的“会剿”，并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军长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这时第二纵队司令员是刘公安），在七月底从龙岩出发，经宁洋县向闽中前进。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红四军主力向东行进。八月中旬，红四军主力到达大田县城外，大田城筑有碉楼，又有城墙，以红军当时的装备情况，很难攻克。闽中各县城防状况大部这样，加上天气炎热，又正值雨季，病员增多，我们党在闽中没有群众工作基础，筹措给养困难。朱德军长在大田城外召集支队以上负责同志开会，经过研究，决定放弃进军闽中的计划，转回闽西。在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以后，闽敌即进占龙岩。红四军以第三纵队为前卫，向漳平前进。第一天，第三纵队以第七支队为前卫，在新桥附近和敌人三四百人打了一仗，把敌人击溃。在战斗中，第七支队二十一大队大队长陈龙鹤（朝鲜人，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毕业生）负重伤后牺牲。第二天，我们第九支队为第三纵队的前卫，行进到漳平附近，遇到一二百人的反动地主武装，敌人利用一条小河进行防御。小河的河水较深，伍中豪司令员带着我和各大队长到河边进行侦察，发现平静的河面中有一处稍有波纹，判定从那里可以徒涉，便布置火力掩护，部队在齐胸深的水中进行徒涉，成功到达对岸并击溃了敌人，部队无一伤亡。接着，朱德军长带着本队全部顺利地占领漳平。漳平守敌是闽敌张贞部，在红军到达的前一天就逃到漳州去了，驻龙岩的敌军也闻风而逃。红军在漳平筹款，做宣传工作，休息了三天之后，经白沙镇再次进入龙岩城，返回闽西革命根据地，敌人的“会剿”也就此收场了。红四军返回闽西以后，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前委决定集中第二、三纵队攻打上杭。盘踞上杭城的是郭凤鸣残部卢新铭团，大约有一千余人。上杭县城有古老的城墙，三面环水，地势险要，素有“铁上杭”之称，易守不易攻。根据守敌情况，朱德军长指示各部队要严密组织攻城准备工作。九月二十日拂晓，各部队按部署进行攻击，第三纵队担任城西北的主攻任务，第九支队在城北使用竹子做的云梯扒城强攻。敌卢新铭部战斗力极差，不堪一击，我们在天亮前就配合友军攻进城里，天亮后，就将守城敌军全部歼灭。第三天，朱德军长领着部队在城里游行示威。

红四军进占上杭以后，部队在上杭休息了半个多月，红四军在上杭召开了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我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会毛泽东、陈毅均未出席，会议只讨论了一般的工作问题，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这时，张发奎和李宗仁联合进攻粤系军阀陈济棠。

红四军接到党中央指示：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红军应乘机向东江地区出击，向潮梅发展。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第四纵队留在闽西根据地，军部率第一、二、三纵队向东江进军。十月二十五日，红军进占梅县县城，驻了一天，因为广东敌军进攻，旋即退出，撤到梅县以南的游击根据地马头地区。当地党组织的基础较好，红四军深夜徒涉梅江时，当地群众（主要是妇女）手举火把，在梅江浅水线上设立标记，为部队引路，群众热烈拥护部

队的盛况是其他地区少见的，部队指战员都深深被感动，对士气鼓舞很大。红四军在马头地区休息了三天，将伤病员安置在当地群众家中。根据当地群众报告，进占梅县的敌人只有一个团（实际上却是一个师），在东江特委要求下，十月三十一日拂晓，红四军再次进攻梅县城。敌人凭城死守，战斗进行了一整天，没有打开，虽然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红军伤亡也很大。攻城时，第九支队担任北面主攻，连续发起三次冲锋，部队伤亡了三十余人，党代表罗荣桓也负了伤。在这次战斗中，第二十七大队大队长阵亡，这位大队长的姓名我忘记了，只记得他是浙江人，莫斯科步校毕业生，才回网不久，到红四军任大队长不几天。红军撤出梅县战斗以后，前委判断粤敌会继续增兵，不能滞留在东江地区作战，便经江西安远、寻乌逐步转回到长汀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罗荣桓养伤期间，杨立三代理第九支队党代表一个多月。此时，陈毅同志由上海党中央回到了部队，带回“中央九月来信”。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长汀，重新回到部队工作。二十八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红四军第一、二纵队集中在连城县新泉，第三纵队集中在龙岩地区进行整训。第九支队进驻龙岩县城，向漳州方向警戒，这是红军又一次进龙岩城。这时，毛泽东在上杭古田村主持了党代表联席会议，为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会议开了半个月。第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伤愈以后，去古田村参加了党代表联席会。大约在十二月下旬，即“古田会议”将要召开的时候，第九支队由龙岩县城开到古田村。红四军的其他部队也都靠近古田村。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自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到三十日结束，共开了三天。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由陈毅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听了陈毅汇报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并代表中央给红四军写了“中央九月来信”。在党代表联席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听取了各组讨论意见，根据调查及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第九次党代表会主要是通过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会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拥护这个决议。会上，朱德军长做了军事报告，陈毅同志讲了话。实际上正式会议只开了两天，第三天是朱德军长集合中队以上的军事干部演习，将过去沿用北伐军的班、排、连的横队集合队形，增加了班、排、连的纵队集合队形，即我军现行《队列条令》上的班、排、连纵队和连并列纵队集合队形：把散兵线由一字形改为人字形。“古田会议”总结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起义到一九二九年这两年零四个月时间内红四军的建军经验。会议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必须置于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在政治上，要树立坚强的政权观念和群众观念，克服单纯军事观念和流寇思想；在思想上，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在组织上，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要把红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必须把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他列举了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并提出纠正方法。会议的这个决议，完全划清了红军和一切旧军队的界限，形成了我军的建军原则，为把红军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会议最后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十一人为委员的新前委。红四军和赣南、闽西的地方武装，首先学习和贯彻这个

决议，部队受到教育以后，纪律加强了，内部团结更好了，战斗力提高了，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 巩固赣南、闽西苏区

红四军再度入闽，闽西六县全面暴动，大大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蒋介石便组织赣粤闽三省军队对闽西进行第二次“会剿”，命令江西的金汉鼎、福建的刘和鼎、广东的陈维远等部，向闽西进逼。红四军前委根据敌情，决定毛泽东同志率第二纵队在小池准备阻击敌人，朱德同志率第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开往连城，在那一带展开工作，筹措给养。前委当时的口号是巩固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实现“争取江西”的计划。一九三一年一月，红四军主力沿武夷山向北发展，部队分散在连城、宁化、清流地区做地方工作，这时，赣敌分别从长汀、上杭进到涂坊，准备进攻新泉、庙前；闽敌由龙岩、坎市进到小池，准备攻打古田；粤敌进到武平、永定。为了调动赣敌返回赣南，红四军前委决定绕到敌人后面去，转移敌人的攻击目标，红四军主力由连城经宁化占领广昌。红军由闽入赣，行军时正遇着下雪天，风烈天寒，山路陡滑，部队走走停停，十分艰苦。红四军离开闽西，敌人“会剿”失去目标，粤敌、赣敌先后退走，刘和鼎也因福州发生内部不合，溜之大吉，乱哄哄的所谓“三省会剿”，又告破产。闽西特委在敌人退走以后，成立了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并将各县的地方武装合编为闽西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不是以后红一军团的十二军）。与此同时，赣西特委在红五军和湘赣边特委支持下，将江西的红军独立团和赣西游击队、赤卫队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六军，黄公略当军长，刘士奇为政治委员。这时，红军的党代表都改称政治委员。红四军在赣南活动，主要执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并深入进行土地改革，为夺取江西全省而斗争。红四军前委决定集中兵力攻打吉安。蒋介石得到红军集中在吉安、泰和附近的消息后，慌忙调部队到乐安、宜黄、宁都，准备配合驻守吉安的一个旅敌军进攻红军，红军诱敌深入，向富田退却。敌独立十五旅唐云山部分三路跟踪红军，孤军深入到水南、值夏、富滩地区。红四军前委决定集中兵力消灭唐云山部，二月二十五日拂晓，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分割包围猛攻敌人，我们第九支队参加攻击值夏、施家边一路敌军，担任施家边东北方向包围攻击的任务。这一仗，消灭了敌独立十五旅大部，俘敌千余人，残敌逃往吉安。战斗以后，红四军分散在赣江以东的吉安县、吉水县的富田、值夏、水南、施家边一带做地方工作。第九支队在施家边地区工作。三月中旬，红四军试图攻占赣南重镇赣州孤城。守敌马昆旅和一些地主武装，战斗力虽然不强，但他们依靠坚固的城防死守，而红军装备很差，没有攻坚能力，难以接近城墙，围城三天后即主动撤围。在围城时第三纵队担任东门方向的攻击任务。

赣州撤围后，红四军分散在赣南广大地区筹款、分田地、武装群众，加强根据地建设，使寻乌、安远、于都等苏区县连成一片。第三纵队在四、五、六月先后活动于瑞金、兴国、宁都、于都、会昌、武平等县。第九支队活动的地区是瑞金县城和该县的九堡、兴国县的团村周围、会昌县的筠门岭、福建武平县的武所等。在瑞金时，第二十六大队大队长徐扬在夜间查哨中被哨兵误伤，流血过多牺牲。徐杨是福建永定人，从武昌出发时任警卫团班长、司务长，上井冈山时任排长，是一位好同志。这一时期，长汀为贵州军阀部队周志纯旅盘踞，约在六月下旬，红四军重返闽西，将周志纯部驱逐，部队集中在汀州休整。

毛泽东在汀州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闽西特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

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整编红军。这次整编，以红四军为基础，把闽西和赣南的地方红军各一部合编在一起，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下辖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红四军以原红四军第一、二纵队为基础，加上闽西地方部队一部组成，林彪任军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红十二军（缺三十六师）以原红四军第三纵队为基础，加上江西地方部队一部和罗炳辉在吉安起义的靖卫大队组成，罗炳辉代军长（军长伍中豪因病未到职），谭震林任政治委员，谭政任政治部主任，林野任参谋长未到职，由我代理参谋长。红十二军下辖两个师：红三十四师师长周昆，政治委员旷珠权（后叛变）；红三十五师师长龙普林（企图投敌后被法办），政治委员欧阳健。红三军纯系江西地方红军组成，黄公略任军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全军共约万余人，枪三千余支。

在红一军团组建的同时，活动在湘赣地区的红军第五军和第八军，组成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红三军团也有万余人。湘鄂西地区组成红军第二军团，鄂豫皖地区成立红一军，鄂东南成立红十五军。还有广东东江地区红十一军，广西右江地区的红七军等各地区红军都有较大的发展。一九三一年的革命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一封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所预见的革命高潮“很快会要到来”。

一九三一年夏季，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发生空前规模的大混战，蒋介石将湘鄂赣的国民党军队大部调往中原战场。各苏区周围敌军兵力不足，只能处于守势，红军乘势广泛进攻敌人。取得了许多胜利。而这时，中共中央被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他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指责毛泽东的“以乡村包围城市”理论是一种错误观念，要求红军“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他命令朱、毛部队夺取南昌、九江，配合全国各大城市总起义。毛泽东对立三路线自始至终是反对的，并以实际行动不断减轻和纠正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七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主力由长汀北上，开到江西广昌，以一部绕经兴国，七月二十日进到永丰城。从永丰进攻七琴，将守敌击溃，歼敌数百人。接着，红军继续向樟树镇（今清江县城）前进，击溃了敌张辉瓒第十八师两个营，在七月二十四日占领樟树镇，截断了赣江的水路交通，威胁南昌。但毛泽东和朱德认为红军不宜进攻南昌，没有执行当时党中央要红军“夺取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任务，在樟树镇一边收集船只，动员船工，准备渡过赣江；一边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停了两三天，红军由樟树镇渡过赣江，占领了高安县、上高县、奉新县和万寿宫、牛行车站一带，分兵筹款和做地方工作。红十二军部队分散在高安到牛行车站一带，军部驻高安，后驻万寿宫。八月一日是南昌起义三周年纪念日，红一军团命令红十二军占领南浔铁路牛行车站的部队，隔着赣江向南昌城放了几排枪示威，以示纪念。随后，红一军团即转移到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从而使红一军团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

## 第四章 反“围剿”

## 二打长沙 攻下吉安

红三军团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六月中旬从大冶地区向西南进击。七月下旬，红三军团趁湘敌何键部主力南下衡宝地区和粤桂军阀作战，在长沙外围击溃和消灭了敌人六个团，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占长沙。后来因为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向长沙反扑，红三军团撤离长沙，退到浏阳、平江地区。红一军团指挥机关在报纸上得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消息，派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去和红三军团联络。过了几天，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杨岳彬一起回到红一军团，请求增援红三军团。红一军团遂经江西的万载县向湖南前进。追击红三军团的湘敌戴斗垣旅驻在浏阳县文家市，红一军团决定在八月二十日拂晓、突然奔袭包围全歼该敌。战斗中，红十二军配合友邻担任由西向东的攻击任务。红军击毙戴斗垣，俘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八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前进到浏阳东北的永和市地区，和从长寿街赶来的红三军团会合。红一、三军团会师以后，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红一军团机关担负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任务。方面军下辖红一、三军团共三万余人。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红一方面军成立以后，李立三路线的中央又命令红军第二次打长沙。当时，毛泽东虽然不主张打长沙。但是有不少同志认为这是“中央”的命令，一个三军团就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在一起，打长沙更没有问题了。其实，红一方面军同长沙守敌相比数量虽稍占优势，但在装备上则相差甚远，就连敌人只用铁丝网构成的简单防线，也无法冲破。九月初，红军包围长沙之后，接连三个晚上进行总攻，都未奏效。后来有人提议，用战国时代的“火牛阵”来冲铁丝网，有的部队竟然采纳了这个提议，买来一些耕牛，把浸有煤油的棉花团绑在牛尾巴上，到晚间用火点燃，冲击敌人防线。结果这些牛根本不听指挥，它们受了惊吓不但不向前冲，反而到处乱跑，最后成了一场笑话而告终。就在这时，红十二军部队在猴子石附近捉到长沙县敌政府派往湘潭专送军事通报的差役，得知长沙敌人计划由湘江西岸绕道到易家湾附近偷渡湘江，迂回我军后方。城里敌人从猴子石出击，妄图南北夹击红军。军长和政委指示，由我负责把俘虏和信件上送方面军司令部。毛泽东和朱德听了我的汇报以后，指示要严密看守俘虏，决不能让他跑掉。接着朱云卿参谋长指示，为了防止万一，你们把俘虏杀了罢，我按他的命令办了。根据新的敌情，方面军当即部署，由红三军团接替红一军团围城任务。红十二军担负阻击由城里出击的敌人，朱德、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四军、红三军在易家湾附近消灭渡江迂回的敌人。战斗结果：红四军、红三军在易家湾附近消灭了敌陈光中旅渡过湘江的两个团，红十二军击溃了由周希武指挥从城里出击的敌人，残敌逃回城里。红军围攻长沙城达半个多月，眼看没有希望攻进城了，蒋、冯、阎军阀之间的大混战又将要结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的领导下，及时作出正确决定，红军于九月十二日主动放弃了对长沙的围攻、这就又一次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九月中旬以后，红一方面军分散在湖南的醴陵、攸县、茶陵，江西的萍乡、万载、宜春、新余、安福地区筹款和做地方工作待机。红十二军以攸县为中心，部队分散在醴、攸、茶三县筹款和做地方工作，军部驻攸县。

这时，中共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命令到宜春，要毛泽东把部队带回去打长沙。总前委在宜春连日开会（这就是袁州会议），毛泽东说服了周以栗，决定不回去打长沙，先去打孤立无援被江西苏区地方武装长期围

困的吉安。会议决定红一军团打吉安，红三军团占领清江地区，阻击援敌。

九月底，红十二军奉命经茶陵、莲花、安福向吉安前进。当时，吉安守敌邓英师已被江西地方数万工农武装围困了几个月。吉安周围都是苏区，守敌非常孤立。红十二军到达吉安城下时，红一军团的其他部队还没有全部到达，邓英所部就在十月三日夜间弃城，全部坐船沿赣江向北逃跑了。十月四日，红一军团解放了吉安城。根据上级命令。只有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开进城里，红军进吉安时，城里秩序井然，商店照常营业。罗炳辉是老吉安，他进城后首先到戴济民诊所和几家百货商店查看了一遍，我跟他一道去的。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到了吉安，罗炳辉告诉了戴济民，戴济民就热情地请毛泽东、朱德到他家吃饭，罗炳辉、谭震林陪同前往，我和红十二军副官处长杨至成也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席间劝说戴济民参加革命，为伤病员服务，戴济民从此参加了红军。

吉安解放以后，周围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靖卫团都逃走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散在峡江、吉水、永丰、宜黄、乐安、南丰、南城地区做地方工作，以筹款为主，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这时，红一方面军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各军的兵员都得到补充，由地方部队改编组建的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红二十二军（军长陈毅是古田会议以后来江西的，政委邱达三）和几个独立师也来到吉安集中。吉安地区一时非常热闹，群众踊跃参加红军，红十二军缺编的第三十六师，以军教导大队为基础，加上各县送来的新兵一千五百余人，在吉安编成并开始训练。红三十六师由我担任师长、邓华任政治委员，师部驻吉安阳明中学。红三十六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六团，团长杨梅生，政委雷松生；第一七团，团长张荣发，政委何醒南；第一八团，团长肖美虎，政委谭国清。十月十四日，总前委北上和红三军团会合，总前委在峡江、罗坊连续开会，毛泽东同志最终说服一些立三路线支持者，一是决定红军不打大城市；二是据报告敌人有六个师开到南昌，可能要对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红军要诱敌深入，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里关门打狗。十一月下旬，红十二军奉命由吉安转移到宁都县城附近集结。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四万余人，枪万余支，为以后的反“围剿”作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果然不出毛泽东同志所料，蒋、冯、阎军阀混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开始筹划对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第一次反“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蒋冯阎军阀混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就调集了十一个师又两个旅，约十万人的兵力，任命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我赣南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企图由北向南，“分进合击，长驱直入”，一举消灭中央红军主力，他吹嘘“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面对这样大规模的“围剿”，红一方面军主力根据罗坊会议反“围剿”的决定，以“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进行战略退却，从白色区域主动退到红色区域，在根据地之内，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以后，十一月下旬隐蔽集结在革命根据地中部的宁都县城和黄陂、小布地区进行整训。红十二军集结在宁都城附近整训。红三十六师驻梅江左岸的阳戈村。在这之前红军经樟树镇、乐安、永丰等地区，边工作、边筹款、边备战，使尾随红军的敌军三次扑空。红军到了黄陂中心区，即抓紧训练，准备转入反攻。就在这时候。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了



肃清“AB团”事件。红十二军也奉命开展了肃清军内“AB团”的运动。红三十六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接到军部“肃反”通知后，很快就把这一政治运动发动起来了。广大指战员听说有反革命分子隐藏在革命内部，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把反革命斩尽杀绝。但是，“肃反”运动应该怎么搞法，“AB团”在哪里，谁是“AB团”呢？却没有人能说清楚。于是就乱怀疑起来，先从平日不大遵守纪律的人怀疑起，又怀疑到谁谁是如何参加红军的，谁谁的出身成份有问题，谁谁和地方、外单位的嫌疑分子有关系……从怀疑发展到传讯、刑讯、逼供信，乱搞了一场，结果冤枉错杀了一些好同志。如红三十六师一八团政治委员谭国清同志，一向工作积极，就被错捕处决了。理由是他和“富田事变”（红二十军由于这次肃反扩大化引起内部矛盾激化，该军少数领导人在富田将部队拉到赣江以西）的发动者刘敌是醴陵同乡，一起参加醴陵暴动，暴动失败之后，一起上的井冈山，实际上到红军以后，他们之间来往并不密切；一八团团长沙美虎，工作很好，因为他在周浑元部队当过班长，又是吉安人，这次也被杀掉了；大队长许绍武也是个好同志，因为是旧军队出身，有人供他是“AB团”，也遭不幸。班长和战士中也有一些人遭到杀害，部队里搞得人人自危。当时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明知被处决的是好同志，但都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对运动的搞法也明明看出不对，同样不敢发表意见。多亏大敌当前，“肃反”运动搞了大约十多天就结束了。

十二月中旬，敌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进攻。敌军西头在吉安，东头在福建建宁，相距八百里，力量较分散，而在红军集结地区北面的敌军实际上只有三个师，而且敌人进到山区三个师分在三处，交通不便、联络困难，加之根据地的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封锁消息，坚壁清野，敌人补给困难，行动迟缓。总前委认为红军有四万人，一次打一个师，占绝对优势，决定寻找战机，机动歼灭敌人。总前委在小布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会场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会场上。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动员讲话，详细他说明了我军必胜，敌军必败的各种有利条件。

十二月下旬，张辉瓒的十八师一个旅进到南垄，谭道源第五十师进到源头，许克祥第二十四师进到洛口，毛炳文的第八师进到广昌，其先头进到头陂。敌军一路上被弄得疲惫不堪，士气沮丧，红军反攻作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源头、洛口、头陂一线的群众基础较差，红军没有去打，计划等敌军前进到群众条件较好的小布地区再打。

根据敌军进展情况，总前委决心先消灭最接近的谭道源第五十师，群众也送来情报，谭道源师准备出发，红军计划在运动中将其消灭。红军在小布地区设伏，等了三四天，每天早出晚归，为了隐蔽行动白天不许做饭，每人带着午饭，在山上摆开阵势，力求在敌军向前运动时一举歼灭之。但谭道源师在源头按兵不动。而西面之敌张辉瓒却率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孤军深入到革命根据地的龙冈地区。龙冈地区的群众条件和地势都对红军有利，红一方面军总部当即决定，先歼灭张辉瓒部。部署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为右路，由上固和下固，向龙冈西北的还铺、张家车攻击前进；红三军为左路，在三十日晨占领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向龙冈攻击；红十二军（缺三十五师，指挥六十四师），于三十日拂晓向表湖前进，占领龙冈南端、水西西边的盲公山，截断龙冈西面通南垄的大路，从张辉瓒部后面打。

三十日拂晓，满山是雾，红军各部队按总部部署，占领攻击出发阵地。张辉瓒部吃过早饭以后，从龙冈出来，由龙冈以东、小布以西登山时，就遭到红军迎头痛歼，战斗从此打响。红三十六师在这一战斗中，担任红十二军的预备队。战斗到中午十二时左右，我师右邻的红三军第九师师长徐彦刚亲自跑来要求增援，我请示军部同意以后，立即让司号员林龙发吹起冲锋号，我把枪一挥带头跳出阵地向前冲，因为我师大都是新兵没有作战经验，指挥员必须给他们作出榜样。部队初战却表现得很英勇，经过两次冲锋，就将正面的敌人击溃并消灭了一部。部队接着向前追击，上好遇着敌人师部卫队营，这个营的武器精良，装备的都是花机关枪和驳壳枪，但是没有马步枪射程远，打了一下就跑散了，以后陆续缴了枪。随后又遇着敌人的后方机关和跑乱的零散部队，更是毫无抵抗能力，一触即溃，他们东奔西跑一阵之后，就坐在山头上喊：“不要打了，我们缴枪！”忽然听到有人走火响了一枪，其他敌兵就慌忙齐声高喊：“不要打枪！不要打枪！”就这样全部放下了武器。山上这时真是乱作一团，那天我穿着一件敌军士兵的棉大衣，要不是我身边有林龙发跟着，兄弟部队的战士就会把我当敌军“俘虏”了。我赶忙命令第一六团团团长杨梅生和第一七团团团长张荣发把俘虏集合起来，迅速带离战场。整个战斗在下午四时结束，红军活捉了张辉瓒，全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次全胜。红三十六师共缴获各种枪支七百余支，是红十二军各师中缴获武器最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师得到一次很好的战斗考验。这样，我们红三十六师部队丢掉了全部梭镖，换掉了全部旧的枪支，装备齐全，焕然一新，马步枪、驳壳枪、花机关枪、重机枪全都有了。

龙冈战斗结束以后，第三天是一九三一年的元旦，部队移到小布一带，准备再打谭道源师。不料谭师因张辉瓒惨败，已向东逃窜，他们想逃到东韶，和毛炳文、许克祥两师靠拢。但许师也从洛口逃往毛师的头陂，总部判断敌军可能总退却，决定乘胜追击逃往东韶的谭师。红十二军担任正面追击，红三军团为左路往头陂追击，红三军为右路进到田营，钳制洛口的许师。一月三日红军在东韶地区追上了逃敌谭道源师，敌人来不及修筑工事防守，经红军一个猛攻，就全线溃退。我红三十六师协同友邻担任东韶西北方向的攻击任务，歼灭了部分敌人。谭道源师在溃退途中，被红军歼灭数千人，缴枪千余支，谭道源率残部突围逃向抚州。在红军进攻东韶时，敌人总溃退，富田、东固、头陂一线的敌军部害怕挨打，纷纷撤退。就这样，红军五天之内打了两个胜仗，俘敌一万多人，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头行了“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把敌人引入根据地，择其弱点，集中兵力打它的一路；坚持慎重初战，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再打，务求全歼；坚持打运动战，打运动中的敌人。这是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利用战斗间隙，分散在广昌、石城、宁都、瑞金地区，做扩大红军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同时进行筹款、训练部队，为再次粉碎敌人“围剿”做准备。红十二军的工作区域在石城、宁都一带。红三十六师在石城县的屏山地区开展工作，石城是军阀赖世璜（后为周浑元部）的家乡，此地有不少人在赖世璜军队中做事。屏山地区较富，有洪石寨等两个寨子，分别由两支地主武装据守，他们不敢出来，红军也不去管他。红三十六师在屏山地区工作了两个多月。

## 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遭到惨败以后，又派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来当“陆海空军总司令和南昌行营主任”，组织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把兵力增加到二十万人，在三月下旬集结完毕，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四月一日，敌人分四路对我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这次敌军吸取了上次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的战略方针，一天只前进几里或十几里，每占一处，即构筑工事，大肆抢掠、烧杀，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制造白色恐怖。

在获悉敌人开始“围剿”情报以后，红一方面军总部立即进入反“围剿”阶段，总政治部下达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令；红军各级召开各种会议，研究作械指挥，作战保障、伤员收容救治、战俘的收容清理等等；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广泛动员、明确任务，如何配合红军作战。毛泽东签署了一个关于游击战的通令，要求各游击区执行拢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十项任务。红军还大力进行筹储粮款的工作。但是，四月中旬，王明路线的积极拥护者以“四中全会”代表团名义来到中央根据地，他们把持了中央苏区中央局，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许多非议。由于对反“围剿”方针有分歧，中央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多次举行扩大会反复讨论，毛泽东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到根据地里，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他指出包围中央根据地的敌军虽然很多，但他们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指挥不统一，在苏区里他们没有群众、地形不熟，给养困难，弱点很多。相反，红军有群众，地势有利，指成员求战心切，有利条件很多。经过争论，终于重新确定诱敌深入的方针。

对先打哪路敌人的问题，也进行了争论。毛泽东同志认为，四路敌军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和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先打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而王金钰的第五路军是新来的，地形不熟，战斗力不强，先打王军有全胜的把握，会议最后确定第一仗，先歼灭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军的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王玉钰兼师长的第四十七师。四月下旬，红军主力集结在东固地区待机。这时西面王金钰部四十七师和二十八师进到富田陂下一带，红军前哨距离富田敌据点只有十多里路；北面郭宗华的第四十三师由吉水进到水南、白沙，距东固也只有七十里；南面蒋光鼐、蔡廷锴的部队还在兴国一线。红军待机达二十多天，目的是等敌人离开其富田的坚固工事，在向东固推进时。在运动中将其一举歼灭。由于东固地区群众基础好，消息封锁得严密，敌人一点也不知道红军主力就在他们面前。五月十五日晨，王金钰的四十七师和公秉藩二十八师分别经观音崖、中洞向东固前进。红军以红三军团为左路，十五日隐蔽到江头树，然后向富田、固陂包抄迂回；红三军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大道，迎击公秉藩师；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为右路经观音崖迎击敌人。红军乘敌人在运动中突然向其猛攻，激战一昼夜，将公秉藩师大部歼灭，敌四十七师一个旅被歼，缴枪共五千多支。红三军团在固陂消灭了敌二十八师兵站，当夜进占富田。在东固地区集结时，红十二军（缺三十五师）的位置在红军部队的右翼。红三十六师集结在东固通往白沙的大道上，任务是保障我主力右翼的安全，向白沙方向警戒。五月十六日，敌第四十三师郭宗华部，配合富田的敌人，由白沙向东固推进。当郭部发现红军警戒部队以后，即停止前进，就地加紧做工事。我们不断袭扰敌人，和郭部对峙了两天。在富田的敌人被红军歼灭后，郭宗华

部在十八日晚仓皇向白沙撤退，红三十六师连夜跟踪追击，俘获甚多。我们师有一个送饭的炊事班竟俘虏了敌人一个迫击炮连。战士们形容敌人的狼狈情形时说：简直象打土豪时一个样，我们一进村，敌人不抵抗就缴了枪。这次战役，红军大部队几万人在敌前集结了二十多天，敌人竟毫无察觉，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和诱敌深入予以歼灭的战略战术方针无比英明正确。那时，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防止坏人给敌人通风报信。由于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分得了土地，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又受到第一次“围剿”胜利的鼓舞，对革命战争充满了胜利信心，支前热情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坏人也不敢公开活动，加之红军在接近敌人的地区实行封锁，断绝了和敌人据点的一切往来，所以，没有走漏任何消息。二是大军云集一地，部队生活问题，如粮油盐的供应、烧柴吃菜等等，都难以解决。由于军民一心、士气高涨。粮油盐都由总部和地方政府统筹解决，烧柴由部队派人上山去砍；最困难的是吃菜问题，通过发动战士到山上采竹笋、野菜，到水田里捉泥鳅、鳝鱼、甲鱼、田鸡和拾田螺等，使吃菜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十八日，王金钰四十七师残部和郭宗华四十三师一部由水南逃向白沙，十九日红军在白沙截住逃敌，消灭大部，缴枪四千多支、残部逃往永丰。二十三日，红军攻击中村，歼灭孙连仲的高树勋第二十七师近一个旅，又缴获各种枪支三千余支。

第四仗，红军乘胜围攻广昌，由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围攻。朱绍良在红军来到之前已率毛炳文第八师和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北逃南丰。二十七日，红军开始攻城，红三十六师担任城西南方向的攻击任务。激战一天，守敌第五师师长胡祖玉被击伤后毙命，其所部在夜间弃城向南丰逃窜。红军攻占广昌以后，孙连仲部刘和鼎第五十六师赶紧从闽赣边界安远县以南的中沙，连夜撤回建宁。方面军总部为继续扩大战果，以红四军第十师北上南丰，协同红三军切断南丰和建宁敌人之间的联系。方面军总部率领红三军团和红三十六师突袭建宁城，力求歼灭敌第五十六师。三十一日，红军抵达建宁，由红三军团为主攻部队，我们红三十六师为预备队。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和滕代远政委直接指挥，我们出敌不意，突然发起攻击，红三军团首先攻击建宁西面和北面。以猛烈火力封锁建宁东门石桥，并派出一个师，从建宁以东迂回包抄；我们红三十六师也投入战斗，从南门城边直插城东包围敌人，攻击敌人的炮兵阵地和指挥机关。那时，我们没有军用地图，又是在丘陵地带作战，观察视界不远，全凭听枪炮声行动。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在当天下午六点攻占建宁城，全歼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三个多团。红三十六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缴获不少。刘和鼎带着少数人员逃走，红三军团一部一直追到闽江边。战斗结束以后，我们师在建宁城郊试射刚缴获的重机枪，不小心打伤了红三军团的两个战士，彭德怀军团长把我叫去批评了几句，这是我和彭德怀同志第一次接触。红一方面军自五月十六日东固战斗起，到五月三十一日攻占建宁为上，仅十多天时间，横扫七百里，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当敌人二十万大军压境之时，红军主力只有三万多人，众寡悬殊。在这一紧要关头，主持中央苏区中央局的项英，曾主张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避敌逃跑。毛泽东坚决主战。在他的正确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此后再没有人提逃跑的意见了。在东固集结待机的时候，我第一次认识了王稼祥，他是我见到的由上海党中央来江西革命根据

地的第一个同志。他到我们师部和阵地上来看过，从他的言行来看，他是同意毛泽东主战意见的。建宁战斗以后，红十二军分配在宁化、清流两县筹款和做地方工作。红三十六师的工作地区在宁化县城关。在宁化，我第一次见到徐特立同志，人们称他为“老教育家”。徐老很注意对红军里的小同志进行培养教育，爱找小同志谈话，我把红三十六师师部的文书、外号叫“小西瓜”的介绍给徐老，他曾几次找“小西瓜”去谈话。我们还抓紧时间总结经验，进行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 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仅隔一个月，即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起，又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这次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调集了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嫡系部队，加上蔡廷锴、孙连仲、朱绍良、上官云相等部，兵力达三十万人，还有几十架飞机参战。他们想乘红军两次苦战之后，还没有来得及休整。而且主力远在闽西的机会，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兵分三路，妄图一举夺取我赣南根据地。

红一方面军鉴于敌人前进速度较快，来不及在根据地边沿集结。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并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胜后再追”的方针。用“磨盘战术”，首先绕入敌背后，捣敌后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横扫过去，把敌人主力甩在赣南，等他们转回来，就必定非常疲劳，再选其一路歼灭它。于是，红军主力以急行军绕过已大举进入革命根据地的敌军前锋，分途向赣南根据地的兴国地区集结。七月的江西，正是盛夏季节。红军背负着全副武装和三天干粮，一个个被烈日烤得汗流浹背，有的人草鞋都磨透了，脚踩在发烫的石板路上疼得钻心，许多人中暑、发疟疾，就是这样困难，红军的急行军速度一直没有减慢，绕道汀州、瑞金，行军千里，在七月下旬进到兴国地区。回到老根据地兴国，又是一番景象，群众给战士搨扇子，送草鞋、鸡蛋，帮着拆洗缝补衣裳，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情。红军个个情绪高涨，坚决要“消灭白军，保卫人民夏收，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这时，根据地里的县城和集镇多被敌人占领，红军面临赣江，南、东、北三面受敌、形势相当危急，方面军总部决定向东突破。周围有十二个师的敌军，敌人的飞机白天到处轰炸、扫射，红军采取夜行军向敌后穿插，行军要求非常严格，白颜色的东西都掩盖好，能发出响声的东西都包好，行军中不准高声讲话，不准咳嗽，不准吹号、吹哨子，只有每人左臂上扎条白毛巾作识别。八月六日拂晓，红军在兴国的莲塘村，突然包围歼灭了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一个多旅。八月七日，红军多路抢占了永丰的良村四周的山头，紧紧包围了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红军从四面向下压，仅仅几个钟头。就歼灭该师大部。敌四十七师和第五十四师残敌相继逃向龙冈，那里驻有敌周浑元率领的第五师，周浑元连忙在龙冈周围赶修工事。红军佯作要攻龙冈，却突然包围了宁部县的黄陂，守敌毛炳文第八师占据有利地形，以为万无一失。红军采取集中兵力，集中炮火，集中军号，声势很大，突击队很快就分路突入黄陂，仅用一个多钟头，就全歼毛师四个多团。红军在五天之内，接连打了三个胜仗，缴枪万余支。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在黄陂一带以后，立即把敌军主力调转过来，对红军进行大包围。八月十六日，方面军总部令红十二军伪装成红军主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军向北吸引，红一方面军主力则转向西面，在夜间秘密和敌人对进，在敌军的空隙越过，最后突出重围，在兴国地区集结。我们红十二军一路上书写路标，号房子，写上各军的番号，牵青敌人鼻子走。敌军在根据地里到处扑空，加上群众“坚壁清野”，连饭也吃不上，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又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敌军被拖得饥疲沮丧，士气低落。正如他们的文件上说的“剿匪是无期徒刑”、“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等敌人发觉红军主力在兴国，再调头西进的时候，红军主力已经足足休整了半个多月。敌人最

后不得不下决心全线总退却。敌人退却的时候，红军集结在兴国、泰和、万安地区伺机，当敌人从兴国向北逃，红军分三路攻击敌人，在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旅，在高兴圩给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以重创。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追上了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和第丸师残部，经几个钟头战斗全歼该敌，韩德勤被俘以后化装成伙夫逃脱。红军在七十五天之内先后击溃敌军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四万三千多人，缴枪两万多支，又一次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在莲塘、良村、黄陂的三次战斗中，红三十六师参加了在黄陂歼敌毛炳文第八师的战斗，担任由南向北攻击的任务。战斗将要结束时，我中了暑，临时用土办法在脖子和前胸乱扯了一阵，总算坚持到战斗结束。八月十六日，红十二军指挥红三十六师和红二十二军的六十四师向北吸引敌军时，红十二军的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补充编入红四军。红三十六师奉命在小布和小布以北地区进行游击活动，直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那时，红三十六师的工作主要是同地方武装一道参加对敌斗争和做群众工作。例如：破坏道路、封锁消息、做疑兵动作。我们曾在夜晚派少数人到山上打起火把，装作大军转移的样子，迷惑敌人，使敌人弄清红军主力的位置。在反“围剿”斗争中，遭受重灾的往往是敌军路过或宿营驻扎过的地方以及红军同敌军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每到这些地方，就帮助群众修盖房屋，掩埋烈士遗体、敌军尸体和死牲畜残骸，帮助驻地居民清扫、铲除垃圾。我记得当时的苍蝇特别多，不但做饭和吃饭时要和苍蝇作斗争，随时随地都得开展消灭苍蝇的活动，不论军人还是老百姓，每人都随身携带着一把甚至几把棕树叶做成的蝇刷子，它既是“自卫武器”，也是“进攻武器”，不消灭苍蝇人们简直无法生活。

一九三一年十月，红十二军军直和红三十六师开到长汀整训和做地方工作。这时，缺编的红三十四师和红三十五师暂由闽西地方红军编补（但没有集中统一行动）。红三十六师的减员也由闽西红军进行了补充，全师已达二千五百多人，有长短枪一千二百多支、重机关枪六挺、迫击炮两门。红三十六师团以上干部的情况是：师长张宗逊，政委邓华，参谋主任石成玉，政治主任邓华（兼），供给主任徐林；第一六团团团长杨梅生、政委雷松生，第一七团团团长张荣发、政委何醒南，第一八团团团长吴东生、政委罗元发。

红三十六师的工作地区、先是在汀洲北部山区。这个地区盛产竹子，不少作坊用竹子作原料，手工生产毛边纸，工人多为农民季节工。这里山险林密，非常适合打游击战。红三十六师后来的工作地区是连城及其西北地区。我在长汀时，在福建军区第一次遇到肖劲光同志和由上海党中央来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其他一些同志。我还首次见到参加陕西“渭华暴动”的李建平同志，从他那里得知我的胞兄张宗适牺牲的消息，我当即哭了一场，心情几天不能平定。宗适后来曾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中共陕东特委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等职，领导农民和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在一九二八年“渭华暴动”失败后到处躲避敌人搜捕，生活困难而肺病复发去世。李建平同志在“渭华暴动”失败后，经党组织介绍，在一九三一年来到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当时任闽西红军第三十五师一三团团团长。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恶性发展，并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他提出要“夺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争取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王明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红一方面军主力攻打赣州（当时就听说毛泽东同志不主张打这一仗），由于缺乏攻坚技术和装备，几次挖地道爆破城墙部没

有成功，打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打开，损失很大，只得撤围赣州。以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由他亲率红一军团主力去打漳州。四月二十日红一军团打开漳州，消灭了敌张贞部主力。这期间红十二军的任务是巩固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在闽粤边界的上杭、武平地区活动，向粤敌警戒，保障红一军团的右路和右侧翼的安全。红三十六师进到武平县北部，拔掉了苦竹山、桃溪、永平等地的地主武装据点。这些据点的少数地主武装，依托村寨，拚命和红军为敌，这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敌人，除非坚决加以消灭，他是决不会放下武器的。这伙地主武装还专门打冷枪射杀红军指挥员，我在苦竹山曾被冷枪打坏了帽檐，差一点被打中头部。红四军军长王良打漳州回来，经过武平县的大禾村时，就被寨子里的地主武装打冷枪击中而牺牲了。可见红军和顽固地主武装的斗争同样是激烈尖锐的。

就在红军打漳州的时候，广东军阀陈济棠向赣南增兵，侵占了赣南西部大片地区。为了打击粤敌，打漳州的红一军团主力迅速回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红十二军也奉命离开闽西，冒着炎热天气在六月下旬赶到赣南西部。红军在池江、海关、大庾接连打击敌人，最后打了水口战役（在广东南雄县境内）。此役是红五军团先在水口地区和敌人先打响，敌人迅速从南雄县城增援、以优势兵力反扑。正在红五军团处境困难的时候，红十二军和红一军团赶到，在七月十日向水口的敌人发动总攻。红十二军只有红三十六师参战，向敌人猛烈冲杀，指战员和敌人展开肉搏，杀得敌人心惊胆寒。由于敌我兵力相当，红军只能将敌人十个团击溃，敌人受到重创，逃回南雄，红军也很快撤出战斗，红三十六师伤亡了几十个人，没有什么缴获。水口战役打击了自夸为“铁军”的粤敌的嚣张气焰，迫使其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从此粤敌再也不敢向我根据地进犯了。八月，红一方面军奉命由南线转到北线作战，部队在根据地里行动，迅速到达了指定位置，组织了乐安、宜黄战役，歼敌三个多团，俘敌两千多人，攻占乐安、宜黄县城，红十二军积极配合，在二十三日占领了南丰城。十一月上旬，红三十六师配合红一、三军团向建宁、黎州、泰宁县行动，进占太宁。红军主力继续向资溪、金溪前进时，红三十六师进占邵武。太宁和邵武的守敌是新编十四旅周志群部和部分地主武装，战斗力不强，他们稍事抵抗之后就逃走了。红十二军军部跟进太宁、邵武县城进行筹款并做地方工作。建宁、黎川、泰宁的作战行动，红军以很小代价，开辟了一块大面积的新根据地。十二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红十二军军部率红三十六师和红二十二军合编，由罗炳辉任红二十二军军长。红三十六师编为红二十二军的六十六师，黄永胜任红六十六师师长。在闽西另行组建新的红十二军，由我任军长，黄甦任政治委员。我从一九三二年十月且组建红三十六师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调离，在该师整整工作了两年零一个月。一九三三年六月“滕田改编”时，该师编为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在此期间，执行王明路线的苏区中央局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召开了“宁都会议”，诬蔑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决定毛泽东回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实际上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很不理解，内心里深为毛泽东同志不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旬，我由邵武去闽西，到新红十二军任职。路经太宁、建宁、石城、长汀等地。到太宁时，首次见到宁都起义的红五军团部队。到达建宁红一方面军总部时，向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刘伯承总参谋长汇报请示了工作。这是我相隔七年后和周恩来又一次见面。七年前，在广东听过他几次政治报告，当时他



不一定认识我，这次见面，他神采奕奕，一如当年，给我的印象特深。我过去久闻刘伯承大名，在建宁是首次见面。路过长汀时，我特意去看望了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详细地询问前线的情况，他十分关心战局的发展，关心打歼灭战的情况，特别关心的是能否和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他问我崇安县的情况怎样？我说不了解。他惋惜他说，占领邵武以后，应该派人到崇安去联系。这次谈话，毛泽东自始至终一字未提及王明路线排挤他的事情，可见毛泽东的组织观念之强。毛泽东当时住在长汀郊区一幢普通的民房里，卧室陈设十分简朴，只有一张桌子，几条板凳，桌上放着一盏随身用的马灯，一个铜墨盒和一管毛笔，一张木板床上堆满了各种书报。同毛泽东同志一起休养的还有周以栗、陈正人等同志。医生是傅连璋。

#### 第四次反“围剿”

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地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重兵五十万，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为“进剿”军，担任主攻，陈诚为总指挥。另由福建第十九路军蔡廷锴任总指挥的六个师又一个旅；粤北、赣南的广东驻军余汉谋任总指挥的六个师又一个旅都执行就地“剿办”，配合“进剿”行动。敌军采用“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分进合击”的战略，向中央根据地发起进攻。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领导下，仍然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乘敌军“围剿”部署尚未完成，诱敌深入就范。尔后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

红军在二月十二日主动进攻南丰城，南丰城东临抚河，为抚河一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军打了一夜没能突破敌人主阵地。守敌告急，敌罗卓英第一纵队奉命增援南丰。在这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秘密地北进，集结在黄陂以西的山地。

敌总指挥陈诚即以抚州为中心，以三个纵队共十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我黎州、建宁、泰宁地区大举进攻。其中罗卓英的第一纵队、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由宜黄、乐安一线出发，直奔宁都、广昌、企图堵击红军主力撤回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归路。但这路敌军深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敌第二、第三纵队距离较远，他们在行军中，两侧没有掩护，有利于红军攻击。方面军总部决定在黄陂地区伏击、歼灭这路敌军，红军组成左右两路纵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三军团，为左路；由董振堂、朱瑞、刘伯坚指挥红五军团、红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和独立师为右路。二月二十六日，两路红军先后进入阵地。红十二军担任总司令部的预备队。

黄陂地区山连山、岭连岭，绵延几十里，山高林密，山谷狭窄，偏僻荒芜，便于大军隐蔽集结，又是从宜黄、乐安到宁都的必经之路，红军就埋伏在峡谷两旁的大龙坪、霍源和小龙坪、登仙桥，红十二军埋伏在霍源的摩罗岭东麓一带的密林里。各部队进入预伏地区，即封锁消息，侦察敌情，进行临战准备。敌李明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第五十九师是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加强师，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他仗着装备精良，有恃无恐地昼夜兼程开往广昌、宁都，但是这些骄兵吃不得苦，不会爬山，路上弄得疲累不堪。二月二十七日晨，淅淅春雨使山间变得朦胧，道路泥泞。敌五十二师首先进入红军伏击区，当他们四个团完全进入包围圈，红军左路纵队立刻发起攻击，一时枪炮声大作，在峡谷中回响。全歼了敌五十二师、击毙了李明。敌五十九师进到霍源，红一军团包抄了他们的后路，红五军团从山上冲下来，把敌军分割开来，红十二军由东向西，配合友军围歼敌第五十九师。经过激烈战斗，到二十八日上午全歼敌军，活捉了陈时骥。这次战斗是红军主力大兵团埋伏战的一次成功战役，毙俘敌官兵一万多人，缴获大炮四十多门，轻重机枪三百多挺，其他枪支一万多支。还有大批银元、军用物资。在战斗中，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三团团长李建平阵亡。李建平同志作战勇敢，工作深入，在部队中很有威信，不少干部、战士听说他牺牲了，都不禁流下眼泪。这次战斗红十二军情绪高涨，有些团队虽然伤亡较大，但仍坚持冲锋，有些指挥员负伤了仍忍着伤痛，鼓励战斗员战斗。缺点是伤兵收容和救治做得不够周到，以致少数伤员没有及时上药，没吃上饭，各部队的伙食担子也没有统一指挥，有的挑饭走错了路。

敌总指挥陈诚获悉罗卓英纵队两个师被歼，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寻歼红军主力。但是，红军主力迅速转移，苏区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敌人仍然摸不清红军主力的去向。陈诚就将“分进合击”变为“中路突破”，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策三纵队第五、第九师为后纵队。企图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进攻，歼灭红军主力。

三月二十日，敌前纵队进到罗坊、甘竹一线，后纵队第十一师进到草台岗，第九师进到东陂附近。两个纵队之间相距近一百华里，再一次出现对红军有利的战机。方面军总部决定在草台岗地区歼灭敌第十一师。二十日夜里，红军各部队进入各自的攻击位置，二十一日拂晓发起进攻。红三军团由西南向东北，红一军团由东向北主攻；红十二军配合由东北包围草台岗，并钳制东陂的敌人。经过分割包围和猛烈的攻击，红军歼敌第十一师全部和敌第九师一个营，打退了敌第五十九师残部和第九师一部的增援。这次战斗，毙伤俘敌六千多人，缴枪五千多支，机枪和自动步枪一百多支。红十二军政委黄甦负伤，被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红十二军此役歼灭了大量敌人，缴获甚多。草台岗战斗以后，敌“围剿”军其他各部队纷纷后撤，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次反“围剿”斗争，虽然王明路线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仍在红一方面军中占统治地位。红军仍然是打运动战，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原则。在黄陂、东陂战役中，红军主力都是隐蔽集结，待机歼敌。敌人始终没有发觉红军主力所在，因此红军发起进攻时，便惊惶失措纷纷就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十二军归红三军团指挥，参加了红军主力进攻宜黄、乐安的行动。由于敌人固守据点不出，红军连续进攻乐安、宜黄不克，在战略上显得被动，只得撤出战斗。

六月间，红军奉军委命令，实行大师大团的正规化编制。红十二军在宜黄以南地区进行整编，军直和红三十四师编为红一方面军独立团，我任独立团团团长，独立团政委是刘希平（西路军失败后到新疆当了叛徒，全国解放以后被人民政府镇压）。红三十五师由师长杨遇春（不久投敌，叛变革命）带领调回闽西，另行编组新的部队。独立团是大团编制，全团约两千多人，编有电台，独立活动。

一九三三年六月下旬到十一月，独立团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北线活动，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行动。部队多次穿过乐安、宜黄以南，西起永丰东到南丰的敌军堡垒封锁线。活动在宜黄县的二都、棠阴、永兴桥；崇仁县的罗陂冈、龙骨渡；抚州南城线路上的滕桥、东馆、岳口；南城和南丰间的新丰、里塔；并以新涂县的七琴游击区为根据地，活动在樟树镇附近。八月间，独立团一度打开丰城县城，威胁南昌，有部分缴获，并捉到一批土豪。我现在还保留着一个象牙图章，是用缴获的国民党丰城县县长的印章，在瑞金红军大学工作时由一位同志为我磨平篆刻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我调到红五军团第十四师任师长，接替程子华的工作。红一方面军独立团调回闽西，以独立团的基础组成新的红三十四师。这时红一方面军实行正规编制，其情况大体是：方面军下辖红一、三、五军团（一九三四年增编了红七、八、九军团），每个军团下辖两个正规师。红一军团辖红一师、红二师（一九三四年增编红三师），红三军团辖红四师、红五师（一九三四年增编红六师），红五军团辖红十三师、红十四师。师以下部队的整编情况，以红一师为例：该师由原红三军、红二十二军合编组成，师长罗炳辉、政委黄吐。原红二十二军六十六师（即我曾在那里担任两年师

长的红十二军三十六师) 编为红一师第三团。

## 第五次反“围剿”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这次“围剿”中，敌人调集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聘请德、意、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度和占领的地区实行血腥镇压和欺骗利诱相结合的政策；在经济上，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严密的封锁；企图将根据地军民困死；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一边推进，一边修筑坚固的堡垒，叫嚣要“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企图长期消耗红军，逐步缩小革命根据地，从而达到消灭红军，消灭苏维埃，消灭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下，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一套错误的战略，使红军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敌人在完成了兵力部署之后，九月下旬向红军守卫的黎川进攻，并占领了黎川县城。敌人以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固守硝石，修筑堡垒，挖战壕，布设铁丝网。“左”倾路线领导者在反“围剿”一开始，就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不甘心一城一镇的丢失，命令红三军区、红五军团强攻硝石，收复黎川。红三、五军团强攻硝石，敌人依托坚固阵地，以密集的炮火阻拦红军的冲锋，无数红军战士倒下了，而临时中央还指示继续强攻。董振堂亲自带着敢死队冲锋，也被敌人炮火压了下来。久攻不克，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左”倾路线领导者才不得不下令撤出战斗。

“左”倾冒险主义者并不接受教训，又命令红五军团主力强攻资溪桥，结果进攻了四天，红军在敌人堡垒面前、白天遭敌机轰炸，晚间露营，大大挫伤了指战员们的斗志。红军主力辗转在临川和黎川的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屡战不胜，十分被动。而“左”倾路线领导者反而把战斗失利的原因，归罪各军团领导人，还毫无根据他说红五军团存在“AB团”、“反革命小宗派”、“第三党”等等，在敌人大军压境的非常时期，却派出大批保卫局人员到红五军团搞“肃反”，弄得人心惶惶。

当时，我任红五军团十四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司令。

红十四师政治委员是朱良才，参谋长是袁良惠（回族，宁部起义后参加红军），政治部主任是唐天际。红十四师的任务是：修筑广昌城到甘竹（广昌北）一带的防御工事。这项任务原来是前两任广昌警备司令陈奇涵和张经武负责的，他们动员民工修筑了很长时间，已经在广昌城北郊修了一个大碉堡，在甘竹西北面修了两个中型碉堡，都还没有完工。红十四师到广昌接防后，李德（德国人，又名华夫、是王明从莫斯科弄来，专门帮助他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军事顾问）来广昌视察工作，他批评原来修筑的碉堡目标太大。他说，这样不行，要改为构筑支撑点（独立的，目标小的工事），要求既要目标小，又能向四面发扬火力。原来修的碉堡射击孔是里面小，外面大，同国民党军队修的碉堡一样，李德要求改修成射击孔外面小、里面大。他还要求在每个支撑点里储存够一个星期用的干粮和水，准备能够死守一个星期。红十四师用了五个月时间，在广昌城和其以北到甘竹一线，共构筑了坚固的大小支撑点和碉堡十多个，在广昌城周围修了七个支撑点，广昌没有城墙，其他分布在广昌到甘竹之间，每个支撑点驻守的兵力不等，有的为一个营，有的一个连，有的一个排。红十四师以四个营的兵力守支撑点，以五

个营的兵力作为反冲锋部队。一九三四年四月，敌人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四月十日，敌人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左”倾路线领导者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提出要象“保卫马德里”一样地“死守广昌、寸土必争”，“胜利或者死亡”等拚命主义口号，下令调集红一、三、五军团赶到广昌，协同红九军团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和敌人决战。这时，红十四师归红九军团建制。在这之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已经改组，博古接替了周恩来的工作，博古不懂军事，完全依靠李德指挥。广昌战役时，博古和李德来到前线，他们躲在距广昌西南十多里的坑道里指挥、督战。敌人一开始在抚河东岸向大罗山红军阵地进攻，红军采取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敌机的狂轰滥炸，顽强抗击，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十四日抚河西岸的敌人乘红军主力在东岸作战，突破红九军团阵地占领了甘竹。十九日东岸的敌人也攻占大罗山一线，红军经多次反击不奏效，被迫撤退。二十七日，敌人在这狭小地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发起全线的总攻击。红军主力多次向敌人反突击，均不能消灭敌人。红十四师组织第二梯队，在甘竹附近几次向敌人反冲锋也同样无效。敌人平均每天前进四、五里，凭借堡垒线和优势兵力，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红十四师的团以下干部多有伤亡，团长马良骏负伤，我的警卫员小李也阵亡了。当时，在王明路线统治下，惩办主义盛行，没有上级命令不敢后退一步。红十四军坚守支撑点的几个营的指战员都没有放弃阵地，没有及时撤出，半数和支撑点共存亡了。敌人在四月二十八日占领了广昌城。

广昌保卫战，激战了十八天，红军虽然给了敌人重大杀伤，但参战的红军部队也伤亡很大。红一方面军主力的伤亡，给以后的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 响。红九军团和红十四师伤亡更大，按中央军委命令撤销了红十四师番号，幸存的兵员编补到红三师，红九军团实际上只剩一个师的兵力了。这次战斗之后，我被调到驻在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习。一九三四年六月，原红大校长兼政委周昆调前线工作。由我接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钟纬剑任参谋长，徐梦秋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红军大学有一百多名学员，每期学习时间为三个月，分为高级班和上级班。高级班的学员是团以上干部，学员有蔡会文、龚楚、邓华、姚喆等。上级班的学员主要是营以上干部，记得优秀学员中有韦国清、张爱萍等。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苏军的战斗条令和野战条令，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列宁主义和政治工作方面的材料。高级班的主要军事教员有：何笛宙（原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讲苏军条令，李德讲“短促突击”，陈时骥（原国民党第五十九师师长）讲地形学、射击原理等技术课。政治课由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和校外联系，邀请校外的同志来讲课，瞿秋白同志曾来红军大学高级班讲过一次列宁主义。广昌战役后，红军在“左”倾路线领导者指挥下，又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实行了“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略，同敌人拚消耗。红军虽然在根据地人民支援下，英勇苦战了一年之久，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招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九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在敌军继续猛攻面前，“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得不决定放弃中央苏区。一九三四年九月底，红军大学第三期学员毕业，以后红大就没有再招新生。同年十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大转移”（当时还不叫长征），红军大学除主要干部分配了工作外，其余人员同红军

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一起编为干部团，由陈赓和宋任穷同志负责，随军“大转移。”

## 第 五 章

### 长征路上



## 突破四道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我由红军大学调任中央纵队（即第二野战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是李维汉（即罗迈，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治委员邓发（当时是中共中央保卫部部长）。军委纵队（即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中央纵队比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包括党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以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坛坛罐罐。中央纵队的战斗部队有张经武任师长的教导师和姚喆任团长的中央保卫团。红军在十月十六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跨过于都河，向西南方向前进。行军时，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是红八军团；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第九军团；就象抬轿子似的，在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前进，最后面的是红五军团。

在王明路线的支配下，中央纵队完全是搬家逃跑的组织形式，根本没有作粉碎敌人“围剿”的准备。这样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行动，事先竟然不进行公开动员，使各级领导和群众思想上有所准备，而是采取严格保密的作法，只让下边做一些组织上和物质上的简单准备，到时候就下命令行动。

我到中央纵队担任参谋长一个多星期，队伍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两三天行程时，红三军团突破广东军阀陈济棠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红四师师长洪超在信丰县白石圩附近被敌军流弹击中，不幸牺牲。中央军委命令我接任红四师师长。我在红军主力通过敌人设在仁化、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以前，赶到红四师工作。红四师政治委员是黄克诚，红四师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

在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红四师担任红三军团的前卫，军团命令我们打掉前进路上一个寨子的敌人碉堡，开辟通道，以保障军团主力通过，军团炮兵连连长匡裕民带一门山炮前来配合。我第一次指挥炮兵作战，没有近距离用山炮平射打碉堡的经验，由于不是在水平线上射击，接连发射两发炮弹，都没有打中目标。我们没能按命令在拂晓前打开通过，彭德怀军团长着急了，他从后面赶上来，问了一下情况，他观察了一会，指示炮兵作了调整，只用一发炮弹就击中目标，打开了通路，后续部队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十一月初，红军向敌人设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前进。宜章县城是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一环，红三军团以第六师附迫击炮两个连和一门山炮攻击宜章城。宜章守敌只有几百人的保安团和义勇队，看见红军来进攻，吓得紧闭城门。宜章城外有三百多名被强征来筑路的工人，他们热清地帮红军掘坑道，扎梯子，作攻城准备。城里敌人看见城外的情景，半夜就弃城逃跑。第二天，红六师在群众热烈欢迎下开进宜章城，红军就此通过敌人设在粤汉铁路沿线的第三道封锁线。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部署二十个师，要在湘江以西堵截消灭红军。湖南和广西军阀商定以全州为界，全州以北为湖南军阀防区，全州以南为广西军阀防区。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接近第四道封锁线时行动迟缓，延误了四天时间，以致敌人重兵紧迫，造成非常严重的局面。蒋介石在湘江东岸修筑了大量碉堡，他预期在湘江以东消灭红军，万一红军突过湘江以西，也不能让中央红军和四川红军或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决定在全州和兴安之间渡过湘江，红一军团在右翼，红三军团在左翼苦战，冒着敌机轰炸和地面敌军的火力封锁，掩护全军脱离了险境。这

次强渡湘江的战役，红八军团损失惨重，溃不成军，其他军团的损失也很大。强渡湘江时，红四师在界首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渡河地段，以一天时间阻击广西敌军的进攻，掩护中央纵队通过。第二天，我率红四师两个团继续西进，红十团在湘江以西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红五军团过江。红十团艰苦战斗了两天两夜，打退了敌人十多次冲锋，红十团团团长沈述清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红四师参谋长杜宗美接任团长指挥战斗，不久也壮烈牺牲了。红十团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付出了伤亡四百多人的代价。以后，掩护后续部队的任务交由红五师接替。

渡过湘江之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到三万多人，损失过半。这都是“左”倾领导者推行错误军事路线的结果。他们一路上不愿轻装，使部队在道路上艰难前进，行动缓慢。他们不会捕捉战机，硬往敌人部署的口袋里钻，主力军团只能掩护中央纵队和新军团，不能集中全力作战。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深思，特别是唤醒了高级干部的觉悟，也教训了“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

红军渡过湘江以后，即进入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的山区。这里山势连绵，林深叶茂，地形险峻，特别是东西向的大道较少，部队把大道让给中央纵队通过，部队多数走山地小道。红四师这时的任务仍然是掩护中央纵队行军，蒋介石的“追剿”部队被甩在后面很远，敌机有时侦察轰炸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讨厌的是广西的敌军和民团，他们经兴安和隆胜由南向北分成小股，不断地向红军侧击，增加了我军的一些困难。红军继续前进，进入苗族同胞聚居的地区，这里的苗寨多是傍山构筑，用树皮作屋顶，竹子作架的木板房，由山脚一直连到山顶。山上风大又无水源，如果一着火就会把整个寨子烧光。红军进入苗族地区，各级领导就教育部队防火，制订了防火措施。但是，广西军阀为了不让红军通过，在夜间派出特工人员，到红军宿营的苗族村寨放火烧房子，企图煽动群众反对红军。有的村寨因此被烧成一片焦土，红军给群众赔偿成千的银元。这种情况，在进入贵州境内才稍有好转。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中央在通道举行了会议，由于蒋介石在新宁、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会同、黔阳、芷江地域部署了十五个师兵力，黔军王家烈部进到锦屏、黎平地区堵截红军，湘桂军各一部继续尾追红军，企图围歼红军在北上湘西的路上。“左”倾领导者要北上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势必进入蒋介石预设的口袋。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正确主张得到的党和红军大部分领导的赞同。

红军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西进贵州。旧社会称贵州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困地区。红军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为右翼，经新厂、溶洞进入贵州；红三军团为左翼经团头、播阳，向黎平前进。

黎平城四面环山，敌人在这里没有修什么工事，红三军团逼近黎平，守敌不战而逃，红三军团顺利进入黎平。这样红军把敌人重兵一下子甩在湘西，敌人调整部署需要时间，红军在征战了两个月之后，第一次获得喘息机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里召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准备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决定把红八军团建制撤编，剩余部队分别编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把教导师补充到各军团；把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新编的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另外，把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

凡能战斗的都调到战斗部队去，后方的迫击炮、炮弹和枪械也补充给作战部队。黎平会议后，红军即分两路向黔西北进军。

## 二打遵义

红军从黎平出发，经黄平向瓮安前进。红四师是左路的先遣师，第十团是先头团（在黎平整编得到补充后姚喆任团长），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乘着浓雾逼近瓮安城边。红十团突然发起攻击，打了不到一个小时，守敌就弃城逃跑。红军进了城才知道守城的是黔敌王家烈的第五、第六团、这两个团还以强悍善战出名哩，就那样不堪一击。红军在瓮安欢度了一九三五年元旦，休息了两天。

随后，我们在岩坑附近，赶在敌军江防部队到达之前，到达乌江江边。乌江又名黔江，从西南向东北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江面宽阔，两岸都是黑黑的悬崖绝壁。部队就砍竹林扎竹排，拆破庙做木排，顺利渡过乌江。红军继续向黔北重镇遵义挺进。一月七日红三军团配合红一军团以夜袭，前卫冒充国民党部队智取了遵义城。红四师经团溪到遵义西南的鸭溪地区休整，就地扩军筹款，收集资财，做地方工作。

红军在遵义、桐梓一带休整了十二天。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遵义会议。会议着重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和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增选了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这次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军事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以后，红一方面军在一月十九日主动离开遵义，移师北上，向川南前进。原拟由宜宾附近渡长江北进，配合红四方面军行动。后来了解到川敌在长江沿岸布防，封锁了长江，并派出六个团向土城阻击红军主力北进，中央决定在土城附近消灭这股敌人。一月二十八日拂晓，红三军团以红五师向郭勋祺旅和潘左旅的结合部猛攻；红四师向郭旅第七团阵地猛攻，激战了三个小时，突破了敌阵地，消灭了部分敌人。中午时分，敌廖泽旅赶到，敌军已增到三个旅九个团，而且火力很强。军团领导决定迅速摆脱敌人，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土城战斗中，红四师十团团团长姚喆负伤。进军川南的局面未能打开，中央放弃了由宜宾北渡长江的计划。二月上旬，部队转进到云南的威信（扎西）地区集结。在威信休息了三天，军委为适应战斗形势，充实各连队战斗力，整编了战斗部队。由于战斗减员，红三军团取消了师一级组织，由军团部直接指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团。我任红十团团团长，黄克诚任政委，钟纬剑任参谋长，杨勇任政治处主任；红十一团团团长邓国清，政委张爱萍；红十二团团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红十三团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

二月十九日，红三军团由威信向东转移，在古蔺以南的二郎滩击溃黔军一个团，二渡赤水河。二十四日红三军团进到桐梓以南的胡坝地区，红一军团攻占了桐梓。从川南到遵义，桐梓是第一道门，第二道门就是娄山关。桐梓到娄山关三十里，娄山关下山到板桥四十里，板桥到遵义八十里便无险可守了。

这时，娄山关有王家烈的三个团防守，其中一个团由娄山关向桐梓开来。娄山关在敌人手里，在地形上说对红军不利，红三军团派出一部迂回到娄山关右侧后，夺取了可以俯瞰娄山关的一个山头，在他们的配合下，红十三团从正面攻击，一举攻占了娄山关。

次日拂晓，敌人向娄山关多次反扑，这时我们红十团和红十一团、红十二团赶到，分两路迎击板桥的敌军，敌军抵挡不住，连夜向遵义溃退，红军顺着公路紧追，一直追到遵义城下。战斗中，红十团参谋长钟纬剑（黄埔

军校第三期学生，长征前任红军大学参谋长）牺牲，由伍修权继任；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腿部负伤，由苏振华继任。遵义城分老城和新城两部分，中间有条小河分界，红军占领了新城，敌军凭借城墙在老城闭门坚守。军团参谋长邓萍亲自到老城外侦察，不幸被城内敌军冷枪击中牺牲。部队愤怒地喊着：“为参谋长报仇，坚决拿下遵义城！”二月二十七日晚，红三军团主力向遵义老城发起猛攻，打得敌人伤亡惨重，仓皇弃城溃跑，红军胜利地再次解放了遵义城。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蒋介石命令薛岳兵团两个师配合黔敌王家烈残部向遵义进攻。红军趁敌军在运动之中，集中主力向敌军发动猛攻，仅几个小时激战，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残敌逃往乌江，这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在歼灭薛岳兵团的战斗中，红三军团由右翼进攻。

我带红十团同敌人争夺遵义城西南郊的老鸦山时，腿部负了重伤。当时我感到右腿象被沉重的东西猛击了一下，就很难行动了，走十多步便倒下来，担架员迅速把我抬下火线。我被抬进遵义城里时，起初还能勉强记事，随后就昏迷过去了，医生是怎样诊断的，怎样决定动手术，移动了几个地方。一概不知。直到手术完成以后，为了止血，医生用力捆扎血管时，我才疼醒过来，自以为这一回可能完成革命使命了。当我完全清醒过来后，才知道这次负伤伴有严重感染。给我动手术的是梅丹青医生，他是日本医科大学毕业的，原为国民党芦兴邦部医院的院长，红三军团打开沙县时解放过来的，全国解放后，我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这次手术是由陈伯钧同志承担责任，他因治旧伤，当时在总卫生部休息。梅丹青医生的手术做得很好，把我小腿肚子上受感染的坏肉完全清除了，用肉眼可以从子弹的进口看到子弹的出口。他救了我的性命，保住了我的腿，至今我非常感谢他。手术后由于伤口一时不能愈合，行军转移时，我全在担架上生活。那时，担架员们非常辛苦，有时夜行军，有时走小路，遇到军情紧急时，警戒部队不断催促担架快走；遇到敌机轰炸、扫射时，又要紧急疏散、隐蔽。沿途负责照顾我的原红四师警卫排长，在贵阳以南紫云附近敌机空袭时牺牲了，贺子珍同志也在那次空袭中负了重伤。我当时想，五个担架员轮流抬着我，长时间行军总不是办法。因此在行军道路比较平坦的时候，我就挣扎着骑一段牲口，逐渐转为以骑牲口为主，遇到骑牲口不便时，才躺在担架上。一次经过四川荣经县附近一个叫水子地的地方，因是密林小路，不能骑牲口，也不能躺在担架上，便拄着棍子挣扎着步行了十余里。就这样，我先在总卫生部医疗，到达四川会理休整五天后、

便转到中央休养连休养。

到休养连以后

我到中央休养连休养时，组织上让我担任休养连连长。在这之前休养连连长是侯政，政治指导员李坚真。我来休养连后，李坚真仍然为指导员，她是中央苏区的妇女部长，是个很能干的女同志，支部书记是董必武同志。

中央休养连是一个特殊的连队，大多数是休养人员，有体弱年老的领导同志，还有一些妇女干部和家属等。当时我记得有：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等老同志；蔡畅、邓颖超两位大姐；钟赤兵同志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致残，也在休养连休息。

休养连每到一地，工作人员就打前站，找向导、挑夫、找粮食，安排宿营地。休养连行军速度也很慢，体弱有病的同志更是艰苦。谢觉哉、徐特立等老同志，当时都只穿一身破旧棉袄，背个破挂包，里边就只有几本书、放咸盐的破纸烟盒和碗筷；林老在行军中手里总提着个马灯，以备夜间宿营时

用；他们每走到宿营地都累得不想动了，找把稻草就躺在地上休息，可是谢老还常给大家讲历史故事，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过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战役”等等，鼓舞大家的情绪。

到会理以后，休养连随大军从西昌城外通过，在冕宁休息了两天。接着，就要通过彝族地区，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先头部队的经验，每人都故了些准备，随身带几件小东西和零钱。经过彝族区域时，遇到彝族群众要东西、要钱的时候，就给他们一点，这样我们就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以后，就是过泸定桥。主力部队已经过去了，九根铁索联成的桥身只铺了些门板，人走在上面晃晃荡荡，抬担架的两人脚步不一致，就会把担架翻到河里，有些民夫不愿意挑药箱和抬担架过桥，一时桥头堆着休养连的人员和药箱、挑子，幸亏军委纵队警卫部队上来，才帮着把担架、挑子弄过泸定桥。过了天全、芦山、宝兴，就要翻过夹金山这座大雪山。在宝兴的时候，给大家传达了先头部队过雪山的经验；要在正午前过山顶，午后气候变得恶劣不能通过；在山顶上不能停留，要手拉手地集体通过；体弱的同志用拉着马尾巴的办法上山最好。我们除了吸取这些经验以外，还根据休养连的实际情况，对年老的同志和重伤病员，作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董老等老同志都坚持把马匹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拉着马尾巴随大队走了过去。由于山上空气稀薄，人马走到半山腰就喘不过气来，抬担架和挑药箱的更是困难，大家咬着牙，有些人爬着走，终于把担架、药箱全弄过山去了。休养连翻过夹金山算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一个人掉队，那时在山上掉队就意味着死亡。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直属部队翻过夹金山，来到懋功县的达维，在这里遇到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师，师长是韩东山同志。当天晚上，在达维镇召开了联欢大会，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大事，全国人民都会高兴，只有蒋介石反革命派不高兴，他们害怕得很哪！会师以后，革命形势和过去相比就会大不相同了，我们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六月下旬，休养连在卓克基休息。在那里，傅连喆医生给我拔牙，当时没有麻醉药可用，虽然拔牙时有点疼，但在当时有这样好的医生治病，算是很难得的了。在卓克基休息后，我的伤口已经不用上药了，只是行走还有些不便，医生说不要紧的，经过一段时间锻炼，一定会恢复得同好人一样。于是，我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分配工作。

八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我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军长是许世友，政治委员是王建安。这时，中央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红四军、红三十军和红一、三军团组成。党中央随右路军前进。

红四军在八月中旬由哈龙一带集中到毛儿盖。八月二十日，我随红十一师（师长陈锡联）到腊子山（草地）向松潘方面警戒。二十五日，由腊子山出发过草地，三十一日到达上包座。在上包座配合红三十军击溃敌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歼灭其一部。从九月一日起，红四军担任向南坪方向的警戒。我在红四军工作不安心，写信给右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请求调动工作。当时，右路军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九月九日晚饭后，我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宗逊星夜回总部，另有任务。接到电报后，我立即启程，一夜走了六七十里路，在十日黎明赶到驻夹溪的总指挥部。当时，

没有见到叶参谋长，我就在司令部休息。第二天，我睡醒起来，看到刘志坚和李伯钊，才知道张国焘阴谋用武力裹胁毛主席、党中央南下，发生了我党历史上有名的张国焘反党事件。事出意外，使我感到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后来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已率领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开往俄界，脱离了险境，并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同志，反对张国焘南下把红军带到战略上极为不利的地区、反对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刘志坚、李伯钊等同志是带着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到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来慰问的，事件发生后，他们也没有赶上红三军团的部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告诉我，毛泽东曾亲自对在红军大学工作和学习的红四方面军同志说：你们想回去的可以回去，你们将来还是要北上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当我知道毛主席、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的消息以后，懊悔极了，都怪自己遇事不敏感。其实，我在前一天晚上赶往总指挥部的路上，曾遇到红一、三军团的收容队，但我没有主动向他们问清情况，他们误认为我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员，错过了联络机会。我万分难过，当天曾想逃跑，但因为道路不熟，也不懂藏语，毫无办法，因而精神恍惚，情绪消沉。九月十一日，彭绍辉同志从红三十军调来总指挥部，他也是从红一方面军调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当时任红三十军参谋长，有了他来作伴，我的情绪才稍好一点。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开始南下过草地。就在这一天，我和彭绍辉被调到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的学生队（红一方面军的学生队已北上）当教员，学生队有学员一二百人。南下的路线仍是北上时走过的路线，由巴西过草地，经过毛儿盖，上下打鼓、黑水芦花、马塘、卓克基。红军大学学生队在九月三十日到达松岗附近的邓家桥休整。

十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公然打出反党的旗帜，组成他自己非法的“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十月五日，张国焘找我和彭绍辉两人到卓木碉去谈话。我们到卓木碉时，非法“党中央”正在开什么会，我们一进门，有一位同志就站起来骂彭绍辉同志挑拨红军团结，一边用手摸盒子枪，声言要枪毙彭绍辉。虽然被旁边的同志拉住了，没能用枪打，但他还是伸过手来打了彭绍辉两个耳光。事情的由来是，绍辉同志曾给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和意见，不料这封信落到张国焘的手里，张把信交给一部分人传阅了，其中就有这位同志。

本来我也给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写了一封信，报告我所知道的“分家”情况和我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信写好后没有发出，但有人向张国焘汇报，说我和彭绍辉一起讲过对南下不满他的话，因此张国焘叫我和彭绍辉一起去谈话。那位动手的同志只知道彭绍辉写的信，不知道我的情况，他这样一闹，张国焘也没有再讲什么话。朱总司令以极不满意的脸色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表示抗议。“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张国焘阴谋以武力迫害毛主席、党中央的事实和这次同我们的“谈话”过程，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党分裂主义路线和军阀主义倾向。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部队中发生类似的蛮横行动并不奇怪，如张国焘调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去红军大学学习，余闹着不去，张国焘就派人把他看管起来。余天云还是不服，部队南下到懋功的铁索桥时，他竟从悬崖上跳下去身亡。

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晚，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排以上活动分子会，我因病未去参加。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对我说，这次会主要是斗争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要他们表态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遭到朱、刘

两同志严词拒绝。

一九三六年二月

月，敌人大举向天全、芦山进攻，红四方面军陷入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的困境，不得不撤离天全、芦山，又开始向北行动。这说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已经完全破产。但张国焘仍不死心，在部队向北行动时，又任命刘伯承（当时是红军大学校长）为先遣军司令，到金沙江上游去调查，企图经德格、邓柯、玉树去青海西宁。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二月十三日从天全县红岩坝出发向北行动，途经宝兴、夹金山、达维、懋功、丹巴、道孚，在四月四日到达炉霍。到炉霍后，部队的行动方向已成为广大指战员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溜在红四方面军的原红一方面军的大多数同志，都盼望能够早日和毛主席、党中央会合。有一天，李井泉、郭天民、曹里怀等同志来到我的住处闲谈。当时曹里怀是“军委”一局局长，了解部队行动的情况，他同我们谈到先遣军司令刘伯承同志来电说：经格德、邓柯、玉树到西宁，沿途人口稀少，大军不能通过。后来，有人把我们谈话的情况向何畏（红大政委）汇报了。何畏向张国焘报告后，根据张国焘的指示，以非法的“中央军委”名义通知我们：曹里怀同志泄露军情，给予留党察看处分；张宗逊同志不制止谈论军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李井泉、郭天民同志分别给予警告处分。事后才发觉，我们是张国焘列入“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名单并加以监视的对象。张国焘的反党行动，一直持续到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红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才有所收敛。

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旬，红军第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七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同志，领导红二方面军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决斗争，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决反对，以及南下失败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迫使张国焘不再坚持用非法中央的名义发布命令，勉强同意北上。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张国焘在炉霍心怀鬼胎地向总直属队干部作了一次骗人的讲话，他说：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很好，现在党内路线上和行动上都达到一致了，决心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七月上旬，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包括红一方面军随张国焘南下的红五军等）经过阿坝，沿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开始北上。九月下旬，部队到达岷县附近时，张国焘仍不肯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后来，由于胡宗南和马步青、马鸿逵两敌从东西两个方面进逼，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和红一方面军会师打击胡宗南。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和红一方面军会师。



## 在红四方面军红大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大小金川地区会合。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给全党全军带来无比的兴奋和力量。为了一起北上抗日，党中央决定统一两个方面军的组织和行动。红军分兵左右两路向甘南进军。

当时，提高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适应抗日救国的需要，也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为此，党中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任命倪志亮为校长（未到职），原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为政委（后叛变），刘少奇兼政治部主任，李特为教育长，莫文骅为总支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随右路军行动。

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右路军过草地到达包座、班佑、巴西地区。张国焘随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之后，借口噶曲河涨水，违抗党中央要其北上的决定，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他还电令右路军一起南下。党中央获悉了张国焘的阴谋，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一起北上，迅速脱离险境。接着，党中央又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全体同志巩固党和红军的团结，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里，李特鼓动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南下，以后编成一个红大干部队，随同红四方面军部队行动。当时，我奉叶剑英参谋长的命令，由红四军调到驻夹溪的总指挥部。我去报到时不知道党中央北上的决定，没赶上北上队伍。九月十二日，我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干部队当教员，由李特和何畏介绍同学员见了面，该队有学员一二百人，随总指挥部沿老路由夹溪南下，重过草地，在九月三十日到松岗附近的邓家桥休整。十月五日，张国焘在马尔康县的卓木碉公然打出反党旗帜，组成非法“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政府”，继续破坏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十月九日，以原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干部队为基础，在卓木碉又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以下均称红军大学）。张国焘任命刘伯承总参谋长到红军大学兼任校长，刘伯承就利用这个阵地，有计划地提高红四方面军指挥员的军政素质和管理教育部队能力，耐心地向干部和学员宣传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引导他们走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团结一致，北上抗日”的正确道路。红军大学的领导机构很精干。校长刘伯承，政委何畏。我任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协助刘校长做教学组织和行政工作。参谋长下面设有一个行政科（后来改为供给科）负责行军、宿营、伙食和生活管理工作。以后随着学校扩大，又增设了卫生科和警卫连。原红九军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任红大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下设宣传科。

红军大学干部队的学员都是团营两级军政干部，组成上级政治科和上级指挥科两个队。上级政治科科长彭绍辉，教导员李井泉；上级指挥科科长周子昆（后为陈伯钧、曹里怀、马良骏），教导员李培南（后为李园芳、黄志勇）。高级指挥科的学员是在卓木碉新招的，从部队抽调了三十多名军师干部来学习。当时，规定在作战行动中师级干部可以随带牲口两匹，饲养员、炊事员、勤务兵各一人，警卫员二人；军级干部可随带牲口三匹，文书、勤务兵、炊事员各一人，警卫员三人。这样，只有三十几个学员的高级指挥科实际上就有一百多人，宿营的时候也要有一个村子才能安顿下来。红大的每期学员规定学习时间为三个月。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原军委总队的防空机枪排和工兵连归红大建制，

编为一个特科中队，以后又将高级指挥科、军师级学员带来的文书组成青年队，将公勤人员和第九军交通队（都是部队的优秀战士和班排长）组成一个干部队。以上几个队统编为中级干部队，由皮定均任队长、黄志勇任指导员。同时，还成立了一个政治连，学员大都是各军调来的支部书记和少数排长。中级干部队和政治连的学习期限规定为半年。

一九三六年四月，红大转移到炉霍时，各科又招收了第二期学员。在校部新设了教育科，由郭天民担任科长。这时，红大已扩大到一千五百多人。九月、十月间在甘南以红大中级干部队为基础成立了一个步兵学校，直属总部领导，校长倪志亮。

我记得在红大担任过教学工作的同志，军事教员有周子昆、陈伯钧、彭绍辉、郭天民、曹里怀、马良骏、李奇柱、赖光勋、符显禄、王波等；政治教员有张际春、毛庭芳、黄志勇、李培南、陈志芳、罗世文、潘自力、朱光等；还有洪水（越南人）担任文化教员。红军大学各学员队一开始就建立了较为健全的科（队）、排、班等行政组织，校部和学员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刘校长经常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校部的党组织生活，积极帮助党支部了解思想情况，做好思想工作，为全体干部做出了榜样。

红大的学员们，都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员，但是大都是贫苦出身的工人、农民，不少人从小就当放牛娃，根本没有念过书。他们说：“我们有机会进‘红大’学习，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学校里既学文化，又学军事和政治知识，这是一生中了不起的大事。”所以，每个学员都能抓紧时间勤奋学习。

在长征路上办红军大学，环境特殊，气候恶劣，物质条件异常困难，还要边打仗、边行军、边教学，真是史无前例。刘伯承校长针对当时的具体条件，为红大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就是说，把马列主义的原理，特别是军事方面的理论，结合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要求把学员培养成为有高度政治觉悟，有指挥作战本领，有管理教育能力，有艰苦奋斗不憎牺牲精神的红军干部。刘伯承同志亲自主持制订学校的教学计划。他深知办学的重要，在中央苏区时就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他反复向我们讲明办学的目的、意义和方法。他经常对我们讲，古今中外能打胜仗的军队都没有“不教而战”的，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无头苍蝇，打起仗来东撞西碰，四零五散，各不相顾，没有不失败的。

红大的教学课程主要设政治课和军事课。在政治教育方面，开设了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和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着重讲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宗旨，把大家的认识逐步统一到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团结一致，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上来。再就是组织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将来开展工作做准备。除了正式讲课以外，结合当时部队在少数民族地区活动，要求大家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遵守保护寺庙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并且向群众宣传民族自治，民族平等，民族联合和国家统一的道理。为此，要求大家都学会点常用藏语。针对红四方面军当时存在一些军阀主义倾向，学校狠抓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强调官兵平等和军民团结，反对打人、骂人。刘校长提出了我们的拳头不能打在工农阶级兄弟身上，只能打在敌人身上的口号。在军事教育方面。开设了《苏联红军战斗条令》和《苏军野战条令》课程，这是刘伯承校长在戎马倥偬之中，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他开设条令课为的

是红军的长远建设。另外还有军事地形学和射击原理等课程。战术课从单兵训练开始到班排连的作战指挥进行野外练习，营到兵团的作战指挥则采用沙盘作业或图上作业训练。红大的学风是在实践中学，学以致用，从来不讲空洞的理论。一方面边学习理论，边总结过去的作战经验；一方面联系当时的实际，提出要学会“打”和“走”。“走”是长征的一门主课，一是给学员们讲爬雪山过草地等不同地理环境的行军、宿营、警戒各方面的知识；二是讲红军北上可能经过的地区情况，如地形特点、气候变化规律、沿途民情和物产分布，以及敌人的部署情况等等。“打”就是可能遇到的不同战斗，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对付敌人。要求学会打骑兵，打平地战、打山地战、打河川战、打隘路战、打麻雀战。这些学习内容，既实用又生动具体。刘伯承校长提倡教员讲课多做示范，学员要多做操练，使学员们能够较快地掌握运用所学知识，学会怎样带兵、练兵、用兵。因为红大的学员们文化程度大都很低，有的甚至不识字。红大专门从红五军团调来洪水同志，负责全校的文化学习。刘校长经常对大家讲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刻苦学习。他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时候，为了学习俄语，吃饭、散步，甚至上厕所也用小木棒在地上练单词，很快就掌握了这一语言工具。大家听了都很受启发。当时，红大油印出版了一个校刊，名为《红炉》，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园地，刘校长为《红炉》题写了刊头和发刊词。发刊词的大意是：我们学校是一个红炉，我们要在这个红炉中锻炼，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向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在这通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刘校长还带头为校刊写稿。当时红四方面军转战在四川、西康交界的险山急流之中，经常发生隘路战斗。刘校长认真总结了部队隘路战斗的经验，考察隘路的大小、长短，暴露或是隐蔽，定出适应隘路环境的战术，写出了《当前隘路战斗》一文，发表在《红炉》第一期上。

红军大学的学习期限很短，而学习的内容很多，时间安排很紧。刘伯承校长抓紧落实教学计划，和学员们一起听课，了解学习情况，耐心细致地回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学员们经过紧张的学习。都能学到一定的知识，达到预定的教学目的。红军大学没有固定校址，随着战局的发展和粮秣筹集情况，不断地行军转移，只能抓紧宿营的时间进行教学训练。起先在卓木碉成立之后，只训练了一个星期。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转移到绥靖县的沙尔坨，在那里搞了大约三个星期的训练又继续南下。红大随总部行动，途经丹巴、懋功、达维、夹金山、宝兴等地，在十二月五日到达天全县的红岩坝。这次行军，沿途都是走路，找粮食搞饭吃，没打什么仗。在红岩坝才正式按教学计划上课。我担任高级指挥科的军事课。刘伯承校长只要有空就跟着听课。当每一项军事课程学习结束时，他都亲自作讲评和总结，他讲话通俗易懂，由浅入深，生动风趣，还善于运用典故，举例形象。例如他在战术课小结时，非常生动地比喻：我们千万不要学牛抵角的战术，去消耗、胶着。要学狼的战术。当一个人推车过来的时候，它不咬，只在旁边跟着，瞅准人推车上坡的时候，它才跳出来咬推车人的屁股，推车人不敢撒手，白白让狼咬掉一块肉。学员们听着笑声不断，印象十分深刻。

红军大学在天全县红岩坝共驻了两个月零八天，完成了教学计划的三分之二，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三日向北行动，途经宝兴、夹金山、达维、懋功、丹巴、道孚，在四月四日到达炉霍。高级指挥科在转移途中利用休息时间继续上课，甚至在丹巴休息一天，准备翻越二千米的党岭山主峰时还坚持学习。那时学习条件极差，没有纸笔，就用打土

豪时寻到的一点旧书翻过来写，用子弹壳做成笔，找货郎担买点颜料冲成墨水。住在道孚的时候，大家从山上找来石片，在烂墙下拣些石灰块作纸笔，晚上没有灯就点松脂照明。高级指挥科第一期学员在到达炉霍之前，终于完成了教学计划并进行学员毕业分配。

进入炉霍以后，红大驻在一个喇嘛庙里。这座喇嘛庙的房子很多，都是金色屋顶，有的还是两层楼，下面堆放东西，上面住人。庙里原有七八百名喇嘛，因为他们不了解红军是什么队伍，都纷纷出逃了，只留下少数喇嘛看庙。在炉霍期间，刘伯承校长特别强调在学员中普遍进行少数民族政策教育，要求大家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保护群众安全；提出人人要做群众工作，并开展调查研究，打扫卫生，帮助群众做好事。刘伯承同志以身作则，经常带着通司（翻译），找没逃走的喇嘛谈话，向他们解释红军的政策，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和国民党军队有本质的不同，请他们把山上的喇嘛找回来。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跑上山去的喇嘛和群众陆续返回，他们还多次和红军举行联欢会，表演歌舞，欢迎红军的到来。在喇嘛庙里，我们上课学习，喇嘛念经拜佛，大家相安无事。炉霍完全是藏族聚居地区，地处草原，交通不便，气候恶劣，经济条件很差，补给困难。炉霍的大喇嘛庙里，存有许多羊毛，我们利用这些羊毛，人人学习捻线，织毛衣、毛裤、毛袜，打草鞋，准备过冬。不久，每人都织成一套半毛衣，打好三双草鞋。炉霍地区的烧柴问题很困难，当地群众都是烧牛粪作燃料，校领导便请当时参加红军的藏族战士为部队表演如何烧牛粪和架帐篷。部队随带的粮食到炉霍不久就吃完了，只能就地筹粮，吃青棵面。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校部号召大家挖野菜来补充，学校还专门举办了采野菜的短训班，组织挖野菜比赛来推动这项工作。在炉霍，红大举行了一次阅兵和体育运动会。当时就在喇嘛庙前搭了一个简单的检阅台，在军事体育表演之后，朱总司令和刘校长检阅了队伍。阅兵之后，刘伯承校长讲了话，他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的人民武装要组成浩浩荡荡的分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的讲话，进一步鼓舞了全体学员学习军事政治的积极性。一九三六年六月底七月初，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部队在甘孜会师，消息传到红大，大家非常振奋。刘伯承校长号召校部的党员们每人织一件毛衣、毛裤或毛袜来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同志，他自己在工作之余也熬夜织毛衣。

七月初，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起经过阿坝，沿着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北上，这时，刘伯承和陈伯钧等同志到红二方面军帮助工作。后来，红二方面军抵达甘肃也组成一个红军大学，刘伯承兼校长。

红大在炉霍训练了将近三个月。由炉霍出发时，每人只配给了十五斤糌粑和酥油、食盐、茶叶各一斤。此外学校供给科还统一准备了全校平均每人一头牦牛和一些羊群随军行动。当时不知道到底要走多长时间，所以规定每人每天只准吃二两炒面，其他主要靠挖野菜充饥。后来随带的粮食吃完了，沿途又筹不到粮食来补充，就规定每个伙食单位每天杀一头牛。牛也一天天减少了，人员营养不足，行军很吃力。这期间根本不可能进行教学了，只能在行军中和饥饿以及疾病作斗争。

红四方面军冲破重重困难，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从成立到陕北，仅一年的时间。一年来，在战斗极为频繁，条件极为艰苦的长征途中，红大全体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培训了从班排到军师干部三千多人，使这些同志的军事水平、政治水平以及管理教育

部队的能力，都有明显的提高。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为党和红军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 胜利到达陕北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合。红三十军、红九军和红五军共两万余人，由靖远渡过黄河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编为西路军，最后遭到失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其余部队（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指示，向陕北革命根据地靠近。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军主力在山城堡、甜水堡地区，击溃了胡宗南的丁德隆师，消灭其大部。以后胡宗南的军队不敢再前进了。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十月二十一日由会宁的张城堡出发，经过打拉池、同心城、预旺堡，在十一月中旬抵达环县的洪德城。在行军中因受张国焘反党行动的影响，红大有些学员思想波动很大。高级指挥科的少数学员还邀集在一起找张浩同志（即林育英，当时刚从共产国际回来不久）去闹，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辩护，个别人甚至离队逃回鄂豫皖去了。我是红军大学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工作处境很困难。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洪德城附近，接到军委命令：何畏带红四方面军红大高级指挥科去保安；张宗逊带其余部分去木钵（甘肃环县境内）和红一方面军红大第三科会合。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带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上级指挥科、青年队和部分教职员到达木钵集合待命。二十六日，朱总司令、刘伯承校长来到木钵，召集红一、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教职员和学员讲了话，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宣布木钵学校为红军大学第二学校，刘伯承同志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周昆任副校长，袁国平任副政治委员，我任上级干部队队长。二十八日，红二方面军的学员由谭家述同志带领来到木钵。这时，红大第二学校上级干部队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学员编为第一区队，红四方面军学员编为第二区队。原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的青年队改为测绘队，隶属于上级干部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厉地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却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反共打内战，并调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到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张、杨在和红军作战中，受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也看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前途的，从而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蒋介石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反而调兵压迫张、杨，要他们继续进攻红军。张学良和杨虎城被迫发动了西安事变，逮捕了蒋介石，实行“兵谏”。

中央军委主席团来电通报事变情况如下：十二日六点钟，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及其他在西安的国民党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二团团团长杨镇亚被击毙，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在逃。整个西安城郊伪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被缴械。

在南京的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人图谋进攻西安，扩大内战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毛主席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派周恩来副主席率代表团去西安进行调停，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代表严肃地向蒋介石指明出路，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勉强答应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在中共代表和张、杨两将军的共同努力下，使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从而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十二月十九日，刘伯承校长奉命回到驻在保安的中央军委。二十五日，军委命令红军大学第二学校移驻庆阳。第一天在马岭宿营时，接到军委命令红大第二学校上干队和保安红大二科合并的电报。二十七月，我即率上干队

(原青年队,即测绘队留在第二学校)从马岭出发,经曲子、五角、吴旗,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到达保安(今志丹县)的顺宁宿营。在顺宁,红军大学本部派来管理人员筹办给养,并送来要红大第二学校上千队在顺宁宁侍命转移延安的信。我在一月三日上午到保安,当天中午去见毛主席。

我以兴奋和敬佩的心情向毛主席敬礼问好后,毛主席亲切他说:张宗逊你倒好,革命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随后,毛主席问了学校的情况,谈了些有关蒋介石十二月二十六日飞回南京的情况。毛主席说: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但还会有斗争。并说,释放蒋介石是对的,有人(指张国焘)主张杀掉蒋介石是不对的,杀了蒋介石有利于亲日派,不利于抗日。

我在军委四局休息了两天。一月六日,毛主席任命我为军委一局局长。我到职后即参加组织军委纵队由保安迁往延安的工作。一月十日,军委纵队由保安出发,路经安塞,三天行程分作四天走,每天走四五十里路,在一月十三日进驻延安城。一月十九日,毛主席任命我兼鄜甘警备司令(全称是鄜县甘泉警备司令)。赴任前,我向毛主席请示工作。毛主席说:做好进城工作,要注意多交朋友,防止关门主义倾向。一月二十一日,我带着一名参谋、一个警卫班和警卫员、公务员、饲养员、炊事员等由延安出发,走了七十五里路到达甘泉附近的白上坡宿营。甘泉县城的地主武装紧闭城门,不准红军进城。我遂派参谋到就近的高哨和陕甘省委罗迈(李维汉)同志联系,罗迈同志派来一个工作组随我同去鄜县(今富县)。我们走了两天,于二十三日到达鄜县北郊,那里有红二十七军贺晋年、张达志同志带来的部队。我在鄜县北郊暂时住下,以后就来往在延安和鄜县之间。在延安三十里铺和甘泉劳山之间,曾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破坏捣乱,军委指定李德(德国人)负责这一带的剿匪工作,我曾和他联系过两次,由黄华同志当翻译。延安、甘泉和鄜县三座县城,是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撤走后交给红军进驻的。延安城的移交工作进展顺利,军委纵队未到之前,红军就已进入延安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任的延安县县长马豫章同志到任后尚未开始工作,就主动要求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在我任鄜甘警备司令时,鄜县、甘泉两座县城仍为地主士绅及其武装盘踞着。甘泉县城地处咸榆公路上,来往的汽车也须经过城里。甘泉县城里有地主士绅领导的县保安队数十人,枪四五十条,他们不敢硬和红军为敌。红军派人和保安队交涉军车通过,不得阻挡,不得检查,必须保证安全通过。接着,红军的兵站进驻县城。随后又通过地方做工作,改编了城内保安队。在红军进驻甘泉县城的过程中,陕西省政府任命的甘泉县县长苗芝青(陕西佳县人),起了不小的作用。鄜县县城在洛河右岸,不通公路,距城四华里处的茶坊有公路经过。我没到鄜县前,县城城门关闭,地主士绅盘踞城内,日夜有保安队巡逻,老百姓不得自由出入,红军游击队曾要求进城,地主士绅和县长也都没有答应。我到达后,经过交涉和多方做工作,红军终于驻进城里。城门开放了,恢复了集市,红军战士遵守纪律,很受群众欢迎,红军不到地主士绅住的土寨子里去,秩序很快恢复正常。在红军进驻部县城的工作中,国民党的县长张执庵(陕西中部县人,政治立场亲杨虎城将军)、县保安大队队长杨国栋(又名杨公甫,陕西安定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曾是中共党员,后被捕变节)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政治形势迅速发展。

陕北革命根据地通向全国各地的大门开放了,白区党组织的同志,各地

的进步人士、革命青年纷纷来延安工作、学习或参观。一开始，来的多半是西安地区的和东北各省流亡关内的人，以后全国各地都有人来了，特别是平津一带的青年学生来得不少。我在七月间离开鄜县、延安时，延鄜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已经相当繁忙。

我到鄜县不久，开始同家中通信，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叔父张浩如的第一封回信，一开头就感叹地说：“你还在人间！”他叙述家庭破产的经过后说，这时接到你的来信，真是“否极泰来”。王尚德老师给我的第一封信说：十年来到处打听你的消息，都如石沉大海，突然接到你的来信，大出所料，兴奋极了。这是两位前辈对我十年来同家庭关系的总概括，也是我十年革命生涯中同家庭之间的实际情况。



## 第六章 转战敌后

## 到一二 师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全面抗战，全体红军誓为抗日的先驱。蒋介石放弃了不抵抗政策，开始了全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七月二十七日，毛主席批准我到西安去治牙疾。我在八月一日到达西安，住在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他们给我做了一套便服，并安排我到珍珠泉浴室洗了澡。我在西安治牙期间，红军办事处以我的名义，请王尚德、张浩如、田涵荣（武昌商业大学毕业，在西安教育界工作）等乡亲故旧吃了一顿饭，由叶剑英同志作陪。我在红军办事处住处和芍林里田涵荣家里，和王尚德、张浩如两位老师畅谈了几天，主要谈离别十多年的情况。八月上旬，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调我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我立即离开西安，在八月十四日赶到驻在三原县云阳镇的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和总政委任弼时同我谈了话，他们嘱咐我说，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情况不同，工作上各有特点，到红二方面军工作，不能照搬红一方面军的工作经验，在工作中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注意做好团结工作。我在红军总指挥部只休息了一天，八月十六日到驻富平县庄里镇的红二方面军指挥部报到。一进村就遇见贺龙同志，他老远就豪爽地大声打招呼：“张宗逊！你来了，欢迎你，还没有吃饭吧？先进屋吃饭，吃了饭再谈。”吃过饭以后，贺龙和关向应一起和我谈话。贺龙说：“你到四师去工作，四师的工作情况由四师政委李井泉给你谈。”关政委说：“现在有人说二方面军有军阀主义，在我看来，二方面军的问题不是军阀主义倾向严重，严重的倒是游击习气。”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有人说红二方面军有军阀主义，而且指名批评原红四师师长卢冬生和十二团团团长。卢冬生想不通，要求去延安学习，我到红四师的时候，卢冬生已经去延安了，我未能和他见面。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洛川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明确了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贺龙参加了洛川会议，他在会上坚决拥护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他回部队以后，召集团以上干部进行传达，我听了他的传达以后，决心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在实践中认真领会和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去。在八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协议，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反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自前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 师、第一二九师等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第一二 师以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第一二九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九月十一日，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司令部，但是人们习惯上仍叫八路军。

这次改编，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干扰，政治工作人员要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改编为政训处，取消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使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度受

到削弱。一九三七年十月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主动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制度，并任命聂荣臻为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为第一二一师政治委员，张浩为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八月下旬，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业已就绪。九月二日在庄里镇东端的广场上召开第一二一师整编大会。这天，天气很晴朗，全师八千多人集合在一起，会场上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落，盛况空前。但是，指战员们心里都结了个疙瘩，就是由红军变为“白军”，弯子转得太大了，大家对穿白军衣服，戴白军军帽和帽徽最想不通。当贺龙等领导同志步入会场的时候，大家都翘首注视着，盼望他们能解开大家的思想疙瘩。大会由甘泗淇主持，贺师长首先宣布了总部的改编命令，然后讲话，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华北危急，国难当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抗日，党中央决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跟国民党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八路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仍然要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我们虽然换上国民党军队的军旗和帽徽，但是我们外表是白的，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他的话获得热烈的掌声，当然有的人从感情上还是转不过来，悄悄地保存着红军军帽等等，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不自愿戴白军帽徽的情绪才逐渐消失。贺师长讲话以后，肖克和周士第在会上发布了开赴山西前线的行军命令。第一二一师是以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二师，赤水警卫营，总部直属队组成。第一二一师辖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师教导团；每旅各辖两个团，还有师直属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骑兵营。全师八千余人。第三五八旅的主要干部是：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十月一日改为政治委员）、参谋长姚喆，政训处主任张平化。下辖七一五团和七一六团。七一五团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政训处主任朱辉照（十月一日改为政治委员）、参谋长喻楚杰；七一六团团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十月一日改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曾来古、政训处主任伍晋南。

### 开赴管涔山前线

在红军胜利完成改编的时候，日本侵略军正沿着平绥、平汉、津浦等铁路线向西、向南长驱直入，华北战场形势日趋恶化。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八路军挥师东渡黄河，向华北抗日前线急进。第一二一师除留第七一八团和几个直属营保卫河防和陕甘宁边区外，主力两个旅和教导团在贺龙和关向应率领下，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从富平县庄里镇出发。第三五八旅随师部之后，经澄城、郃阳，九月十二日在韩城的芝川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九月十七日到达侯马镇（今曲沃县）。当时，国民党搞片面抗战，没有广泛动员群众，所以我们行军路上，沿途群众弄不清我们是什么队伍，没有搞有组织的迎送。上层人士还比较热情，他们知道前线吃紧，希望八路军赶快开上去。路过合阳的时候，我随贺师长去访问一个专员，和他商量解决粮草和行军宿营等事宜，这个专员设便宴招待我们，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满口答应帮助解决。我们在侯马乘火车北上。在侯马火车站，我们见到了朱总司令和任弼时主任，阎锡山派了一个少将带专列来迎接他们到太原去。这时大同已经沦陷，雁北非常吃紧，而山西的窄轨火车走得很慢，我们一路上都得注意防空。走到临汾停了一天，那一天国民党的空军在太原上空和日本空军打了一场空战。国民党空军在山西只有几架意大利造的老式飞机，这次几乎都被日军击落击伤，再也打不起空战了。从此，制空权完全被日军控制。敌人的飞机在同蒲铁路沿线频繁活动，十分猖狂，火车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走走停停。九月

二十三日，我们旅部和第七一五团才到达宁武车站下车。九月二十七日全旅集结在神池以西的庙子、东湖地区待命。

当时，雁北各县不是被日军占领，就是留下一座空城。晋北的国民党军队纷纷败退到雁门关一线。九月二十八日，贺龙和关向应率第一二 师直属队一部到达义井镇。当晚，在义井镇召开第三五八旅团以上干部会，研究作战行动问题。为了配合友军固守雁门关，贺、关首长当即决定：派第七一六团团团长宋时轮率该团第二营（原为陕北红军二十八军编成），组成宋支队，在同蒲路以西的雁北地区独立活动，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第七一六团（欠第二营）由廖汉生率领到广武、雁门关、太和岭之间活动，破坏交通，打击敌人。第三五八旅旅部和第七一五团集结在八角堡、义井镇地域，准备配合国民党守长城的部队作战。而国民党骑兵军何柱国部和独立第七旅马廷守部，却没有打一枪、放一炮，就放弃了雁门关以西的长城各阵地。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一千余人，这次胜利极大的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心集中卫立煌等部几个军在忻口一线和日军决战，以保卫太原。宋时轮支队在九月二十九日由神池东湖出发，十月一日占领井坪镇，十月四日占领平鲁县城，接着活动在同蒲线上，威胁大同，成功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第三五八旅主力则活动在敌人侧后，十月六日第七一六团一营和师骑兵营进占神池城。同日夜晚，李井泉率第七一五团二营夜袭宁武城。敌军占领宁武之后，主力沿铁路南下，留下几百人在城里抢掠烧杀，夜里敌人岗哨空隙很大，到二营摸进城里，敌人才发觉，打了一通宵巷战，二营给敌人很大杀伤后撤出城去。七日以后，第三五八旅主力尾随南进的敌人主力，先后占领阳方口、段家岭、轩岗，斩断了敌军的后路。十月十三日，日军坂垣师团向忻口国民党军正面阵地发动攻击，打响了忻口战役，遭到猛烈的抵抗。十月十四日，尾敌跟进的第七一五团，在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率领下，抵达原平以西的南北大常、永兴村。经过侦察知道村里驻有日军的辎重部队，他们没有修工事，警戒不严。当日黄昏，王尚荣团长即以第一、三营攻袭南北大常，以第二营攻击永兴村。指战员们勇猛地迅速突进村里，很快占领了村庄的大半部。敌人退守在坚固的房屋里顽抗，并且组织坦克和装甲车掩护进行反冲击。当时，我们还缺乏和日军作战的经验，巷战中只是顺着街道进攻，又没有反坦克武器，遇着敌人坦克、装甲车，只能以手榴弹来对付。所以七一五团两个营打了整整一夜，仍然不能解决战斗，直到天亮了，只得撤到村外。这次村落战，消灭了百余名日军，用手榴弹炸毁敌人坦克、装甲汽车各一辆，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十多支和一些军用品。第七一五团也付出了代价，第二营营长刘开绪和组织股长胡道全牺牲。

第七一六团到达广武地区以后，立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交通线。这时，在红军大学学习的贺炳炎回到部队，担任第七一六团团团长，和廖汉生共同指挥。十月十八日，第七一六团在雁门关以南的黑石头沟进行破路，侦察分队前来报告，由广武方向开来汽车百余辆，阳明堡方向也有百余辆汽车开来。团领导立即指挥部队迅速隐蔽在黑石头沟两侧的山上。当敌人汽车开进伏击地区、各连立即向敌人开火，头几辆车的敌人慌忙下车还击，后面的车掉头就跑。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战斗，消灭了敌人五百多名，击毁汽车六辆，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二十多支。部队完成伏击任务之后，迅速撤出战斗。二十日，第七一六团一部继续破路，一部一度攻

占雁门关，他们在公路上积极活动，截断敌人后方运输达五天之久，有力地支援了忻口友军。

八路军各部队不断在敌人侧后进行袭击，使敌人很为恼怒，但是他们却以为我们是国民党军队的残败兵，顾不上认真对付。十月二十四日驻原平的敌人派出一个骑兵中队，向驻在北上岗的第七一五团二营进行报复进攻。我们很快得到消息，第七一五团领导命令第二营和特务连，在北上岗伏击消灭这股敌人。等到嚣张的敌人骑兵整队闯入伏击区，第二营和特务连就勇猛地冲向敌人，敌人受到突然打击，纷纷下马抢占有利地形负隅顽抗。第二营打了四个小时，未能歼灭敌人，团领导命令第一营投入战斗，和第二营合力围攻，终于将敌人大部歼灭。这一仗打死日军七十余人，缴获战马二十余匹，轻机枪两挺，步枪三十余支。在这次战斗中，第七一五团二营政治教导员盛东才牺牲。与此同时，活跃在雁北地区的宋支队，在十月十日于怀仁、岱岳之间的公路上，伏击了满载日军的上百辆汽车，击毁汽车十八辆，歼灭二百多名敌兵。他们在十月二十六日袭击了口泉镇，十一月五日又袭击威远堡。宋支队这些战斗都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忻口战役作战。

忻口战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以九十多个团兵力，坚守了半个月。由于日军以两个师团沿平汉线南下，占领了石家庄，攻进娘子关，直逼太原。在这样的情势下，忻口的国民党军队终于在十一月二日下令总退却。而第一二师各部队仍在侧后尾击敌人，第七一五团在十一月七日，以第三营袭击驻在卫村的日军，毙敌三十余人，缴轻机枪两挺，步马枪九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在忻口一线丢弃了不少枪支弹药，我们收集了这些武器弹药来补充部队和武装群众。

晋北忻口战役是第一二师和日军作战的开端。我们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一度扰乱并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使日军在忻口战役中军用物资供应困难。我军通过和日军初战，开始掌握了日军作战的一些特点，取得了一些经验，证明用我军的长处，如以夜战、近战、伏击等战术来打日军的弱点，日本侵略军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而国民党军队在片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实行消极防御，他们机械地搬用军事教条，战略战术是笨拙的。实践证明，我们必须发动全民全面抗战，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逐步削弱敌人，在战争中锻炼壮大自己，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太原沦陷前

## 后

忻口战役以后，太原和晋中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南、晋西南退却，太原市在十一月八日沦陷。

太原沦陷以后，毛主席当即指出：华北战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进入了主要地位。毛主席具体指示一二师在晋西北要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作为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纷纷南撤的时候，山西的局势非常混乱，散兵游勇到处流窜骚扰，人民被迫四出逃难。一些汉奸坏人乘机造谣，说：“山西没有了！”“华北没有了！”

这时，第三五八旅遵照贺龙、关向应的命令，进到阳曲、交城、文水、汾阳地区活动。旅直和第七一五团以古交、河口为中心，在太原西北的黄寨、向阳店、东社、白家庄、交城地区活动，并派出游击队到太原东山和寿阳县境内活动；第七一六团在文水、汾阳、离石地区活动。部队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向活动地区的群众宣传：我们要坚持华北抗战，坚持山西抗战、要变敌后为前线。

八路军的活动坚定了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注意做好友军、友政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当时，我们的战斗活动，主要是打击出扰的小股敌军，孤立敌人占领的据点，打击汉奸维持会等敌伪活动，建立和健全抗日政权。我们在敌后，经过积极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初步打开了局面，八路军所到之处，群众就踊跃要求参军，要求武装，抗日团体组织起来了，散兵游勇也要求收编。我们三五八旅将收编的一个散兵组成的营和新组的汾（阳）孝（义）游击队四个连编入第七一六团，补充宋支队走后遗缺的第二营，其他部队也得到补充和发展，第七一五团和七一六团都扩成每团三个营，每营四个连，还有一个机枪连，每连一百七十多人。在忻口战役中，我们派出第七一五团副团长顿星云，和第一营政治教导员彭德大，带领第七一五团九连组成两个工作组，分赴崞县、宁武地区进行工作。崞县、宁武地区许多村镇都被日军烧成一片瓦砾，无数同胞遭到屠杀。仅宁武县城，家家的菜窖差不多都成了日军活埋无辜百姓的地方；所有的水井，都堆塞着被日军用刺刀挑死的男人、小孩和被奸淫的妇女尸体……工作团目睹这些惨象，眼都红了，他们号召逃难的群众回家坚持生产，建立地方抗日政权，组织自卫队，武装保卫家乡。经过工作团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崞县、宁武地区的群众很快组织起自卫队，不到一个月时间又由自卫队发展到一千多人的抗日义勇军，以后抗日义勇军又改编成顿、彭游击支队。十二月底，宁武游击队开到崞县，整编成忻、崞独立团。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在崞县楼板寨将独立团正式编为第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顿星云，政委彭德大。宋支队在雁北也由一个营扩大到五个营。这样不算宋支队，第三五八旅由东渡黄河时的四千多人，发展到一万多人。

一二 师在同蒲路北段沿线的一些县份都初步通过工作打下基础。凡是开展工作的县都成立了中共党组织和抗日的群众组织，组织了成千人的游击队和自卫军。一二 师从八千多人扩展到二万五千多人。

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三五八旅主力进行短期休整，旅直驻北小店镇，第七一四团驻楼板寨，第七一五团驻扫峪、凌井，第七一六团驻古交、河口。二月一日，日军分两路进攻古交、河口地区。一路八百多人，由太原出发经西铭村、斜道，向河口进攻；一路六百多人，由交城经姜庄头、李家庄，向古交进攻。第七一六团在第一一五师陈士榘率领的晋西支队一部配合之下，在敌军攻占河口、古交以后，进行猛烈反击，消灭了敌人百余名，敌军仓皇撤回太原和交城。二月中旬，华北日军纠集了占领平遥、汾阳、邯郸的三路人马，向临汾进攻，企图迅速全部夺取山西。阎锡山见同蒲路敌人兵力空虚，想趁机反攻太原。为了限制太原敌人的机动，配合国民党军队防守临汾。贺龙和关向应奉军委命令从岚县来到忻县西南的庄磨镇，指挥一二 师主力，趁日军兵力南调，破击同蒲路北段。第三五八旅主力也集结在庄磨镇以南地区，进行战斗准备，只留第七一六团一营在太原外围单独活动。第三五九旅一部，在二月二十二日袭击同蒲路平社车站，战斗一开始，守敌就急忙逃窜，该部乘胜追击，连续占领了路北的豆罗村、关城镇、石岭关等要地，切断了这一段铁路交通。日军为了打通铁路运输，到二十七日从太原和忻县各出动一千多人，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平社车站进攻。贺龙师长命令我三五八旅担任打击太原方向的敌人，第三五九旅对付忻县方向的敌人。太原的敌人乘装甲列车沿铁路线北上，第七一六团三营在河庄和敌人遭遇，敌军下车攻击，第三营一边还击，一边退到田庄的高地上，会同第二营坚决阻击这路敌人，和

敌人打成对峙的局面。我们旅部决心打退这路敌人，并争取消灭其一部分。我令第七一六团准备从正面向敌人突击，第七一五团从侧翼截击，全旅隐蔽地进入攻击位置。等到黄昏来临，全旅发起总攻，指战员们勇猛地向敌人冲锋，很快就将敌人全线击溃。敌人狼狈不堪，乱成一团，只有一部分人来得及爬上装甲列车，装甲列车不等敌官兵全上完就赶忙开走，其他敌人只能徒步逃跑。第七一六团紧紧尾随敌人追击，第七一五团则平行追击，一直追过东西河庄、北白村，到达高村车站。逃跑的敌人在高村车站守敌掩护下，跑进高村依托村落还击，我们才停止追击。天亮以后，我们派部队打扫战场，搜索零星残敌。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日军四百多人，生俘两人，击毁火车一列，缴获武器物资一部。第三五九旅也将忻县南犯的一路敌人击退。敌人退回太原、忻县以后，我们就组织群众很快把这段五十多里的铁路破坏了，使敌人一个多月不能通车。第七一六团一营在太原外围连续袭击了飞机场、火车站，给敌人的后方设施以很大的破坏，并占领了太原东山。但是，国民党军队高唱“反攻太原”，实际上是按兵不动，使八路军孤军奋战了十多天。日军终于得以调遣两路大军南下，国民党在临汾一线守军慌忙继续南撤，临汾在二月底陷落。

### 收复晋西北七县城和五寨训练

临汾失陷以后，阎锡山对抗战的前途悲观失望，带着部队撤到黄河以西，躲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一带去了。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正当八路军在同蒲路北段进行破击时，日军为了打通同蒲铁路，首先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全面围攻。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黑田旅团的千田联队和竹内联队八千余人，会同伪蒙军李守信部三千余人，分三路由朔县、井坪镇、偏关南犯。驻守这一地区的国民党骑兵军不战而逃过黄河西，使日军很快占领了奇岚、保德、五寨、河曲、偏关、神池、宁武等七个县城。南边太原方向的敌人也配合着向西进犯，占领离石，进到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隔河炮击我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河防阵地。南北两个方向的敌人都指向黄河，象是要进犯陕甘宁边区。贺龙得到日军围攻晋西北根据地的消息后，为了打击可能西渡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敌人，立即命令三五八旅由同蒲路的忻县地域赶回离石地区，三五九旅由平社地区赶回奇岚。

我们一接到命令，就立即出发，冒着严寒风雪，日夜急行军，于三月初回到预定地区。这时，敌情开始发生变化，南面敌人撤离黄河渡口，准备由离石北犯；北边敌人也将兵力转向五寨方向集中，并已占领奇岚县城。贺龙同志判断：日军是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佯攻，其主攻目标仍是企图攻占我晋西北根据地；南面的敌人只起配合作用，北边的三路敌人才是主力。同时毛主席也在三月六日来电指示：应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一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师部当即改变原来的决心，集中三五八旅、三五九旅的主要兵力，首先打击进占五寨、奇岚的一路敌人。这一路敌人深入我根据地，最孤立，危害也最大。当时，有的同志主张采取攻坚战，直接攻取五寨、奇岚县城。贺师长根据当时战场的形势，决定还是坚持游击战，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一个一个地击破敌人。于是命令三五九旅和当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领导的游击队围困奇岚县城。命令三五八旅从离石迅速赶回奇岚、五寨之间打援。

占领奇岚的敌人是日军千田联队的一个大队及骑兵、炮兵、工兵若干，共一千余人。三月七日三五九旅开始围困奇岚，该城里没有水源，过去都是到城外奇岚河中挑水。自从被我军民围困后，水源断绝了，粮弹也无法补给，日军被迫于三月十日黄昏弃城逃跑。当晚这股敌人逃到奇岚和五寨之间的三井镇，想固守待援。三五九旅追到三井，趁敌人立足未稳，连夜发起猛攻。敌人的炮兵垂死挣扎，疯狂地乱打炮。七一七团一个排冲进敌炮兵阵地，歼敌一部还缴获山炮一门。次日，敌人眼看待援没有希望，便狼狈逃往五寨。这次战斗歼敌三百多人。三五九旅和游击队紧跟着追到五寨城下，五寨城内原有日军数百人，连同奇岚逃敌共一千多人。五寨地处晋西北根据地的中心，这个钉子是一定要拔掉的。这时，有人又主张造梯爬城，实行强攻，贺龙坚持说明五寨城墙坚固，我们炮火不强，不具备强攻条件，而且敌人作困兽斗，所以仍然采取围点打援。贺龙命令三五九旅一部和游击队围困五寨，另一部集结于五寨以北三岔堡之间；三五八旅赶到五寨东北神池与义井镇之间；这样就可截断五寨周围交通，迫使五寨敌人撤退，以便在运动中歼灭它。三月十七日午后，三五八旅赶到神池以南的虎北村、山口村地区，与由神池出动增援五寨的一千余敌人遭遇。三五八旅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向敌人发起冲击，很多指战员鞋子走坏了，赤着脚在雪地里和敌人进行白刃格斗。经过几小时激战，歼敌三百余人，俘敌军官一人，缴获轻机枪三挺，马步枪



二十余支，残敌窜入义井镇。次日，残敌在六架敌机的掩护下，仓皇逃回神池。这次战斗还解除了日军对驻虎北村、山口村的国民党骑一军孙长胜师的威胁。

三月二十日，河曲、偏关、保德的敌军弃城东撤。

三月二十一日，五寨的敌人也撤出向神池逃去。这四座县城遂被八路军收复。三月二十二日，三五八旅在神池西南的凤凰山及其以东地区待机，国民党骑一军拨给一个山炮连配合作战。五寨的敌人逃经凤凰山，进入七一六团的伏击区，七一六团指战员立即发起冲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烧毁汽车十辆，毙敌三百余人，残敌不敢恋战，连夜逃进神池城。七一六团跟踪追到神池城下，敌人不敢久留，三月二十四日又逃往朔县。凤凰山战斗中七一六团第二营营长黄子德牺牲。

我们收复神池以后，根据地里只剩宁武有日军一千余人，宁武是同蒲路北段的重要车站，占领宁武的敌人妄图长期固守，以修复同蒲路北段，恢复太原到大同的交通。师首长决心乘胜收复宁武县城，指挥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由平山独立团改称）围困宁武城，其余部队集结在宁武西北的斗沟地区待机。

三月三十一日，朔县的敌人步骑兵六百余人，在五架飞机掩护下增援宁武，当敌人进到石湖村时，遭到我东西两面夹击，毙敌百余人，敌人就地固守，前进不得。是夜七一六团一部夜袭宁武城，敌人趁黑弃城向北撤退。四月一日宁武的敌人和石湖村的敌人会合，在五架飞机的掩护下逃回朔县。至此侵入晋西北的日军和伪蒙军全部被击退，七座县城全部被光复。这次战役正值寒冬季节，塞北朔风刺骨，冰天雪地。三五八旅全体指战员发扬了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精神，从同蒲路北段破击战之后，未曾休整又连续作战四十余天，取得了较好战绩，部队也得到锻炼。在战斗中，贺龙师长正确执行了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方针，证明在部队装备火力不足的情况下，围点打援，争取歼灭运动之敌的战术是成功的。同时，丰富了部队对日军作战的经验，也锻炼了人民，为巩固晋西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收复晋西北七城之战，国民党军队主力跑过黄河，留在该地区的大都在观战。各县的县政府也都跑了，只有五寨的县长好，他撤出县城就找八路军来了，所以五寨光复以后仍然让他当县长，其他各县就由“动委会”和“牺盟会”派干部组织抗日县政府。战役之后，三五八旅主力（七一五团和七一六团，缺七一四团）奉命开到五寨训练。四月一日由宁武地区出发，二日到达五寨地区。五寨是当时晋西北林业木材集散地，交通比较方便，市面比较繁华，敌人占领之后，未来得及作较大的破坏。旅部和七一六团驻在五寨东关，七一五团驻右所。

四月四日部队就开始训练。训练内容第一项是根据进入晋西北以来历次战斗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着重研究如何打好伏击战，我们认识到在游击战争中，伏击战术应成为我们主要的战斗方式。这样可以利用敌人和群众对立，不能实施准确周到的侦察警戒的弱点，给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使敌人优势的装备技术来不及发挥，就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因而要求部队学会侦察、隐蔽利用青纱帐、村落、高地、公路的有利地形，达到秘密、突然、迅速、坚决、速战速决。

在技术训练方面，主要是射击、投弹、刺杀，利用地形地物，夜间动作；以及在当时装备条件下如何破坏火车、汽车，对付敌人的坦克、装甲车等等。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抗日救国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教育，使新参加八路

军的工人、农民和国民党散兵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一定提高。干部教育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自洛川会议以来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和战术的论述。干部战士们对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之目的”和“基本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作战方针的认识，有了较普遍的提高。

这次训练自四月四日开始到五月四月结束，整整训练了一个月。在以后的作战实践中证明，五寨训练的成绩是较大的。在五寨期间，部队得到休整，进行筹粮筹款、补充物资，这都得到五寨县长的大力协助。这一个月中敌机曾轰炸五寨县城，炸毁了许多民房。那时，原晋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也从河西等地陆续返回，旧县政府一些人员也回来了，这样在晋西北形成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贺龙、关向应指示我们本着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有斗争、有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阎锡山的部属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巩固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深入雁北敌后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把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转向华中，图谋夺取徐州和武汉。随着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了。毛主席及时指出，敌之主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无力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的机会。五月徐州失陷以后，华北战场逐渐沉寂，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布指示，八路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根据这一指示，贺龙、关向应决定：师部率师直属部队和三五八旅七一二团、七一四团，仍留晋西北继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派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赴同蒲路以东的雁北浑源、广灵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晋察冀边区创建恒山抗日根据地；宋时轮支队开赴冀察边区，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李井泉等率七一五团等部准备开赴绥远，创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这样一来，晋西北就同晋察冀、大青山以及晋东南各根据地遥相呼应，敌军盘踞的太原、大同、归绥、包头等重要城镇和平绥、同蒲铁路也就落入各抗日根据地包围之中。

五月三日，贺龙师长由岚县来到五寨，他告诉我们，国民党军队傅作义部和何柱国部要“反攻绥、包”，要求八路军配合。贺师长指示我带七一六团到雁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箝制敌人，配合国民党军队行动。

五月五日，我率领七一六团由五寨出发，开赴雁北活动。七一五团准备开赴绥远大青山地区，继续在五寨进行训练。

我随七一六团团部带第一二营活动在朔县以北地区，令第三营单独活动在怀仁以西的小峪口地区，积极侦察敌伪军情况，寻找战机，以打击敌人的交通运输，袭击敌人的据点。首先，我们侦察了怀（仁）朔（县）公路上日军汽车活动的规律，决定以伏击战捕歼敌人有生力量，并破坏敌人在大同以南的交通。五月十四日，令第一营在朔县以北的北周庄设伏，天亮后敌人从岱岳开来汽车十一辆，中途返回八辆，其余三辆进入伏击区后，第一营立即以火力攻击并冲上公路，击毙日军十人，俘日军二人，将三辆汽车焚毁，缴步枪四支，战后即向西边山里转移。同日，第三营在怀仁以南的南北辛庄设伏，由怀仁开来六辆载有一百余名日军的汽车，先头两辆汽车进入伏击区，当即被第三营火力击毁，后面的日军慌忙下车与我激战，打成相持局面。敌人又从怀仁派出步骑兵六百余人，在两架飞机掩护下，将残敌接回怀仁。第三营也趁机安全撤出战斗，此次战斗击毁敌人汽车两辆，毙敌七十余人。

朔县和怀仁的敌人经我打击之后，行动上加

强了警戒。七一六团又转移到朔县至井坪方向活动，在摸清朔、井之间敌人汽车运输规律以后，决定再打一次伏击战。五月二十二日拂晓，贺炳炎团长带七一六团一、二营到朔、井之间的马鞍山地区设伏。上午十点，由朔县开来满载日军的汽车八辆，观察员发出冲击信号后，第一营一齐开火，把前边的四辆汽车打瘫了，车上的敌人跳下车来，窜到路边的房屋里还击，后面的汽车掉头就跑。第一、二营合力围攻房屋里的敌人，放火焚烧敌人集中的房屋，敌人大部被我军的手榴弹炸死，总共击毙了一百余名敌人，俘敌两名，缴获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一个，步枪二十三支。部队打扫完战场以后，立即撤走。第二天，朔县的敌人在飞机掩护下，到马鞍山地区寻找我军报复，结果扑了一个空。第三营在营长王祥发带领下，从怀仁方向赶来归队，正遇着敌人来报复的部队。王营长机警地指挥部队从敌人的空隙通过，只在敌人侧后打了一下，就摆脱了敌人，顺利归还建制。这时，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反攻绥、包”的战役行动失败，由归绥附近向南溃退。敌人一面由北向南跟踪追击傅军，一面派平鲁、朔县的敌人由东向西堵截傅军的退路，企图全歼傅军。贺、关首长命令我带七一六团，打击进攻老营堡的敌人，掩护傅军撤退、收容、整顿，并命令七一五团由五寨出发增援。我们接到电令时，井坪的敌人已经占领乃河堡，并向老营堡前进。我带七一六团在六月二日赶上这股敌人，部队不顾连夜行军疲劳，展开侧击敌人，敌人缩进下土寨。六月三日，傅军退出老营堡向西撤，敌人就占领了老营堡。根据这种情况，敌人可能继续从乃河堡向老营堡增兵。七一六团在六月三日上午派第一、二营在乃河堡和老营堡之间的西坪口设伏。十点左右，果然从乃河堡开来五百多名敌军。敌军进入伏击区后，第二、二营即以短促火力向敌人射击，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场倒下一大片。我军接着发起冲锋，敌人不敢恋战，夺路向老营堡逃去，这一战斗我军歼敌二百余人，自己仅伤亡四人。

六月四日，日军占领偏关，傅军继续溃退，至此国民党车队的“反攻绥、包”计划完全失败。七一五团于六月三日从五寨出发，连夜驰援偏关，一面在城外围困敌人，一面打击敌人的运输，使敌人在偏关无法立足，敌人终于在六月七日退出偏关，七一五团当即收复该城。敌人退回原来各自的据点。根据当时部队的情况，七一六团已连续行军作战一个多月，需要休整，决定让该团返回八龟堡地区休整。七一五团则由偏关转到左云、平鲁地区活动，以侦察了解长城沿线和绥远境内敌军的情况，为开赴太青山建立抗日根据地作进一步准备。我在六月九日离开了七一六团，改指挥七一五团行动。七一五团到达平鲁地区以后，经过侦察掌握了平鲁和左云之间敌人兵力调动和运输的情况，为了扩大八路军在雁北人民中的影响，决定打一次伏击战。部队经过夜行军于六月十六日拂晓到达平鲁、左云公路之间右玉县的台子村设伏。上午八点左右，敌人的五辆汽车载着一个分队日军，从平鲁方向开来，第一辆汽车驶进台子村时，七一五团特务连就给它个迎头痛击。第二、三营各连同时攻击后面的车辆，敌人正要下车抵抗，我们的战士已冲到他们跟前，经过三十分钟顽强的白刃战，毙敌五十余名、生俘四名，五辆汽车全部烧毁，缴获各种枪支四十余支（挺），九二式电话单机三部，还有其他一些军用品。我方无一伤亡。台子村战斗之后，当天下午部队就向西转移到大河堡、魏家窑、赵家窑地区休息。平鲁、威远堡的敌人得知敌分队被袭，立即分两路派出六百余人，前往台子村增援，可是这股敌人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七一五团已经转移。敌人仍不死心，当晚沿七一五团转移路线追来。驻在赵

家窑的七一五团二营由于警戒疏忽，被敌人包围了还没有发觉，直到十七日拂晓敌人发起攻击才仓猝应战，第二营一部分依托村庄和敌人对抗，一部分抢占了村西南的高地准备向团部靠拢。团部听到第二营被袭击，立即命令第一营由魏家窑向东北出击，帮助第二营突围。战到中午，七一五团全部转移，敌人也缩回原来据点。六月二十二日，贺、关发出电令：“井泉、姚喆（旅参谋长）率七一五团组成大青山支队，去绥远大青山活动，李、姚到七二五团后，宗逊回五寨。”六月二十七日，七一五团开到贾家堡、南辛庄一线集结，做去大青山的准备工作。六月二十九日，关向应和李井泉一道，来到贾家堡七一五团团部。七月一日，七一五团召开连以上活动分子会，关政委在会上讲了当前形势和开辟新区的政策。他说，自傅作义反攻绥远失败以后，绥远境内已无中国军队，敌人占据了中小城市，组织伪政权和伪军，挑拨蒙汉民族关系，摧残抗日力量。大青山地区群众在日伪军压迫之下，加上土匪抢劫骚扰，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群众虽然有个别抗日组织，但没有正确领导，我们八路军要去发动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打击敌伪土匪活动，建立抗日根据地。七月三日，我和关向应政委一道，离开七一五团，路过五寨、岢岚，在七月八日到达岚县师部驻地，我在那里休息了几天。七月十七日，贺龙、关向应在岚县师部当面向我交代任务，为了保障李支队（大青山支队）顺利进入大青山地区，由我率七一六团再到雁北地区活动。七月十八日，我从岚县动身，二十日回到五寨。七月二十二日，七一四团开到五寨集中训练。二十三日，我和七一四团领导就训练工作谈了话，作了详细的安排。二十五日，我即带七一六团再一次开赴雁北。李支队在八月初进入绥南厂汉营地区，即和日军一个步兵联队、伪军两个骑兵师周旋，七一六团进入雁北，八月三日夜，以第三营袭击朔县的榆林车站。我们利用车站长期工作关系作内应，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处死了车站敌人的哨兵，全歼守敌五十余人。岱岳的敌人得讯后，派二百余人乘火车前来救援，行经泥河村七一六团二营预先埋伏的地区，即遭到第二营以火力拦阻，敌人下车反击。在我军猛烈的冲击下，激战了两小时，敌人终于支持不住徒步向岱岳溃逃，我军即将敌人这列挂有四个车厢的火车烧了。四日清晨，敌人又开来十余辆汽车第二次增援，我军主动撤出战斗，让敌人扑了个空。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三百余人，烧毁火车一列，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二十支，电话机一部。

八月中旬，李支队进入大青山后，七一六团就回五寨整训，我也回旅部。李井泉去大青山后，三五八旅政治委员由政治部主任张平化担任。姚喆占的参谋长职务由喻楚杰代理，到十二月才由延安抗大调来的李夫克担任。

### 滑石片歼灭蚋野大队之战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晋中的敌人第二次占领离石、军渡，炮击黄河对岸的宋家川。三五八旅奉命到方山以南地区活动，以配合河西的守备部队，阻止敌人扩大其占领区，防止敌人西渡。

九月下旬，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方针指导下，沿平汉、正太、同蒲、平绥铁路，分二十五路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阜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九月二十九日我接到师部电报：敌集结重兵向晋察冀边区进攻，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一二九师和一二〇师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作战，粉碎敌人的进攻。师部命令三五八旅担任配合任务。

十月初，三五八旅旅部即率七一六团和七一四团，从晋西北的方山地区出发，昼夜兼程东进。十月四日，进到同蒲路西侧忻县南北沿线活动。十月八日，七一四团进到平社附近袭击了车站。十月十日，七一六团以一部兵力袭击龙泉庄的敌人据点，并破坏了一段铁路。十月十四日，贺师长、关向应政委来电，命令三五八旅主力越过同蒲路以东，进入晋察冀边区，归聂荣臻司令员指挥，粉碎敌人的“围攻”，把敌人逐出边区。十月下旬，三五八旅由忻县西侧的鱼龙沟、杨胡村地区出发，经恩西、白水，在高村、黄寨之间秘密越过同蒲铁路，转移到五台县以南的当地群众叫做“窑头”的地区，该地区出产焦煤。这一线有几个村子，旅部和七一六团驻寨里村、中庄村、七一四团驻白家庄、脑上。部队一到，马上在边区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在五台到河边村一带寻机歼灭敌人。当时，旅部的电台只能和一二〇师师部联络，和晋察冀军区电台还联络不上，消息只能靠一二〇师电台转达。我们只知道五台县城里有敌人，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样，全不了解。十一月二日，旅部派七一六团参谋长刘忠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察，准备寻找机会攻打五台的敌人。十一月三日，风雪停了，我们焦急地等待消息。中午时分，刘忠回来了，他说，五台的敌人主力蚋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共七百余人，昨夜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今天凌晨偷袭了高洪口的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五大队，当地军民受到一些损失。同时，二分区司令员赵尔陆通过电话得到上述情况派人来联系，也证实了这股日军动向的消息。那时，晋察冀军区各分区都有一条秘密电话线路和军区直接联络，他们是利用拆来的国民党的电话线，架到远离公路、村落的偏僻山上，敌人不容易发现破坏，这个办法后来我们也用到晋西北根据地。得到敌人的消息以后，大家都非常振奋。我和张平化主任，七一六团黄新廷团长、廖汉生政委一起研究。我们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带多少给养，后方空虚，必然迅速退回原来据点；敌人经过整夜长途行军，三日必然要在高洪口休息，估计三日晚或四日早一定要撤退；按敌人以往的行动规律，必然按原路返回。我们从地图上看，从高洪口到五台，必须经过滑石片，这里是两山之间夹着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道路就从沟底通过，沟深路窄，我军在此设伏，以短兵火力突然开火，即可陷敌于不利地位。从我们驻地到滑石片却要走五十里，从高洪口到那里只有二十里，而我们还摸不准敌人撤退的时间，必须抢在敌人前面到达设伏地区，起码也要和敌人同时到达，打个预期的遭遇战也好。因此，关键的一着是要动作快。于是，我决定，七一六团担任伏击部队；七一四团赶到滑石片西北，负责警戒五台方向准备打援。限定各部队在一小时之内出发。任务下达的时候，各连队已经做好了晚饭，战

士们都说不吃饭了，打敌人要紧。下午四时，七一六团各营就先后从驻地出发了，从获得情况到部队出发仅用了两小时。十一月初的五台山区，已经刮着凛冽的寒风，漫山铺满白雪。部队在当地老乡带领下，抄捷径向前疾进。各连的干部一边行军，一边跑前跑后进行政治动员。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旅部和七一六团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就走完了五十里山路，在晚九点登上了滑石片以西高地。我们借着朦胧的月光，但见两座高山夹着一条狭长的沟道，弯弯曲曲由东南向西北伸展，沟道宽约二三十米，西面是高三至四米的陡崖，不易攀登，东面坡度较缓容易上下。我军只要占据了西面有利地形，就可以用火封锁敌人，他们就无法爬上东坡，这里的确是打伏击的好地形。就不知道敌人过去了没有，这时侦察员跑来报告，敌人来了。黄团长、廖政委立刻命令部队按原定的部署展开。第三营拦头，迅速占领滑石片西北高地，并以一个排占领大沟东侧高地，卡住沟口，堵住敌人去路；第二营设伏在滑石片附近大沟西侧，准备拦腰打击敌人的行军纵队；第一营在滑石片东南大沟的西侧隐蔽设伏，和第二营部队相接，待敌人进入伏击地区，战斗打响后堵击其尾部；旅和团的指挥所就设在大沟西面的西天和附近。战斗命令一下达，各连队就迅速跑步向山下预定地点展开。这时，远处就传来一片皮鞋和马蹄走在石子路上的嘈杂声，敌人进沟了。不一会，嘈杂的人马声已经来到山下，还夹杂着牛、羊、鸡、鸭的鸣叫声。这些日本兵在高洪口抢掠一番，正洋洋得意，边走路嘴里还叼着烟卷，行军警戒极为疏忽，入沟后一点也没有发觉我军的埋伏。看到这种情景，战士们都按捺不住满腔怒火。黄团长狠狠地说：“看你们还能猖狂多久！”为了指挥方便，团指挥所移到第三营阵地方向。第三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敌人的尖兵分队十几个人已经过去了，九连几十个精壮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打过去。骄横的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过了一会，敌人集中全部骑兵，向九连正面冲来，企图突出沟口。眼看九连突击队的火力压不住敌人，黄团长对第三营营长王祥发说：“往下压！”王祥发把棉衣脱下往地上一甩，挽起衣袖，一手提驳壳枪，一手拿手榴弹，大吼一声：“十一连跟我来！”战士们象一阵风似的跟着他扑下去。九连长曾祥旺也带两个排，从侧翼向下压。片刻，山下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火光中，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使敌人无法发扬火力，王祥发营长果敢沉着地指挥第三营指战员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与此同时，第二营在营长蔡九和指导员黄新义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一个劲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第八连连长李家富、指导员徐文礼，没等上级号令，就带着全连跑步接近敌人，勇猛冲杀，把敌人拦腰截断。第二营其他连队紧跟着从山上插下去，用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火力，向敌人侧翼冲击。第五连连长巴尚真和指导员万在明率领全连，硬是在敌人中间突过去，飞速占领了东侧山坡上的一个小庙，控制了制高点，把向东坡上爬的敌人打得滚回沟里。第一营三连在敌人后尾过完之后，也迅速向敌人侧后包围攻击。敌人正面和侧翼被第二、三营打得死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后尾的又转过头来往回突。随后，第一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刘忠参谋长抢着跑向第二营，带上一个连奔向第一营的阵地。战斗进行到白热化，各连队发扬了我军夜战近战的特长，战士们个个勇敢，人自为战，经过两小时激烈战斗，就将敌人的行军纵队分割成数段。大部敌军被迫躲在陡崖下进行垂死挣扎，少数退到沟西北的石沟村几间土屋里困守，根

本没有反击能力了。这时，敌人已经被打得非常混乱，绝不能让他有整顿组织、恢复指挥的机会。我到团指挥所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全团冲下去，彻底消灭这股敌人。顿时，嘹亮的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着雪亮的刺刀，喊着“冲呀！杀呀！”象猛虎下山似的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以刺刀和手榴弹最后歼灭被分割的敌人。

第三营九连排长覃学良，率领全排冲向石沟村。快接近村屋时，敌人拚命以机枪扫射，负隅顽抗。覃排长领着战士们冒着弹雨冲到土屋跟前，几个战士迅速爬上屋顶，把一束束手榴弹扔到屋里，炸得敌人嗷嗷怪叫。敌人的机枪哑了，没被炸死的敌人再也不敢呆在屋里，发狂地往村外跑。第三营的其他连队也赶到村前，这些日本溃兵有的被刺死，有的当了俘虏。第二营的陡崖下有三户窑屋，一伙敌人被困在里边，第六连连长周绍训领着战士们冲进屋内，把敌人全数消灭。但见屋里有敌人没来得及架起来的电台，几笼军用信鸽也没顾上放出去。七一六团各连队和敌人进行了终夜的格斗，在拂晓前将敌人全部消灭。只有二三十名残敌绕到北边的灰窑沟，逃出了伏击圈。七一四团驻白家庄，距离滑石片西边凤凰山的南院村有一百多里路，接到命令后就马上出发。经过整夜急行军，四日拂晓才到达南院村附近，正遇着从滑石片逃出来的几十名敌人路过，立即派一个营跟踪追击。这时，五台方向有一小股敌人出动向滑石片增援，和几十名残敌会合。七一四团马上投入战斗，给这股敌人以迎头痛击。敌人被打得狼狈不堪，扭头就往五台城逃，七一四团紧紧追击，一直撵到五台城下。四日早晨，万道霞光照耀着滑石片四周的远山近村。彻夜的枪声停止了，恢复了宁静的山沟里，到处横七竖八地倒着日军士兵和军马的尸体、敌人带着的山炮、小炮（日式掷弹筒）都完好地驮在军马背上，来不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残刀断枪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疯狂一时的蚋野大队被消灭了。七一六团的战士们在附近的群众帮助下迅速打扫战场，几个战士好奇，把缴获的两只毒气发射器弄响了，毒气冲着团指挥所飘来，我和黄新廷团长、廖汉生政委都第一次吸着这种毒气，幸而及时发现走开了，弄了一场虚惊，没有造成伤害。七一六团打扫完战场就开往高洪口。七一四团在四日夜间袭击了五台城，因为敌人严密戒备，没能攻进去。城里的敌人却吓坏了，彻夜向城外打枪打炮，消耗了不少弹药。七一四团当夜也开到高洪口集结。到了高洪口的当天，旅部才和晋察冀军区二分区用电话联系上，通过他们向聂荣臻司令员报告了战斗情况，同时也通过电台向一二师贺龙师长作了汇报。滑石片伏击战，歼灭了敌人一

九师团第一三五联队的蚋野大队长以下七百余人，俘敌二十一名，缴获山炮两门，小炮四门，轻重机关枪三十余挺，步马枪三百四十余支，战马一百五十三匹，电台一部，其他军用品甚多。七一六团的一些连队在高洪口整齐地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止晋察冀军区的记者照相，这张照片保存下来了。后来回到晋西北，国民党当局派驻一二师的上校联络官陈宏模不相信我们取得的胜利，贺龙师长嘱咐给他两件日军呢大衣和一柄日军军官指挥刀。在实物面前，这个联络官才哑口无言。滑石片战斗的胜利，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定襄、忻州地区影响很大。群众争相传递胜利消息，聂司令员让边区政府专门派人来慰问，地方群众和部队联欢祝捷；还有“延安参观团”的王智涛、《大公报》记者、“联合国赈灾委员会”于璞等三人也专门前来慰问伤员，给慰问伤员费一百元大洋。十一月七日，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二十五路大“围攻”胜利结束。日本侵略者“北围五台”

的幻梦宣布破产，只落得个损兵折将的下场，狼狈地逃出边区。三五八旅在高洪口稍事休整之后，于十一月下旬返回晋西北。这次胜利对国民党骑一军军长赵承绥和部队也有很大震动，赵承绥把他的部队家属基地静乐县娄烦镇让出来给三五八旅驻防。我们经过骑一军防区的时候，国民党官兵都围拢来看我们的战利品。抗战初期，国民党给了一二 师两挺丹麦造的反坦克炮和两挺机关炮，师领导把这些炮交给三五八旅编了一个旅直炮兵连。这次利用缴获的山炮和小炮，把炮兵连扩编成旅直属炮兵营。滑石片战斗，大体发生在三五八旅抗战一周年的时候。第七一六团以比敌人稍多的兵力，以劣势的火器，歼灭了优势的敌人，自己仅伤亡几十人，用事实为三五八旅做了一个总结，在这一年作战中，我们掌握了日军作战的规律，如作战战术完全按正规训练的那一套，行动刻板，带的装备较多，虽然后来减少了一些辎重，但也只能依靠汽车在公路和乡村大道活动，袭击的距离也不敢超过一日行程，往返都是一条路，作战方式是夜间接近，拂晓前形成包围，然后在空军或炮兵配合下进行攻击。另外，日军的致命弱点是和群众对立，得不到我军行动的确切情报。我们进行伏击战就是充分利用敌人战术上的刻板 and 弱点，以秘密迅速的动作，给敌人以意外的打击。滑石片战斗在群众帮助下，使我军能准确地判断敌人的行动和路线，果断地掌握战机；部队行动迅速，已经做好的饭也顾不上吃，连续行军二十四小时没有吃饭，七一四团一昼夜行军一百八十里路，又马上投入战斗，这都是新型的人民军队才具有的优秀素质；在战斗中，各级指挥员都发挥了高度机动灵活的战术，弥补了情况变化中，上级指挥的不足，如营长王祥发率全营击退敌人五次以上的冲锋，使敌人始终不能突围；战士们的英勇顽强，猛打猛冲，人自为战，发挥了近战夜战的优良传统，使敌人优势的装备火力发扬不了，从而分割敌人、逐个歼灭敌人。这次战斗证明了毛主席的“基本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战略方针是英明正确的。

### 转战冀中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对抗战以来王明的新投降主义进行了批判，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在战略问题上的一些错误思想，阐明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抗战的长期性和规律性表现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批驳了王明不相信有相持阶段，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而能速胜的错误主张；决定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战区和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确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这就为敌后人民力量的大发展，克服相持阶段的严重困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贺龙、关向应率一二 师一部，进到冀中，执行三大任务：一、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二、帮助冀中部队进行整训；三、扩大本身力量。冀中抗日根据地处于河北省的中部，共有四十多个县，人口稠密，地处平原，交通发达，河流纵横，物产丰富，经济文化条件比较优越。国民党军队南撤以后，冀中地区拉起了各种杂色武装，人称“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后来，由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和中共党员、原东北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扩编的人民自卫军会合，收编了杂色武装，围剿了土匪武装，安定了社会秩序。一九三八年四月遵照晋察冀军区指示，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了冀中军区。十一月，日军在围攻晋察冀边区失败之后，又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攻，占领了大部分县城，根据地缩小，



汉奸日伪势力活跃，形势非常严峻。加之冀中部队成分复杂，党的基础较弱，在反“扫荡”中有的部队动摇溃散。因此，中央军委命一二师开赴冀中。贺关首长接到命令以后，立即在岚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并决定师部率师直属队、七一五团、七一六团和独立一支队去冀中；我和张平化率三五八旅直属队、七一四团，并直辖独立一团、独立二团、警备六团、第六支队留在晋西北地区，坚持与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保卫陕甘宁边区，维护陕甘宁和华北各根据地的交通枢纽。

贺龙、关向应同志率一二师直属队和七一六团，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由岚县出发去冀中。七一五团也同时从大青山出发，直接经雁北、晋察冀边区去冀中。师部离开岚县以后，三五八旅旅部和直属队，由娄烦移到岚县；晋西北区党委由罗贵波、赵林负责，也把机关由奇岚移到岚县。

师部走后，和国民党驻军骑一军的统战工作就由旅部出面。关向应政委临走之前，安排在“动委会”工作的张崑轩陪我到静乐访问骑一军军长赵承绥，张是阎锡山的外甥，学生出身，思想进步。我在赵承绥处住了两天，赵承绥并不积极反共，主要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很客气地招待我。我和他谈了如何互相配合防止日伪军进攻，如何合理负担粮款等问题。以后，我们相安无事。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日军分五路向静乐、岚县、方山“扫荡”。赵承绥部一听到敌人要来“扫荡”的消息，就慌忙退出静乐，不战而退。日军当天就占领了静乐，从此静乐县城成了日军的一个永久据点。敌人在三月九日进占岚县，七一四团在岚县周围不断袭击伏击敌人，使日军在占领岚县仅一天之后，就仓皇弃城逃走。接着，七一四团在警备六团和工卫旅的配合下收复了方山，粉碎了敌人的围攻。那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谣言，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在事实面前完全破产了，八路军的行动和赵承绥部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敌人退走以后，区党委机关搬到大小蛇头一带，旅部搬到岚县东村和普明镇之间的一个村子。这时，兴县的开明士绅刘少白和牛友兰等兴致勃勃地带着兴县各界代表慰问团几十人，带着慰问品、慰问信，到岚县前线来劳军。刘少白一贯比较进步，他以后成为中共党员，他的子女都参加了党组织；牛友兰也比较开明，他的儿子牛荫冠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在旅部开了一次欢迎会，然后送他们去七一四团慰问前线部队。一二师进到冀中以后，接连粉碎了日军的三次“围攻”，经过工作，部队也有很大发展。一九三九年四月，为了工作需要，贺、关来电命令我和张平化带一批干部去冀中工作，晋西北的工作交给彭绍辉和罗贵波负责。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三五八旅的名义和旅直属队一部仍留在晋西北，即以后的彭三五八旅。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我和张平化带着三五八旅旅直一批干部，由七一四团一个营护送，从岚县地区出发，通过同蒲铁路。同行的还有由延安去晋察冀边区工作的电影工作队，他们之中有袁牧之，吴印咸等电影界知名人士，他们一路上拍摄了不少好镜头。我们经过晋察冀边区，在第二军分区会见了赵尔陆政委；在第三军分区遇见聂荣臻司令员，他和三分区陈漫远司令员、王平政委一起招待我们吃饭，洗澡。以后，我们来到驻在晋察冀边区的一二师教导团驻地稍停了几天，当时教导团团团长是喻楚杰、政委是洗恒汉。我们在五月下旬才到达冀中，在高阳县的河西村和一二师师部会合。同师部会合以后，贺龙和关向应考虑为便于指挥作战，命令我和张平化组织张纵队，我任司令员，张平化任政委。下辖独立第一旅和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一旅是由

七一五团和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的独立第一、二、三团编成，旅长高士一，政委朱辉照，副旅长王尚荣，参谋长郭征，政治主任杨琪良；独立第二旅由七一六团和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编成，含独立第四、五团，旅长魏大光、政委王同安，副政委廖汉生，参谋长赵振国。高士一和魏大光都是冀中的抗日爱国人士。高士一的儿子高万德和杨琪良原是雄县史各庄、任邱县苟各庄的进步教员，“七七事变”以后，起来宣传组织群众，成立了百余人的抗日武装。在和中共保属特委取得联系后，三个月就发展到三千余人，十七个支队，改编为河北省人民抗日游击军第五路，高士一在他们推动下出任总指挥。冀中军区成立时，编为独立第四支队。魏大光在霸县以东信安镇自己组织了上千人的武装，开始和共产党八路军没有直接关系，以后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编为独立第五支队。这些武装虽然组织不严，枪支不全，但从一九三八年以来，为打击敌伪力量、摧毁敌伪政权，粉碎敌人围攻，打过不少仗。在改编为独立旅以后，在七一五团和七一六团影响下，经过整顿，加强了党的领导，加速了部队的正规化，懂得了平原游击战术的适用，战斗力有较大提高。一九三九年六月，张纵队组成后，纵队（缺七一六团，该团随师部行动）任务是分散在沧石路两侧，做群众工作，进行游击战。这时连绵阴雨，河水泛滥，大部队行动不太方便。纵队领导强调各部队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扎根于群众之中，尊老爱幼，因而部队深受群众欢迎，所到之处都有青年群众要求参军参战。我们一面整训部队，一面扩军，部队有了很大发展。在此期间，国民党民军司令，反共顽固分子张荫梧，率其所部第八、第九、第十旅共两千余人，由冀南向冀中军区进攻。我纵队奉命协助第一军分区赵承金部歼灭该敌。张荫梧是个野心家，“七七”事变后，以他办的四存中学等几个学校的学生为骨干，组建了河北民军，想骗取“民族英雄”的称号。平津沦陷以后，张荫梧带着“守望队”和训练团南逃，一路还打着抗日旗号，扩大他的河北民军。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后，张荫梧搞所谓“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十二月间他指挥三个主力团两千多人，进攻安国、博野，还在深县杀害我后方机关留守人员，制造“深县惨案”，冀中第二军分区奉命自卫，将其三个团包围歼灭，张荫梧带着一二百人逃回冀南。这次他又想卷土重来。六月中旬，独立第一旅由河间任邱地区进到深县东南，独立第二旅由王岗进到深县东北地区。六月十八日，张荫梧部侵占深县以南的南北黄龙、陈二庄地区；二十日进至张骞寺、北马庄、魏家庄地域，准备向我进攻。

纵队决心和国民党顽固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以独立第一旅率二团、七一五团第一营配合第一分区部队向张荫梧所部实行反击。二十一日，独一旅部队隐蔽集结在陈二庄附近，第一分区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大队及挺进支队集结在凤凰池、五龙堂、北梨园地域，准备分割包围各个歼灭顽军。当时看到张骞寺架有天线，判断张荫梧指挥部可能在张骞寺，由独一旅部队进攻。第一分区部队进攻北马庄。二十二日凌晨一点，各部队即向各自攻击目标发起冲击。张骞寺的顽军没料到八路军主力进行主动反击，从睡梦中醒过来，被打得措手不及，一部分人立刻投降了，大部分被压制在几个院子里，依托高墙大院负隅顽抗。天明以后，我军以迫击炮轰击敌人，在炮火掩护下，部队冲进院里，敌人纷纷缴械投降。张骞寺战斗在上午九时结束，毙伤民军二百五十余人，俘民军旅长以下一千余人。此时进攻北马庄的第一分区部队，遇到顽军顽强抵抗，形成对峙状态。原来

张荫梧的司令部设在北马庄。纵队当即命令七一五团第一营参加攻击北马庄，该营用机枪火力掩护从北马庄西北突破，最后协同一分区部队将顽军包围在村东一个院子里，一直打到黄昏，张荫梧化了装带十几名骑兵死命突围，向南逃窜。此次战斗，共毙伤民军五百余人，俘旅长以下二千余人。有力的打击了张荫梧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

一九三九年七月初，冀中地区阴雨仍然连绵不断，河水暴涨，日军挖开猪龙河、滹沱河河堤，放水淹没冀中，造成冀中地区空前大水灾。日军开着汽艇来往搜捕我军人员，企图置我军民于死地。我纵队分散活动于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进行扩兵工作和整训部队。各部队都突击学习游泳，由人民帮助制造木筏、木船和敌人各据点的汽艇打游击。

七月中旬，独立第二旅魏大光旅长在大清河北，被敌人袭击牺牲。七月十八日，冀中第一军分区部队围攻武强，估计深县敌军可能前来增援，纵队即令独立第二旅第四团在武强、深县之间的大冯营设伏，准备打援。十九日清晨，敌人从深县出动，有日军三百余人和伪军一百余人，带有山炮两门。由于第四团封锁消息不够严密，二时许，敌人进到邢家庄时，发觉大冯营有我军埋伏，就停止前进。不久，敌人兵分三路向大冯营进攻。第四团在村内抗击敌人，独二旅领导派五团一个营从南面侧击敌人，但五团行动不快未起到侧击箝制作用；纵队又令独一旅第一团增援，第一团到达大冯营东端时，敌人经过巷战已占领该村大部，再打下去对第四团不利，我即令第四团撤出战斗，部队向北转移。这股敌人虽然遭到很大杀伤，当日仍进到武强。在这期间，纵队与敌人斗、与水斗，并克服各种困难，抓紧时机进行整训，整顿和建立了各项工作制度，增强了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各旅的扩兵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全纵队共扩充新战士四千三百一十七人（独立第一旅二千一百四十六人，独立第二旅二千一百七十一人），使各级战斗员额都得到充实。

一二师在贺师长指挥下，在冀中平原战斗了八个月，同冀中军区军民一起，粉碎了日军第三、四、五次“围攻”，平定了柴恩波的叛乱，歼灭了张荫梧的顽军，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一十六次，共歼敌五千余人，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帮助和锻炼了冀中部队，一二师部队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三项任务。

## 陈庄歼灭战

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战略重点逐渐转向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一九三九年三月起，日军对晋察冀军区后方机关与设施，实行所谓奔袭合击，分区“扫荡”，侵入根据地腹地，在北岳区的东部，西部先后进行疯狂“扫荡”，遭到边区军民奋起反击。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不图抗日，一意反共制造磨擦，全国都可能随时发生突然事变，特别是可能突然偷袭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八月七日，毛主席致电一二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应付突然事变，我们的警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除调三五九旅即由恒山地区开赴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地区，巩固绥德警备区外，一二师在冀中各部队，移到现在三五九旅所在位置，并视情况再移到晋西北地区，以利指挥。我纵队（缺七一六团，该团仍随师部行动）奉一二师首长命令，移到晋察冀边区整训。八月十八日，我们离开冀中平原，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九月一日，到达行唐西北的秦家台羊、口头镇地区休整。九月中旬，七一五团开赴灵邱的下关、上寨地区，接替三五九旅的任务。九月十日，师部命令，按十八集团军总部颁发的编制表进行整编部队，撤销张纵队一级组织。独立第一旅辖独立第二团和七一五团两个团；独立第二旅整编为三五八旅，辖独立第四团和七一六团两个团；两个旅均直属一二师建制。我和张平化仍任三五八旅旅长和政委，独立第一旅旅长为高士一，副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七一五团团长江文清、政委温成功；独立二团团长江传作，政委幸世修；七一六团团长江、政委仍为黄新廷、廖汉生；独立四团团长江立树，政委杨秀山。

整编以后，三五八旅旅部和第四团驻牛家下口、岔头一带，独立一旅第二团驻南北城寨，杨嘉瑞的独立一支队（即以后的师属特务团）驻在程家庄，张仲翰的津南自卫军（即以后的三五九旅七一九团）驻在南北谭庄，隐蔽进行整训。陈伯钧、邵式平带的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驻在陈庄附近，晋察冀军区四分区五团（团长陈祖林、政委肖锋）活动在慈峪镇以南，三分区的部队活动于党城镇地区，分别监视灵寿和曲阳的敌人动静。

就在这时，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正在参加晋察冀第二次党代表会的一二师关向应政委联名写信给我和张平化说：敌人正频繁调动兵力，有向我“扫荡”的可能。要我们指挥一二师从冀中过来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信中还说，各地的地方武装、后方机关、学校和群众，也都作好了反“扫荡”的准备。我们当即以临战姿态，就地继续整训。

果然不出聂、关所料。日军侦知晋察冀边区和一二师部分后方机关、抗大二分校等单位，正在边区南部重镇——陈庄附近休整。妄图举行“秋季大讨伐”，消灭我驻陈庄的后方机关、学校，破坏边区的后方设施，攻占陈庄，以陈庄作为对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的据点。九月二十三日，驻石家庄的日军独立第八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亲自指挥守备正太铁路的独立第三十一大队全部，以及灵寿、正定、行唐、无极等地的几个伪警备队，共约一千五百余人，并随带强拉来的民夫约二百余人和数十辆大车，突然集中在灵寿县。敌人这次进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特别在战术上做过多研究，声称是“从八路军游击战中学来的新经验”，采取“山地讨伐的‘牛刀子’新战术”，即反“杀鸡焉用牛刀”之意，用“牛刀子”来对付我们。敌人的所谓“新战术”其实并不高明。敌人的调动，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判断敌人

可能进攻陈庄。陈庄距离灵寿只有百余华里，从灵寿到陈庄，除几条绕行的山路以外，主要的道路是经慈峪镇的一条大路。以前，敌人曾多次对陈庄进行骚扰，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估计，这次敌人还会走这条大路。因此，确定调四团到牛家下口，派一个营到口头镇以南地区，向行唐、曲阳方向警戒，其余部队集结在北谭庄到岔头一线两侧的山岭上，布成一个袋形阵地，等待来犯之敌。二十五日清晨，我们在旅部听到由南方传来阵阵隐约的枪声，知道敌人已从灵寿出动了。就在当天下午，贺龙师长带着一二 师师部和七一六团由冀中来到北岳区，在南北城寨和我们会合。我们立即通过电话向贺龙师长和周士第参谋长汇报了对敌情的分析和战斗部署，贺师长同意我们的分析和部署，这就增强了我们战斗的勇气和夺取胜利的信心。敌人向慈峪镇进攻，在慈峪镇附近，只有第四分区五团的两个连在那里警戒，对敌人来说并没有多大阻力。而敌军却动用了全部火器，象正规战一样作正式进攻。敌人进占慈峪以后，我们即令津南自卫军以一部分从正面逼近敌人，如敌人进攻时节节抗击，且成且退阻止敌人前进。第四分区五团一部则单独在慈峪以南活动，监视慈峪及灵寿的敌人后续部队。敌人以炽烈的炮火推进，进占了北霍营、东西五河，逐步向着我们设伏的方向来了。我们等待着，可是敌人占领了南谭庄以后，就停止前进。当夜，津南自卫军曾以白头山为依托，派部队不断向南谭庄的敌人袭扰，疲惫敌人。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南北谭庄、东西五河和北霍营一线的敌人全部退回慈峪镇去了。傍晚，情况又有新的变化，第四分区五团传来电话说：慈峪镇的敌人正向灵寿撤退，大炮、辎重已经退走很远。

敌人就这样撤走了吗？我们分析了各方面情况，结论是否定的。日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打了整整两年交道，在我军面前吃尽了苦头。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对其部属所作的一份指示上说：“对付八路军必须采用一套新的战术。找准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以大胆勇敢精神和动作，进行包围、迂回、欺骗、急袭，在近距离进行很快的奇巧袭击”可见目前敌人的行动正是采取“新战术”，突然撤退，显然是一种欺骗动作，用来迷惑和调动我军主力。二十七日拂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来电话告诉我们：敌人只留下几百人控制慈峪镇，主力一千多人正沿着鲁柏山的小路向陈庄轻装疾进。第四分区五团两个连正紧紧尾随敌人，监视敌人行踪。这个消息完全证实了我们的判断。我们立即作了部署：津南自卫军以一个营绕道尾追敌人，其余继续控制白头山、北谭庄以南阵地，严密监视慈峪镇的敌人；七一六团、二团、独立一支队等部，即刻顺大路向陈庄前进。二十七日正是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敌人想趁我军民欢渡中秋佳节之际奇袭陈庄。但是，敌人的花招是徒劳的，驻陈庄的机关和群众早已作了几次坚壁清野，当接到上级转移的命令之后，就迅速安全转移了。敌人沿着鲁柏山的山路，经南燕川、长峪奔袭陈庄，沿途仅遭第四分区五团和抗大二分校派出的连队零星阻击，上午十一时敌人占领陈庄。下午，我各部队先后赶到陈庄外围，并派出了扰乱敌人的部队。占领陈庄的敌人，以为他们的“新战术”奏效了。

后来，从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发现，日军独立第三十一大队长田中省三郎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而实际情况是，敌人进入陈庄扑了一个空。这个八九百户人家的大镇看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家家户户都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而满街的墙壁上到处涂写着大字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

赶出中国去！”入夜，我独立一支队和原驻陈庄的抗大二分校一部，分别从东西两侧不断袭扰占领陈庄的敌人，陈庄周围彻夜响着枪声。敌人整夜不得安宁，他们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得不到一点情报，只能躲在村里盲目射击。我军的袭击小组一直摸到敌人的阵地前沿，有一个战士摸到敌人一个机枪组前十米处，投了一个手榴弹，把三个敌人全炸死了。

当敌人奔袭陈庄的时候，贺龙师长就给我们指挥所打来电话，他说：“敌人这次袭击陈庄，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轻装急袭，这算什么‘新战术’，完全是‘班门弄斧’！”贺师长指示我们：“敌人是孤军深入，北无据点接应，南边接济也十分困难。因此，他们在陈庄必然不敢久留。等敌人回窜的时候，必须抓紧时机，在运动中把它消灭掉！”

遵照贺师长的指示，我们立即研究调整部署。关键的问题是敌人会从那条路逃跑呢？过去，如在五台和高洪口之间的滑石片歼灭蚋野大队等战斗经验，向我根据地奔袭的日军，往往是从哪条路来沿哪条路回去。我们也正是依据这条规律设伏，取得了不少胜利。现在，敌人的行动规律开始变化了、既然敌人来的时候耍了“花招”，那么走的时候也可能改变过去的老规律，不走来时的小山路，而顺东南的大路逃跑。敌人这样做，既可以避免象过去一样遭到我军伏击，又可以和慈峪的敌人相呼应。敌变我也变！我们决定七一六团集结在东西寺家庄，严密控制敌人东逃的大路；第二团进入陈庄以东的冯沟里、破门口、高家庄地区；我们指挥所前移到南台头，决心在敌人运动中将其包围全歼。为了防备万一敌人由来时的小路南撤，另派独立一支队三营进到陈庄南面的长峪。独立一支队的另一部则顺大路向陈庄东侧的七祖院和敌人保持接触。这个方案经师部批准后，部队便开始行动。同时，边区政府还把灵寿、平山、行唐、正定、建屏等县的游击队和民兵都发动起来，参加侦察警戒、封锁消息、带路送信、捕捉敌特汉奸、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等，积极配合部队消灭敌人。二十八日拂晓五点五十分，陈庄上空腾起了冲霄的烟柱，敌人焚烧陈庄的房屋了，这是敌人逃跑的信号。我们命令各部队马上准备战斗。八点多钟，陈庄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侦察人员报告：“敌人出了陈庄，向东沿着大路撤退，在七祖院和独立一支队打上了。”根据情况判断，进犯的敌人大概要顺大路向东逃跑。这个消息实在令人振奋，敌人就要进入我军的伏击区。可是，半个小时以后，独立一旅来电话说：“一位侦察参谋亲眼看见，敌人的主力已经后撤，离开大路向南徒涉慈河，有向南沿来路逃跑的迹象。”狡猾的敌人又来了一个新花招。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仍肯定原来的判断：从敌人的一系列行动说明，他们并没有发现我军设伏的位置，更没有觉察我军的伏击部署。因此，他们向南顺来路逃跑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命令第二团主力由冯沟里以南的山地赶到陈庄南面一线，协同独立一支队三营，防止敌人真的由来路逃走。

一个小时以后，前沿侦察部队送来报告：敌人主力过到慈河南岸以后，又转换了方向，原来敌人看到南岸的芦苇和树丛茂密便于隐蔽，就放弃走北岸的东西大路，沿着鲁柏山脚顺慈河南岸的小路向东窜来。敌人到底还是朝着我们给他安排好的死路走来了。

战斗很快打响了。开始，敌人以为我们上了他们“新战术”的当，把我们的主力集中到他们的来路方向，他们在七祖院遇到的只不过是一些小游击队而已，因而并不在意，大摇大摆地向东撤退。当敌人走了不过五里地，在

破门口就遇到第二团特务连和七一六团一营的猛烈阻击。正向长峪急进的第二团主力，听到这边的枪声，也从敌人后面追来。敌人开始慌乱了。七一六团一营据守的叠谷崖阵地，是伸向慈河的一个突出而又光秃的小山包，象一扇闸门一样，死死卡住敌人向东逃跑的路，对敌人威胁极大。敌人为了夺路逃跑，以两个中队的兵力向这个小小山包上涌来。第一营的战士们沉着应战，等敌人冲到跟前，手榴弹就在敌人中间开花，冲在前边的敌人一个个被打得滚回到山下去。第一营的战士英勇地从上午九点一直打到下午一点，先后向敌人冲击了四次、肉搏三次，阵地坚如磐石，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第一营手中。敌人被第一营火力压在河沟里，成群地挤在一起，火力发扬不了，又无藏身之处。一股敌人涉到慈河北岸，企图抢占东西寺家庄的高地。须伏在北山上的七一六团三营突然以猛烈的火力进行阻击，过河的敌人猝不及防，一批又一批倒毙在淤泥里，残余的敌人狼狈地逃回南岸。第一营四连连长曾祥旺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后壮烈牺牲。敌人向东、向北突击都碰了硬钉子，又转向南面。敌人以高家庄、破门口的村庄为依托，向南面青山上第二团的阵地展开猛烈攻击，企图夺取有利地形。第二团三营坚守阵地，连续打退敌人几次冲击，经过激烈战斗，敌人在我阵地前沿死伤惨重，第二团三营也伤亡很大。此时，独立一支队尾追敌人，由西向东对敌占的高家庄展开进攻；七一六团也从慈河北岸向南组织进攻；第四团从牛家下口赶到，在七一六团和第二团之间投入战斗，占领了破门口以东的高地，把敌人向东逃窜的路完全封住了。这样，北边是慈河，南面是陡峭的鲁柏山，四面都有我们的部队堵击，敌人被紧紧压缩在沿河的高家庄、冯沟里、破门口三个村庄和附近的小高地，完全陷入绝境。

这时，边区的群众翻山越岭，从四面八方来到阵地上，有的送饭，有的送水，有的抬担架救伤员，群众的热情支援，给部队很大的鼓舞，战士们磨拳擦掌地准备最后围歼敌人。

袭击陈庄的敌人被包围，灵寿方向的敌人着了慌，急忙向慈峪镇增兵三百余人，连同留在慈峪的四五百敌人，在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向南北五河、白头山津南自卫军的阵地发动进攻，企图打通到破门口的大路，去接应那里的敌人突围。但是，津南自卫军的指战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下，顽强阻击，使敌人前进不得。

黄昏时分，我军向被围的敌人发动总攻击。第二团由南向北攻击，占领了冯沟里村南的小高地，逼近敌占村沿；独立一支队从西向东攻击，占领高家庄以后，继续攻占了冯沟里以西的高地，向冯沟里攻击；七一六团越过慈河向南进攻，迅速占领了破门口和冯沟里中间的小高地，将两处敌人联络割断，接着冲入破门口村内和敌人开展格斗，此时敌人极为混乱，死伤狼藉。但是，因为我们的部队刚从冀中水灾区过来，行军时手榴弹大部受潮，十之八九不发火，未能解决战斗，攻进敌占村内的部队只得退出来补充手榴弹，和敌人形成对峙。夜里，我们的号兵迎着明朗的圆月，不断吹冲锋号，刺刀班、投弹班轮番袭击敌人。被困在两个小村子里的残敌，惊恐万状，又渴又饿又累，几次组织突围都被打了回去，有些伪军悄悄地跑过来投降，剩下的敌人只得依靠村子作垂死挣扎。当晚，我军在破门口缴获三个盖着“武运长久”、“太和魂灵”旗子的麻袋，里边装满砍下来的右手，一个阵亡的敌人砍一只手，是准备拉回去核对指纹档案找出阵亡者姓名的。二十九日，敌人还想以出我意料的行动来逃脱被歼的命运。清晨津南自卫军的白头山阵地部

分被敌人攻占。师首长为保障主力顺利歼灭被围之敌，遂令四团转移到东西岔头，以增强对白头山之敌的防御；上午七时，津南自卫军对攻占白头山之敌发起攻击，歼灭了部分敌人，收复了阵地，余敌退回东西五河。这时，我们令第二团和七一六团各以一部兵力监视被围之敌，主力稍向后移，补充弹药，准备再战。被围的敌人不敢向东逃了，他们发现我东面和南边的主力移动，伺机找薄弱的地方转变突围方向。七时三十分，敌人离开村子，集中全部火力、施放毒气，全力向破门口西南高地冲击。他们突破第二团六连的阵地，拚命往鲁柏山上爬去。鲁柏山又高又陡，他们趴在光秃秃的山崖上，既无掩护，又无依托，我七一六团迅速尾追敌人以各种火器猛烈射击，又给敌人很大杀伤。敌人军官在后边压阵，举着战刀砍那些走不动的士兵，辎重和重火器等等丢了一路，当敌人爬到山顶时，活着的也只剩下二三百人。中午，残余的敌人满以为爬上鲁柏山就可以摆脱我军的重围，从山背后溜走。他们没想到第四分区五团主力早就赶到山后西南的万寺崖，堵住了敌人的逃路。急红了眼的敌人摆开三人一小组，三小组一大组三角形阵式，在火力掩护下向第五团阵地冲击，当敌人冲到离阵地二三十米的山坡上，早已蹙足了劲的第五团战士们用手榴弹向敌人猛砸。敌人几次冲锋，都被第五团打退。敌人向西南突破不了，又反过来向东南突击。他们没有料到，我军各部队已先后赶到。七一六团和独立一支队自北向南，第二团二营自东向南，将敌人重新包围在鲁柏山西端及附近山沟里。民兵、游击队和群众卡住了所有的大小山沟和荒僻小道。包围圈越缩越紧，敌人被围困在方圆不过一里的鲁柏山主峰上，南面是很陡的石坡，北面是绝壁，真象落网的野兽，叫天皇、听不见，护身符、不灵验。这天上午激烈的战斗中，独立一旅参谋长郭征指挥第二团战斗，最后包围残敌的时候，被敌人机枪射中三弹，光荣殉国。郭征是老红军，牺牲时才二十五岁。下午一时，一二师的炮兵也运动到山上，对敌人抵近轰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死尸遍地。敌人经过我军几次打击之后，根据火力判断，东侧是八路军主力，西侧似乎薄弱一些。于是，又回过头来向第四分区五团的阵地全力突围。敌人的全部火器一古脑向五团阵地打来，特别是第五团八连所在阵地是个山丫口，成为敌人进攻的重点，黄乎乎的一片日军，端枪呼喊着冲向八连的阵地，经过几番拚搏，八连伤亡很大，前沿阵地被敌人所占。第四分区五团经过一夜急行军和大半天激烈战斗，战士们又渴又饿，但是战斗情绪却十分旺盛。这时师炮兵再次向敌人轰击，第五团八连趁势组织反击，连炊事班也投入战斗，在另一个连队支援下，一鼓作气，又夺回了阵地。此时，七一六团三营十连和独立一支队也向敌人发起冲击，当即占领了敌前沿阵地。敌人多次组织突围均未得逞，而且不断受到我军迫击炮的杀伤，处境非常困难，只好不住地呼救。从战后缴到的敌人电文中知道，敌人垂死前曾哀叫：“现在西侧鞍部苦战。刻下身边忧虑，望至急以飞机送弹药粮秣，并增派讨伐队。”敌人飞机倒是来了，第一次飞来三架敌机，我军正向敌人发起冲击，激烈的白刃格斗，和敌人扭在一起，敌机无法扫射轰炸，转了几个圈就飞跑了。第二次又飞来三架飞机，用降落伞投下几大包弹药和饼干，但是大部分落到我军阵地上。

二十九日下午六时，贺龙师长骑着马来到我们指挥所，他到前边看了一会炮兵轰击敌人，笑着回来。他坐在柳荫底下，安详地抽着烟斗，指示我们说：“要补足弹药，安排好伤病员，坚决打好这一仗。”黄昏时分，我们按照贺师长的指示，对鲁柏山的敌人发起总攻。刹那间，山上枪炮齐鸣，杀声



震天，硝烟弥漫，七一六团五连的战士们首先从东侧冲上山去。接着，后续部队和西侧的第四分区五团战士们相继冲到山上，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敌人在我军勇士面前，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就地被歼。有十几个敌兵从南面的陡坡滚下去，钻进万寺崖偏僻的山沟里，到三十日清晨也被我民兵、游击队一一捉住，无一漏网。

三十日上午七时，慈峪方向的敌人又增加了二百多人和三辆坦克，企图绕路沙湾方向北进，又被及时赶到沙湾的第四团所阻击，无法前进。到了下午，这路敌人得知北犯陈庄的敌人已被全歼，垂头丧气地用汽车载着死伤的敌兵，经慈峪全部退回灵寿。至此，陈庄歼灭战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在贺龙师长指挥下，发挥了我军山地游击运动战的特长，历时五天五夜的战斗，以六个团的优势兵力全歼进犯的敌军，并击退增援的一千多名敌人。一些新战士、民兵也缴获了枪支，捉了俘虏。慈峪方向死伤的敌人无法估计，单陈庄方向共击毙故官兵一千多人，俘日军十六人；缴获山炮三门、轻重枪二十三挺、手枪三十支，步枪五百多支、掷弹筒九个、无线电台一架、降落伞五个、战马数十匹。从此敌人再也不敢轻易以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孤军深入边区腹地。这个胜利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情绪和信心，也给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国内顽固分子以又一次回击。这次战斗，我军参战部队共伤亡五百八十四人，英烈们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洒尽鲜血，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 第七章 巩固晋西北

## 反顽斗争

国民党晋东北第十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白志沂，一贯和日伪军秘密勾结，仗着日军为靠山和八路军搞磨擦敌对活动。他趁着三五九旅西移陕甘宁边区之际，特别是乘日军进攻陈庄，以其所属四个团不断向我方挑衅，袭击抗日政府，进攻三五九旅留在雁北的雁北支队和接防的七一五团，气焰极为嚣张。

陈庄战斗结束之后，一二师首长决定反击这股顽军，命令我负责指挥这次反击行动。我率三五八旅第四团在十月二十一日从陈庄附近出发，并指挥七一五团和雁北支队按计划行动。于二十四日晚分别向上下石矾、下关、寨上地区的敌人包围攻击，打到二十五日凌晨结束战斗，共歼敌一百多人，俘敌六百五十多人，缴获机枪三挺，步枪手枪一百零六支，还有部分军用物资，残敌在日军掩护下向北逃走。战斗结束以后，第四团接替七一五团，留在雁北地区活动。我也回到陈庄附近的刘家沟旅部。日军自陈庄惨败以后，在十月到十二月上旬集中了两万多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摧毁边区后方机关和设施，并在阜平建立据点。三五八旅自陈庄战斗以后，即集结在陈庄、大庄地区，一面休整、一面总结陈庄战斗的经验教训。敌人的“冬季大扫荡”开始以后，一二

师部队积极参加反“扫荡”，七一五团、七一六团作为师的主力，集中行动，待机歼灭敌人，三五八旅直属队随七一六团行动；其余部队分散行动，配合晋察冀边区军民袭击、伏击敌人。一二师特务团在杨嘉瑞团长率领下，配合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在黄土岭激战，围歼了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一部，击毙了敌酋阿部中将。进入边区的敌军，在我军民打击下、被迫胶着在各个“点”、“线”上。从十二月三日起进占阜平及其他地点的敌人先后向原来据点撤退，“冬季大扫荡”以失败而告终。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晋察冀根据地赢得了—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对巩固根据地，进行各项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召开“六中全会”，决定了“政治反共为主改为军事反共为主”的方针，掀起了反共投降的高潮。阎锡山也乘机为投降日伪扫清道路，和保持他在山西的反动统治，发动了一次阴谋消灭山西新军和“牺盟会”等进步力量，然后进攻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十二月事变”。

十二月一日，阎锡山命令决死第二纵队举行“冬季攻势”，阴谋在灵石、霍县地区和日军夹击消灭决死第二纵队。第二纵队司令员韩钧识破了阎锡山的阴谋，断然拒绝执行阎的命令，阎锡山又借此向全国通电，说决死第二纵队“叛国”。阎锡山首先在永和地区解决了决死第二纵队一九六旅旅部，先后惨杀隰县等六个县的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又杀害了一一五师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

阎锡山在晋西北兴县成立了所谓“省府办事处”，由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第一军军长赵承绶兼主任。十二月十六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具体拟定向决死第四纵队进攻的计划。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不顾个人安危，中途逃会，亲向晋西北党委报告情况。区党委立即通知决死第四纵队迅速铲除阎锡山安置的反动军官，部队立即开到岚县地区，靠近彭三五八旅旅部，使决死第四纵队避免了损失。

十二月底，中央军委电令彭绍辉、罗贵波，让他们率领部队接应决死第二纵队和晋西支队向晋西北转移，同时命令一二师星夜赶回晋西北，以便集中力量反击顽军的进攻。我们接到命令以后，对阎锡山要消灭新军，破坏

抗战，在我们后方搞磨擦，都感到非常气愤。三五八旅旅部率七一六团立即从刘家沟出发，开回晋西北。第四团从雁北返回南台头进行训练，以后单独西进归还建制。在我们西返时，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来到晋西北，他会同林枫、罗贵波、彭绍辉、陈士榘等同志，指挥彭三五八旅、暂一师、工卫旅、决死第二、四纵队、晋西支队发动岚县、临县战役，把国民党赵承绶的骑一军和郭宗汾三十三军压缩在临县地区。经过几天战斗，赵承绶和郭宗汾惧怕被全歼，在一九四〇年元月十四日夜里，越过汾离公路逃向晋西南吉县地区。至此，晋西北的反顽斗争宣告胜利结束。我三五八旅经忻县以北过同蒲路，经寺坪、新屯堡、岚县、普明镇，在二月十日到达临县的白文镇以西地区集结。新军集中在晋西北，经过整编，全部新军完全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成立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由原第二战区总动委会主任续范亭任司令，罗贵波任政委。从此，结束了晋西北并存阎军、新军、八路军的复杂局面。一二师为了统一各不同建制部队的领导，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有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周士第、王震、林枫、赵林、陈士榘、罗贵波、张宗逊、李井泉、彭绍辉等。

四月间，阎锡山被迫同意和八路军谈判，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分界线上属晋西北。五月，一一五师的晋西支队由晋西北出发，开赴山东归建。

三五八旅回到晋西北以后，彭三五八旅改为独立第二旅，调张平化去任政委，李井泉回来仍任三五八旅政委。五月初，第四团从南台头回晋西北归建；五月中旬由冀中回晋西北的一二师第二支队，拨归三五八旅指挥。

二月中旬，日本曾乘一二师刚回晋西北，根据地一切工作尚未整顿就绪的时候，命令五寨、静乐、离石的敌军先后出动进行“春季扫荡”，结果遭到八路军和新军各部队的打击，部退回原据点。师部命令各部队抓紧时间整训，并以一部分部队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活动。当时我军的部署是：一二师师直和新军总指挥部驻在兴县附近和以西的李家湾、蔡家崖地区；独一旅和第五支队在临县以南以西地区；独二旅和暂一师位于岢岚、五寨地区；师特务团和工卫旅活动在文水、交城西北地区；第三支队活动在静乐的宁化堡、娄烦地区，新军第二纵队、第四纵队位于临县、方山之间地区；三五八旅和第二支队在临县文白镇地区。这时候，我们除了加强军队本身建设以外，还抓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征求意见，最后成立了以续范亭为主任，武新宇为副主任的晋绥行政公署，选举开明士绅刘少白（中共党员）为参议会议长。对地主、富农实行“二五减租减息政策”。爱国人士对八路军支援很大，如刘少白、牛友兰部曾捐助银洋万元以上、粮食千多石。使我们能很快地安定人心，整顿金融，开展经济建设，使根据地的秩序很快恢复正常。

## 米峪镇歼灭战

一九四一年五月下旬，晋西北的敌人在忻（县）静（乐）公路上运输频繁，不断向汾（阳）离（石）公路各据点增兵，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从大同、朔县、怀仁等地抽出第二十六师团一部到偏关地区；从崞县、代县抽调第三混成旅团二千多人到五寨、神池、宁武等地；以第十六混成旅团、第九混成旅团全部以及从临汾、介休抽调的第四十一师团石田旅团一部一千余人，总兵力两万多人，在第九混成旅团长越生虎之助和第十六混成旅团长村井指挥下，在六月八日占领岚县，开始了对晋西北根据地的“夏季扫荡”。敌军图谋占领岚县、岢岚建立据点，缩小我根据地，寻找我军主力作战，最终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师部确定此次夏季反“扫荡”作战方针，在战役初期以游击战杀伤、消耗疲惫敌人，争取在战役中寻找敌人弱点，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一部，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并命令三五八旅指挥独立第二支队活动于岚县、静乐以南地区，相机收复岚县。

六月十二日，文水、交城之敌，分头出动，向文水、交城西北山区“扫荡”，企图攻击在该地区活动的一二师特务团和工卫旅以及地方党政机关。六月十四日，静乐的日军上村大队七百余人，由静乐出动，经娄烦镇、米峪镇，配合文水、交城的敌人向对久、东坡里“扫荡”。十五日拂晓，经米峪镇的敌人兵分两路，一路五百余人经圪塔村，进对久；另一路二百余人经杜里到对久；两股敌人计划在对久和文水、交城的敌人会合，合击我军。结果敌人在对久扑了个空，我方党政机关和部队早已转移，沿途特务团和工卫旅的小分队不断阻击敌人。十六日，文水、交城的敌人退回原据点，村上大队也退到米峪镇。

三五八旅在六月十二日从白文镇出发东进，十五日在东村附近活动，得到村上大队去米峪镇方向“扫荡”未回来的消息。我们分析这股敌人是孤军行动，远离据点，深入山区，难以久留，不久必定经娄烦返回静乐。我决心利用娄烦地区敌人增援困难和地形等有利条件，在敌人返回静乐的途中将其歼灭。于是一面将情况和决心报告师部，一面派出侦察员进一步查明敌人情况。十五日夜，旅部率领七一六团、第四团和第二支队向王光塔、大夫庄地区前进。十六日拂晓，部队在王光塔地区集结待机，并令第二支队在大夫庄设伏，向娄烦方向警戒。十六日下午侦察员报告敌人到达米峪镇休息，但是敌人返回静乐可以从米峪镇直接向北走，也可以绕道罗家岔走。我根据以上情况，决定分两路向米峪镇推进，一路以第四团为前卫，七一六团两个营为预备队跟进，十七日凌晨一时出发，经马家庄向米峪镇前进，准备和敌人打一场遭遇战；另一路由七一六团一个营和第二支队向罗家岔前进，如该地没有敌人即转向米峪镇前进。两路兵力以左路为主，无论那一路，一旦同敌人遭遇，部可以相互接应、展开包围敌人。十七日四时，第四团一营在曹家掌附近和米峪镇出来的敌人遭遇，第一营即迅速抢占曹家掌村东南的高地阻击敌人，跟进的第四团二、三营也立即占领练村西北高地，从西北和东南两边夹击敌人。八时，我们令七一六团三营接替第四团二、三营阵地，准备向练村西边高地的敌人攻击；第四团三营退到兴旺庄作预备队，第四团二营配合七一六团二营向米峪镇以北的高地攻击；准备夺取敌人控制的各个高地，将敌人压迫到大川之内，在黄昏后予以歼灭。九时，各部队部署调

整完毕后，即在火力掩护下向敌人发起进攻。激战三个小时，七一六团三营夺取了 练山敌人两个阵地；七一六团二营和四团二营向米峪镇北山敌人阵地进攻，未能奏效；同时米峪镇北山的敌人用火对七一六团三营进行侧击，掩护 练山的敌人妄图夺回丢失的阵地，于是和敌人打成对峙。

十二时，第二支队和七一六团一营从罗家岔赶到。

敌人被我军多次冲击，伤亡惨重，可能要突围逃跑。我立即召集各团领导，重新调整战斗部署，命令七一六团主力继续攻击 练村附近高地和米峪镇北山的敌人，一部分兵力占领米峪镇南面罗家塔南山防止敌人掉头向南逃；第四团一个营自曹家掌东南向西攻，第四团主力在兴旺庄以南，堵击可能向北突围的敌人；第二支队一个营位于曹家掌东北高地防敌突围，第二支队主力协同七一六团向 练村及其附近高地进攻。

下午五时，各部队即按部署发起攻击。七一六团二营占领米峪镇以北高地，敌人退到山下向东突围，遭到第四团一营堵击，转向兴旺庄，又遭到第四团主力堵击，敌人被击溃在大川之内，到处乱窜，只有少数敌人从潘家庄逃出川外。天黑以后，大川里的敌人各顾各地利用坟包抵抗，最后还是全部被歼，只剩百余残敌在 练村和 练山上顽抗。由于大川之内一场混乱的歼灭仗，我们部队的建制搞乱了，第二支队和七一六团同时攻击 练村，在村里发生了误会，结果都退出村子，使村内和山上的敌人得以乘机连夜加修工事。十八日拂晓，七一六团再攻 练山，仍攻不下来。

于是我们决定，除了少数兵力包围监视敌人，主力集结重新调整部署：由第二支队一个连占领潘家庄高地向白道村警戒，支队主力进到大夫庄向娄烦警戒，阻敌增援；七一六团一部监视 练山，并侦察进攻路线；第四团包围 练村，侦察好进攻道路；第四团和七一六团以一部分兵力在大川山沟里打扫战场；全旅主力集结，准备夜间再战。

十八日下午五时，第四团和七一六团同时向 练村和山上的敌人发起猛攻，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是敌人依托房屋、窑洞、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我们未能解决战斗。我们考虑，敌人只剩下百多人经过两昼夜战斗，没有吃喝，弹药消耗得差不多了，增援也没有希望。为了避免部队不必要的伤亡，决定第四团一部接替七一六团继续攻击 练山，旅直率七一六团和二支队向罗家岔转移，准备新的战斗。

十九日拂晓，第四团接替七一六团阵地时， 练山的敌人乘机突围，四团即令通讯连、侦察排和旅侦察连追击，将逃敌消灭在潘家庄和兴旺庄之间的坟地里，少数逃得较远的，也被第二支队打死或活捉， 练村的几十个敌人躲在几个窑洞和房屋里顽抗，到黄昏时，第四团采用火攻，将残敌全部烧死在村里。

米峪镇战斗胜利结束，共歼灭日军大队长村上及其以下七百余人，俘大、中尉以下官兵二十余人，缴获骡马三百余匹，轻重机枪六挺，步枪一百五十余支。

米峪镇战斗之后，三五八旅于十九日夜间转移到赤坚岭、马坊地区，有意避开敌人的报复性合击。二十日拂晓，敌人果然前来报复，文水、交城出动五六百人，静乐出动五六百人，古交出动三四百人，三路敌人向米峪镇合

击，而我已转移到赤坚岭，敌一无所获。敌人又加上岚县的敌人向南，进占方山的敌人向北，分途合击赤坚岭，结果又扑了一个空。二十一日清晨，三五八旅到达寨上、阳坡地区，敌人继续向我旅追来。我们当晚再向北转移，直到二十四日转移到兴县以北，才最后摆脱了敌人的合击。在这期间，敌人曾对我军进行了一次细菌战，用飞机空投了三个带有细菌的稻草人，我们通知群众不要接近这三个稻草人。

敌人在米峪镇惨败之后，又找不到我主力部队，即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先后占领了方山、临县、岚县、岢岚、河曲、保德等县城，并进到黄河沿岸的碛石、黑峪口地区，炮击黄河对岸的陕甘宁河防阵地。但是，敌人占领的只是几座空城。

六月二十八日，窑头、岚县、保德和岢岚的敌人分四路向兴县大举进犯，企图消灭这一地区我军领导机关。三十日，岚县的敌军一千余人进占兴县，我军机关早已离开。而临县、方山的敌人则向南移动，北面敌军也向岢岚、偏关撤退。七月一日，一二师师部判断，敌人的战役进攻已接近末期，敌兵已疲惫不堪，兴县的敌人必然向岚县撤退，决心集结三五八旅、独一旅、第三支队、第五支队，由我和李井泉统一指挥，在兴县以东的二十里铺附近地区，伏击东退的敌人，歼灭它一部或大部。七月二日，三五八旅由康宁镇西北到冯家沟地区；三日，独一旅也进到预定地区，七一五团在交口至阳会崖设伏，第二团右接七一五团在白崖沟设伏；第五支队一个营进到太蛇头以西警戒，阻击岚县的敌人西援，以一个营进到界河口附近向岢岚方向警戒。四日师部前进到羊湾子指挥战斗。上午十一点，兴县敌人分三个梯队东撤，第一梯队三百余人，第二梯队一千余人，第三梯队五百余人，先后进入二十里铺我军伏击区。先期到达明通沟和奥家坪的独一旅二团一营、七一五团二营趁敌人行军休息时，向沟内猛烈射击，敌人队形一时大乱，七一五团二营乘机发起冲击，企图大量杀伤敌人。但是，敌人很快就展开战斗队形进行反冲击，并且炮击我军阵地，第二营伤亡很大，撤回原阵地。下午一点，第二团和七一五团主力赶到，立即展开，击退了敌人五次冲击给予敌人大量杀伤。五点，七一六团赶到二十里铺的石槽沟一线山梁，向敌后队突击。黄昏以后，各部队调整部署，八点各部队主力冒雨隐蔽下沟，向敌人进攻。但由于天黑，山路难走，各单位联络不好，进攻时间不一致，而敌人依托村庄防御，进攻没有奏效。天明前，各部队撤回原阵地。五日拂晓，我们得知原来侦察有误，原判断兴县敌人兵力只有二千人左右，没料到还有从保德经咸康南下到兴县的一千二百余人未出动，而且东边阳会崖、恶虎滩的敌人也在原地未撤走，这样敌军总数已超过三千五百余人。而我们原计划投入六、七个团兵力，因第三支队没能及时赶到，实际只有四个团参加战斗，而且都经过长途行军，十分疲劳，第四团和七一六团在米峪镇战斗后没来得及补充弹药。这样，我们实际上不占优势，敌人还可能从兴县和恶虎滩东西两面增援，使我军陷于不利地位。因此，贺龙师长当机立断，决定不和敌人决战，只留少数人在原阵地监视敌人，掩护主力撤出战斗。当部队开始集结，还未正式接到撤出战斗命令的时候，兴县的敌军一千二百余人已进到奥家湾以东。上午九时，敌机三架掩护步兵向七一五团阵地进攻，该团稍有伤亡，四团一个营迅速占领了附近大山，阻击敌人，掩护七一五团撤出战斗。下午，兴县的敌人和恶虎滩的敌人会合，六日经太蛇头撤回岚县，沿途第三、五支队不断对他们进行侧击。我军部队主力向西南转移，这次战斗歼敌七百六十余人，夏季反“扫

荡”战役遂告结束。这次战役，我们利用了南、北、东三面的敌人建制不同，协同指挥较差的弱点，各部队灵活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适时转移到外线，使敌的合击连连扑空。而我军不断以袭击、伏击、尾击、侧击等手段，达到疲劳和消耗敌人，并且正确判断情况捕捉战机，及时歼灭敌人。米峪镇战斗是一二 师部队这次回师晋西北取得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我军民的士气。二十里铺战斗在战役指挥部署上也是正确的，只是在战斗协同动作上，因通信工具简陋，通信联络困难，出现漏洞，因而未能大量歼火敌人；同时，由于根据地建设还未展开，群众还未发动起来，未能得到群众的及时支援，也是这次反“扫荡”不足之处。



## 参加百团大战

晋西北夏季反“扫荡”结束以后，敌人占去了岢岚和岚县两个县城，并在普明、寨子、东村、峪口、寺圪塔、石门塬等地建立了一些据点，每个据点各有百人左右日伪军据守。日军此时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利用铁路、公路，占领城镇，筑点连线扩面的办法，阴谋从封锁围困到最后窒息消灭八路军的目的。

八路军总部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牵制敌人更多的兵力，破坏敌人向洛阳、重庆大后方进攻的企图，乘青纱帐季节在华北各主要交通干线发起百团大战。以打击敌人据点，消灭部分敌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

百团大战由八路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以一百零五个团兵力，在广大民兵、游击队配合下，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对正太、同蒲、平汉三条铁路线的敌军，进行大规模的破袭战。

前线总指挥部原先分配给一二师的任务是，集中主力，破坏榆次到平遥段的同蒲路，配合兄弟部队向正太路进攻。贺龙、关向应接电以后，考虑到一二师刚回晋西北，又经过夏季反“扫荡”战役，部队伤亡较大，广大的、深入的群众工作才刚刚开始，建议前总修改一二师的作战任务。前总经过研究，复电同意一二师建议的任务，改在同蒲路北段和忻静公路上活动。

七月间，三五八旅集结在静乐、娄烦地区，在接到师部指示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后，即开展袭击敌据点、伏击战、高苗地战斗等战术训练，并侦察附近敌据点和工事设施情况；后勤部门则紧张地筹备粮草，给部队补充弹药、鞋子等。在兵力上也进行调整，按照师部命令，撤销独立第二支队番号，将二支队编散，分别补入四团和七一六团。八月二十日，百团大战在华北展开，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根据一二师师部计划，三五八旅向静（乐）忻（县）公路破击，并配合独一旅七一五团相机逼退岚县及东村等据点的敌人，扩大晋西北根据地。第一阶段是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中旬。八月十九日，三五八旅由娄烦、边家庄地区前进到下马城地区集结，当时侦察到康家会有日军十五人，伪军四十余人，东北的石神村有日军三十余人，西边的利润村有敌十余人，静乐有日军一百余人。于是，我们决心以第四团一部袭击康家会，一部伏击可能从石神增援的敌人；七一六团在康家会以西的砚湾设伏，准备打击静乐可能来援的敌人。按规定百团大战统一于八月二十日夜开始对敌人攻击。三五八旅部队经过准备以后，于当日下午四时秘密向康家会和砚湾开进。第四团以第二营袭击康家会，第一、三营在炭窑沟、青龙庄设伏；七一六团以第三营设伏于石子堡、砚湾、圪台坪，以第一营设伏于砚湾以东、西梁沟北边，第二营六连在砚湾以南高地设伏，另一个连向利润村警戒。部队隐蔽进入预伏阵地以后，八月二十日夜里零点，第四团二营砍断康家会外围的铁丝网，冲入敌人院内，经过两小时战斗将敌人大部歼灭，只有少数残敌在碉堡里顽抗。拂晓时分，第二营组织火力封锁敌碉堡射击口，步兵冲进碉堡将敌兵全部歼灭，拔掉了静忻公路之间最大的据点。

二十一日早五时左右，静乐的敌人四十余名分乘两辆汽车前来增援。当敌人汽车进入七一六团伏击区后，七一六团第二营六连即以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头一辆汽车被打着火，车上敌兵跳下车，七一六团第一、三营的战士马上冲上去；后面一辆汽车看见情况不妙，掉过头向回开，第三营十连

立刻追击，把汽车打坏，车上敌兵跳下车来逃跑，第十连追上去把他们全部打死。不到四十分钟，这股敌人就被全歼。石神的十三名敌兵也在这个时候跑来增援，当他们走到青龙庄的河滩时，第四团一、三营开火过早，敌人看见火力很猛，吓得扭头就跑，第四团部队即刻追击，打死打伤八个敌兵，其余五个跑回石神去了。

康家会战斗胜利结束，我们只留七一六团一个连打扫战场，并且破坏公路桥梁，全旅撤到土地堂，双井集结。我们为了扩大战果，决心再袭击丰润敌人据点，决定由四团参谋长吴子杰、七一六团政治主任颜金生共同率领第四团和七一六团各一个营强袭丰润；旅主力在丰润以北准备打击静乐方向援敌。

二十五日晨，强袭丰润据点的部队，将敌人在山上的碉堡攻占，残敌缩到山下一个大庙里。我们正要组织攻击大庙的时候，发现下马城方向有敌人打到我主力侧后，由于对这股敌人情况不明，我们决定对丰润的敌人停止攻击，由第四团二营监视敌人，七一六团一个营撤出战斗。五点，七一六团主力庄温家坪和援敌遭遇，展开战斗。当时，为了继续行动，减少部队疲劳和弹药消耗，在给予敌人杀伤之后，即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娄烦东北地区集结。九月五日，接师部电令，配合正太路战役已告一段落，准备执行新的战斗任务。第一阶段战役，八路军在敌人后方进行大规模的突然的破袭战，使敌人惊恐万状，遭到很大损失。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从九月十四日发起到十月初结束。三五八旅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破坏原平、宁武之间的铁路，并准备袭击轩岗、良庄、东寨等据点。九月十四日，三五八旅从娄烦地区出发，于十六日到达马家沟，十九日原定派七一六团强袭羊圈岭敌人据点，后来群众报告羊圈岭增敌二百四十余人，我们没有歼敌把握，决心暂停攻击。二十日，羊圈岭的敌人出动，开向里坞，七一六团奉命攻歼这股敌人。从二十日卜午四时，打到二十一日拂晓，才将这股敌人击溃，没能全歼。二十一日下午令第四团和师属工兵连，向轩岗、段家岭之间开进，执行破坏同蒲路的任务。为了配合第四团的破击任务，我们令七一六团第三营在二十二日晚强袭头马营。因为经过第一阶段战役行动以后，敌人都如惊弓之鸟，加强了警戒，又由于第三营行动过早，所以一发动攻击，头马营据点的敌人立即以强烈的火力抗击，第三营只好撤出战斗。二十四日，第三营再次袭击，也因掩护火力和攻击运动分队配合不好，敌人顽强抵抗，攻击仍不奏效。

二十七日破击任务已经完成，把同蒲路铁道破坏了好几段，使敌人的运输中断。我们研究了当时情况，敌人各据点都有了准备，再进行强袭不易成功，遂令第四团继续留该地区活动，旅部率七一六团于十月三日向娄烦以西的边家庄、大夫庄集结。第二阶段战役也宣告结束。

三五八旅在百团大战中，协同兄弟部队进行大小战斗十九次，毙伤敌军二百二十名，俘敌十名，攻克一个据点，破坏铁路二十里，公路十五里，桥梁两座。完成了师交给的任务。

晋西北的战役行动，仅是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它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使敌人手足无措，大为震惊；同时，也振奋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教育了一些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人，动摇了伪军和伪组织。

## 一九四一年冬季反“扫荡”

百团大战以后，三五八旅返回娄烦地区进行休整，旅直驻娄烦，第七一六团驻边家庄，第四团驻界河口。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日，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作战，加强根据地人民武装建设的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兴县组成晋西北军区。一二师领导机关兼军区领导机关，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副司令员续范亭，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军区下辖直属分区和第二、三、四、八、雁北等六个军分区，由各旅或纵队的领导机关兼分区的领导机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彭绍辉，政委张平化；辖：独立第二旅，彭绍辉旅长，张平化政委；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兼。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张宗逊，政委李井泉，辖三五八旅。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王尚荣，政委白坚（地委书记，主要做地方工作），由洗恒汉代；辖：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士一，政委朱辉照；决死第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雷任民。第八军分区，司令员韩钧，政委王逢源；工卫旅，旅长兼政委侯俊岩。各单位统一在苏联十月革命节，即十一月七日举行成立大会。一九四一年三月又成立直属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五月成立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郭鹏、政委胡全。第三军分区管辖的地区，包括岚县、静乐、忻县、崞县、代县、宁武、阳曲及五寨、奇岚的管涔山山区。军分区机关领导还有副司令员贺炳炎、参谋长李夫克、政治部主任金如柏、副主任肖新春。三五八旅第四团改为第七团，团长唐金龙、政委杨秀山；七一六团建制和领导未变，团长和政委仍为黄新廷、廖汉生。一二师的第三支队经过长期征战，减员很多，在十一月初在静乐南峪村整编为第八团，归五八旅建制，团长刘彬、政委余秋里。百团大战以后，日车即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扫荡”，先是晋东南，再是晋察冀，三是晋西北。敌军除原在晋西北周罔的第三、第十九、第十六混成旅团和第二十六师团一部，另外山闻喜、曲沃调来安达部队，晋东南的第四十一师团一部，正太路的第四混成旅团一部，共约两万余人，分三十一路“扫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敌军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晋西北本来就是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百团大战以前根据地的几万军队和党政机关人员的衣食就是严重的问题，从冀中平原补充的兵员，不适应山区生活。所以，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晋西北区党委进行了四大动员，解决军队和机关的粮食、财政、人力、军鞋等问题。这次反“扫荡”就更艰苦了，老百姓和有的军队机关只能以黑豆为主食，大冬天不少战士没有鞋子穿。就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全军区军民下定决心，粉碎敌人的冬季“扫荡”。军区确定反“扫荡”的方针是：基本是游击战，以相当主力集结，机动作战；不断袭击敌人，疲惫敌人，使敌人不能焚烧房屋、抢粮、杀人；进行坚壁清野，配合游击战，使敌人弄不到粮食；扩大地方武装，帮助地方武装发挥威力。根据军区部署，三五八旅以第七团一个营活动在静岚公路之间，破坏敌人的运输和电话；第七团团直带一个营在岚县、奇岚之间活动，另一个营在大蛇头向寨子方向活动。七一六团主力转移到马家店、张家庄附近，一个营在娄烦西南活动，袭扰娄烦的敌人。第八团主力集结在南峪附近，注意对东村、普明、岚县的敌人侦察警戒；以一个营附电台一部活动在静忻公路间各据点周围，将敌情随时通告旅部，该营一个连担任华北各根据地人员，过往同蒲铁路的交通护送。十二月中旬，各路敌人先亏出动占临县、方山、娄烦等地区。敌人此次“扫荡”，采取数路分进合击一点，有基干支队，又从基干支队分出小股平行地进入山区“扫荡”。敌人走小路、翻高山，很偏

僻的地方都去，有的还反复“扫荡”两三次。敌人一方面想消灭我军主力和党政机关，一方面想搜寻挖掘根据地军民坚壁在深山荒野的物品和粮食。我们的部队按划分地区分散活动，以游击战不断打击敌人，使敌人行不安，住不宁；我们的小分队甚至有时一夜袭击敌人几次，敌人吓的彻夜打枪，休息不了。后来敌人分数路合击兴县，我们即令部队分散到敌后交通线游击活动，避开敌人的合击。十二月二十二日，敌人进占兴县，几路敌人到处扎临时据点，每天四出抢掠，反复“扫荡”，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敌人还积极修筑岚兴公路，很快修到大蛇头。第七团二营积极打击敌人交通运输和修路部队，在郭沙沟伏击了敌人修路部队，给敌人造成很大伤亡，使敌人不得不停止修路；第三营也伏击了岚县到大蛇头的汽车，杀伤很多敌人。各分队积极伏击袭击敌人的战斗，都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扫荡”。

晋西北军民在贺龙、关向应正确领导下，对敌人的残酷“扫荡”，事先有所准备，展开“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游击战。经过三十七天的艰苦奋斗，使敌人不得休息，精神状态经常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敌人终于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疲惫不堪地，先后退回到各自的据点，其合击消灭晋西北党政机关和我军主力的企图化为泡影。

敌人这次“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给晋西北地区造成很大破坏。其手段不仅残酷，还反复推行，如娄烦、大夫庄就有两次反复、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旬，一次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兴县也是两次，一次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敌人纵火烧兴县城，一次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二日，敌人在拂晓时再次进占兴县，又放火焚烧民房。日军见人即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即抢。据不完全统计，全区被烧民房一万间以上，被杀的无辜群众达五千余人。其杀戮方法以刺刀刺死或枪杀，或投入井中淹死，或挖眼剖腹身首异处，遇到妇女，不论老幼即被奸淫，有的甚至被抓去当“劳军队”。日军的残暴行为是史无前例的。第三军分区的部队在这次反“扫荡”中，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饱一顿、饿一顿，在冰天雪地里没有棉衣穿、没有鞋子穿，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全分区部队共作战六十四次，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敌人在兴县、临县、方山建立据点的企图，完成了军区交给的任务。

## 一九四一年的晋西北斗争

日军在连续的“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失败以后，改变了花样，在一九四一年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对其占领区实行“强化治安”运动，以血腥的屠杀和严密的管制，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对各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区实行“蚕食”，对抗日根据地内地实行分区“扫荡”和从据点派出小股部队袭扰破坏。一九四一年全年，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虽没有再组织大的“扫荡”，却以政治渗透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手段，不断实施新的进攻。

国民党则在一月六日制造了“皖南事变”，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对八路军停发了经费和作战物资，驻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顽军也蠢蠢欲动。在日伪顽的联合围攻下，晋西北根据地日益缩小，人口由一百五十万减到一百万。一九四一年开始，晋西北根据地也进入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阶段。

年初，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军委和贺、关首长指示，三五八旅利用战斗间隙，抓紧整训部队，随时准备应付一切突然事变，保卫陕甘宁边区，并反击日军对晋西北的“扫荡”。

三五八旅的部队经过一九四一年一年的反“扫荡”

连续战斗，部队相当疲劳，部队极需进行休整。我们所在的三分区，在晋西北来说本来物产较丰富，但战争以来荒地甚多，而且生产的主要是小米、莜面和土豆等低产作物，加上敌人破坏抢掠和封锁，人民生活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部队的给养补充困难，缺衣少食，不得不以杂粮、野菜充饥，还要勒紧裤带打仗。针对这些实际问题，贺龙和关向应动员干部战士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贺龙同志说，晋西北虽然条件差，但是离党中央最近，党中央是我们的脑壳，我们有责任保卫他；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守卫延安的大门，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他不仅是那样说，而且以身作则带头干。他带领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积极开荒种粮食、种菜，养猪，纺纱织布；敌人来了就战斗，打走了敌人再生产。这一年，我们三分区指战员经过努力，开荒一万二千亩，完成了三个月的粮食、蔬菜、肉类的自给任务，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和供应，对根据地人民也是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一九四一年二月，根据军区的指示，三分区的部队在战备姿态下进行两个月训练，以建立正规部队，克服部队的游击习气和干部中的军阀残余，加强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部队作战技术，充实部队装备；准备迎接敌人新的“扫荡”。此次整训，因为根据地遭到敌人“三光政策”的破坏，房屋被烧毁，不得不靠近敌人据点进行，因而需要随时准备战斗，一面备战一面训练。当时，以第七团三营活动于忻县、崞县、宁武地区，由游击支队协同，担负对敌斗争任务。分区机关和七一六团、第八团集结在娄烦以西的娄家庄、大夫庄、边家庄、马家庄地区。第七团缺三营集结在界河口以南的会里、阳寨、阴寨地区进行整训。在整训期间岚县的敌人于三月二十六日向娄烦地区作了一次突然袭击，遭到七一六团、第八团迎头痛击之后窜回原据点。四月上旬，部队完成了第一期整训。为了就粮和打击敌伪活动，五月，分区机关和直属部队移住兴县恶虎滩、沟门前、白崖沟地区，七一六团仍留娄烦地区，第八团移往五寨以南、静乐以北、宁武西南之阎家村、芦草湾地区，第七团仍在界河口，以第二营接替第三营的对敌活动任务，第三营返回整训。部队调防以后，即投入开荒生产。六月以后，部队所吃粮食决定由自己运输，这样部队除训练、

战斗、生产以外，还增加繁重的背粮任务。七月底，敌人对娄烦、文水、交城地区进行了一次分区“扫荡”，被我们的部队粉碎。

八月，日军集中七万多人，在空军配合下，举行号称“百万大战”，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三五八旅奉命配合晋察冀部队反“扫荡”作战，我们即派第七团一二营和第八团全部开赴忻县、宁武之间进行活动，向同蒲路进行了全面破击，从八月下旬至九月九日，先后攻占忻口车站和轩岗、奇村等敌据点，袭击了楼板寨、三交镇敌据点，打击了敌据点外出活动的敌伪军小分队；破坏了同蒲路，使敌人半个月不能通车。

一九四一年各部队都分批轮流活动于敌占区和游击区，各级干部在对敌斗争中，都提高了单独活动的的能力，能根据当时的敌情，紧紧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组织战斗，对游击战术的掌握也运用得更为自如了。

例如：八月初，第八团二营五连由教导员钱治安率领在五寨城、东店坪、大东沟地区活动。六日早得到群众报告，东寨的敌军七十余人到达谢家沟，打算设立据点砍伐林木资源，正抓民伏来修碉堡工事，还抢掠财物、强奸妇女，谢家沟的群众大部都逃跑了。第二营教导员和连的领导判断敌人的工事碉堡还没修好，警戒不可能很严，决心消灭这股敌人，保护群众利益。计划以一个班向五寨警戒，一个班向东寨警戒，从全连挑选组成一个投弹班和一个刺杀班，其余作为二梯队跟进，当连里进行战斗动员时，各班排都互相挑战，提出捉俘虏竞赛，争先报名要参加投弹、刺杀班担任突击队，群众协助连队严密封锁消息，进一步查明敌人情况。当日晚八时，第五连从大东沟出发，为保守秘密由群众带路绕道前进。夜十二点到达谢家沟，按原先部署，战士们隐蔽而敏捷地摸到村里，敌人的哨兵刚发觉就被刺死，接着投弹班就迅速地往敌人的住屋里扔手榴弹，刺杀班以刺刀刺杀没被炸死的敌人。最后只有十余名伪军躲在一间屋里固守，战士们以短促火力压制住敌人，继之进行政治喊话，这些伪军也就乖乖地当了俘虏。这次战斗只打了三个多小时，我方仅伤亡各一人，击毙日军十二名、伪军三十名，俘伪军三十四名，缴获全部武器装备，打得干净利索。又如：第八团一营活动在忻、崞以西大川的山地，八月十六日进到敌占区崞县所属何家庄、娄子沟地区活动。十七日得知原平日伪军二十余名，携轻机枪一挺，十六日到楼板寨，同日会同楼板寨的敌人到卫村。第一营估计这股敌军是经常外出骚扰的，十七日可能经大白水回原平，准备伏击歼灭这股敌人。后来又得到群众报告敌人已经在大白水宿营，第一营决心在夜间强袭消灭它。当晚部队封锁了消息，夜十时秘密出发，十一时到大白水村，以一个排向奇村警戒，一个排向楼板寨警戒，第三连组织一个投弹班、一个刺刀班，二连组织一个刺刀班，分两路向敌人住房突击。当我各分队静悄悄地抬着梯子冲向敌人住房时，村外被敌人强派来放哨的老乡，看着也不吭声。战士们登上房顶，敌人哨兵才发觉鸣枪，我们的战士已迅猛地冲进屋里。少数敌人上房顽抗，战士们就用火攻，烧得他们哇哇怪叫下来缴枪投降。这一仗，两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战斗，第一营伤一名战士，击毙日军二名、伪军十名，俘日军一名，伪军十八名，缴获全部武器装备。

我军精干的分队，经常深入敌占区活动，积极打击了敌人，全年分区部队共作战一百二十六次，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保护了地方政权，保护了群众利益。

至九月底，第七团、八团连续战斗给同蒲路北段的敌人很大威胁，牵制

了敌人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晋察冀部队的反“扫荡”。

十月至十一月，全旅除以一部分兵力收自己所种粮食以外，其他营、连分散活动保卫和帮助群众秋收。在秋收期间，粉碎了敌人对兴县、界河口、宁武的两次进攻。

十一月底，部队再一次集结整训。这一年分期整训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训练与实战相结合，打一仗总结提高一次；训练中也加强了部队组织纪律性，健全了各种制度；同时清洗了混入党内的成分不纯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向党内不良倾向开展了斗争，使部队党组织更加巩固，提高了党员的党性，密切了党群关系。从而保证了部队在艰苦困难的斗争中，能很好地完成党和上级给予的一切任务。

### 粉碎“铁壁合围”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晋西北日军独立第九混成旅团调走，华北敌军有所减弱。日军急于变华北为其侵略战争的兵站，积极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并采取所谓“梳篦队形”、“剔块扫荡”、“铁壁合围”等办法，企图袭击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捕捉青年当劳工，掠夺物资，以弥补其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

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军第十六混成旅团和第三混成旅团一万多人，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反复大“扫荡”，其矛头指向根据地中心区的兴县、临县、奇岚、保德等地区。

贺龙、关向应在敌人发动进攻之前，就制定了反“扫荡”作战的基本方针，以小部队围绕深入根据地的敌人开展游击战，主力集结在敌人侧后，待机行动，当敌人分进合击，企图围歼我军主力时，指挥部队机动转移，使敌人不断扑空。为了作战精干，确定党政机关及各部队不必留在前方的人员、伤病员，骡马及笨重物品一律转移到黄河西岸，并动员民兵自卫队展开斗争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日军这次“扫荡”集结调动迅速，日夜连续行军作远距离奔袭，企图一举摧毁军区指挥机关。二月六日，日军第十六混成旅团到达兴县，军区机关早已转移，敌人合击的是一座空城。日军目的没有达到，又分成几股反复“扫荡”兴县西南地区。

三五八旅旅直、教导营和七一六团、第八团奉命在大蛇头、界河口、二十里铺一带，破坏兴、岚公路，截断兴县、岚县之间敌人的交通线，逼敌退出兴县。二月十四日，第八团在寺沟会地区打击“扫荡”之敌，毙敌一百余人；二月十五日，七一六团在沟门前伏击了敌人的汽车队，毙敌数十人；二月十八日，七一六团第三营，在孙家庄以北和“扫荡”的敌人遭遇，给敌人以杀伤……在二月十九日前，三五八旅各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十次，第七团和各游击大队积极开展破路、收电线，打击敌交通运输活动。

敌人受到打击之后，开始侦察三五八旅旅部的位置。

当时使用的军用地图是民国初年出版的，绘制得很粗糙，不少地方有错误，图上没有标出孙家庄，过去敌人历次“扫荡”也没有到过孙家庄。因此，三五八旅旅部在反“扫荡”时，多次驻在孙家庄。这次，据捉到敌人的翻译官供称：敌人用侦察电台的办法，侦察到三五八旅旅部的方位，但不知道具体位置。日军第十六混成旅团长若松亲自率领村川、佐佐木、杉山三个支队分八路急进，企图将三五八旅歼灭在兴县东北的孙家庄、大树岔地区。既然敌人不知道我旅部具体位置，作战计划也就不可能很周密具体，必定有许多空子可钻。二月二十日，旅直和旅教导营、七一六团集结在孙家庄、大树岔地区待机；第八团一个营活动在大蛇头地区，团的主力集结在寺沟会附近待机。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侦察员报告，由兴县进到魏家滩、中温泉的一千多敌人，分两路向大树岔、孙家庄袭来。我当即命令七一六团三营占领阵地，掩护旅直和七一六团向兴、岚公路以南转移。大约在下午五点，旅先头部队到达阳会岩、明通沟附近，通过兴、岚公路时，由兴县东进的敌人已赶到阳会岩，并用炮火轰击我警戒部队。旅直大部和教导营在旅政治部主任朱明带领下随先头部队跑步通过公路，突出敌人合围圈，摆脱了敌人。旅部和旅直小部以及七一六团主力未能跟进，被敌人切断。接着明通沟以南的李家坡方向也发现了敌人，说明我们已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



我即令七一六团二营占领白岩沟以北高地，坚决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向东南突围。

黄昏以后，旅部停在明通沟、白岩沟之间的一个小山后面。大约停了两个小时，我们弄清周围敌情之后，决心在晚九时由白家庄突围。部队静悄悄地行进，经李家庄、阴坪上，在拂晓时分到达吕家沟、大同沟休息。二十二日上午十时，二十里铺的敌人发现了我们的部队，用炮向我方射击，我令少数部队监视敌人，掩护旅主力向芦子沟、吕家塔转移，完全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敌人合围三五八旅旅部失败，又在麻地沟、界河口等地区反复“扫荡”，企图寻找七一六团和第八团部队决战，敌人这次“扫荡”达不到摧毁我军主力和指挥机关的目的，就分成数十人到一二百人的小股，搜遍荒山僻野，日伪军初到一地时，开始不烧不杀，欺骗群众，使群众不躲避。等到分股“扫荡”的时候，就烧房子、挖窖、抢牲畜，捕捉壮丁、妇女，进行彻底破坏，其手段的毒恶、残忍比过去“三光政策”更变本加厉。

敌人“扫荡”我根据地，其后方空虚，受到游击队广泛的袭扰，交通运输补给困难；其进入兴县内地的敌人又不断受到内线部队的打击，只得于二月底分路开始撤退。敌人历时一个月的所谓“铁壁合围”反复“扫荡”，遂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次反“扫荡”，说明敌人在不断变换其战术，敌人的“扫荡”失败一次，战术也改变一次。如果我们对敌人的情况研究、掌握得不够，就可能吃亏，这次孙家庄战斗险遭敌人合围就是个教训。说明研究敌军战术，相应地改进和提高我们的战术，是军事斗争中战胜敌人的重要环节。

春季反“扫荡”战役结束后，七一六团活动于界河口、大蛇头地区；八团活动于奇岚东南的铺上地区；第七团三营活动于忻、崞地区，第七团主力活动于米峪镇。旅直属队仍驻兴县以东的沟门前、恶虎滩地区。

## 第八章 准备大反攻

## 参加延安整风

一九四二年四月上旬，我的痔疮发作，工作受到影响。经军区领导批准，让我过黄河西岸，到陕西神木县贺家川的后方医院治疗。这时，关向应政委也患病在贺家川休养。

我离开部队期间，分区和三五八旅的工作由参谋长李夫克、政治部主任朱明负责。李井泉政委早在一九四二年冬去延安学习，分区副司令员贺炳炎随后也去延安学习了，这期间团以上领导干部差不多都到延安学习过。我住院期间祁开仁院长给我动了手术，在医院大约住了一个月，就痊愈出院。出院后，贺龙、关向应决定我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我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间去延安学习。我参加整风学习的性质是在职学习，没有住党校。六月成立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和晋西北两个根据地的部队。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林枫为副政委。我们在职学习的都住在联防军司令部，共分两个组，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部的为一个组，一二师的一个组。当时，联防军司令部对外仍保留留守兵团名义，司令员肖劲光，政委高岗，张经武为副司令员，方强为副政委，曹里怀为参谋长，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李井泉、甘泗淇等到延安学习的都编在我们一个组。我们学习的整风文件都由联防军司令部发给，中央党校发给特别许可证听重要的报告，在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参加有关的会议。当时，延安是处在整风运动高潮之中，一切工作学习都以整顿三风为内容。三风即：整顿学风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以反对官僚主义，整顿文风以反对党八股。党中央规定了二十二个整风学习文件，我们的学习方式以自学为主，先阅读文件、听报告，一律要做学习笔记，笔记的内容不是光摘记文件，而是要联系自己过去工作上、思想上的优缺点。十月十九日起，我参加了中共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会议一直开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县一级和团一级以上党的负责干部三百多人，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

会议的一个议题，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干部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们排斥刘志丹等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推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使边区的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过去由于边区党内缺乏强有力的马列主义思想方法的武器，不能从理论上澄清问题。这次很多代表以亲身参加过两条路线斗争的体会，对照整风文件着重检查思想和作自我批评，统一了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我通过这段时间的讨论，学习了“六大以前”的文件，开始了解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这次会议中央领导经常到会，毛泽东同志在开幕会讲了话，还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会就整风文件《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作了讲解报告。毛泽东同志指出，从边区的历史教训说明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必要；当前的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虽然不是路线问题，但也是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

叶剑英同志给会议报告了华北斗争的现状，使到会干部了解敌后斗争的艰苦情况，以及边区与敌后斗争不可分离的关系。贺龙同志向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彭真、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也

在会上作了报告。这次会议的任务提出七整：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政、整学。纠正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对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制订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会议指出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是执行了党的路线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要发扬优良作风，纠正这种倾向，才能提高部队战斗力，更好地执行党与上级的政治任务，更好地进行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会议进行了八十八天。闭幕会上，毛泽东同志做了领导问题的讲话，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通俗的话，阐明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使我们对什么是领导和如何实现正确的领导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接见了从前方到延安学习的军事干部，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全吐出来，心情就舒畅了。你们再把架子放下来，如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席话，使我们心中豁亮了。我在延安参加了八个月整风学习，收获很大。一九四三年三月，我由延安动身返回部队。在我离开晋西北期间，部队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九四二年四月第四军分区并入第三军分区，领导机关不变、司令员、政委仍由我和李井泉担任。旅直属队由兴县恶虎滩移到临县的松峪；五月二十日，三五八旅和工卫旅等部，在兴县东南的田家会战斗中歼灭日军第八十五大队七百余人；八月间成立晋绥分局，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十月，晋西北军区改为晋绥军区；同月林枫从延安带回毛泽东同志“要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晋绥军区组成武工队十五个、三百四十五人深入敌后，以后发展到三十七个队，并派出九个主力连、十九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展开对敌斗争；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成立联防军政治部，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联防军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由柯庆施介绍，我同杜芳同志结婚。杜芳，原名张柱芳，四川达县人，当时是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大学班的学生。她原来家境赤贫，三岁时，父亲把她送给张鲤庭作养女。张鲤庭以教书为业，思想进步，一九三三年红军到达县，他参加了红军，不久即为张国焘肃反扩大化所杀害，全国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张死后，家无积蓄，其妻、母生活艰难，杜芳读书全靠自己学习成绩优异，办得“清贫证”，可以公费上学，既解决了学费，又解决了吃饭穿衣等问题，从初中到高中六年全靠自己发奋刻苦读书，初中在达县住校，高中在成都住校，假期都没回过家，在学校用功。她的老师都很喜欢她，杜贵文、苏爱吾、黄驾谷等老师在经济上都对她有过帮助。一九三八年她由老师杜贵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参加革命工作，她对工作特别认真，擅长语文，给上级写报告，开会做记录都是她的差事。总之，她是个很好的同志，婚后对我有不少帮助。我回部队时，从联防军政治部要了李玉治等八人，杜芳也随我到晋绥。

### 大练兵、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抛出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六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叫嚣“解散共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了几十大大军，除在华北、华中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外，竟将胡宗南守卫黄河河防与日军对峙的第九十军、五十七军八师、六十军炮营撤到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邠县、铜川等地集结，企图闪击延安。陕甘宁边区北面的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也进占神木东南的盘塘等地，企图南北夹击陕甘宁边区。形势非常严重。这时三五八旅刚刚参加粉碎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胜利返回静乐地区驻防。根据国民党一贯反共反人民的经验，全旅指战员密切注视着从陕甘宁边区传来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无不义愤填膺。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增强边区的作战力量。六月上旬，三五八旅旅部接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电令，赶回陕甘宁边区。部队情绪激昂，立即出发，经由磻口、绥德、清涧、延安、甘泉，于六月下旬开抵延安以南、邠县以西的葫芦河地区。独立第一旅的七一五团同时由绥德、吴堡地区出发到达葫芦河归还三五八旅建制。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新四旅、教导旅呈弧形布防在南边通往延安的要道隘口上。

在此期间，毛主席、党中央一方面向全国全世界公开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准备投降的阴谋，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准备反击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反对，由于边区早已作好充分准备，国民党未敢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遂以失败而告终。

## 大 练 兵

为了预防国民党再次发动突然事变，三五八旅奉命就地驻防扼守延安的南大门。旅部驻王家角村，七一五团驻寨子湾、七一六团驻张家湾、第八团驻黑水寺、兰家湾。

葫芦河地域古来就是兵家角逐之地；清朝同治年间左宗棠反回民义军的战火把这一带村镇夷为废圩。三五八旅来到这里的时候，土地一片荒芜，只住着几户从四川逃来的难民，部队只得住在破窑洞里或是露天宿营。接到就地驻防的命令以后，部队首先要解决的是住的问题。于是，我们组织全体干部战士，自己动手，削陡坡、挖窑洞、干打垒。经过两三个月的紧张施工，在十几里河川的崖上，修起了一千三百多孔窑洞、九百五十多间平房，完成了以营为单位的新驻地，全旅在这里安营扎寨。为了解决冬季吃菜的问题，全旅以十天时间开了一部分荒地，并且为一九四四年大生产做准备，进行了荒地勘测，准备生产工具，达到一人一把锄头。十月来到了，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在延安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研究部署边区部队在驻防的同时开展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发出“边区部队在冬季要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的号召。会议明确了大练兵运动的目的是：“提高战斗力，准备大反攻。”方针是：“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尤应以技术为主。”基本方法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会议结束以后，我立刻赶回旅部，紧急召集全旅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高干会议的精神。会上进行了讨论，与会同志都弄通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大家说，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没有能够好好练兵，现在有了个和平间隙，应该抓紧时机，很好练兵，更好的保卫边区。会议还具体研究了如何搞好冬训，作出了初步安排。随即，全旅指成员都投入紧张的练兵准备工作。首先是深入做好动员群众的工作，提出“练好武艺，准备反攻”的号召，要求把“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性练兵方法渗透到思想政治工作中去，这次冬训大练兵要有新特点、新经验。各级领导反复向大家讲清形势，说明这次大练兵是为了适应部队的发展、准备将来战略反攻和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突然事变，练兵的每一个实际步骤都要和形势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这次大练兵要改变过去训练靠少数人包办、司令机关包办、教员包办的教学作风，变教学为广大群众自己的事。发动全体干部、战士、勤杂人员自觉学习，相互帮助，展开竞赛。从每个人到班排连都要通过讨论，订出学习计划。另一方面在物资上也充分做好准备。练兵任务下达以后，战士们积极响应，提出“今年要好好练兵”、“没本事下不了山”的口号。但是也有些战士发牢骚，说：“一到练兵就没饭吃，要背粮。”等等。针对这些议论，我们要求后勤人员想方设法改善给养，保证每人每天的油盐菜达到规定的标准，还组织特等射手打野禽、野兽做补充，使每人每月能吃上两斤肉；还保证不吃生饭，有开水喝。另外，卫生部门加强监督管理，预防冻伤、跌伤和感冒等疾病发生。再是加快训练场地和训练器械的建设。指战员们沿着河滩，很快修建了七个标准训练场，每处都修有五百米长的跑道，设置有跳栏、铁丝网、堑壕、草人靶、独木桥等障碍，并且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自制了各种土训练器材。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这次联防军司令部只拨给我们十几根用来架单杠的铁棒，还有两筐铸铁手榴弹壳，用这点材料来做全旅的训练器材是远不够用的。当我们去各部队检查训练准备工作落实情况的时候，但见

各个连队都自行解决了训练器材，战士们用细荆条编成坚固的防刺具；用挖空的圆木，蒙上老羊皮做成木马；用一根根磨得锃亮的白腊杆绑在两棵树之间；搞起许多单杠，试了试都挺合乎要求。部队还推广制作模仿机枪、步枪声音的器具，声音还挺逼真。还有一个难办的问题，就是训练教材怎么解决。当时全军还没有正规的统编教材，自己组织编写也来不及。旅司令部负责训练工作的同志经过研究，决定把全旅在抗大学习过的干部保存的课本、笔记收上来，参照旅部存有的苏联红军和西北军、东北军的一些教材，按实际技术装备状况和训练科目的先后缓急，编写一些简明教材，陆续刊印在旅的《战火报》上，供各班排学习用。有些科目一时没有合适的教材，就采用示范教学的方法，先在旅司令部集中训练负责该科目的各团训练参谋和技术尖子，然后组成示范小组，分别到各连去示范施教，这个办法后来在实践中证明效果很好。

十一月二十二日，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预定一百零五天（十五周）的冬季大练兵计划正式执行。这次动员工作做得较为深入，所以练兵一开始就形成热潮。人人都抓紧时间学习，宿舍里都安上杠架，到处是“课堂”。司号员吹号成了形式，吹起床号之前大家都早早起了床，吹熄灯号以后却很少有人休息，都燃起火把来练，有的利用灯光下的人影来练刺杀和射击，很多人就是晚上学会翻杠子的。平时人们都三三两两地议论怎样掌握好技术要领，找差距，想办法，谁也不愿落后，都怕拉了集体的后腿，有的战士因为进步慢而哭肿了眼。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不胳膊痛、腰痛、腿痛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连队指战员是这样，勤杂人员也不例外，炊事员下河挑水也带上手榴弹甩两下，通信员送信走在路上也练习投手榴弹……总之，在部队驻地附近走过，谁都得注意着点，不然就会被手榴弹砸着。后勤干部中不少是“老干部新兵”都说：“当兵好几年了，什么也不懂，这次不练可不行。”因此，军政干部间的团结、军政工作的相互配合是空前的好。为了保持群众高涨的练兵热情，各级领导倒要经常催促群众按时作息，叫大家不要紧张过度，要保持体力；还要适时提出新的训练内容和新的训练方式。首先，改变以往只练战士不练干部的作法，要求真正做到毛主席指示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新式练兵方法。强调干部和积极分子、骨干要起模范作用，大多数干部在训练场上都参加到班里和普通战士一齐操作，一样守纪律，动作要是没做好，班长叫重来，同样重做，吃得起苦，影响很好。战士们反映，这次练兵没说的，如果还俏皮，就对不起上级。这次练兵内容着重以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为主，改变了过去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教育方式，真正做到学与用、理论和实际一致。三五八旅不少老战士身经百战，有一套实际的作战技术经验，就是不注意学习理论要领；有些青年学生出身的新战士，理论要领学得快，讲得出、背得上。就是投弹不远，射击不准。这就要根据各类人员的特点，扬长避短，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互相辅导，共同提高。教材是过去的经验总结，教材的要领不能忽视，一般要按要领操作训练。但是教材上的要领也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投手榴弹、教材上只有一种正规的投掷法，可是各人用力不同，习惯不同，按统一一种投法，反而成绩下降。有些人就是用抡投、左手投才能投远投准，就不一定非要他改按正规投法了。

随着训练的进展，出现了一批三大技术的尖子兵，就让他们来向大家谈体会、讲课示范；旅和团营各级干部都虚心地向他们拜师。如八团三连战士

刘振福，过去是个有名的“啰克兵”，可是在投弹训练中他达到六十二米的好成绩，第八团领导果断地让他当投弹教官，到各连去示范施教。开始有些干部还想不通，不同意让“啰克兵”当教官，第八团领导让刘振福先到二营去讲课，这个营平均成绩老是在三十三米左右，再也提不高了，经过刘振福介绍经验以后，不久全营平均进步十米，这样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在事实面前也信服了。第八团领导把刘振福的经验报到旅部，旅司令部也就在王家角村召开了现场会，各团的训练参谋和营以下干部都来参加，听刘振福讲课示范。刘振福的经验在全旅推广以后，不到一个月全旅投弹成绩也提高了十米。

训练中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骨干带头，把练兵的群众运动推向高潮。但是，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落后分子，改造落后分子是个老大难问题，这次旅部专门提出正确对待落后分子的方针，强调要改变管理教育方式，改善官兵关系，先进带后进；对落后的干部战士不准歧视，发现他们一点长处就要鼓励表扬，有了错误批评要适当，坚决反对旧军队那种打骂、体罚、强迫命令、讽刺挖苦的错误做法。练兵初期还有个别打骂战士的违纪现象，七一六团采用军事民主会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促进了官兵团结。有些过去经常打骂战士的干部改变了作风，学会了诱导提高落后分子的方法。第六团排长王克军在全排投弹突不破四十米时，他对全排同志说：“谁投四十米，我替他放一次哨。”结果有一天晚上，他代替放过三次哨，他还把上级奖励给他的物品，转奖给战士们；第八团二连连长陈献亭和战士比赛，让战士先胜他几天，使战士们有了信心以后，再慢慢提高成绩，把战士带起来；第八团特务连有十个“啰克兵”，在全旅都出了名，人称“十大金刚”，在这次练兵中他们受到多方温暖的关怀，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人人立志争当先进，其中有个战士杨中华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当了军体操的小教员；第六团的“啰克兵”转变以后当选为学习模范……这样的例子很多，当然这是一时的转变，还需要长期做工作，使之巩固经得起考验。有些战士学习落后，是因为脑子笨、动作不灵活，对这些人强调不准讽刺挖苦，要多安慰，给以勇气，特别要指定专人帮助，只要他们有些微小进步，也给以鼓励如第六团五连用减少公差勤务的名义，不说是落后，把一些学习落后的战士集中到连部，由连长亲自教，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最后欢迎他们和全连同志一起学习，这样收效很大；又如第六团有一个战士怕跳高，他始终只能跳过六十厘米，有一次帮他学习的干部告诉他已经跳过七十厘米了，他听了很高兴，干部悄悄把跳杆放在七十厘米处，他果真跳过去了。后来又告诉他跳过八十厘米了，他又真跳过去了，大家就鼓掌鼓励他，并告诉他主要是心理作用，他完全可以跳得跟大家一样高；第八团还专门介绍特笨战士的成绩，如他们介绍了全团闻名的军战士刺杀动作好，结果很多战士说：“他能学得好，我们应该学得更好。”象这样鼓励后进战士的例子很多，也推动了全体。

练兵中我们把连队的俱乐部委员会搞成团结、发动战士学习的组织。俱乐部委员会领导群众订个人计划、搞竞赛、请小教员、搞各种练习技术的小组等活动。俱乐部在连长、指导员领导下工作，但俱乐部委员会的决定，所有干部战士都得执行。如某排长被选举为俱乐部投弹甲组的组长，这位排长就应以小组长的身份接受俱乐部的领导。

在练兵的中期出现了一个群众性自发的竞赛活动。

最先是八团的几个射击尖子发起的，一连战士齐跃宗订的个人计划进度和难度都超过了训练大纲，射击成绩目标要名列全团第一。射击标兵张福才



知道了就要和齐跃宗争第一，战士李光军、排长刘凤、杨住义也提出参加比赛，这样一来竞赛热潮霎时间就掀起来了。旅司令部发现了这个新鲜事物，因势利导，就在全旅组织起竞赛来。积极分子的竞赛带动了中间分子，而一些成绩稍差的往往不是不愿参加进去，而是别人不愿意同他们比，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上就得设法给他们找对手。如第八团一连三班因为落后没人愿和他们比，俱乐部就组织他们同炊事班比，结果这个班的成绩成了全连第八，并不是最落后的。竞赛有决赛还有预赛，俱乐部每天公布各排、各班和个人成绩，促使有些连队的成绩一天几变地提高。有一天公布第八团七连三班的成绩落在全连后面了，三班正副班长看到以后，立即召开班会，马上带出去练，第二天他们的成绩就赶上了其他班。练兵竞赛蓬勃地开展起来以后，产生了许多新经验，需要交流推广。旅部经过研究，决定适时地召开各级学习代表会，使学习模范有机会互相交流，各级领导也借此高度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运用典型来推动练兵运动。连营团旅都召开各级学习代表会，开会的形式可以不同。营连可以不定期地举行，召开的时间间隔短一点；旅和团的要准备充分一些，这一段旅的代表会只开了一次。基层的会主要采用现场会、上大课、讲评讨论的形式；内容也可以不一样，如表彰先进、总结讲评，选举出席上级代表会的模范等等。代表的产生，采取民主选举的方法，无记名投票，多者中选，杜绝了领导指定的现象。群众选举出来的模范威信高、先锋和桥梁作用好，而且照顾的面也比较周到，有老典型，也有专业分队，勤杂人员的典型。群众选举对一些群众和干部也是种鞭策，如第八团一连连长钱树登，是一连的老兵，很负责任，但是对战士态度不好。该连选举出席旅代表会代表的时候（当时规定每个伙食单位选干部一人，战士两人代表），结果新到该连仅一个多月的副指导员苗义武当选。这事对钱树登刺激很大，由此改变了管教方式，以后团里召开两次代表会他都当选为干部学习代表。

练兵竞赛中的先进模范者都给以适当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练兵中行行出状元，所以奖励也是多样的，战士、干部和事务人员都有奖，营团旅各级都发奖。当时，联防司令部制定了练兵运动的奖惩条令：射击三发子弹，命中二十一环者评为“朱德射击手”；投弹四十米以上者评为“贺龙投弹手”；刺杀勇猛，测验九十分以上者评为“高岗刺杀手”。全旅有近千名战士、干部获得“三手”称号。除了授予称号，另外发给物质奖品，如铅笔、牙粉、本子等，练兵期间旅用奖励费七百余万元（边币），各团用奖励费共一千多万元。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三五八旅在王家角村召开了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旅领导向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品，各团代表进行技术比武，互相传授经验，有的立下了开展竞赛的军令状。正如《战火报》评价的，这是一次比武的现场会，训练成果的汇报会，掀起练兵新高潮的誓师会。

三五八旅这次冬训大练兵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到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结束，训练时间共一百零五天，除去十五个星期天，新旧历年假六天，测验一周，实际练兵时间七十七天。在这短短的期间所获得的成绩，若与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军训相比较，成绩确是空前的。

在三大技术训练中，通过群众的竞赛和学习代表会的总结交流，摸索出不少新鲜经验，补充原有的教材，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如投弹训练方面，在方法上总结出“分类专练”，即原来一天之内同时练投弹、射击和白刃战斗，臂力不容易恢复，以后改为一个半星期练刺杀，超越障碍，这样臂痛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对投比赛”、“诱导提高”等办法。在投弹技术上怎样

用手用腿、握弹位置和投出时机等环节都总结出最佳方法；在姿势上除了原教材的正投外，还总结了抡投的方法，用正投投不远的，可以用抡投的姿式。

射击训练方面，当时我们部队的枪有七八种，而且新旧程度不齐，性能特点不同。如八团六连三班，有些特等射手用他自己的枪打得很好，百发百中，他的经验是瞄准时准星低于标尺缺口。但是，让他们改按射击原理来瞄准，却总是吃“烧饼”。其他班的特等射手也出现这种情况，按教官教的反而成绩不好，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教官和特等射手们共同研究，才发现原来是枪的问题，就一起依据射击原理，对所有的枪进行了细致的测定，让每个战士都掌握自己手中枪的瞄准方位，以后实弹考核结果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在白刃战斗训练方面，旅里把原来只有“一、二”，“进、退”多简单的日式刺杀动作改为有七个连续动作的苏式刺杀，提高了训练难度，增加了战士练兵的兴趣。经过一段训练之后，一些“刺杀手”觉得还不满足，又把我国传统的武术动作揉进刺杀动作里，搞出了“空中劈刺”、“枪托打击”、“迷眼突刺”等绝招。旅司令部经过收集、充实、整理，肯定了这些动作，写成刺杀训练的补充教材，加上图解，登在《战火报》上。在政治教育方面，紧紧地配合了大练兵进行。从练兵开始到旧历新年间，即前两个月，按旅政治部编的教材进行时事教育；旧历新年过后，到训练结束的一个月时间，为拥政爱民教育。教育的形式生动，改变了过去政治教育教员讲得多、战士讲得少的状况，让战士来当主角，启发战士讲话、辩论。这样就能掌握战士们的真实思想，了解他们在认识上有什么偏向和错误，讲课人有针对性地联系思想实际，讲解得既通俗易懂又解决问题，使战士们不断纠正糊涂认识，思想觉悟有较大提高。在这方面军事干部都争当优秀的政治干部，把训练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军政分工不分家，齐心协力地保证群众练兵的热情不断高涨。这次练兵使“啰克兵”大都转变了，开小差的大大减少了，总共只跑了几个人。一九四四年三月初，旅司令部组织全旅进行了一周大考核。全旅步枪射击命中率由原（练兵开始的成绩，以下同）百分之四十八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三点三，特等射手六百名（按三发三中，全中六环以上的）；轻重机枪原来成绩最坏，没作统计，这次考核重机枪命中率百分之八十四，全旅只有四名普通射手，其余皆为特优等射手，轻机枪命中率百分之六十八，特等射手百分之三十五；山炮从卸炮到发射时间由原来十五分钟，进步到二分四十秒，实弹射击命中率达百分之百；机关枪从卸枪到发射时间由原来一分五十六秒，改进到一分五秒，实弹射击命中精确；迫击炮和掷弹筒因为节省弹药关系没有进行测验。投弹（弹重零点七五公斤）全旅由原来平均二十五米，猛增到四十点六九米，原来投三十米以上的六百一十三名，增加到三千二百九十五名，四十米以上的二千一百五十五名，六十米至六十五米的投弹标兵二十六名，并创造了投弹七十二米的最高纪录。白刃战斗改为苏联式，刺杀动作比较熟练，通过障碍壕沟投弹命中百分之三十，全部动作完成时间缩短到八十五点七二秒。以前，全旅会器械操的只有十来个人，现在增加到一千多人。其中获得特等成绩的七一五团四百三十八名、七一六团一百九十九名、第八团一百七十三名。就技术提高而言，可以说使部队的战斗力增加了一倍。三五八旅的冬训给一二师开创了一条新式军事整训的路子。晋绥军区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发出了一九四四年军事教育的训令，规定：技术训练，主力兵团以射击、刺杀、投弹为主，地方兵团以射击、投弹为主，游击队以投弹、爆破为主。成术训练，以单个战斗教练和班

排的战斗教练为内容。夜间训练则要求熟悉夜间行军、侦察、警戒、袭击、伏击和被袭击的处理等各种动作。要求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与对敌斗争相结合的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做到即学即用，学用一致，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不论技术和战术，都要全副武装进行，干部着重于总结实战经验，提高指挥能力，并亲自组织领导好本部队的训练。

接着不久，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这份重要文件指出：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养兵的经验（带兵即管理，用兵即指挥作战，养兵即生产给养），练兵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练兵方法实行群众运动，结合整风，开展群众性的练兵高潮。

三五八旅遵照党中央和联防军司令部的指示，召开了一九四三年冬训总结大会，我代表旅党委在会上作了《三五八旅冬训总结》，总结了坚持群众路线，开展官教官、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练兵运动这一最基本的经验。这个报告受到党中央和联防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七月二十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予以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发至全军。我们在葫芦河练兵，起初粮食和副食供应都很困难，一九四三年进驻以后开了秋荒，为冬季解决了吃菜问题。为了坚持抗战、减轻人民负担，积蓄力量，准备反攻，我们一面练兵，一面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边区部队要做到生产自给，改善部队生活的号召，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大生产运动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一九四四年二月起，全旅就着手准备，自制各种生产工具，勘测荒地，规划生产地区，制定生产计划，区分生产任务。从旅到营连都组成了生产委员会，负责领导大生产，并设了专管生产的专职干部，二月二十日全旅召开了干部大会进行生产动员，提出以“农业为主、副业为辅”的生产方针和“丰衣足食，自己动手”的口号，努力完成联防军司令部规定的做到粮食、菜蔬自给自足的目标，达到全旅生产两万石粮食的任务，要求每人垦荒二十亩。全旅干部会以后，各级分别深入动员，进行思想教育，当时主要克服“当兵吃粮”的旧思想，有些战士认为参军就是来打日本侵略军的，不是来种地的，不如在前方打仗痛快、光荣；有些干部则怕影响练兵，削弱战斗力。经过教育和广泛的讨论，大家懂得了开展大生产运动是解决部队吃饭穿衣、保障供给的可靠办法，不搞好生产就设法练好兵，生产也就是为了打仗。思想认识提高了，干部战士纷纷表决心，订个人计划，并且掀起了群众性的挑战、应战热潮。各团相继把每人开荒二十亩的任务指标，提高到三十亩、四十亩。

冬训练兵告一段落以后，二月二十日开始，全旅上下，从旅长到勤杂人员，五千多人一齐动手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垦荒战斗。各级领导带头起早摸黑、披星戴月地进行紧张的劳动，一些身经百战、有伤残的老同志也积极地参加，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生产热情。垦荒一开始就形成了劳动竞赛热潮，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每日开荒纪录不断上升。到五月中旬，只用了五十多天时间，全旅开荒十四万亩，超额完成了开荒任务，在这期间涌现了许多模范集体和先进个人，如八团三连和七连开的荒地都超过计划的一倍，达到四千亩以上；出现了开荒六百六十亩的班，达到人均开荒五十五亩的最高纪录；各单位都奖励了一批个人开荒百亩以上的劳动模范。

垦荒以后，全旅不失时节，立即进行播种。在开荒、播种、锄草以及秋收、打场、入仓等一系列的农事劳动过程，我们都拜当地老农为师，提倡深耕细作。在生产劳动的同时，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检查战士的生活情况，让有关部门注意改善伙食和关心卫生保健，这不仅推动了生产，也密切了同志

之间的关系。由于田间管理得好，秋收及时，这一年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共收粮二万零八百石，各种蔬菜二百七十六万五千斤，副业生产采药材、山果、生漆等山货二万六千斤，养牛、羊、猪三千一百多头，超额完成了粮食、菜蔬自给自足的任务。

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旅建立了被服厂、榨油厂等手工业作坊和商店，解决了部队装备需要和供应日用必需品。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部队生活，而且还上交了部分公粮，减轻了边区人民负担，胜利地渡过了经济难关，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经济封锁。

在一九四三年冬训和一九四四年大生产基础上，三五八旅在一九四四年冬又进行一次练兵，三大技术得到巩固和提高，并进行了班以下的战术训练；一九四五年部队又进行了第二个年度生产，在五月播种完毕，将要开始锄草时，接到上级命令，三五八旅开赴晋西北创建吕梁山军区，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全旅的农业生产任务交新编第四旅接管，农业生产任务暂告结束。

## 爷台山战斗

一九四四年三月，中央军委为了推广三五八旅的练兵经验，决定在中央党校学员中抽调营团军事干部八九十人成立军训队，调我到军训队工作。军训队主任是徐向前，教员在学员中选军事理论基础好的解方、王智涛等担任，学习期限六个月，到九月结束。我们除在军训队搞实际训练外，还编写了由单兵到连的技术战术训练教材，可惜底稿没保存下来。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对军训队的教、学员都很关心，结业时，朱总司令、彭真同志都到场讲了话。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联防军在延安召开了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三五八旅的代表在会上作了三大技术和战术表演，受到与会的领导和其他代表的好评。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我参加了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三五八旅的七大代表是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部队从冀中返回冀西整训时选的。从整风学习开始各根据地的代表已陆续来到延安，大多数住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会议期间，我们主要是学习领会七大的文件精神。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日战争已接近最后反攻阶段。四月，苏联废除了苏日中立条约；五月七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向盟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处在接近覆灭的境地。为了准备配合全国向日军举行反攻，扩大抗日根据地，晋绥军区组成了三个二级军区，即吕梁军区、雁北军区和绥蒙军区，贺、关命令三五八旅迅速赶回吕梁山区。我令七一六团于七月十日先行出发，旅直率七一五团、八团于七月二十四日出发。七月二十六日，旅部进到甘泉、接到联防军司令部通知：国民党军队向爷台山进攻，关中地区形势危急，令三五八旅急速增援爷台山地区。我即令七一六团在延安地区集结待机，旅部率七一五团、八团经三天急行军赶到关中淳化凤凰山、照金地区集结。原来，国民党军队为了篡夺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企图夺取关中解放区，箝制陕甘宁八路军向日军的反攻，进而发动全面内战。从七月十五日开始，胡宗南将河南前线、黄河防线和驻西安等地的国民党军西调，在边区边境的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旬邑等地集中了九个师的兵力。七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突然向关中军分区淳化县的爷台山等地发起攻击。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和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阵地岿然不动。二十三日，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也投入进攻。我军坚守了七天，终因寡不敌众，于七月二十七日，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四十一个村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边区的宽一百里、纵深二十多里的地方，企图继续北犯。这时，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关向应等七人通电全国，宣布淳化事变真相，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进攻，撤返原防地；并主张组织公正的社会调查团体，考察真相。八月二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吁请调查淳化事件真相》的社论，新华社也接连发布和报道了大量消息，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各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首先获得了政治上胜利。

联防军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为了制止内战，收复失地，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由我任司令员，政委是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副政委谭政，副司令王世泰、王近山、黄新廷，参谋长张经武（未到），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指挥部设在马栏。抽调新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参战。

临时指挥部决心在敌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守敌，打击敌人的气焰。决定新四旅五个营配山炮一门为主攻部队，警备第一旅第

三团配合，消灭爷台山、老庄、宋家洼之敌，尔后扩大战果，收复全部被侵占的村庄；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集结于凤凰山、照金地区机动，必要时可以越境作战，但不宜突出太远，得胜后迅速撤回准备打击反攻之敌；教导第一、第二旅集结在岭湾、上珍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并严密监视东、西两面之敌，保障我军后方安全。

各参战部队在马栏集结后，临时指挥部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主要讲了我军作战意图和战役战术方面要注意的问题，要求各部队密切协同，隐蔽接敌，速胜速决。八月七日，部队从马栏出发，向预定作战地域前进。临时指挥部也从马栏村移到距爷台山二十里的凤凰山下的免鹿村。爷台山位于乔山山脉的南端，海拔一千三百一十三米，地势险要，易守不易攻。国民党军侵占爷台山后，大肆抓民伕，抢修了大小十多座碉堡和一些掩体、堑壕等工事，其中尤以主峰的碉堡最大、工事最多，妄图固守。国民党军还在耀县、淳化、邠县、中部、石堡、兴平、西安等地集结重兵，作为战役预备队，准备再次扩大进攻。爷台山上驻守的是胡宗南的暂编五十九师三团的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重机枪排。主峰内是暂编五十九师的所谓“常胜连”——三团二营四连，配备轻重机枪七挺。八月八日黄昏，部队向爷台山敌人前沿阵地运动，进入冲击出发阵地。午夜，反击战总攻开始，各部队全线出击，向爷台山敌人展开了猛烈进攻。国民党军依托工事，凭险据守，负隅顽抗。战斗到九日凌晨四时，只新四旅七七一团攻占孟户原、熊家山两阵地，歼敌一部。其他部队的攻击均未奏效。为了迅速解决战斗，临时指挥部命令三五八旅投入战斗。三五八旅黄新廷旅长即令第八团投入战斗，并集中全旅的山炮三门、两个团的迫击炮八门，集中火力压制敌人。九日上午十时，第八团二营六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以迅速猛勇的动作，冲进敌人碉堡的外壕，战士尹玉芬首先登上敌人碉堡。二营的其他连队及新四旅十六团一营紧跟着冲上去和敌人展开手榴弹战和拼刺刀，经反复冲杀，至下午两点全歼爷台山上的守敌。第八团三营和警三团同时攻克老庄子、宋家洼等五个碉堡。其他部队也乘胜扩大战果收复其他被占的村庄，残敌逃出边区以外。十日全部战斗结束，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毙伤敌一百余名，俘敌营长以下三十六名，缴获轻重机枪十九挺及大批弹药。这次战斗对三五八旅来说是两年冬训成绩的实际考核，步兵对炮兵的精确射击非常满意，炮兵称赞步兵能利用炮火支援的效果紧跟着勇猛前进；步兵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熟练的投弹、拼刺、抵近射击的技术，战俘们都说八路军的刺刀、手榴弹厉害。战斗结束以后，所有部队仍严阵以待，预防敌人新的进犯。八月十二日，美军调查组来到爷台山进行了所谓“现地调查”。记得由杨尚昆等陪同，黄华、马海德作翻译。美军调查组无非是想寻找一些指责八路军的口实，然而阵地上到处残留着国民党军的印着美国制造英文字样的弹壳和弹药箱，还有我们缴获的美式武器。这样的调查结果，使调查组扫兴而去。八月十四日，我军打扫了战场，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召开了追悼会和军民联欢晚会。此后，临时指挥部奉命撤销，我随三五八旅仍按原计划向晋西北前进。

## 迎接抗战的伟大胜利

就在我们进行爷台山战斗之时，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东北，日本关东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路军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各抗日根据地部队向日军及其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期投降，敌伪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坚决予以消灭。为了适应反攻进军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从联防军建制中调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由贺龙、李井泉统一指挥，担负向晋绥地区日伪军大反攻的任务。晋绥军区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委，续范亭、周士第副司令员，陈漫远参谋长，甘泗淇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副主任。下辖三个二级军区：吕梁军区、雁门军区、绥蒙军区。吕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兼政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贵波，副政委解学恭，参谋长张希钦；下辖三分区，司令员陈刚，政委秦立声；四分区，司令员杨秀山，政委刘文珍；七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马佩勋；八分区，司令员王长江，政委甘一飞。雁门军区司令员许光达，政委朱明，副司令孙超群。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委张达志，副政委苏谦益，参谋长邓家泰，政治部主任饶兴。

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因病未到职），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张经武（由许光达代），副参谋长李夫克；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副主任冼恒汉。下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独立第二旅旅长许光达，政委孙志远。九月组建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委金如柏。

晋绥解放区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八月十一日，在北线以骑兵旅、九团、二十七团，收复陶林、武川、察素齐、毕克齐、旗下营、陶卜齐等地，斩断平绥路和同蒲路北段，会合晋察冀部队，包围并一度攻入归绥。在南线，第三、四、七、八军分区部队收复古交、河口、石千峰、王家庄、陈家峪、皇后园、忻口等地，一度攻入太原近郊。

正当解放区部队向敌人进行反攻之时，蒋介石以“抗战最高统帅”名义，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伪军的枪械；命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开进：还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固守所占地区，阻止人民军队受降。晋绥的国民党部队趁机抢占归绥，阎锡山的部队则与日军勾结，进入太原市。这时，党中央指示，改变作战方针，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迫使日伪军向大城市和要道收缩，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扩大、巩固解放区。三五八旅从陕西关中北返，执行向敌反攻受降命令。七一六团从延安先行回到汾阳以北坡头地区集结，八月十九日，在晋绥三分区指挥下，七一六团协同十七团、特务团进攻汾阳城，后因守敌兵力增加，停止了进攻。后来，侦知离石、柳林、大武地区的日军集中在离石，准备撤到汾阳。九月二十一日，日军一个大队六百余人，携带大车六十余辆，满载物资装备，由离石撤往汾阳。七一六团即于离汾公路中段的芦家庄伏击该敌，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敌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区，七一六团以三营掩护，一二营发起冲击。经过一个小时战斗，歼灭敌人一百余人，缴获步马枪十八支，马车三十五辆，电台十二部，电话总机一部，电话单机十八部以及大批医药器材等军用物资。当敌人后续部队赶来，并将一个炮兵中队展开，向我方攻击的时候，三营十二连坚决抗击，掩护团主力有组织地撤出战斗。与此同时，独立第一旅也从陕甘宁边区回到汾阳以北的刘村、

裕口村、补城寺地区。军区即令独一旅协同八分区部队首先消灭拒绝投降的文水城敌伪军。文水城内有伪军城防司令部和—个保安大队，以及伪县政府的反动武装共计八百余人。独立第—旅和八分区—、二、六支队在八月三十一晚秘密包围了文水城。九月—日凌晨，独—旅以七—四团担任主攻，八分区的二、六支队辅攻，二团和八分区—支队为预备队发起进攻。部队冒着大雨前进，旅属的七五山炮连的四门山炮猛烈的轰击城门楼，摧毁敌火力点。部队很快攻占城门楼，突入城内进行巷战。战斗到下午七时结束，共击毙伪县长宋子君以下—百五十余人，俘伪保安大队长王兴国，保安副大队长王耀先等以下六百余人，缴轻机枪四十余挺，掷弹筒三具，步马枪四百余支。文水城里有两座仓库，内有不少军用物资。

九月三日，三五八旅七—五团和八团从宋家川渡过黄河。旅决心以七—五团攻击柳林镇，八团攻击离石城。

七—五团领导也不休息，四日拂晓就带着营连干部走到柳林镇外围的高地，进行实地侦察确定部署，当即决定采取各个分割围歼的办法，向守敌的六个分哨和东西街口的碉堡同时进攻。团领导要求各部队很快完成准备工作，行动力求隐蔽，严密封锁消息。九月五日凌晨二时，各部队到达进攻出发位置；三时开始总攻，由于我们攻击得突然，敌人在睡梦中爬起，摸不着头脑，有的向外窜想突围，有的缴枪投降。拂晓以后，只有—个碉堡没有强攻下来，团炮兵以迫击炮抵近平射，将碉堡摧毁。战斗进行了六个小时，守敌无—漏网，共毙伤敌四十名，俘敌支队长陆彦龙、大队长高文英以下官兵二百七十二名，缴获步马枪—百九十一支，轻机枪五挺，手枪十七支，还有其他军用物资。

九月四日，三五八旅八团绕道柳林镇以北，进至交口、梁家会地区集结，进行战斗动员和准备攻击离石城的工作。五日，第八团领导和各营干部到离石以西的高地进行实地侦察，并找围困离石城的游击队和民兵干部进行调查。离石城过去是日伪顽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特务活动的中心据点之—，日军投降后曾企图将离石移交阎顽军，八月下旬日军撤到汾阳，离石内留有阎锡山的地主武装“离石爱乡团”，和由伪铁血团、伪警备队经阎锡山加委合编的“晋西北挺进纵队”共—千余人，其主力全在城里，只在离石城北的凤山底东山驻有—个排，离石城南卧牛塬山上驻有—个连。

九月六日凌晨三时，第八团二营对卧牛塬进攻，第—营向凤山底攻击。至上午八时，在炮火支援下，两处阵地都攻下来了，离石城已完全被我们控制，部队即集结休息，积极准备攻城器材。

部队攻城主要是用木梯在火力掩护下竖梯攻城，离石城墙高约十米左右，木梯得有十三米高，每个梯子要有数十人才能搬动，攻城有火力组、竖梯组、突击组、投弹组互相配合。六日晚九时，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各营发动攻城以后，竖梯组行动困难，梯子刚竖起就被敌人炸断，反复几次都没有成功，只得暂时后撤。七日，旅山炮连开到，以炮火掩护，—营三连、—连，三营九连主攻，连续几次竖梯又没有成功，战士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伤亡较大。团领导只得再次命令后撤。八日部队休息—天，团营领导实地勘察，研究两次攻城失败的原因，决定改变攻击方向和部署。九日凌晨—时，部队主攻方向从城东北角改向西北角，经过加固的竖梯，未被敌人炸断，五点第三营八连—次竖梯成功，—部巩固突破口，—部顺城墙向南发展。七连也登上城墙，接着九连、特务连也爬进城；三连在城东北角爬梯也成功，—



部打开城门楼接第一、二连入城，主力向西南发展；第二营从东南角登上城墙入城。部队人自为战，以手榴弹、步枪火力，利用街道追击敌人。上午八时全部战斗结束，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三百零四人，俘敌少将主任以下官兵一千一百零四名，缴马步枪四百零五支，轻机枪三十四挺，重机枪一挺，手枪三十九支，冲锋枪六支和大批军用物资。离石解放以后，吕梁军区就设在离石。我军的正义行动，深受敌占区人民的热烈拥护，并有力地教训了敌伪军，谁拒不投降，就一定将它消灭。到九月初，晋绥部队在北起绥南，南到晋中平川，延绵三百多公里的战线上，与日伪军进行了较大的战斗八十多次，收复县城九座，据点八十一个，毙伤俘日伪军五千余人。八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我大部分时间在三五八旅工作，在艰巨复杂的战斗过程中，在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遵循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从胜利走向胜利，较好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历史任务。

## 第九章 反对内战自卫反击

## 大同、集宁战役

一九四五年九月，党中央针对蒋介石抢占平津，控制华北，进而与我争夺东北的阴谋，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央军委决定由贺龙同志指挥晋绥野战军、聂荣臻同志指挥晋察冀部队共同发起了绥远战役。在绥远战役中：晋绥野战军在卓资山歼灭国民党六十七军新编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击溃援敌一一师，毙伤俘少将副师长以下四千余人，取得了自卫反击以来的重大胜利。

后来，晋察冀部队围困归绥，晋绥部队在十一月，十二月两次攻打包头。由于敌军凭着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而我军兵力、火力都不足，又缺乏攻城经验，遂打成僵持局面。直到隆冬到来，土工作业和部队食宿都遇到极大困难，我军只得主动撤出战斗，转入休整。绥远战役遂告结束。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停战协议生效。二月中旬，我奉贺龙命令，从吕梁军区调往绥远前线工作。我从离石出发经兴县、五寨走了十天，到了丰镇附近的野战军司令部。我在野战军司令部住了十多天以后，贺龙同志就回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这时，李井泉同志因事去张家口，以后也直接回兴县了。他们回兴县以后，晋绥野战军司令由我代理。当时野战军参谋长是许光达、副参谋长李夫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也回兴县，遗缺由孙志远接替，副主任是洗恒汉。此时，野司直属队随野司移驻丰镇，独立第一旅驻卓资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率军区直属队和几个连，并指挥军区第二十七团驻集宁；三五八旅驻集宁以南的平地泉地区；五分区司令王赤军率领由游击队改编的两个小团驻在左云。以上兵力总共不到一万人。这时，美国政府伪装中立，宣称要帮助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开办一所军官学校，负责提供教学的武器、教材和设备。中央军委指定我到张家口负责筹办学校，晋察冀军区派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协助我工作，决定校址设在张家口的十三里营房，朱良才已带了几个干部住在那里。我接到命令后，在三、四月间离开晋绥野战军司令部，先去张家口十三里营房，接着我带孙志远一同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直接同美国方面谈判办校事宜，美国方面派一位上校，和我在协和医院先后谈了三次，每次都是王光美同志当翻译。

当时，美国有些开明友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是同情的，真诚地愿意帮助我们。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则是支持蒋介石反共的，他们参加军调处执行部，实则是缓兵之计，一边谈判拖延时间，一边积极帮助国民党向东北等地运兵，抢占战略要地，准备全面进攻解放区。所以，美方提出帮助我们办军官学校，只是故作姿态，毫无诚意。开始谈判的时候，美方代表夸夸其谈，大谈办军官学校的重要性，说他们办校的原则怎样严格，讲了许多大道理，就是不接触提供办校用的教材、武器、教学设备等具体问题。我一提具体问题，他们就吱唔其词，说这些不成问题，一再推托，不是说正在准备，就是说还没有准备好，反正不作肯定的答复。第三次谈判的时候，美方代表的谈话态度变得更冷淡了，不但没谈实质性问题，还说以后有新的问题时再谈。我向叶剑英同志汇报了谈判情况，估计再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此结束谈判。随后，我就回到张家口转返晋绥野战军司令部。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对解放区发动全面的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还击。

晋绥军区组织了晋北野战军，以周士第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贺炳炎任副司令。以晋绥独立第二旅和其他部队为主，并指挥晋察冀军区陈仿仁

的第十一旅，发起晋北战役。到八月中旬，晋北野战军连续攻克和收复朔县、宁武、崞县、山阴、代县、繁峙、定襄、五台、原平等九个县城和广大乡村，并且控制了同蒲路沂县以北地段，使大同的敌人陷于孤立。在这同时，晋察冀部队围攻应县打了好久没有成功，直到大同战役结束时也没能攻下。在此期间，中央军委和晋绥军区贺龙、李井泉，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同志酝酿夺取大同。在这之前，毛主席让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罗瑞卿同志回延安，毛主席让他到晋察冀部队工作，当面指示要晋察冀部队先出平汉线，消灭弱小的敌人，扫掉敌人的小据点。但他到前线后，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些同志轻敌，不以为然，坚持要先打大同。后来，中央军委也于七月二十五日复电，同意先取大同，再攻平汉、正太铁路沿线，并指定聂荣臻同志负责组织。八月二日，聂荣臻司令员在阳高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刘澜涛、罗瑞卿，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晋绥军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晋北战役之后，大同已经成为一个孤城，尽管大同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守敌建制不统一，战斗力不强，我军如能在外围作战时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再用坑道作业爆破城墙，大同是能够攻克的。会议着重讨论了大同战役的组织计划，分析了大同的情况，区分了任务。估计以十天作准备，十天扫清外围，再十天即可拿下大同。在会议上我提到我攻大同，傅作义部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大家又认为大同不属傅作义所辖的战区，他即便出兵来援，兵力也不会很大，行动不会很快，只要我们攻下大同，傅部就不敢东来，所以会议对打援问题只确定了打点阻援的方针。没有预定打援的战场，没有做出打援的具体部署。

会议决定：晋察冀军区以第三纵队周彪的七旅、易耀彩的八旅，第四纵队邱蔚、傅崇碧的十旅，第二纵队肖应棠的四旅，军区教导旅李湘部，第一军分区刘苏部两个小团（十二团和十三团），炮兵团进攻大同；晋绥军区以三五八旅，第五军分区两个小团协助晋察冀部队进攻大同西北方向的任务。攻击大同的总兵力约一万六千余人。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决定成立大同战役野战指挥部，由我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副司令员。

会后，聂荣臻同志便回张家口，他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中央军委批准了攻打大同的部署，要求“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并准备歼灭傅作义可能派出的援军。大同是山西的煤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同守敌由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四十三军军长楚春溪指挥，连同驻守大同外围的敌军有：整编三十八师，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骑兵五师、骑兵六师、特务营和海福龙团，保安总队（内有留用的日本侵华士兵），两个炮兵营、一个特务营和一个工兵连，还有从其他县逃来的自卫队等等，总共有一万余人。敌守军建制不一，战斗力不强，但是大同城墙厚实，高且陡，又经过敌人长期修筑，工事坚固，城下有交通壕，从近郊到城墙脚下有三层碉堡和暗堡；大同的地形是三面环山，山上山下都有敌人的工事据点，只有城南较为开阔，总的来说易守难攻。在阳高会议之前，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八旅，教导旅和晋察冀第一军分区以及晋绥第五军分区的部队，从七月三十一日起，没有在上级统一部署下，就对大同外围开始作战。这几支部队分别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攻击敌人外围据点，切断了大同到怀仁之间的铁路交通，并且占领了几个据点。怀仁的守敌暂编三十八师第三团约一千五百余人，在这种情况下慌忙向大同撤退，被晋察冀部队堵击，消灭了一部，晋绥五分区王赤

军部随即占领了怀仁县城。驻守大同外围据点的敌人被攻击后，守敌多数退集到大同近郊和城关各据点，这样就增加了我军以后攻城的困难。

八月五日，各部队按阳高会议精神，休整九天，集结兵力做攻城准备。大同守敌也趁机增修工事加强防卫措施。

八月十四日夜晚，我军主力以十三个团兵力，同时总攻大同近郊和城关据点。我军由于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敌人的碉堡，效果不大。当晚，马占山部的海福龙团在海福龙率领下起义，退出近郊的白马城，这是唯一的胜利。由于我军在外围作战时，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敌人从外围收缩到城郊工事，加强了防守兵力。而且，飞机场还在敌人手里，几天以后，敌人还从包头空运来交警第三大队。这样在数量上我军攻城的兵力并不占大的优势。守城敌军依托坚固工事、充足的弹药和复杂交错的碉堡群进行抵抗。阎锡山收编的几百侵华日军炮兵，对我们攻克各个据点也造成很大障碍。当时大同矿区虽然有充足的炸药，因为我们的部队没有用爆破进攻敌人的经验，没有利用爆破进攻。近郊作战打得非常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直到九月四日，即傅作义部已开始增援时，才肃清郊区据点和北关、西关的敌人，实际上不少据点的敌人是主动撤进城里的。我军没能对大同城发起攻击。傅作义对大同覬觐已久，但对增援阎锡山并不积极。蒋介石为了促使傅作义增援大同，在八月中旬下令将原属第二战区阎锡山管辖的大同，划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蒋介石的这一着棋很灵，傅作义立即积极起来，调集其主力三十五军三个师、暂编第三军两个师和四个骑兵师，共三万多人，九月三日从归绥出动，来解大同之围。敌人集中三个师的兵力，首先沿平绥线迅速东进，猛攻卓资山。我们原来估计傅作义不会出动那么快，敌人要是进攻卓资山，估计独一旅可以守三天，我们派部队打援也来得及。不料傅作义部来得快，兵力也大，独一旅苦战了几个小时，损失很大，卓资山便告失守。在得知傅作义部出动时，我即同晋察冀军区副司令肖克一道率晋绥三五八旅和晋察冀的肖应棠旅等部驰援卓资山，我们还未赶到，卓资山已失守。我们根据已变化的敌人情况，决定首先消灭傅作义增援部队后再打大同，由杨成武指挥晋察冀第三纵队和接替三五八旅的晋绥独二旅等部队，继续围困大同。由我和罗瑞卿指挥晋绥三五八旅和晋察冀第二纵队肖应棠的四旅、教导旅临时组成的陈正湘纵队集中打绥，并急调杨得志、苏振华的晋察冀第一纵队向集宁增援。敌人占领卓资山以后，中央军委的电报估计敌军可能有三种动向。一是在卓资山呆着不动；二是向凉城推进；三是进攻集宁。我们决定在麦胡图附近集结部队，以观其发展。七日，我各部队尚未到达麦胡图地区，即发现傅作义部的暂编十一师、十七师、新编三十一师，已从卓资山向集宁推进。我打援部队即急速转向集宁前进，指挥部和先头部队九日赶到集宁南郊。十日上午八点，我先头部队在集宁西南山地和敌人警戒部队接触，以声援集宁守城部队。敌人三个师攻集宁城，我守城部队仅为绥蒙军区两个由游击队编成的小团，并指挥二十七团，集宁又没有完整的城墙，我军只能依据工事，英勇抗击从西面、南面攻城的敌人。当天，三五八旅和独一旅经过上百里行军赶到集宁城，立即投入战斗，夺取了敌人的几个警戒阵地。十一日，陈正湘纵队四个团也到达了。当夜，晋绥独一旅、三五八旅、陈纵队包围了攻城的敌军，并发起攻击，把敌十七师、十一师击溃，歼俘敌人一部。杨苏纵队当天到达集宁附近。十二日中午，敌三十一师和十一师残敌在飞机配合下，攻占集宁

城西南角，城内情况很困难，我们调杨苏纵队一个团进城增援。与此同时，敌人后续的一一师和三十二师逼近集宁。负责警戒的陈纵队一个团没能阻住敌人，独一旅和三五八旅一部回过头来阻击敌人，和敌人打成对峙。十三日，由于联络不好，陈正湘纵队误以为独一旅和三五九旅撤走了，便自动绕集宁城向东撤退。陈纵队这一撤，攻城的敌军得以恢复阵地，并和一一师、三十二师会合，敌新编骑兵第四师也接踵而来，敌人的兵力骤增到六个师。我军守城部队伤亡较大，难以坚持战斗，再调杨苏纵队进城已来不及了，而且军委曾电示杨苏纵队伤亡不宜过大，我军遂于十三日晚主动撤出集宁。集宁打援失利，大同已经打了一个多月，不能再攻了，也只得撤围，大同战役到此结束。这次战役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目的，使张家口处于受敌东西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战役没有打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当时我军正处于由抗日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阶段，不少部队刚由游击队编成，战斗力不强，打运动战尚不成熟，就打大规模的攻坚战，是很勉强的。其二，这次战役具有初战性质，不慎初战，一开始就张大口去打有坚强设防的大同，未能发挥我军打运动战，打小据点的长处。如果先打下应县、怀仁等据点，逐步消灭掉大同外围据点的敌人后，再集中兵力攻城打援，这样夺取大同的时间虽然长些，但打下大同的把握可能要大些。其三，当时有夺取敌占城镇的风气，卓资山、集宁反成了我们的包袱，若不守卓资山和集宁，把晋绥的一万部队集中起来，配合晋察冀部队打运动战，会主动得多。按我军所长，坚守卓资山、集宁都是失策的。其四，我军装备太差，大同矿区虽有大量炸药，没有利用来炸敌人的碉堡，以弥补我炮火不足的经验。战士们虽然打得很英勇，然而仅靠手榴弹、云梯来攻坚，结果连敌人外围的防御工事也扫不动，以致作战时间拖延了一个月，使敌人有充分时间准备增援。其五，对大同守敌和傅作义增援均估计不足，战术上轻敌。如大同敌军战斗力虽然不强，但设防坚固，而我军未能集中兵力，形成压倒优势，逐个歼灭守敌，将敌人主力消灭于城外和郊区。对傅作义增援没估计到他会倾巢出动，而且来得那么快，事先没有充分准备。整个战役准备仓促，只给了十天准备时间，在阳高会议之前有的部队已经打起来了，临时搞指挥机构，地形没来得及看，部队情况不熟悉。通信联络也没有搞好，主要靠参谋人员送信传递命令，敌人逼近集宁的报告收不到，给陈正湘纵队的命令发不出去，在集宁城下错失歼敌的良机。总之，没有达到中央军委指示的“精心计划，充分准备”的要求。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提出了我军的根本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也是给我们回顾和总结大同、集宁战役提供了依据。303

## 保卫延安

大同撤围以后，我率领晋绥的三五八旅和独一旅从集宁经丰镇，转移到大同、阳高、浑源之间地区，监视大同、应县的敌人，并做地方工作。大同守敌马占山部曾出来活动，我们在阳高西南截击该敌，由于地形的限制，未能围歼敌人，只将其击溃，残敌退回大同城去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番号，将晋绥部队统编为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第一纵队由我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贺炳炎任副司令员，王绍南任参谋长，冼恒汉任政治部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下辖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司令员率三五九旅从中原突围回到陕甘宁边区，不久即到吕梁军区任司令员），彭绍辉任副司令员，唐健伯任参谋长，王恩茂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委李铨；吕梁军区组建的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第三纵队是稍后成立的，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委，李夫克任参谋长，杨尚高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独立第二旅，旅长唐金龙，政委罗志敏；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委孟昭亮；独立第五旅，旅长李夫克兼，政委王赤军。

这时，国民党军队继续向解放区进攻，胡宗南集团抽调了十个旅和一个装甲团，企图偷袭延安，消灭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迎击敌人，中央军委急令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调驻陕甘宁边区。我们接到命令以后，立即从阳高附近开往临县，在那里补充物资弹药。贺龙同志从兴县赶到临县，对部队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粉碎敌人进攻延安的阴谋，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

我们晋绥第一纵队在临县休整了几天，便出发赶赴延安。部队从碛口渡过黄河，经吴堡、绥德，于十二月初到达延安，住在延安南边的七里铺进行休息整训。十二月七日，全纵队在飞机场召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动员大会。我们接到通知，毛主席要前来检阅部队，我和纵队其他领导在清凉山下静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林伯渠等领导同志乘汽车到来，我立即上前去向毛主席作报告。随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很高兴地冒着寒风检阅了部队。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检阅和慰勉，给了全体指战员莫大的鼓舞。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合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全野战军共六个旅，两万六千多人。我被任命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委，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为政治部副主任。

二月十九日，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等部在胡宗南部八个旅的三面合击下，大量杀伤敌人后，主动撤出关中分区。胡宗南又以其十七师四十八旅、七十六师二十四旅和一一四旅、新一旅、骑兵第一旅等，共五个旅兵力直取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企图吸引我军西调，然后集中主力袭击延安。中央军委决定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组成防御兵团在东起临镇，西到鄜县地区，保障延安的安全；集中第一纵队和新四旅、警备第三旅，打击进犯陇东的敌军，并相机出击关中国民党统治区，粉碎敌军袭击延安的计划。

三月二日，敌二十四旅、一四四旅进占庆阳，四十八旅进占合水。三月三日，我们第一纵队进到合水以东地区，这两股敌人又相继向回撤。据侦察报告：敌四十八旅南撤到西华池、板桥一带。我们决定在西华池围歼敌四十

八旅，以新四旅、三五八旅和独一旅一个团进攻西华池；独一旅一个团对板桥防御；警备三旅五团向赤城警戒。

我军于三月三日晚对住西华池的敌四十八旅突然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部分敌人阵地。但是因为对当地地形不熟悉，事先侦察不够周密，部队协同也不够好，未能集中兵力，坚持连续攻击。敌人在我军攻击的间歇中得以喘息，不断增修防御工事。敌人依托工事顽抗，我们打到四日晚，打成僵持的局面。五日清晨，敌二十四旅增援逼近，我军遂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没能全歼敌人，虽然击毙了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以下一千五百余人，我们的部队也有些伤亡。三月十日，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大批由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地区，向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宜川、洛川和宜君、耀县地区集结，无疑敌人要从这个方向进攻延安了。

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放弃延安，党中央、毛主席仍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并直接决策陕北我军作战的方针。南线部队进行机动防御，节节抗击，尔后主动撤出延安，达到骄敌之兵，使敌人误认为我军不堪一击，从而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集团，寻机歼灭敌人。

在这大敌压境的情况下，指挥陕北部队的贺龙同志正忙于处理晋绥的问题，不能赶回陕北。当时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同志，主动请缨，向中央提出由他来指挥陕北的两万多部队和十倍于我的敌人作战。中央军委当即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所有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指挥。三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当时，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和地方武装在延安以南六七十里的临镇、金盆湾至牛武、茶坊一线组成第一和第二防御地带。军委命令第一纵队和新四旅、警备第三旅等部迅速从陇东赶到甘泉地区，构筑第三防御地带阻击敌人，掩护党中央机关和群众撤出延安。军委还命令晋绥第二纵队由晋西北兼程赶至延安以东地区集结。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集团在南线发起进攻。战斗一开始，敌人即使用了十五个旅十四万人，一天出动五十余架次飞机狂轰滥炸延安和边区城镇。敌人分左右两个兵团，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带领，从宜川、洛川出动，胡宗南亲到洛川坐镇指挥，他狂妄地叫嚷：“三天之内占领延安。”敌人第一线攻击部队十二个旅八万余人，以强烈的炮火轰击我军阵地，然后以步兵轻装从荒山中开路，以密集队形蜂涌地向前冲。敌人的进攻首先遭到教导旅、警备第七团的抗击。敌我兵力虽然众寡悬殊，然而边区军民士气高昂，由于军委正确领导在敌人进攻之前赢得了构筑防御工事的时间，全体军民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战斗口号鼓舞下，积极利用山地、梢林，顺着山顶构成支撑点，有些地形改造成断崖陡壁，构筑了宽大正面的野战防御阵地。延安直属分区的民兵、游击队埋设地雷、破坏道路，配合部队开展游击战和爆炸运动。第一纵队从三月十五日起和敌人接触，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与敌人寸土必争，白天以少量兵力固守要点，适时实施反冲击，夜间以夜战的特长不断袭击敌人。

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很大伤亡的代价，每天只能推进几里地，敌人三天之内占领延安的狂妄计划失败了。直到十八日黄昏，我们接到通知，延安的中央机关和群众已全部疏散转移完毕。第一纵队当夜撤到延安，十九日晨撤出延安。十九日上午敌人占领延安。

胡宗南占领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但骄傲得不可一世，大肆宣传其重大



“胜利”，狂妄地叫嚷：“中共已成流寇”，“共军不堪一击”。蒋介石也高兴得手舞足蹈，除表示“嘉勉”要亲自到延安视察以外，并命令胡宗南尽快寻找“共军主力决战”。我第一纵队于十九日撤出延安以后，即大摇大摆、浩浩荡荡地向安塞方向开进，并令独一旅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和敌人保持接触，使敌人误认为我军主力开往安塞，诱使敌人主力北上。而第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等部队却隐蔽地集结在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一带待机。

独一旅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积极行动，坚决执行把胡宗南的“牛鼻子”牵到安塞的任务。果然，胡宗南误以为我军主力在安塞，急忙带着他的指挥所从洛川赶到延安督战，命令其第一军军长董钊率精锐部队整编第一师三个旅、整编第九十师两个旅沿延河向安塞攻击前进。二营看到敌军行进速度放慢的时候，就朝他们打冷枪，敌人立刻追击，加快了行军速度，战士们叫做“枪打慢牛”。就这样二营在三月二十四日把敌人牵到安塞。就在胡宗南这五个旅出发之前，我们得到群众和侦察员的报告，前伸到延安东北拐峁村的敌三十一旅正在打听前往青化砭的路程，并在准备干粮，大有要前进到青化砭设据点来保障其侧翼的可能。彭总根据这种情说决定在青化砭至拐峁的延榆公路伏击这股敌人。当即命令我第一纵队赶到公路以西，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埋伏在公路以东，新四旅从青化砭向南，布成一个口袋阵。三月二十四日拂晓，各部队进入设伏阵地，第一纵队以三五八旅参加伏击，独一旅对延安和安塞的敌人进行警戒。指战员在冰雪还未消融的阵地上趴着，从拂晓等到中午，也不见敌人的影子。是敌人发现了我军动向了吗？这是决不可能的，我们部队行动隐蔽，民兵和群众也严密封锁了消息。黄昏时，接到野司的通告，敌人在拐峁因没有备齐干粮，把出动日期向后推了一天，各部队回集结位置休息。三月二十五日拂晓，部队又进入伏击阵地。上午十时，敌整编三十一旅旅部和所属第九十二团全部进入伏击圈。二纵独四旅迅速封住“口袋口”，新四旅在北面向下压，东西两边山上的部队勇猛向下冲。一时军号嘹亮，枪炮齐鸣，手榴弹和炮弹在敌群中开花。这些负荷过重的敌军士兵，本来已经累得走不动了，突然遭到伏击，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完全失去指挥。经过一小时四十七分的激烈战斗，敌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以下官兵二千九百余人全部被歼，无一漏网。我军撤出延安才六天，就取得了胜利，指战员们无不欢欣鼓舞。战斗结束后，部队转移到蟠龙西北待机。

部队进入驻地以后，周围群众牵羊抱鸡，带着各种物品前来慰劳，一定要部队收下，群众说：“你们不收，国民党兵就会抢去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指战员产生了“宁肯我们自己吃掉，也不留给敌人”的错误思想。他们不经领导批准，随便收群众的东西，个别的甚至不付钱。野司发现了这些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后，为了加强军民团结，决定利用战斗间隙，整顿纪律。批评了“宁肯我们自己吃掉，也不留给敌人”的错误思想，纠正了军队中一切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青化砭战斗之后，胡宗南才发现我军主力不在安塞方向，急令整编第一军和二十九军掉头向东。敌人以十个旅七、八万人马，摆开几十里方阵，经青化砭一直推进到延川、清涧，游行了四百多里，结果扑了个空。四月三日，敌人主力又向西折返，占领了子长县（瓦窑堡），敌人大游行，处处扑空，战线长补给困难，弄得精疲力竭，士气沮丧。四月五日，敌军除留一三五旅守备子长县外，主力南下青化砭、蟠龙进行粮食补给。四月十二日，胡宗南令其一三五旅从子长南下，敌二十九军、一军从蟠龙、青化砭出动接应，企图寻歼我主力部队。野司得知敌人动向以后，决心来个

“虎口夺食”，命第一纵队抗击敌两个军，把敌人主力引向蟠龙、子长大道以西；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在敌一三五旅南下必经的羊马河设伏，将敌一三五旅一举歼灭。四月十三日，彭司令员就召集各纵队、旅的领导，到子长西南后四湾野司开紧急会议，我们挤在一孔小土窑里热烈讨论。彭总说：第一纵队能不能把九个旅的敌军主力堵住、调开，是这次战斗胜败的关键，否则我军还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会后，我们立即返回部队，进行紧急传达，组织行动。我们第一纵队的三五八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一线组织防御，担负牵引敌第一军五个旅的任务；独一旅并指挥警备七团在云山寺、元子沟一线担负阻、牵敌第二十九军四个旅的任务。当天，三五八旅就与敌人接触，按“每天只让敌人前进五至十里”的命令，采取机动防御，以少量兵力将敌人五个旅阻于李家岔、上白家坪、宋家沟一线。四月十四日清早，敌一三五旅离开子长县，彭德怀司令带王政柱副参谋长专门赶到独一旅旅部，察看地形，反复强调要打好阻击。我到独一旅时，彭总已经离开，王尚荣旅长说：“彭总一再叮嘱：要把董钊、刘戡的牛鼻子牵得越长越死，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如果能把二十九军阻击在羊马河以南，这次歼灭敌一三五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了一半。”上午，敌军遮天盖地扑向元山寺、元子沟，敌人炮弹掀起的尘土，弥漫了这一线的黄土山头。独一旅各团以班排为单位占据着各个山头，控制着每条沟渠和道路，机枪、手榴弹把敌人打得乱成一团。独一旅成功地将敌二十九军阻在这一线，前进不得。与此同时，三五八旅将敌第一军向西引到凉水湾、孙李家沟一线。

午后，野司的骑兵通信员送来通报：上午十时，敌一三五旅进入羊马河我方伏击圈，第二纵队、教导旅和新四旅迅速合拢包围圈，正在围歼中。这时，敌二十九军才派出一部向羊马河以南靠拢，在警七团和二纵独四旅一部阻击下，虽和敌一三五旅仅隔一道山梁，终于未能挽救一三五旅的覆灭。下午四时，敌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全部被歼，敌代旅长麦宗禹和两个团的团长被俘，首创了我军全歼敌一个整旅的战例。我第一纵队也给敌第一军、二十九军以重创。

傍晚，我们除留侦察部队和敌人对峙外，主力迅速秘密地撤出阵地，向安定以北地区转移。敌一军、二十九军为寻找我军主力又在子长东南无粮无人地区游行数日，到四月二十日，才疲惫不堪地回到蟠龙、永坪地区休整补给。在敌返回途中，我军在新岔河袭击敌一六五旅，使其伤亡二千余人。

四月下旬，蒋介石不知从哪里弄到的情报，说“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已开始东渡黄河”。他急忙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延榆公路北进，邓宝珊部由榆林南下，要将我军一举歼灭在葭县（今佳县）、吴堡地区，或逼我东渡黄河。胡宗南即倾全部九个半旅，分两路于四月二十六日北上，只留整编一六七旅旅部率一个团，在蟠龙修筑工事，守备其前进补给基地。

野司令三五九旅一部，并抽各旅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的警备四团、警备六团，节节抗击，引诱敌人北上。担任诱敌北上的这些部队，一路上丢下一些符号、臂章、破旧衣物等东西，装出一种许多部队溃逃的景象，并在黄河沿岸布置要渡河的假象，迷惑敌人。敌军排成纵横几十里宽的方阵，又开始大游行了，本来干旱少雨的陕北，这时也凑热闹下起小雨，泥泞不堪的黄土高原，使敌军吃尽苦头。敌军游行了七天终于到达绥德，董钊、刘勘还兴高采烈地给胡宗南发报，说“共军溃不成军，……我全部兵力南北夹击，当将共军主力压至黄河边，一举歼灭之。”

敌军主力北上后，蟠龙之敌成了一个孤点，野司命我第一纵队集结到蟠龙西北的核桃坪地区，二纵独四旅集结于蟠龙东南的何家峁子，新四旅集结于蟠龙东北的卧虎镇，伺机攻歼蟠龙守敌。守备蟠龙的敌一六七旅是胡宗南的精锐，装备精良，蟠龙周围修有很多地堡、碉堡工事，形成交叉火力网，有交通壕、外壕连接，阵地之间可以互相支援，各种火器都有精密的射击计划，其主力北上之后，敌人又冒雨继续加修工事。所以，这一仗是啃骨头的硬仗。

野司决定各部队于四月三十日进入攻击准备位置，五月一日发起攻击。我们纵队领导研究决定，全纵队同时由核桃坪地区向东南攻击，三五八旅先攻北山田子院，续向蟠龙北山攻击；独一旅在右翼先攻老庄南北山各阵地，续向辛店北山小庙梁攻击。五月一日，当部队准备攻击时，突然下起大雨，整日不停，部队行动不便，只得将攻击计划推迟一天。五月二日，天气转晴，这天正是敌军主力游行到达绥德，黄昏时分，部队开始向前运动，接着发起冲击，三五八旅攻占田子院寨子和蟠龙西北敌军阵地，独一旅歼灭老庄、新庄各高地敌人，乘胜向小庙梁、磨盘山攻击。新四旅和二纵独四旅也分别从蟠龙东北、东南发起攻击，向前推进。五月四日，我军采用对壕作业和爆破技术，破坏敌人的工事障碍物，瓦解了敌人的防御体系，残敌放弃碉堡逃入蟠龙镇。四日黄昏，我军对蟠龙镇发起总攻，在轰隆的枪炮声下，各部队由四周居高临下，冲入蟠龙镇街区，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镇内守敌全被消灭。这次战斗，全歼敌精锐一七六旅旅部及四九九团，取得了攻坚作战的经验，毙伤俘敌六千七百余人，活捉胡宗南的“四大金刚”之一，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了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粮食、军衣等许多军用物资。蟠龙守敌被歼，延安的守敌吓得丢魂落魄，胡宗南急令董钊、刘戡带其整编一军、整编二十九军回援。但是远在绥德的数万敌军，失去了补给，几天的路程连饭也没得吃，胡宗南只得派飞机空投接济，这两个敌军才于五月五日放弃绥德南返。独一旅二团一营又紧跟着敌人的屁股追，不断袭击敌人，还抓了些俘虏，弄得敌人不敢走大路，天天爬山路；不敢住窑洞，夜夜露宿山头。敌军因为群众坚壁清野，一路上寻不到粮食，只能吃些面疙瘩汤，军衣也挂得破破烂烂，狼狈不堪。五月九日，这些敌军回到蟠龙，看到的是一六七旅覆灭的悲惨景象，而我军早已转移到安塞地区休整了，胡宗南摸不着头脑，只得干瞪眼。当年新华社记者评论蟠龙战役时附了一首打油诗，深刻地讽刺了胡宗南愚蠢无能的处境：

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去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

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象狗熊；

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我军撤出延安一个多月，把敌人弄得十分疲惫、缺乏粮食，我军取得了三战三捷，这是毛主席提出的“蘑菇”战术的胜利，坚定了边区军民打败蒋介石、胡宗南的信心。

## 从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

蟠龙大捷之后，胡宗南集团“游行”了两个多月，损兵折将，粮食补给困难，士气低落，疲惫不堪，虽然已侦察得知我军主力在安塞、真武洞、龙安地区休整、但已无力再战，只得将其部队集结在蟠龙、青化砭、拐峁地区补给休整。就在我军和胡宗南集团作战的时候，青海、宁夏二马部队侵入我陇东、三边分区，并分兵进行“清剿”。我军在安塞地区龙安镇休整，因胡宗南集团大肆抢掠破坏，粮食供应很困难。野司决定集中主力歼灭二马的有生力量，然后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调动胡宗南集团，继续寻机歼灭敌人，并解决粮食问题。五月十九日，经侦察查明胡宗南集团的主力部队仍在休整未动；青海马步芳的陇东兵团整编第八十二师师部和第一百旅驻在西峰镇、宁县地区，骑兵第八旅驻庆阳、合水、西华池地区；宁夏马鸿宾海固兵团整编第八十一师师部、暂编第六十旅驻环县、蒋台、元城镇地区，第三十五旅驻羊圈山地区，骑兵第二旅驻大钵、曲子、悦乐、阜城地区；马鸿逵宁夏兵团整编第十八师分驻在盐池、定边、安边一线。五月二十一日，我军各部队作好准备之后，我率第一纵队为右路，从龙安镇出发；新四旅和野战军直属队为中路，从真武洞出发；第二纵队和教导旅为左路，从安塞出发；一起向陇东开进。西北野战军经过八、九天艰苦的行军，越过陕甘交界人烟稀少、梢林遍地、一片荒凉的子午岭。我第一纵队在五月三十日，向蒋台的敌军据点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第八十一师六十旅的第一七九团，活捉了上校团长马奠邦。马奠邦是马鸿宾的女婿，我们将他押送野司，彭德怀同志为了做马鸿宾的工作，经过一番教育，把他放了回去。我军中路部队也攻下了悦乐，消灭了敌骑兵第二旅第三团；左路部队围攻合水，给守敌以杀伤，并击溃了从庆阳来增援的敌第八十二师。我军突破了敌人经营数月的一百六十多里防线，为向北发展打开了缺口。这次出击，野战军一些部队产生了轻敌急躁情绪，同青马第一次交锋，对青马部队的宗教统治、宗族关系、士兵愚昧顽强认识不足，造成不应有的伤亡。根据当时敌情，野司决定进攻环县，围城打援。野司部署，我第一纵队由城东北到城东南，新四旅由城西南到城西北围攻环县城；第二纵队在城东南和西南协助攻城并打援；以教导旅在环县以西准备打击增援的敌独立骑兵第五团；陇东分区独立团在三岔和驿马关进行游击活动；陇东骑兵营对洪德城方向警戒。

六月十三日，第一纵队到达指定阵地。十四日在环县西北配合新四旅击毁向环县赶运物资的十几辆敌军汽车。驻守环县的敌第八十一师全部缩到环县城里。环县城当时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城西的王家原是敌人主阵地，打下这个阵地，就可以居高临下，用迫击炮打环县城，敌军就很难固守了。六月十五日，总攻环县开始，第一纵队三五八旅在第二纵队独四旅的配合下，经过一昼夜的激烈争夺，于十六日上午，胜利地攻占了敌人的主阵地王家原，新四旅同时攻占了玉皇山。敌人全线动摇了，下午一时，敌人扔下了山炮、野炮、平射炮等重型武器和装备物资，集中全力从第二纵队三五九旅和第一纵队独一旅的结合部城东原突围逃跑。三五九旅一直追到洪德城附近，除了部分骑马的军官和骑兵逃脱以外，其他残敌全部被截住。这次战斗，西北野战军给予敌第八十一师歼灭性的打击，缴获了敌人全部重型武器，这都是马鸿宾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血本。

宁马第八十一师的惨败，使胡宗南十分震惊，急忙将主力部队调到固原加强防御、控制宜君以西地区，防止我军出击关中和陇西。根据当时的形势，

野司决定在雨季和暑天到来之前收复三边。三月中旬，当胡宗南逼近延安的时候，马鸿逵即倾巢出动进犯我三边分区，并企图长期统治这一地区。六月二十五日，我军即隐蔽从环县北进。二十九日，部队走进荒漠苦水地区，冒着塞上暑大的酷热，在烤得发烫的沙漠地带，忍着干渴走了一整天，到达定边南山。三十日，第一纵队和新四旅立即向定边发起攻击，教导旅到定边西南截击可能向西逃跑的敌人。老奸巨滑的马鸿逵吸取了第八十一师在环县惨败的教训，命令他的部队保存实力不战而逃。当我军部队接近定边城郊的时候，守敌骑兵第十旅第二团即放弃定边县城，绕到长城外面逃跑。因为我们都是步兵，而敌人是骑兵，追击了一阵，还是被他们跑掉了。这大第二纵队也攻占了砖井堡。七月二日，第二纵队独四旅攻占安边。七月七日，第一纵队继续西进，攻占盐池城，歼灭敌骑兵第二十团一个连，敌人向西退走，至此三边分区全境收复。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党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陈赓、马明芳、贾拓夫等同志，我也参加了会。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和部署我军向全国的战略进攻，以及在战略进攻中三路大军相互配合的问题。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把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并作出相应的决议：由陈赓率领太岳兵团。向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开辟豫陕根据地，东向配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西向配合西北野战军，东西机动作战；西北野战军北上出击榆林，继续把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拖住。

七月二十二日，西北野战军从三边先后东移到子洲县的水地湾、双湖峪等大小理河一线集结。中央军委命令晋绥军区的许光达第三纵队率独二旅、独五旅由葭县（今佳县）以北西渡黄河，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这样我军参加榆林战役的部队共有八个旅，并指挥绥德分区警备四团、警备六团。由于榆林地区运粮非常困难，野司决定各部队都要轻装，每人都携带四至六天的粮食，后方再继续筹集粮食供给。八月初，我第一纵队并指挥绥德分区第四、第六团经由武家坡，北渡无定河，向榆林攻击前进。兄弟部队也同时攻击，在两天之内就扫除了榆林守敌设在东起神木高家堡，西到横山响水堡，长达二百余里防线上的大部分外围据点。八月六日上午九时，我第一纵队在第二纵队协同下攻占三岔湾，全歼敌新十一旅二团和第二十八旅八十二团二营和团属卫生队。七日，我们乘胜攻占城南高地和飞机场，并包围城西南部；第二纵队绕到城东，包围了城北和城西北部；新四旅包围城东南部；第三纵队推进到城东，我军完成了对榆林的包围。

榆林，是国民党设在晋陕绥边境的一个反动堡垒，守敌是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等一万五千余人。榆林地处长城线上，西面为广阔的沙漠，北、东、南三面环山，山上高地多为沙丘，不易构筑工事，榆林城墙坚厚，猛一看好象城墙很低矮，容易攀登，其实是城墙外堆积很高的沙丘，沙上不易运动。榆林城外有凌霄塔、观井滩、无量殿等坚固据点，构成火力网，总的来说，榆林城易守难攻。十日我军开始攻城，我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打开了小西门，第三营九连迅速登上城墙。但是因为突击队的指挥员未到前面指挥，使第二梯队和第一梯队失掉联络，未能跟着进城。第九连在城上孤军作战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反冲击，坚持到第二天拂晓，只得退出城外。其他部队攻城北门和东门，用强攻和爆破都没有成功。

蒋介石得知我军围攻榆林，深怕榆林丢失，宁夏就会孤立，胡宗南一旦失去北面邓宝珊的配合，也必然影响西北整个战局。他急令胡宗南以十个半旅六万三千多兵力，分路北进，并以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组成援榆“快速兵团”，沿长城外沙漠地区，取捷径日夜兼程，来增援榆林。

我军得到胡宗南部北进的情报，估计敌人沿咸榆公路经响水堡、归德堡北上的可能性较大，准备在归德堡地区打援。十一日夜里，部队再次攻榆林城，因为仓促准备爆破，药量不够，也没有成功。没料到敌第三十六师五个团，避开我军阻援部队。十一日晚间逼近榆林。野司认为我军已经达到了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赓兵团准备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目的，我军在榆林已来不及调整部署，为取得主动，果断地决定部队撤出榆林战斗。野司命令第二纵队向长乐堡移动，诱敌北进，其他部队在十二日向榆林东南方向隐蔽集结，待机歼敌。第一纵队转移到归德堡以东的万家寺一线山区集结。

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西北、榆林东南集结，西、北两面都是沙漠，东侧为黄河，地区狭小，没有回旋余地，粮食补给尤其困难。野司为了保障后方机关安全并迷惑敌人，决定以一个小部队掩护西北局机关和后方医院等单位，迅速东渡黄河。果然，敌人根据空中和地面侦察，误认为我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胡宗南欣喜若狂，下令“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钟松率第三十六师在十二日进到榆林城以后，第二天即掉头南下，这家伙自恃“援榆有功”，骄横异常，叫嚣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刘戡率第二十九军和第一军九十师由绥德向葭县北进，妄图和钟松夹击我军在葭县西北地区。

形势非常严重，我军背靠沙漠，侧水侧敌，党中央机关处在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野司派第三纵队立即接应中央机关，转移到葭县以北的安全地带。部队缺少粮食，有一段吃黑豆、糠粃，甚至宰杀驮运行李的骡马充饥。全体指战员不顾饥饿、疲困和艰险，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八月十七日，刘戡部继续向葭县逼进。而头脑发昏的钟松竟远离主力孤军冒进，他以第一二三旅附第一六五旅的四九三团为前梯队，从镇川堡向沙家店以东的乌龙铺前进；第三十六师师部和第一六五旅为后梯队，向沙家店及其以东前进。野司注意到敌三十六师孤军冒进，并拉成一字长蛇阵，这是极好的战机，决定在沙家店地区伏击歼灭该师。我第一纵队集结在高柏山、老虎圪塔地区，任务是协同第二纵队在沙家店地区围歼敌军后梯队。第二纵队由北向南进攻，我第一纵队绕到沙家店西南地区，由西南向东北进攻。我们命令各部队在十八日上午由老虎圪塔一线向前运动，以独一旅三十五团进到沙家店以西白家担任抗击镇川堡可能来援的敌人，同时堵击敌三十六师逃向西面的残敌。十八日上午，部队向指定地点开进。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霎时间狂风大作，闪电雷鸣，下起瓢泼大雨来。狂风暴雨引起山洪爆发，满山遍野变成白茫茫的一片汪洋。部队只得停止行动，集结在一些山头、高地上，有些战士把衣服脱下来裹在机枪上，怕把机枪弄上泥水、宁可光着膀子冷得直打哆嗦。直到黄昏以后，风雨才逐渐变小，各部队都抓紧时间休整，准备战斗。

十九日上午，敌刘戡部还在葭县以西的神泉堡。下午，钟松率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第一六五旅（欠第四九三团）进到沙家店以东，在泥沟则以北、张家坪以南构筑工事，并电令其在乌龙铺的第一二三旅，连夜向沙家店靠拢。但是敌一二三旅怕黑夜里行军会遭我军伏击，当夜只令配属他的第一六五旅四九三团先走，该旅原地不动。

十九日黄昏前，风头转了方向，吹起东南风，乌云散开。山头上、山沟里，腾起白蒙蒙的雾气。黄昏以后，一路路部队，在山头上和沟渠里，向沙家店地区运动。二十日拂晓，敌四九三团和钟松会合。我们原计划是等敌人离开阵地东进的时候，在运动中将其歼灭。但是，当我们按计划规定时间发起攻击时，敌人还未出动，就打成攻坚战。独一旅七一四团第一营对均家沟以南的敌阵地攻击，一举攻占了敌人防守的有一座古庙的高地。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也攻克了沙家店以东高山阵地。打到上午十时，几架敌机飞来助战，地面敌军乘机反扑，我第一纵队各部队把敌人打了回去，并乘胜夺取了均家沟以南几个高地，独一旅主力攻占了沙家店东南的郝家岩敌阵地。敌一二三旅在当日凌晨四时从乌龙铺向沙家店开来，他们不敢走大路，而是沿着山梁走。当敌一二三旅走到常高山的时候，被教导旅和新四旅包围在常高山附近。

这样敌三十六师被我军分割包围，切成两块。下午一时，彭德怀司令员发出歼敌动员令：“彻底消灭敌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发扬你们无限英勇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的完成战斗任务！”我们马上将这一动员令转达给部队。

部队接到野战军首长的战斗号召后，全军振奋，个个奋勇争先，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击。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密切配合向敌三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五旅阵地攻击。战到下午五时，各路攻击部队已占领敌人主要阵地。但是由于有些部队迂回的路程较远，又加上大雨之后道路泥泞，未能将敌人的退路全部堵死，敌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和第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得以带少数人逃掉，其余敌三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五旅全部被歼。当天黄昏，新四旅和教导旅也将敌第一二三旅全部歼灭。沙家店战斗，我军共毙伤俘敌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等共六千余人。

在西北野战军围歼敌三十六师时，镇川堡的敌人曾东来增援，被独一旅三十五团击溃。第三纵队和绥德分区第四、六团在乌龙铺阻击刘勘亲自率领来增援的两个半旅，歼灭敌人一部，保证了沙家店歼敌。

战后八月二十三日，野司在前东原村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从离沙家店仅四十多里的梁家岔，骑马来到前东原村。毛主席在旅以上干部会上讲了话，他高兴地说：这一仗打得好啊！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西北野战军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吃掉了敌人一个师，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它将使西北形势很快发生变化。彭德怀司令员接着说：这一次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得好！也是全军指战员共同奋战的结果。明天陈赓兵团就要由潼关以东跨过黄河，这样潼关告急，西安吃紧，胡宗南必定会叫刘戡、董钊率兵南窜。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不顾一切疲劳和困难，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乘胜追击敌人。

## 准备转入外线作战

一九四七年七月底，根据中央小河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前委，野战军领导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全军已增至五万人。沙家店战役以后，陈赓兵团在八日二十三日胜利南渡黄河，出击豫西，直逼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集团处于南北两面作战，潼关、西安一线空虚，胡宗南不得不令其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南下，对陕北采取防御。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拖住胡宗南的主力，不使其南下，并准备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向关中进军。野司认为敌军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仍处于优势，但在三十六师被歼之后，敌人士气低落，八个旅挤成一团，在解放区内只能靠空投补给，困难很大。如果敌军很快撤退，我军在其南撤途中寻机歼敌是可能的。估计敌军一定沿咸榆公路南撤，我军可以沿公路东侧平行追击，虽然侧水侧敌，但河东可以供应粮食，根据地群众可以支援部队。野司决定如敌南下时，即以主力沿咸榆公路以东前进，以一部沿咸榆公路以西策应，沿路追歼敌军。八月二十四日，敌军除派出小部队向北佯动迷惑我军，主力部队则开始收缩，准备很快南撤。野司决定我军主力争取先敌南下，每人携带三至五天粮食，并在行军预定路线上设立兵站，在无定河渡口准备船只。八月二十七日敌军开始沿咸榆公路南撤，八个旅分为四个梯队，紧密靠拢，交替掩护，每天只走十到十五公里。这时秋雨连绵，山道窄小又泥泞，敌人给养无着落，我游击队、民兵沿途袭扰，使敌惊恐万状，疲惫不堪。我军主力在敌人南撤不久，即沿咸榆公路以东追击，第二纵队南渡无定河，沿公路西侧追击。我们采取追击、截击、阻击的战法，第二纵队于九月九日在延川西北伏击歼敌整编七十六师及一六七旅一个营又一个连，击毁汽车二十二辆、坦克五辆，并予敌整编第一师以重大杀伤；九月十一日，绥德分区的警备第四团、警备第六团追击由霞县南撤的敌四三一团歼敌三百余人。我军的追击迟滞了敌人的行动。

九月十三日，敌整编第一军整编九十师附一四四旅的四三团进至永坪以西地区，敌第一军军部、第一师和二十九军进到延川以西，继续向关庄、岔口村前进。野司决心在关庄、岔口抗击敌先头的第一军，追击、侧击第二十九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部分敌人。九月十四日，我第二纵队开到永坪和岔口之间，野战军其他部队集结在关庄以南，当敌军沿大相寺、关庄一线高地齐头并进时，上午九时，我第一纵队、第三纵队、新四旅、教导旅分四路由南向北进攻。敌人遭到攻击立即停止前进，以团或旅为单位分别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据守。敌人龟缩在纵横十五里的地区，而我们只有少数先头部队展开攻击敌人，后续主力还在行进中，因而失去战机，未能割裂歼灭敌人，和敌人对峙了一天。野司决定改变计划，停止进攻，让出敌人西撤的道路，放过其前梯队两个旅以后，再截击其后梯队。

九月十五日下起大雨来，敌人仍在原地构筑工事，加强防御，没有行动。十六日早晨，敌人以密集队形向西撤退，先头部队还向岔口东北的第二纵队阵地攻击。第二纵队放过敌人前梯队后，即由北向南进攻，第一、第三纵队由东向西追击，新四旅、教导旅沿关庄、岔口以南高地向西追击。但是因为截击的敌军有几个旅，队形密集，不易分割包围，我军也拥挤到一起，建制混乱，指挥不灵，只给敌第十二旅、五十五旅以重大杀伤。十七日，永坪的敌九十师已前进到岔口以西的大沙圪塔接应，敌人主力交替掩护撤退，控制



了有利阵地半佛腰观。我军遂结束了追击战斗。这次战斗歼敌四千多人。敌人南撤的主力部队直到九月二十日才抵达延安地区，狼狈不堪急需休整补给，不能继续南下西安、潼关了，我军达到了拖住胡宗南集团的预期目的。这样，敌主力八个旅集结在延安、鄜县一线，绥德、子长、清涧、延川、延长百余公里交通线上只有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部和二十四旅，还有三十六师一六五旅残部等分兵把守。延安南面西起洛川、铜川，东至黄河的黄龙山区，敌人也只驻有六个团兵力。根据敌人分布的态势，野司决定第二纵队和刚由警备第一旅、第三旅和骑兵六师组成的第四纵队（王世泰司令、张仲良政委），南下黄龙山，进行外线作战，一面就粮，一面迷惑敌人，达到调动和分散唐集在延安地区的敌人主力，创造歼敌战机。野战军主力则仍在内线作战，消灭分散守备的敌军，消除尔后南进的后顾之忧。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野司决心发动延（川）清（涧）战役。当天，第一纵队攻占了清涧城南的三十里铺，歼灭敌七十六师辎重营一部；第三纵队和教导旅先后攻克延长、延川两城，全歼守敌两个营。这样就割断了清涧、子长、绥德的联系，创造了围攻清涧的有利条件。十月三日，彭德怀司令员在延川县马家店召开野战军前委会，研究打清涧的作战部署。会议认为我军攻清涧，延安敌军必然来援，绥德、子长的敌人也可能向清涧来。决定第一、第三纵队围攻清涧；新四旅进到青化砭、干谷驿以北阻击延安方向援敌；教导旅进到清涧以北的九里山抗击绥德方向的敌人；绥德警备区第四、第六团则监视和围困子长的敌人。确定各部队当天即开始行动，十月四日完成对清涧的包围。清涧城四面都是山，清涧河和咸榆公路由北向南沿城西笔架山下通过，城墙一半建在沟底，一半建在东山的山腰上，地势险要。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就令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师部和第二十四旅在这里担任守备，半年多来，敌军在城周防区里，修筑了大小五十二个碉堡，还有鹿砦、铁丝网、堑壕、地雷等重重障碍物，妄图凭险固守。野司决定第一纵队以独一旅由西向东，三五八旅由西南向东北；第三纵队以独五旅由东北向西南，独二旅由东向西发起攻击。后来又调新四旅十六团加强城东南的攻击力量。城西的马铺原敌人筑有坚固的集团工事，东南相连笔架山，这山南北长约一百五十米，两端有碉堡，中间四座小庙都有工事，周围都是难于攀登的悬崖，它的火力可以控制全城，实为清涧城的天然屏障，也是敌人守城的核心阵地。

十月六日，我军开始攻击，到七日攻克外围据点十余处。这时，清涧城里的廖昂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一天发几次电报向胡宗南呼叫求援。直到廖昂发出绝望的哀鸣：“再不救援，唯死与降耳”，胡宗南才慌忙于一月八日令刘戡带五个半旅由延安北援清涧。野司侦知刘戡出援，即令一、三纵队加紧攻城，并调新四旅十六团和绥德分区四、六团到永坪、曲思教以北参加抗击敌援军。

十月九日，敌援军进到永坪，离清涧仅一天的路程了，而清涧外围敌据点尚未肃清，尤其笔架山守敌两个连对我攻城部队威胁很大。主攻笔架山的三五八旅和独一旅二团，因受地形限制，在支援炮火不足的情况下，经数次冲击都没有成功。经过总结教训，攻击部队重新组织，进一步弄清敌人情况，选准攻击目标和道路。十日拂晓再次发起冲击，山炮准确地击中敌人主碉堡和堑壕地段，迫击炮、机枪压制了敌人火力，步兵很快占领了两端的碉堡据点，七时夺取了敌二层碉堡，十时全部肃清山上守敌，约五十余名敌官兵缴械投降。

为了保障攻城部队的安全，十日再调教导旅协同新四旅阻击敌援军，在七甲里、曲思教一线挡住了敌援军的轮番进攻。野司决定攻城部队于十日下午四时攻城，后来为了准备得更充分，推迟到晚九时发起攻击，限定翌日拂晓解决战斗。当晚第一纵队消灭了北门外的敌军地堡，攻占了制高点，利用爆破作业越过了外壕进入攻击位置：第三纵队五团在十点钟，以连续爆破炸开城东门，攻入城内。十一日拂晓，一纵独一旅三团在三纵独五旅十五团配合下爆破北门成功，部队也迅速冲进城，占领笔架山的部队用火力俯射城里敌军，巷战的枪声、喊杀声响彻全城。至十一日早七时我军将城内守敌全部肃清，歼灭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两个团和一些还乡团，俘敌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廖昂、少将参谋长刘学超、少将新闻处长曹锡武，二十四旅少将旅长张新等以下四千三百余人，击毙敌官兵千余人。战斗结束之后，野司决定下午就押着俘虏撤出清涧，转移到绥德地区休整。

在我军撤离清涧之时，刘戡的五个半旅在我军抗击下，被阻于仅距清涧城二十多里地。待我阻援部队撤开阵地之后，敌援军到十一日晚才抵达清涧城西高地，但又怕遭我军围歼，连城也不敢进，急忙北进九里山、骆驼铺，西折子长县，把守备绥德和子长的敌军接应出来，一同窜回延安。

第二、四纵队南下黄龙山区后，发起黄龙战役，一度解放了黄龙、韩城、白水、宜川等县，歼敌三千余人，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十月下旬，第四纵队撤至临固地区，第二纵队掩护弹药物资由圪针滩渡过黄河以东进行休整。延清、黄龙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延安守敌更为孤立，胡宗南还调董钊带第一军五个旅南下，以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十七师、二十七师、五十五旅和七十六师残部分散守备延安、甘泉、鄜县地区。野司认为我军向南进攻延安条件还不成熟，而北上消灭二十二军，夺取榆林、神木、府谷，扫清北线障碍，巩固我军后方，不仅可造成我军南下的有利态势，还能保障驻霞县神泉堡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党中央批准了野司进攻榆林的计划，并批准以教导旅和新四旅组成第六纵队，由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张贤约任副司令员；还由晋绥和晋察冀两区支援炸药、手榴弹和粮食等一批物资，调晋绥一个野炮排（二门野炮）来参加进攻榆林。榆林守敌经我军第一次打击之后，力量有所削弱，其二十八旅还空运西安防备我陈赓兵团，守敌只剩九千余人。我们觉得胡宗南集团已不可能再次增援榆林；绥远傅作义集团隔着几百里沙漠，来援兵力亦不会大；宁夏马鸿逵集团虽然离榆林较近，但封建势力为保存自己实力，增援也不太可能。根据这样的分析判断，我军二打榆林，是十拿九稳的了。

十月二十四日，第一、三、六纵队和绥德分区四、六团先后由绥德地区向榆林开进。第一纵队由下盐湾、西岔北渡无定河向三岔湾攻击前进，到二十七日分别围歼了归德堡、三岔湾等外围据点之敌。其他部队也扫清了五里墩、青云寺、金刚寺、无量殿、常乐堡等外围据点的敌人，并占领了飞机场，击毁了敌人一架运输机，将榆林城团团围住。三十一日，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独一旅和六纵队新四旅一部，采取爆破手段攻占了瞰制城南的三叉庙和凌霄塔两个坚固据点。

十一月二日黄昏，我军利用三叉庙和凌霄塔两处有利阵地，集中火力对榆林城进行强攻。由于我军一打榆林之后，敌人对城防设施进行了加强和改进，增加了一大批暗火力点，这新的情况我们事先侦察不够，没有发现：加之我军炮兵火力太弱，不能有效地压制敌人；所带的云梯长度不够，搭上城

墙就被敌人甩下来的手榴弹、迫击炮弹炸毁。因此，战到三日凌晨，仍然没有办法突破，野司下令停止强攻，改用挖坑道爆破来攻城。

从我们攻榆林起，蒋介石就命令归绥、太原、西安等地的空军助战，每天不下五十架次，不停地轰炸扫射。我军指战员冒着敌机的轰炸和地面的敌军炮火袭击，奋勇地在城东南的魁星楼进行坑道作业。

十一月六日，据侦察得知，蒋介石命令宁夏马鸿逵以整编十八师、骑兵第十旅、宁夏保安第一纵队等三万五千多人，组成“援榆兵团”从定边出发东进。邓宝珊在绥远虚张声势，叫嚷傅作义的暂编十七师要从包头南进援榆，但始终未见出动。野司命令部队加速坑道作业。十一月八日上午挖了六十米和一百二十米的坑道各一，晚十一时第二次发起攻城战斗，独一旅的坑道爆破成功，炸开一个二十米宽的城墙豁口，由于没有领导干部掌握突破口情况，攻城的第一梯队未能乘爆破瞬间即发起攻击，到发觉的确炸开了缺口，要发起冲击时，敌人已用火力网封锁了缺口。新四旅在城东南魁星楼爆炸的另一个坑道作业，由于测量不准，坑道没挖到城底下就爆炸了，结果城墙动也没有动，放了个空炮，部队没有冲进城里。我军总结了教训，决定另挖坑道再行爆破，这时马鸿逵的援榆部队已逼进到榆林以西。十一月十日，野司决定先打援军，只留少数部队继续围城，主力于十二日向榆林西南的元大滩地区开进，攻打宁马援军。十四、十五日，我军在元大滩和宁马援军激战，敌人以飞机掩护，向三五八旅阵地冲击，想夺路去榆林。三五八旅因为缺乏沙漠作战经验，兵力未展开，造成很大伤亡，但仍打退了敌人的冲击。我军毙、伤、俘敌四千余人之后，敌军向西撤退。正当我军主力准备返回榆林继续攻城时，发现宁马和榆林守敌已经会合，根据这新的情况，野司决定主力南撤到响水堡、党家岔、鱼河堡、西岔一线休整。

野司在响水堡西南二十里的赵家峁住下，认真总结了第二次进攻榆林的教训。这次对敌人增强了防御估计不足，思想上轻敌，事先没有加强侦察；对封建军阀矛盾的一面过分强调，忽略了反动派在利害攸关时的一致性，造成打援仓促，结果未能歼灭援军也未攻克榆林；坑道爆破经验不足，强攻结合不好，以致失去战机。这次战役虽歼敌六千八百多人，但我军伤亡也较大。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六团诸汉元团长牺牲，副团长薛长义和七一五团罗坤山团长负伤。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内线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由两个纵队另两个旅扩大到五个纵队，在兵员成份上起了很大变化，俘虏成份增多，有的连队竟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加上战斗频繁，教育时间短，部队思想极不稳定。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为谁打仗：在物质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部队有些人产生害怕艰苦的思想，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增多，作战中不能坚决完成任务；有些干部错误地认为西北敌军强大，斗志不强，工作不负责任。这些思想情况在二打榆林中都暴露出来了，使战役受到影响。

针对部队情况，经党中央批准，西北野战军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中旬，分别集中在米脂、绥德、清涧、保安（今志丹）和晋南曲沃地区，进行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整军运动。诉苦，就是诉旧社会的苦，诉国民党统治的苦，诉地主欺压穷人的苦；三查、就是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通过这次整军运动，提高了部队为解放劳苦大众，为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而战的觉悟。达到了加强部队纪律，增强部队团结，提高斗志，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目的。这是一次创造性的整军运动，党中央、毛主席赞扬

这是新式整军运动。在诉苦、三查的基础上，部队开展群众练兵运动，发扬了民主，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整个部队意气风发，士气旺盛，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战术技术准备。十二月下旬，我们野战军领导同志到米脂县杨家沟参加党中央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负责同志。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主席宣告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就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引起我们的深思，回想十八个月前，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仗着美国的援助，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地依靠解放区军民，还击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内线作战的巨大胜利，这都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结果。会议开了四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迎来了一九四八年的元旦。

新年过后不久，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杨家沟召开第一次会议，各纵队团以上干部都集中到一起，汇报整军情况，总结全年作战经验，讨论新的战斗任务。周恩来副主席到会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任弼时同志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华东野战军陈毅司令员也介绍了华东战场的胜利战况。会议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讲了话，他号召我们“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他、吃他，不让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

会议一结束，全体干部就赶回部队，积极准备行动，奔向蒋管区，转入外线进攻作战。

## 第十章 战略进攻

## 宜川战役

一九四七年夏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出陇海，直插大别山和伏牛山，和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会师中原，大量歼灭敌人，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胡宗南集团也陷于两面作战。

这时，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二十九个整编旅共三十三万多人，但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且处于守势。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陆续从陕北、晋南战场抽调整编第一师、第三十师、第三十六师、第六十五师组成裴昌会兵团，东出潼关、陕东南，配合刘峙兵团，准备打通陇海、平汉交通线，增援中原战场。胡宗南集团九个整编师二十八个旅只剩十七个旅用于陕甘宁边区周围，其主力刘戡率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和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集结在洛川、黄陵地区为机动兵团，用以北援延安、东援宜川、或阻止我军南下；整编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的七十二团和陕西保安第六团驻守韩城和禹门口，以阻止黄河以东的解放军西渡，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欠第七十二团）驻守宜川；何文鼎率领整编第十七师的十二旅、四十八旅和陕西保安第十一团驻守延安和维护延安到郃县的公路交通线；其余则驻守铜川、三原等地。青海马步芳整编第八十二师驻庆阳、合水、西峰镇；宁夏马鸿逵整编第八十一师另两个旅驻守安边以西地区；榆林邓宝珊部在我地方兵团围困之中。西北野战军在一九四七年冬第二次打榆林之后，主力集结在绥德、米脂、安塞地区休整，进行战略进攻的准备工作。第二纵队集结在晋南曲沃的曲村镇地区整训，待命西渡。彭德怀司令员和野战军司令部的同志反复研究春季攻势的战役方向。其一、再攻榆林，当时我军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加上气候严寒，对攻坚不利，而且邓宝珊已派代表和我们和谈，害怕我们再攻榆林；其二、西进陇东，该地区也缺粮，我们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作战，胡宗南乘机集中东援中原，对大局不利；只有南出关中才是最合适的办法，这样关中人力、物力丰富，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又可威胁西安，调动裴昌会兵团回援，我们就可策应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陈毅、粟裕野战军以及陈谢兵团经略中原。一九四七年中央十二月会议后，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西北野战军首届前委扩大会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充分讨论彭司令员提出的《关于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均到会作了指示，贺龙司令员也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按照中央的部署，立即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为解放大西北创造条件。接着，在吕家沟野司驻地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彭总进一步提出南下作战方案。南进必先歼灭咸延公路两侧的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占领黄龙、麟游两山区，作为解放关中的依托。针对胡宗南集团确保延安、洛川、宜川各据点的布防，以宜川守敌兵力最为薄弱，仅两个团，如我围攻宜川，敌军必定来援，时值初春尚未解冻，援军在运动中不易构筑工事，有利于将其歼灭；而我军背靠陕甘宁边区，便于掩护部队行动和保证后方供应，第二纵队渡过黄河，即能迅速参战。彭总说：“先打宜川，这是毛主席的决策。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围宜川，敌军必援。原因就在于胡宗南一向对我军估计不足，刘戡还有股‘英雄’劲儿。加上第二纵队仍在河东，敌人可能估计第二纵队不会马上过来，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样我军以逸待劳，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他还说：“当然，敌人也可能不来增援，那我们就打下宜川，直

下黄龙，既可扩大部队，也可解决吃粮问题。”与会的领导干部都纷纷表示决心，要打好南下第一仗。

在二月初，彭总命令野司派出二十人潜入黄龙山区，熟悉兵要地志，查明敌军部署。并责成各纵队派各旅副旅长或参谋长带有力的侦察部队到金盆湾、临镇一线勘察地形，查明敌后情况。这些措施为野战军主力顺利南下起到良好的保障作用。彭总带着野司参谋人员到第四纵队、第三纵队，和王世泰、许光达等纵队领导交换意见，然后在延长以南的佛古原再次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明确战役部署区分战斗任务。我们认为，裴昌会兵团远在潼关以东，难以长途增援，只有刘戡在洛川、黄陵的两个整编师来援可能最大。其增援路线有三：一是沿洛（川）宜（川）公路，经瓦子街到宜川；二是经黄龙和圪台街到宜川；三是经洛川以北的金狮庙梁到宜川。针对这三条路线，我们制定了三个打援的作战方案，但是估计敌军走第一条路的可能性最大，这条路距离最近，虽然沿公路走，易受伏击，但胡宗南过高估计自己，主观成性，必然令刘戡从此路来。我们的第一方案就是如果敌军取道瓦子街，则第三、六纵队以一部兵力正面抗击，不使增援之敌与宜川守敌会合；第一纵队截断敌退路，从左侧后攻击；第二纵队迅速渡河，从南向北击敌右翼；第四纵队由北向南攻敌左翼，最后合围全歼敌援军。彭总说：“就这么统统吃掉，尔后回师再克宜川，这一局棋就算走完了！”为了保障部队胜利进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司令员亲自发动群众掀起了参军支前热潮。经过土地改革翻身的青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军，晋绥人民从千里之外送来粮食、药品、被服。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野战军后勤司令刘景范，动员边区成千上万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随军出征。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野战军主力开始南下，为了不暴露战役意图，野司命令第一、三、四、六纵队于二月十六日到达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一线隐蔽集结；同时电告第二纵队，待宜川战斗打响之后，迅速从禹门口强渡黄河，直奔瓦子街。二月二十日，野战军领导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战役第一步骤以夺取宜（川）、韩（城）、石（堡）、郃（阳）四城，并准备各个歼灭可能增援的整编第二十七师及第九十师。”二十二日，第三、六纵队开始向宜川攻击前进。二十三日肃清了宜川外围的地方武装据点后，在群众掩护下，利用夜暗秘密开进，于二十四日突然从东西两面包围了宜川城。第一、四纵队则隐蔽集结在洛宜公路两侧。这时，黄龙山区寒风呼啸，由于人烟稀少，部队只能靠山露营，筹集的原粮无法加工，只能吃玉米粒和山药蛋。但是，指战员们情绪高昂，阵地上响彻“消灭整编二十九军，活捉刘戡”的口号声。

二月二十五日，彭总和我，会同参谋长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及纵队部分指挥员，先后到宜川北原高地和瓦子街以北察看地形。瓦子街是洛宜公路的咽喉，往东经任家湾到铁笼湾，山势险峻、森林茂密、荆棘丛生，两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十五公里的狭谷，便于我军伏击援敌。

宜川被围后，彭总即电告三纵司令员许光达和六纵司令员罗元发，要求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担任主攻的三纵独立二旅和六纵教导旅，在张开基、陈海涵两旅长指挥下，先后占领了宜川外围要点：老虎山、虎头山、外七郎山等阵地，将敌人压缩在城内。守敌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惊慌失措，赶忙向胡宗南急电求援。胡宗南骄横无比，他认为西北野战军三分之一是游击队编成，现在以三个纵队攻宜川，一个纵队在河东，必定无力打援，坚决命令刘戡率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第二十七师、九十

师共四个旅、八个团的兵力经瓦子街驰援宜川。

二月二十六日，刘戡率部出发，迳直沿洛宜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宜川开来。敌援军走我们预计的第一条路线来了。二十九日，刘戡率先头部队进到瓦子街任家营地区。我们即令各纵队按预定的第一方案的部署行动，只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继续围攻宜川守敌，其他九个旅的兵力。立即在瓦子街以东的南北高地进入阵地。第二纵队已于二十三日在禹门口强渡黄河，按野司要求迅速向圪台街集结，彭德怀司令员还让我随带警卫部队去迎接二纵队，向王震司令员传达战役方案。二月二十八日，野战军领导发出“进字第二号”命令：“本野战军决定于明（二十九）日拂晓发起总攻，歼灭来援之敌。”我们估计敌援军的行军长度，要让敌援军前卫进入铁笼湾以西地区，敌后卫才全部通过瓦子街进入我军伏击圈。因此，命令阻援部队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打援部队在敌援军未全部进入伏击圈之前不能暴露。刘戡在通过瓦子街以后，向公路两侧的山梁各派一一个旅，整编第二十六师四十七旅在左，整编第九十师六十一旅在右，搜索前进，掩护全军沿公路前进。敌四十七旅和六十一旅刚登上山梁，进至任家湾和丁家湾地区就遭到我三纵独五旅的十三、十五团和六纵教导旅二团的阻击。我军且战且退，诱敌深入。这时，刘戡还以为我军阻援的部队不过一个纵队，不超过八千人，不足以阻止他们前进。于是，刘戡仍下令其六十一旅继续向铁笼湾攻击前进。二十八日晚，敌援军后续部队已经通过瓦子街，进入瓦子街沟底的公路，敌军拥挤在沟里，队形混乱，刘戡决定调整部署就地宿营，并占领附近高地，将六十一旅撤回到任家湾以南高地，构成环形防御。刘勘打算二十九日突到宜川，因而仍摆着进攻的架势。当夜大雪下个不停，敌援军也没有构筑工事，这就对我军歼灭援敌造成很为有利的形势。

我第一纵队隐蔽地紧紧尾随敌援军开进，在查明敌援军后续部队已全部通过瓦子街之后，在二月二十九日凌晨两点，独一旅在王尚荣旅长指挥下，由张献村出发，攻进瓦子街，歼灭了敌后卫整编九十师搜索连，断绝了敌军退路。七点多，第一纵队贺炳炎司令员和廖汉生政委带着纵队指挥所来到瓦子街。根据侦察报告，刘戡发觉前进的道路被堵死，后退的道路被切断，已陷入我军的包围之中，企图迅速集结突围，其整编九十师一个团回过头来争夺瓦子街，同时又向瓦子街东南山派出部队，抢占高地控制向南逃的道路。瓦子街东南山原部署由第二纵队堵击，但由于雪路难行，路途较远，第二纵未能赶到。第一纵队领导为了阻止敌人向南突围，决定独一旅担负歼灭洛宜公路北山的敌人；三五八旅立即向东南山攻击，堵击敌人，主动担负起第二纵队的任务；另外七一五团一部进到小寺庄，阻击敌人后续部队的反扑。

战斗打响以后，独一旅首先攻占片石和东北山高地，连续打垮敌整编五十三旅一五八团的多次反扑。瓦子街东南山高达千米，刘戡的军指挥所和整编九十师师部都以此山为屏障，配备了一五七团和一五九团两个主力团和较多的重武器，妄图拼死抢占各要点。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和政委余秋里意识到夺取东南山，关系全局，命令七一四团团团长任世鸿以最快速度抢占要点，封闭南向缺口，封闭所有退路。七一四团二营首先夺取了瓦子街东南一里处一个大山头，控制了制高点；接着三营沿山梁向东迂回，卡住孙卜崾岬口子；二营机炮连进入东南山主峰阵地之后，用火力的掩护六连打垮了敌人的反扑，又乘胜夺取了第二个山头。团领导调整了部署，命令六连从正面攻击，四连在左翼配合，突破敌人第三个山头的阵地。冲在最前边的是著名的战斗英雄



刘四虎，他带领全班攀着荆棘、踩着积雪，勇猛地直逼敌人阵地。敌人居高临下，疯狂地扔手榴弹，他用刺刀把敌人的手榴弹拨开，在冲到敌人阵地前沿时，回击了一颗手榴弹，趁势冲入敌阵，踢翻了敌人正在射击的轻机枪，刺死了射手，又连续刺死刺伤六名敌兵，终因多处负伤，流血过多，昏倒在战壕里。我军后续部队冲进战壕，肃清残敌。敌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自恃兵强，一直坚持己见要继续东进宜川，这时也慌了神，督令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组织部队轮番向七一四团实施反冲击，并以化学迫击炮轰击我军阵地。七一四团任世鸿团长，观察到敌人炮火的情况，判断最密集发射的山头是敌人主阵地，即派参谋长武治安组织二营从正面进攻，三营从干家沟侧后上山，实行两面夹攻。经过激烈的争夺，七一四团占领了敌人一五九团重兵坚守的主阵地，这样敌人的军师指挥机构全暴露在我军面前。刘戡严令敌一五七团疯狂反扑，阵地上硝烟弥漫，团参谋长武治安牺牲，团政委徐文礼来到阵地上组织战斗。经过整天反复肉搏争夺，七一四团战到黄昏，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扑，在方圆不到二百平方米的阵地上，毙伤敌人近千名，终于封闭了敌人可能突围的唯一缺口。我在二十九日遇上正向东南山赶来的第二纵队，当即向王震司令传达了战役部署，确定二纵派主力沿鸡蛋峁、于家崖向蔡家川西侧高地迅速前进，阻止敌人向西突围。黄昏时，我和王震一起来到第一纵队指挥所，贺炳炎说三五八旅主力已挫败敌五十三旅，控制了南山主峰，我就返回野司指挥部。王震司令到三五八旅指挥所，计划让独四旅替换作战，黄新廷旅长说：目前部队正同敌人短兵相接，一旦转移阵地，势必增加伤亡，七一四团士气正旺，要战斗到底。王震司令遂改变部署，二纵队协同六纵队围歼敌六十一旅。与此同时，一纵独一旅二团亦激战终日，夺取了乔儿沟北山的敌人五处阵地：第四纵队主力进占海州塬以南山梁，接替了三纵独五旅右翼阵地，四纵警备三旅七团向敌整编二十七师四十七旅一四团实施攻击，三个营在纵队炮火支援下轮番进攻，占领了几个山头。放军进行反扑，七团接连打退敌人四次冲击，战斗非常激烈，七团副团长李清业不幸牺牲。激战到黄昏，双方对峙在任家湾北山上。同日下午五点，敌第六十一旅主力向丁家湾以南进攻，抢占了枣卜台高地。在铁笼湾正面机动防御的六纵新四旅七七一团，配合六纵教导旅二团夺回了枣卜台阵地，铁笼湾正面防御由教导旅三团担任；担任攻击敌右翼的第二纵队也从砖庙梁投入战斗。至此，我军紧缩包围圈，将敌压缩在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狭小地区。在我军的合围下，敌刘戡部经连日战斗，伤亡惨重，整编三十一旅旅长周由之、整编第四十七旅旅长李达、整编五十三旅副旅长韩指针相继被击毙，其他中下级军官死伤不计其数，敌军士气颓丧到极点。二十九日夜里大雪仍下个不停，我军各部队冒着风雪严寒，积极准备翌日总攻。三月一日上午九时许，野战军司令部由上绛头推进到圪背岭，即发出总攻击的命令。刹那间，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敌人。一纵由西向东，二纵由南向北，四纵由北向南，六纵（欠两个团）由东南向西北，三纵独五旅由东北向西南，四面八方对敌展开围歼战。这时，我们截获刘戡绝望地致电胡宗南，发出“败局已成，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哀鸣。但是敌人仍作困兽斗，我们在指挥所看到四、六纵队攻击丁家湾一个高地，多次受阻，彭总即令独五旅李夫克旅长集中全部火炮轰击敌军山头阵地。不久颗颗炮弹就在敌人中间开花，四、六纵队紧跟压过去，很快夺取了那个山头，插向敌人心脏。第一纵队以独一旅二团协同警备一旅二团突破敌元宝山阵地；以三五八旅七一六

团沿沟东进，协同七一四团自乔儿沟东南夺取了瓦子街东南山敌军残余据点；在兄弟部队支援下，七一四团一营连续突破敌人第四个山头，接着向敌人坚守的最后一个山寨攻击。任世鸿团长带着特务连冲向枣湾刘勳的军指挥所时，不幸中弹牺牲，战士们激愤地喊着：“活捉刘戡！”坐在山坡积雪上，向敌群飞速滑去。战至下午五时许，敌军全军覆没，严明被击毙，刘戡用手榴弹自杀身死，其他无一漏网。宜川东临黄河，南靠黄龙，地形险要。胡宗南进占延安后，把宜川作为战略据点，在城周围的老虎山、凤翅山、内外七郎山构筑了许多永久性工事，主要阵地多为悬崖峭壁，易守难攀。我军南下前，胡宗南特地赶到宜川，严令其嫡系张汉初率整编第二十四旅两个主力团及一部分地方部队坚守宜川。张汉初还强拉民伕，沿城墙四周加修地堡，架设鹿砦，埋设地雷。他自吹自擂说宜川城是“关中屏障”。刘戡增援宜川，将洛川、黄陵的全部兵力除留下重炮兵和留守部队外，倾巢出动，我们将它歼灭后，胡宗南已没有机动兵力可出援了。敌裴昌会兵团急速从伏牛山回陕，才走到潼关以东的灵宝、陕县地区；延安守敌已被孤立，更不敢放弃延安来援宜川；留守洛川的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一团和留守金盆湾的一四一旅一个营，在三月二日进到瓦子街以西小寺庄进行侦察，被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击溃。这样，宜川完全孤立，陷于我重兵包围之中。二月二十九日三纵独立二旅一个营曾突入宜川城内，歼灭一个营，后因城内七郎山、凤翅山未占领，敌人用火力俯射，遂主动从城内撤出。三月一日敌援军全部就歼后，三月二日晚我攻城部队对宜川城发起总攻。三纵独二旅从小北门杀入宜川城，迅速夺取了内七郎山；六纵教导旅一团和新四旅十六团也从南面和西南面攻占凤翅山主峰。独二旅利用曾被我军释放过的俘虏军官，士兵喊话，巷战发展迅速。到三月三日拂晓，守敌从土城里伸出白旗投降，敌旅长张汉初束手就擒，至此宜川战役胜利结束。宜川战役，共歼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部、整编第九十师师部、整编第二十四旅、第四十七旅、第五十三旅、第六十一旅、第三十一旅共三万余人，缴获甚多。这是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以后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仅仅一年时间，敌我力量发生根本变化，敌人由进攻转为防御；我军战斗力大大提高，由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建制团到一次消灭一个整编军（即兵团）；把战争由内线引向蒋管区。这一仗震撼了蒋家王朝，蒋介石匆忙从南京赶到西安，安抚军心，并将华东、中原兵力增援西北，以确保西安和关中。这就给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得以联合发起洛阳战役的战机，有力地策应了中原战场的作战。西北战场的形势也改变了，西北野战军直指关中。

## 西府、陇东战役

宜、瓦大捷之后，黄龙山以西的中部（即黄陵）、宜君，黄龙山以南的白水、蒲城、澄城、郃阳、韩城、石堡地区，敌人只有三个保安团和各个县的保警队守备。野司决定乘胜扩大战果，向黄龙以南发展，扫清渭河以北分散守备的敌人。截断延（安）咸（阳）公路，巩固和扩大黄龙新解放区，解决部队粮食问题，并迫使裴昌会兵团从河南退回陕西。

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我军自宜川地区向西南方向分三路出击。驻守在腰舰的敌第四四团、第七十二团和石堡陕西保安第一团听到风声，慌忙向南逃跑；驻甘泉、鄜县的敌第三十四团和保警队也相继向延安窜逃。我率领第一、第四纵队在三月九日前进到冯原镇、雷原镇地区之后，令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向北攻击黄陵，一部向宜君以南警戒，主力在十日向宜君攻击。黄陵守敌陕西保安十五团一大队三个连向我军投降，而宜君的敌人却趁我军未包围城西门之前，由西门逃走，我们占领了宜君，只俘虏了十几个敌人。第三和第六纵队为一路，他们以夺取洛川为目的，在九日完成了对洛川的包围。洛川的守敌第十二旅拼死守城，敌副旅长杨荫衰（兼三十六团团团长和洛川县县长）将从外围逃进城里的敌官兵全数杀掉，以警告城内守军，要坚决守住。我军攻击了两次，因为部队轻敌和下雨的影响、没有成功，就改为修筑工事、做近迫作业准备再攻。第二纵队在八日西渡洛河，九日歼灭了由黄龙（石堡）逃到雷牙镇的敌人地方武装二百多人，一直逼近白水县城，白水县城的国民党政府和保警队二百多人向南逃跑，第二纵队迅速追上去，将逃敌全歼，并乘胜进到蒲城。我军围攻洛川，解放了黄陵、宜君，逼近蒲城，把胡宗南急坏了，他赶紧电令裴昌会兵团从灵宝、陕州迅速回防西安，并增援洛川。裴兵团动作也挺快，其先头部队整编第三十六师的二十八旅和一二三旅在十一日就开到蒲城。野司根据敌情的变化，命令我第一、四纵队原地待机，第三、六纵队继续围攻洛川、引诱敌军北援，第二纵队撤到白水附近，准备歼灭可能北援的敌军。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在洛川打了二十几天，敌军凭险要地形和坚固设防顽强抵抗，而我军缺乏攻城的火器，只有消灭外围据点的敌人，夺取了部分前沿工事。敌裴昌会兵团直到四月五日才由铜川沿咸延公路北进，敌军吸取了刘戡在瓦于街惨败的教训，采取了援而不进或缓进的方针，五个师挤成一团，一日只走十五公里，晚上宿营的时候，又往回退七公里，徘徊不前。这样，我军没有机会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四月七日野司命令放弃打援，除第三纵队继续围攻洛川迷惑敌人以外，第一、二、四、六纵队西移马栏、转角、庙湾、照金地区。这次黄龙山麓战役，虽然仅消灭三千余敌人，但是达到了扩大和巩固黄龙分区的目的，解决了粮食问题，孤立了延安守敌。更重要的是我军以实际行动模范地执行党的新区政策，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新解放区人民爱戴拥护人民解放军，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月十三日，野司在马栏镇杨坡头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野司原来计划在夺取洛川之后收复延安，然后背靠解放区，出击关中。现在洛川久攻不下，敌人猬集渭河以北，继续围攻洛川和打援已经不可能，黄龙山区粮食又困难，部队吃粮是个大问题，我军不宜在这一地区久留，而西府（今凤翔地区）的敌人兵力空虚，许多同志都认为应该甩开敌人主力，大踏步向敌人后方挺进，相机夺取胡宗南的后方战略基地宝鸡，并调动延安、洛川守敌和裴昌会兵团，寻找战机消灭敌人。当时，彭总顾虑敌众我寡，深入敌占区，远离边区对我不利。赵寿山副司令员也提出：“我们

从胡马之间的夹缝打出去，太深入了，有一定冒险性”。他的意见是中肯的，但是到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宝鸡，彭德怀司令员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还是同意发起西府战役。野司部署部队组成三路西进。这时，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在白水患病，回解放区疗养，野司决定由我率第二、第四纵队为左路兵团；第一纵队为中路兵团，野司随中路行动；第六纵队为右路兵团。第三纵队仍向洛川佯动，牵制敌人。四月十七日拂晓，中路和右路攻占柤邑、织田，十八日又肃清淳化和长武之间、泾河北岸的敌据点，消灭敌陕西保安第十九团两个营和县、区反动地方武装，顺利渡过泾河。胡宗南发现我军南渡泾河后，急将防守西安的青年军第二三师用车运到永寿地区，企图堵击我军。十八日我左路兵团攻占永寿常宁镇，全歼敌二三师第一旅第三团和第二旅第六团。但是由于第四纵队警备第三旅行动不积极，使敌二三师第一旅第一团等部乘车逃到永寿监军镇，并安全撤到乾县，影响了我军后来攻击乾县、醴泉和兴平的计划。接着，我们第二纵队在乾县铁佛寺地区歼敌二三师搜索营一个连，击溃西进的敌整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七七旅第五三一团，占领了陇海线的武功县绛帐车站，截断西安到宝鸡的铁路交通，并歼灭了扶风守敌。与此同时，右路兵团攻克长武、灵台，中路兵团攻占邠县、麟游。这时，胡宗南才发觉我军有可能攻打宝鸡，即刻命令裴昌会向宝鸡增援，又令马步芳的马继援整编八十二师向长武、亭口进攻，以钳制我军。

野司以第六纵队教导旅和新四旅三团向长武、邠县一线防御，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独六旅在武功、凤翔机动防御，保证我军主力夺取宝鸡。

宝鸡，是渭河平原西部的工业重镇，是陇海铁路通向甘肃、四川的重要交通枢纽。胡宗南把宝鸡作为他向解放区进攻的战略供应基地，大量弹药和各种军事装备、物资器材都储备在这里，除了修有庞大的军火库以外，露天还堆放着。宝鸡城北面是高原，南面是秦岭，控制了南北的险要就很难攻进到城里。宝鸡守敌由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徐保指挥，共有七十六师师部、特务营、工兵营、第一四四旅第四十团和宝鸡警备司令部、陕西保安二十一团等二千余人，敌军利用抗日时期的国防工事和高层建筑防守，另外还加修了许多明碉暗堡，车站还有铁甲车，既是徐保的指挥车又作为活动堡垒巡防。宝鸡城外的军械库、北原飞机场、南关和渭河大桥、车站、东堡子、蟠龙山等都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四月二十三日，中路兵团占领凤翔县城。四月二十四日，左路兵团第二纵队的三五九旅、独四旅占领岐山，二十五日占蔡家坡、虢镇两处工业城镇，推进到宝鸡城东。第一纵队三五八旅到达宝鸡西北，独一旅到达城西。这时，我在城东和彭总会合，彭总指示，要迅速攻占宝鸡，抓紧打扫战场，要很快撤离。二十五日夜里，我第一、第二纵队向宝鸡守敌发起攻击，守城的敌军做梦也想不到我军来得那么快。我军用山炮、迫击炮和全部轻重武器压制敌人的火力点，部队勇猛地冲向敌人的制高点和碉堡，不少敌人吓得不战而逃，有些保警大队立即缴械投降。二十六日拂晓，我军已冲入城区和敌军进行激烈巷战。敌师长徐保躲进铁甲车指挥，进行垂死挣扎。战到下午，我第一、二纵队合力围歼固守车站高堡的敌人，并用炮轰击铁甲车，把铁甲车打碎，徐保被击毙在车内。二十六日黄昏，我军全歼宝鸡守敌。部队在城里城外就地休息进餐，不进民房，晚上露宿街头，做到不扰民。当我第一、第二纵队攻击宝鸡时，敌马继援指挥八十二师向亭口进攻。担任阻击的教导旅对敌人骑兵的攻击估计不足，敌骑兵发挥了运动快的特点，从侧翼迂回，而教导旅缺乏打骑兵的经验，还采取打步兵的办法，节节

抗击，二十五日被迫后撤。二十六日教导旅又在张家坡遭到敌人袭击，那里是平原，我们又没有纵深配置，很快被敌人突破阵地。敌八十二师四个步骑团直逼崔木镇，威胁我军的侧后。在东面的裴昌会兵团也加速向宝鸡驰援，敌先头部队很快就在杏林镇地区和我军机动防御的第四纵队发生战斗。第四纵队的兵力部署得过于分散，抵抗又不坚决，右侧被敌军后续的部队突破。第四纵队既未经请示，又不通知友邻，即自行撤到峻山东北的山地，使敌军得以长驱直入。在这危急关头，第六纵队新四旅迎上去阻击放军，经过激战，反复争夺阵地，将敌军阻在凤翔以东十里的地区。独六旅旅长张仲翰率部沿铁路线和渭河两岸机动防御，他们在敌军猛烈攻击下，节节抗击，二十七日将敌军阻在元大营地区以东。这时，我军处在肯水侧敌的地位，野司决定撤出宝鸡，摆脱敌人。

我军在宝鸡全歼敌整编第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徐保以下全部守敌。敌人在宝鸡储存的弹药估计足够我军使用两年的，但是由于仓促撤退，来不及全部运走，只能让全体指战员和俘虏随身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剩下庄窑洞仓库和车站上还有“大量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只得全部炸毁。部队在四月二十八日晨撤离宝鸡。

那时，胡宗南集团十一个半整编旅倾巢驰援宝鸡。

企图和马继援的整编八十二师在宝鸡地区夹击我军。野司认为我军远离陕甘宁边区，应该摆脱兵力较强的胡宗南集团，寻找机会歼灭兵力较小的马继援部，并趁机收复陇东。当时，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无法获得确切的情报，马继援部有多大兵力，部署和运动情况都不清楚。野司判断马继援部有占平凉堵截我军北进的可能。五月一日，野战军向陇东挺进，三日占领崇信。这时，蒋介石企图利用我军远离边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机会，将我军合围在长武、灵台、泾川、镇原地区，以马继援部固守平凉，与永寿、邠县的敌裴昌会兵团整编第三十师、三十八师连接；裴兵团的整编第一师、三十六师、六十五师北进到长武、灵台进行合围。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五月三日夜，我军在泾川、平凉之间，继续北进，准备先夺取屯子镇、北合镇、党原镇，然后夺取肖金镇、荔镇、西峰镇摆脱敌人。我率第二纵队按野司的预定部署，在五月四日向北合镇、玉都庙前进、准备夺取荔镇。这天，敌人又令马继援部进到屯子镇，配合裴昌会兵团围歼我军于屯子镇地区。五月五日下午，第六纵队机关和教导旅按原计划进占屯子镇，以策应第一纵队夺取肖金镇。这时马继援部的三个步骑团从镇原开来。六纵机关进屯子镇以后，从敌人没撤走的电话线上侦听，已经得知敌人的意图，但对敌人兵力等情况还不清楚，没有及时退出屯子镇。六纵队机关和教导旅遂被敌人包围。当天，六纵新四旅也向屯子镇开去。但未能解围。屯子镇很小，部队在镇里拥挤不堪，敌人不时用迫击炮向镇内轰击，造成我们很多伤亡。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彭总命令教导旅在屯子镇坚守，吸引敌人，他亲率野司机关部分人员，指挥第一、四纵队在五月六日拂晓由党原镇、玉都庙向屯子镇进攻。当天，我们攻击屯子镇的部队，除独一旅第三团在西坡里地区和从镇原增派来的马继援部一个骑兵团打成对峙外，其他担负攻击包围屯子镇敌军的部队，因为协同不好，没有同时发起总攻，只形成逐次冲击，虽然杀伤了敌官兵二千多人，却没有达到全歼该敌三个团的目的，仅做到在六日夜将六纵机关和教导旅接应突围出来。

五月六日，我率第二纵队已占领荔镇，并在荔镇宿营。当夜，野司决定

野战军全部迅速沿屯子镇通肖金镇的公路东移，摆脱敌人。命令我率第二纵队在五月七日占领肖金镇；第四纵队在五月七日沿公路构筑野成工事，作机动防御，掩护主力向南庄李家集结，随后全军在肖金镇集结东进。

五月七日拂晓，我按野司部署，率第二纵队由荔镇向肖金镇前进。荔镇和肖金镇在南北相对的塬上，中间是深沟，从屯子镇到肖金镇的公路就在附近通过，我军控制了两侧塬上，就可以安全东进。当时我们对这一线的敌情一无所知，我二纵前卫独四旅进到肖金镇才发现该镇已被马继援部的骑兵第五团和甘肃保安第五团占领。我随第二纵队司令部正下到沟里，向北塬上走，听到独四旅的报告，立即命令独四旅包围肖金镇，我们也赶往肖金。接着，又从荔镇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原来三五九旅和独六旅正要从荔镇出发时，发现敌钟松率领重新组建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和马继援部骑兵第一团从南面逼近荔镇，后卫的独六旅和敌人打响了。情况变得严重了，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后面还有整编第一师跟进。我们没料到敌人行动那么快，如果让敌人占领荔镇，和肖金镇的敌人南北接应，我军主力东进的道路就会被堵死，全野战军就陷在屯子镇、西峰镇和泾川的三角地区，有被敌军围歼的危险。我急忙去找彭德怀司令员，找到已经来到肖金镇西南的野司机关，彭总不在那里，据说他带部分人员随一纵队行动，去解屯子镇的围，以后就没回野司机关。这一天各部队都按统一命令在行军途中，所以电台联络不上，我使用野司的电台和中央军委联络，他们也在开往河北平山的途中，得不到情况通报。我和第二纵队领导王恩茂和郭鹏等同志研究，当机立断，改变原来的部署，命令独六旅和三五九旅在荔镇坚决抗击敌整编三十六师等部的进攻，独四旅主力继续围攻肖金镇的敌人，独四旅另以一个团抢占荔镇和肖金镇以东的三不同，在那里构筑工事，保障野战军主力东进的道路。

独六旅和三五九旅在荔镇以南迅速展开，给予敌整编第三十六师迎头痛击，消灭了敌人两千多；独四旅主力击溃了肖金镇放军的多次反冲击，紧紧地包围着敌人；独四旅十一团迅速占领了三不同，三不同在三道沟交叉点的塬上，有效地控制了我军主力东进的通道。

但是，担任由屯子镇到肖金镇沿公路作机动防御的第四纵队没有完成任务，特别是由于四纵警备第三旅第五团团团长郭应春违抗命令，擅自将部队撤到肖金镇以东，使马继援部得以跟踪追击我军主力，我第六纵队新四旅和第一纵队独一旅受到敌迂回堵击，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七日午后，赵寿山副司令员回到肖金镇附近的野司机关，他说彭德怀司令员仍随第一纵队行动，但是向东转移的部队有点混乱。他连连说，这下子唱了个《苟家滩》，上了娃娃的当了。《苟家滩》是秦腔的剧目，讲的是一个老将军，被一个年少的敌将，引到河滩上吃了败仗的故事，他这里指的是马继援。当他听说二纵在荔镇顶住了南面的敌人进攻时，高兴地说：二纵这回立了个大功，不然我们全军都交“轱辘”了（指输棋的意思）。下午，彭总听到荔镇方向第二纵队抗击钟松整编第三十六师的激烈枪炮声，迅速带第一纵队向二纵靠拢。在第一、二纵队取得联络之后，我知道了彭司令员的消息，这才放下心来。彭司令员经三五九旅的指挥所，安全回到野司机关。第二纵队在荔镇和肖金镇进行了一天战斗，保障了野战军主力东进，使全军脱离了险境。五月八日，野战军主力在三不同，九日在宁县以东的良平镇，十一日在枸邑以北的永和镇、织田镇，给马继援和钟松的追击部队连续打击。五月十二日，野战军主力回到关中分区的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摆脱了

马继援和钟松的纠缠。当西北野战军主力向西府进军之时，驻守延安的敌整编第十七师，在四月二十日弃城南逃，二十五日经洛川，带着洛川守敌第十二旅、六十一旅一八二团连同地方的反动武装，沿着洛（川）白（水）公路南逃。我军在二十一日收复延安，二十六日解放洛川。许光达率第三纵队和地方武装跟踪追击南逃的敌军，一直追到白水城郊。途中第三纵队歼敌六十一旅一八二团、十七师师部、十七师野炮营全部、第四十八旅的一四四团等各一部，共毙伤俘敌三千余人，缴获逃敌的全部坦克、汽车、榴弹炮、野炮等重武器。洛川以北再无敌军了，黄龙分区和关中分区自此就连成一片。西府、陇东战役，我军连续作战一个月，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解放了洛川，一度解放了宝鸡、咸阳、凤翔、岐山等十四座县城，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毙伤俘敌中将师长徐保以下官兵和国民党专员、县长、地方武装共两万一千九百余人，缴获了大量装备、弹药和军用物资。野战军部队回到解放区以后，集结到黄龙、韩城一带休整。野司在洛川的土基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教训，确定部队整训计划和对胡、马敌军的作战方针。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等同志由延安来参加会议。会上，彭德怀同志认为这次战役没有打好。他说西府战役胜利方面是光复延安、夺取洛川、巩固黄龙分区，歼灭两万一千多人，摧毁了敌人宝鸡市西北供应基地，但未能收复陇东、三边。他说他有错误，认为宜瓦战役大捷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役中俘虏的大批敌军。结果决定进攻宝鸡，想破胡宗南的后方，缩短西北解放战争的时间，这是思想上的急躁病。再一个是轻敌思想，对敌情估计不足，没料到胡宗南采取异常迅速的手段，调集了大量兵力和马继援部一起夹击我军。使我军撤出宝鸡以后，部队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因而本来可以歼灭的敌人没有歼灭。林伯渠同志对彭德怀同志说，这次战役还是取得很大胜利。并说，这就跟看漫画一样，要整体来看，不能分割细看，整个来看这次战役应该认为是成功的。我认为这是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成绩还是主要的。在组织指挥、部队协同和贯彻新区政策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经验教训，为西北解放战争的发展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战役的教训是：由于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和在根据地作战情况不同，在根据地里可以依靠群众来掌握敌情，并可以依赖上级通报情况。到了敌占区，行军、作战频繁，通信联络不畅通，情报收集得不及时不准确，不知道敌人的兵力、番号、位置和企图，作战就被动了。这样在今后作战中采取加强部队的直接侦察，取得及时的、准确的情报，弥补单纯依赖上级通报的作法，随着战争的发展是完全可取的。再是大兵团作战，各部队指挥员必须明确了解总的战役意图，从整体出发来作部署。这次会议着重批评了第四纵队党委中存在严重的自由主义，对于部迁就放任、执行任务不积极不坚决。在这次战役中第四纵队多次贻误战机，使全军处于不利形势，这都是不应该的。在总结后，野司给予有关干部应有的处分。前委扩大会议在六月一日结束，野战军前委发出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的指示。六月二十四日，阎揆要同志接替张文舟同志任野战军参谋长。

### 粉碎胡宗南的“机动防御”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即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已变为于我有利，而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利了，敌强我弱的悬殊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计划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内歼灭敌正规军一百一十五个旅，并计划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进行战略决战。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继续对胡宗南集团开展攻势，积极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力争平均每月歼灭敌人一个旅，钳制胡宗南集团，使他不能抽兵增援其他战场。胡宗南集团这时仍有十一个整编师三十个旅的兵力。蒋介石认为胡宗南在西北战场上仍占优势，而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接连打败仗，太原吃紧，曾命令胡宗南抽兵增援。胡宗南为了保存实力，保障西安安全，只空运了整编三十师到太原；将整编六十五师，二十七师、十三师调到豫陕边，预防中原野战军进陕；主力则在西安和其以北地区，实行所谓“机动防御”。七月底，裴昌会兵团四个师七万多人，向我黄龙分区进犯，企图控制黄龙山区南麓的壶梯山、将军山等要点，并相机进犯韩城、石堡（今黄龙），企图封锁我军南进的道路。这时，我军正集结在韩城、石堡地区，在野战军前委上基会议之后，进行了两个月的军事、政治整训，在总结西府、陇东战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评斗志、评政策、评工作、评战斗作风、评功查过等活动，并开展射击、投弹、土工作业和爆破四大技术为内容的战术训练，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当中原、华北、华东各野战军发动攻势连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部队以后，指战员们都纷纷请战，部说：“友区天天打胜仗，我们再不能休息了！”面对胡宗南集团的进犯，为了打开局面，野司决定发起澄（城）郃（阳）战役，首先歼灭裴昌会兵团重新组建的整编第三十六师，然后看情况消灭整编第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目的是粉碎敌人的封锁。野司部署，我军主力五个纵队集中在石堡以南山地，准备歼灭由冯原镇北犯的整编第三十六师；第四纵队的骑兵第六师，兵力相当一个团，在宜君以南，节节抗击敌整编第一师，吸引其北上；另一个小团在洛河东岸，准备阻击敌第一师可能东援；以第三纵队独二旅六团、独五旅十四团，第二纵队独六旅十七团和黄龙分区第十团组成左翼兵团，利用韩城西南山地和韩（城）郃（阳）公路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敌整编三十八师、十七师和骑四团，保证主力的左翼侧和韩城禹门口粮道的安全。七月三十日，敌整编三十六师钟松部进占了澄城以北的冯原镇、刘家凹以后，进行侦察活动，可能敌人发现了我军主力，停止不进。八月三日，我军为引诱三十六师前进，主力后撤到香川寺、芝川镇一线。到八月五日，敌三十六师仍然不动，还加紧利用山地要点和村庄，积极构筑工事。野司研究敌人不动，我们应改变决心转而向敌人进攻，决定以第四纵队和警备四旅攻击冯原镇南面杨家凹的敌一二三旅，第一、二纵队进攻冯原镇东北敌人的主要支撑点壶梯山和魏家桥的敌二十八旅，第三纵队向驻东太极的敌一六五旅进攻，第六纵队进攻刘家凹的敌一四二团。要求各部在八月七日晚上到达指定出发地点，并完成进攻准备。八月八日拂晓，野司下达了发起冲击的命令以后，彭德怀司令就急着从野司驻地界头镇赶往壶梯山前线视察，我也随即跟着到前边去。壶梯山地形险要，敌人赶修了许多明碉暗堡，把它作为冯原镇、刘家凹一线的主要屏障。二纵王震司令在西府、陇东战役之后，已病愈返回部队，这时正指挥壶梯山战斗。当天上午，一纵、四纵先后将魏家桥、东家渠、曹家垆头等据点守敌歼灭，向冯原镇及其以南地区发展；第三、六纵队将敌一六五旅四九三团包围在冯



原镇以东的刘家凹、梁周村。下午四时，二纵队集中炮火袭击壶梯山，仅一个小时激战，就占领了山头，消灭了敌二十八旅的精锐八十二团。黄昏时分，敌人全线溃退，敌师长钟松率其师部和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主力，沿冯原镇澄城公路南撤，我军主力即乘胜追击。九日黄昏，将敌整编三十六师包围在王庄镇、杨家凹地区，除一六五旅旅部和四九五团一部逃脱以外，我军第二次歼灭了敌整编三十六师，击毙少将副师长朱侠，俘敌少将师参谋长张先觉、少将高级参议李秀、国民党国防部战地视察第九组少将视察官马国荣等。当我军围歼第三十六师时，敌十七师、三十八师不敢增援，害怕也被围歼，从韩城撤向 合阳。第四纵队一部和左翼兵团紧紧追击敌军，连续将敌军掩护部队几个团击溃，收复韩城、澄城、合阳三城，一直追到大峪河以南寺前镇、韦庄镇、永丰镇一线转入防御，十二日战役宣告结束。这次战役，指战员们涌现了许多英勇事迹，第四纵队也表现得很积极，说明两个月的评功、查过、练兵成绩很大。这次战役未能彻底歼灭整编三十六师，主要是部队在新区作战，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使敌人便衣侦察得以混入石堡、三岔我主力驻地活动；还有一个瓦子街战斗俘虏兵投敌，供出我军歼灭整编三十六师的意图，使敌人停止前进，破坏了我军诱敌深入聚歼的计划，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澄 合战役结束以后，野战军在澄城、合阳地区休整。九月十二日，野司前委在合阳以北的雷家庄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秋冬两季继续在渭北作战，争取再歼胡宗南部几个旅，决不使其抽兵增援其他战场。这时，华北、东北、华东解放军对敌开展规模巨大的秋季攻势，为了配合这一攻势，拟定十月初发起荔北战役。这次会议还讨论贯彻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和新区政策问题。

战役开始前，部队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训，总结澄 合战役的经验；连队补充了华北子弟兵和澄 合战役的解放兵，普遍进行诉苦复仇教育，文工团演出《刘胡兰》、《刘四虎》等革命英雄主义戏剧，大大激发了战士们杀敌立功的决心；同时抓紧军事训练，针对荔北高原地形特点和敌军防御特点，演练推广平原村落攻坚战术和射击、投弹、爆破、通过障碍、土工作业，特别是迫击炮平射、迫击炮送炸药包等技术，提高了部队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为荔北战役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和战术、技术基础。

胡宗南集团进犯黄龙分区的计划破产以后，为防止西北野战军南下潼关或再出西府，以整编第九十、第七十六师守蒲城，以整编第十七、第三十八师和三十六师残部守大荔以北地区，以整编第一、第六十五师和第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驻富平、兴平一线，以整编二 三师守西兰公路的枸邑县、醴泉一线，整编第十三师守潼关、灵宝，整编第二十七师守洛南、商县。

我军发起荔北战役的目标，是歼灭大荔以北的敌整编第十七师和第三十八师。这两个整编师的敌军利用大荔以北到永丰镇一带砖石结构的村落和土围子，构筑了一个南北三十公里、东西二十公里的防御地带。他们构筑了许多工事，把每一个村庄和房舍都变成他们的支撑点。在这种情况下，在平原地区作战，不把村落、河川、道路和围寨里面敌人的防卫配备摸清，是很难攻击成功的。

在部署荔北战役时，野司就指示各部队，要加强侦察工作，把作战地区的敌情、地形、详细侦察清楚。各部队都派出侦察员化装深入敌区，在敌军戒备森严的防御地带里、机警地开展侦察活动，对敌人的隐蔽发射点、伏地

碉分布，寨墙的高低、外壕的宽深等等，都进行了周密的侦察。这一次，第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率领的侦察队工作最为出色，他们深入敌后，查明了敌人兵力、部署、工事位置、道路等，攻击开始后，他又为部队带路，把部队隐蔽地带入敌人防区，对歼灭敌军这两个师做出了贡献，战后彭德怀司令员通令表扬了刘桐树的功绩。

十月六日拂晓，我军按预定部署首先向位于寺前镇、韦庄镇、永丰镇地区的敌整编第十七师发起攻击。第一纵队轻装疾进，突然插入敌军心脏张家城，把韦庄的敌十七师师部和酥酪的敌四十八旅分割开来，在第二、四纵队协同下将敌四十八旅歼灭大部。当日黄昏，敌第十七师师部率其余部向南突围，我军除第四纵队继续围攻永丰镇的敌第三十六团外，全军主力由追击敌十七师残部，于七日转向对敌三十八师进攻。我军攻占唐家堡、乌泥村、东西汉村、八岔口等据点，全歼敌一七七旅五二九团和五十五旅一部，敌三十八师残部沿铁岭山向西南溃逃。由于地形限制，我军未能截断敌人退路，第二纵队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不顾疲劳奋勇追击，独四旅十二团和独六旅十六团一直追到老君寨以西的洛河东岸，俘敌千余人，缴获敌三十八师的全部重武器和装备；第三纵队追到船舍渡附近，歼灭敌整编第一师一个团的大部；第六纵队乘胜直逼大荔城郊，裴昌会的兵团司令部在整编三十六师残部掩护下仓皇逃过洛河南岸；第四纵队全歼了永丰镇的敌三十六团之后，挺进到蒲城以东的孙镇、桥头地区。第三纵队一部和黄龙分区地方武装解放了朝邑、平民、白水，争取朝邑县两个保安大队一千一百余人起义；四纵骑兵六师攻占铜川的周家岭，歼灭了守敌，并击溃由铜川增援的敌人一个团。

屡战屡败的胡宗南十分懊恼，紧急从兴平、潼关调整编第一师、第六十五师、第十三师，连同原在蒲城、大荔的敌军，共十三个旅九万余人，在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采取军官严厉督战的办法，驱使敌军拼命向我军阵地反扑。十月十一日，敌整编第一师、第六十五师经铁岭山、杨家庄、吕村向北进攻。野司在查明了敌军情况之后，决心趁敌军立足未稳将北进的敌精锐六十五师歼灭。十二日拂晓，我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向敌人进攻，敌军在猛烈炮火和六辆坦克、十余架飞机掩护下，向南逃窜。我军击落敌机三架，击毁坦克两辆，在李家坡歼灭敌六十五师一个团又一个营；第二纵队将敌六十五师一六旅压缩在大壕营土寨里面，几次攻击都未成功，形成对峙状态。野司判断，十三日敌将以其所有战役预备队投入战斗，行动更为谨慎，我军不易各个歼敌。当即改变决心，命令各部队停止进攻，采取积极防御措施，占领有利地形，争取大量杀伤反扑的敌军。十月十三日，敌军十三个旅八、九万人，全部出动，但是敌人的斗志不高，主要是用山炮、野炮、榴弹炮向我军防御阵地轰击，还出动飞机轮番轰炸。敌人步兵的进攻都被我军打退，但是敌军的炮击使我军受到一些伤亡，独一旅旅长王尚荣等同志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我军为了诱敌深入分散其兵力，相机歼灭部分敌人，十四日继续向澄城、郃阳以北转移。但是敌人的兵力集中缓慢，前进也缓慢，十六日占郃阳，十七日占澄城，没有机会歼灭敌人。野司认为这次战役目的已经达到，遂结束战斗，部队移回澄城、郃阳以北的冯良镇、赵庄镇、百良镇地区休整。这次战役歼敌二点五万人，给予敌整编十七师、三十八师、六十五师、三十六师以沉重打击。

这次大规模的平原攻坚作战，后勤工作做得深入严密，鼓舞了战士的士气。特别是野战医院和民工、担架、大车等，一切为了前线，不怕牺牲，

冒着敌机的袭击，日日夜夜进行战场救护，将数千名伤员安全后送，使之得到及时治疗，这对保障战役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部队进行休整以后，彭德怀司令员指示部队要很好总结荔北战役的作战经验。他指出大荔以北的平原地形，对今后在关中地区作战有普遍意义。他指示野战军副参谋长李夫克负责，抽调一部份营团指挥员在野司驻地西太极举办一个战术训练班。在训练班学习期间，还组织了一个近似实战的军事演习，由一个加强连示范推广各种爆破、突击战术动作，如竹竿送炸药包、撑杆上墙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了淮海战役。为了阻止胡宗南集团调兵增援中原战场，野战军前委在十一月六日、七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十一月中旬发起冬季战役，彭德怀司令员在会上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要给胡宗南以狠狠的打击。我们对胡宗南的压力越大，越使他感到自身难保才行。”

胡宗南在荔北战役遭受打击之后，虽然在兵员、装备、弹药和运输条件仍占优势，但士气不高，完全处于守势，“机动防御”只能确保西安了。因此，胡宗南将它的三个主力军九个师平分为三个防御集团（十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将原整编军改为兵团，整编师改为军，整编旅改为师），以蒲城、澄城、郃阳三点为中心，五十余公里的地区进行防御。遭我歼灭性打击的第十七军、三十六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等部集结在富平、三原、临潼、大荔整补，其他部队分散守备铜川至西安、潼关各地。前委研究决定，我军以一部分突然攻击敌军第一线三个集团中的一个集团或一个集团中的一部，调动其另两个集团在运动中，我军主力在澄城、郃阳之间，或澄城、白水、蒲城之间，各个歼灭敌军两个三个师。彭德怀司令员指出：“继续全歼敌两、三个师，渭北战局即可改变。”野司要求部队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阵地，战斗中不能盲目急躁，要严密组织火力和具体分工，尽量缩短战斗时间，避免反复拉锯。争取决定性的胜利。野司部署先歼灭蒲城以北罕井、白提、山东村地区的敌第三十师两个团和陕西保安第二旅两个团，相机歼灭敌第一军的七十八师，命令各纵队在十一月十二日西进，十八日开始攻击。十一月十四日，澄郃的敌第九十军附一四四师，误认我军全部西移，企图趁机进占韩城，分股北犯。敌一四四师四三团向郃阳以东进行侦察，夜宿临皋村。第二纵队抓住战机，连夜以三五九旅包围了临皋村，独立第四、第六两个旅进到临皋以西，断敌退路并阻击援军人十五日拂晓，二纵经一个小时战斗，全歼敌四三团。这时二纵本当停止攻击，按原定战役计划进行，但该纵队未经上级批准，十五日晚乘胜向乳罗山的敌一四四师攻击，经通宵战斗，到十六日晨又歼灭敌一四四师一个多团。这时，罕井、白提、山东地区的敌人缩回蒲城，我军围歼敌三十师的计划部署落空。而且胡宗南误认我军又将在澄郃地区发动进攻，立即将敌第一军、六十五军和第十七军东调，十一月十九日该敌由蒲城、富平进到澄城、永丰镇、露井镇地区，破坏了我军原订战役计划。野司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案，为了分散疲惫敌军，命令第一、四纵队和警备第四旅、骑兵第二旅组成右翼兵团，在二十日向铜川、耀县攻击；以第二、三、六纵队组成左翼兵团，隐蔽在洛河两侧地区，准备侧击西调的敌军。

右翼兵团二十一日在草滩、康庄歼敌第三军十七师一部，二十三日在铜

川以东的军台岭、店子坡再歼敌第二五四师（原暂编第二旅）一部。右翼兵团的积极活动，使胡宗南又误认我军主力在铜川、耀县东侧地区，命令刚进到洛河以西的第一军、第六十五军调头西进增援，并令第九十军、第七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军的一六五师放弃 郿、澄城经永丰、蒲城西进，夹击我军。二十三日，敌第七十六军进到永丰镇和洛河西岸石羊地区，发觉我左翼兵团在蒲城和石羊之间设伏，即占领洛河东西两岸构筑工事准备固守；敌九十军于二十五日进到永丰镇以南的唐家堡地区。

我左翼兵团已不可能伏击歼敌，但敌军主力分散了，应该抓住第七十六军进入我预定战场的有利战机。野司即令二、三纵队主力围歼第七十六军，以第三纵队独五旅，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九团、独六旅十六团进到永丰镇以南的楼之原、韦庄地区阻击可能增援的第九十军，以第六纵队监视蒲城之敌。

二十五日下午，第二纵队向洛河西岸的石羊、坡头、曹村地区的敌第二十四师发起攻击，歼灭其一部，将敌人压缩在河东的永丰镇。当晚，野司前进到坡头村，第二、三纵队东渡洛河向永丰镇的敌第七十六军攻击，到二十六日晚肃清永丰镇外围敌据点，将一万余敌军围在东西六百米，南北二百米的上城之内。二十七日，第二、三纵队进行坑道作业，直抵城下，并组织火力。二十八日拂晓发起总攻，从六点突破城墙到十点结束战斗，守敌无一漏网。我军生俘第七十六军中将军长李日基，少将军参谋长高宪岗，少将师长吴永烈、于厚之，少将副师长朱强，少将师参谋长蒋绍刚等。在我军歼灭敌第七十六军之时，仅距永丰镇五公里的敌第九十军和一六五师，除了以炮火支援以外，步兵不敢前进一步。胡宗南又命令西进的几个师向东调增援永丰镇，这些敌军害怕被我军中途侧击，一直绕到蒲城以南的党木镇、龙阳镇，二十九日才进到永丰镇、韦庄镇、临皋地区，这时我军早已撤离了永丰镇。胡宗南的所谓“机动防御”，只是盲目地东奔西调，疲于奔命，结果损兵折将一无所获。冬季战役我野战军歼敌第七十六军和一四四师、十七师等部共二万五千余人，其中歼一个军部、三个师部，九个团又七个营。西北野战军在澄 郿、荔北、冬季三个战役中，共歼敌五万九千四百余人，彻底粉碎了胡宗南的“机动防御”，把胡宗南集团敌军拖在西北战场，配合了其他野战军进行战略决战。同时巩固了渭北地区，取得了平原村落作战的丰富经验，为尔后解放整个大西北地区创造了条件。

## 解放西安前后

一九四九年，是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各个战场捷报频传，继辽沈战役胜利之后，又取得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损失一百零七个师，一百零五万多人。在西北战场的胡宗南集团万分惊恐，一面收缩兵力，一面准备退路，将西安绥署、机关、学校、眷属等沿川陕公路向汉中、广元迁移。

这时，西北野战军正在宜君、白水、澄城、郃阳地区进行整训。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野战军在澄城武庄召开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会上贺龙传达了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彭德怀传达了中央一月八日指示；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关于时局的声明》；并作了西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几项工作基本总结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报告。会上讨论了关于加强党委集体领导制度，检查了新区执行政策和纪律情况，对提高自觉执行纪律和地方群众工作作了决议。

二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张德生任副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方仲如任后勤副司令员。原来的各纵队依次改编为军，旅改为师。

二月十七日，彭德怀同志离开西北前线，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一野司令部的工作由我负责。春节刚过，我们即按原定计划，发起春季战役。这时，胡宗南主力集结在耀县、富平、三原、泾阳地区，以第二十师、十二师、三十师、陕西保安第四旅、第二十八师等分散守备在铜川、蒲城、大荔地区。我军以歼灭蒲城守敌为目的，以第四军向耀县、铜川发动攻击，吸引敌人主力，然后集中第一、二、三、六军围歼蒲城的敌人。十九日夜间，我第四军从铜川以西的马鞍桥、龙家原发起攻击，扫清铜川外围据点并歼敌一部。二十日，铜川守敌二十师逃到耀县，会同耀县守敌第六十九军一起逃到三原。四军在追击中歼敌二百多人，二十一日进占耀县。驻在蒲城美原镇、兴平镇的敌十二师和三十师，在十九日已相继逃往富平、三原、蒲城只有陕西保安守备旅留守，我第三军、第六军在二十一日晚向蒲城攻击，二十二日拂晓前将守敌全部歼灭，俘获敌旅长赵国珍以下一千余人。这时胡宗南集团由“机动防御”变为依托秦岭，重点退守西安至宝鸡一线，保存实力，待机反击的战术，即一发现解放军进攻立即向后撤，仅留地方武装据守。根据战场的变化，我们对准备撤退的敌人，要大胆深入，迂回敌后，截断敌人退路，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对敌人地方武装据守的城镇，则不能和进攻敌人正规军据守的据点那样强攻，而是有充分准备地采取袭击的办法，速战速决。当我军向铜川、耀县、蒲城进攻的时候，敌人主力相继退守乾县、泾阳、三原、富平和以西地区。二十四日第三、六军追击逃向富平的敌第三十师，二十五日晚向富平发起攻击，该师已逃往泾阳，我军全歼了守富平的敌地方武装四百余人。第四军在二十四日向淳化进攻，守敌十四师四十团弃城逃跑，我军追歼四百余人，占领淳化。二十六日，胡宗南才急忙调第七十六军第二十师连同四十团残部，在淳化西南的朱家庄、口头镇地区防御，想阻止我军继续南进。第四军在二十八日夜里向敌人发起攻击，到三月一日全歼二十师和四十团残部，俘敌师长褚静亚以下一千五百余人。在我军解放了铜川、蒲城、淳化、耀县、富平以后，敌人十一个师集结在三

原、高陵、泾阳和咸阳以北地区，我军没有机会再各个歼敌，就在原地休整待机，开展新区群众工作。另以第六军和骑兵第二旅协同东府分区部队，收复大荔、朝邑、平民。大荔守敌第二十八师和敌八十四师二五二团听到消息，弃城向南逃跑，我军追击歼灭敌二五二团二营大部。三月四日我军攻克大荔，全歼陕西第八专署、突击大队全部；平民县敌地方武装三百多人投降，我军解放了大荔、朝邑、平民。青海马步芳集团害怕胡宗南集团撤走，胡宗南亦想利用马步芳苟延残喘，搞“胡马联防”，马步芳即派八十二军四个骑兵团向淳化地区进攻，胡宗南在三月五日集中第一军等主力十一个师向北反攻。我军没有各个歼敌的机会，便采取诱敌深入，待机歼敌。三月五日到十九日，我军主力先后主动撤出淳化、耀县、富平、铜川、蒲城等城，转移到黄陵、宜君、白水、澄城和大荔以北地区进行整训。十一日，第四军在淳化以北给敌八十二军以沉重打击，敌二四八师师长马德胜被击毙，共毙伤敌一千余人，胡宗南集团进到铜川、美原镇、蒲城、龙阳镇地区以后就不敢继续前进，春季战役遂告结束。这次攻势作战共歼敌七千余人，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宣传了我党政策，为我军尔后进入该地区作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月十九日，在野司驻地澄城以北的平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由于彭德怀司令员到山西参加太原战役指挥，由王震同志传达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和毛主席的总结讲话。会议期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华北野战军也于四月二十四日解放了太原。会议结束前，宣布了中央军委为缩短西北解放战争的进程，命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作战，归第一野战军指挥的决定。大家部认为胡宗南这个人很顽固，他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但又在秦岭以南准备了退路；我们要抓紧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食，弄清敌情，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会议以后，全野战军掀起练兵热潮，加强攻坚、巷战的训练；并学习《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我军城市政策十五条》，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素质和政策水平。各部队都以一部分兵力和侦察部队组成先遣支队，展开侦察活动；在晋南和东府地区筹集粮食、架桥、修路，保证华北部队顺利入陕。胡宗南这时只剩下残缺不全的七个军，调来调去不知如何是好。从四月二十五日起，他把部队从铜川、蒲城、龙阳镇地区后撤到三原、泾阳、咸阳、高陵、临潼，形成保卫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他费煞苦心命令伪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出面，筹备一批资金、枪械，组织一支地方保安队，由敌十七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统一指挥，在西安四周，挖城壕、修碉堡，构筑城区工事，想保住他苦心经营十多年的西安。可是到五月十四日，我们先后接到中央军委的通报和关中分区的报告；第一军和第二军的先遣支队攻占三原和高陵以后，发来的侦察报告，都发觉胡宗南集团有放弃西安，全部撤退到汉中的企图。原来胡宗南把由六军副军长张贤约率领的，在北京和平解放后改编补充一野的七个团向陕西开进，当作华北两个兵团入陕，慌忙决定将主力撤到秦岭以南地区，把留守西安的任务交给十七军和保安队，准备在宝鸡一线布防，阻止我军南下，并伺机进行反扑。胡宗南亲自召开紧急疏散会议，会议一结束，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就立即发出这一重要情报。

我和野司的同志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并报军委同意，决心不等华北部队

入陕，不失战机发起陕中战役。十七日晚在野司驻地富平谢村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我向大家说明，敌人六个军已陆续撤到咸阳、乾县、醴泉、永寿地区，胡宗南决定从宝鸡沿川陕公路入汉中，准备等待时机，联合青海、宁夏二马反扑关中，失败了就经四川撤到云南。我们必须抓紧这有利战机向西追歼敌人主力，并解放西安。会议议定第一、二、四军向西截击敌人，六军解放西安，三军为预备队。

各军立即行动，抢渡泾河，追击全线西撤的敌人。

十八日，第二军追歼了敌五十三师一个团和骑第二旅四团一部乘胜解放咸阳，四军攻克醴泉，一军进到咸阳西北，三军进到武功以北的临平，六军配合二军攻占咸阳以后转向西安前进。接着西进各部队迅速进占麟游、岐山、虢镇、逼近凤翔、宝鸡。

十九日六军到达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渭河。敌人破坏了船只，炸毁了咸阳大桥，并构筑了工事，配备了炮兵，想阻止我军渡河。六军各师团做好了徒涉抢渡的准备，当时正值春洪季节，河水都在一米以上，十九日晚各部队经过侦察选好徒涉地段，摸清对岸敌人部署和火力配备情况。二十日拂晓，六军用炮火压制敌人火力，全线强渡渭河，黎明时分就全歼河防守敌整编第二旅第六团和四十八旅一个营。六军渡过渭河以后，迅速逼近西安西关和南门，占领了飞机场、发电厂，敌十七军大部被歼，军长兼警备司令带着残部逃向终南山。六军在二十日进入西安，并派两个团接应蓝田县自卫队起义。随后贺龙和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等同志到了西安，成立军管会，贾拓夫任市长，六军军长罗元发任城防警备司令。二十二日，我西进的一、二、四军在凤翔以北姚家沟地区把永寿经麟游逃往凤翔的敌五十七军截住，由东北向西北合围，敌五十七军和三十师除少数溃散外全部被歼，我军生俘敌官兵八千余人，并占领凤翔。东府分区的地方武装在五月二十日南渡渭河，解放了临潼、渭南、华县、华阴、潼关。这样，宝鸡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再次全部为我军解放。胡宗南经宝鸡，带着他的第一军跑到汉中，只留西安绥署副主任、第五兵团司令兼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坐镇宝鸡。他喘过一口气，又后悔跑得太快了，丢了西安吃了大亏，便和马步芳、马鸿逵商量反扑西安。这时马步芳刚被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也眼看要当甘肃省主席，二马踌躇满志，正得意忘形，感到胡宗南这一撤退，陇东和西（安）兰（州）公路受到我军威胁，也想取得胡宗南集团配合，保往甘、青、宁的老窝。胡、马经过协商，宁马遂以第十一军、一二八军组成“援陕兵团”，青马也组成“陇东兵团”，由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马步芳之子）统一指挥，由陇东沿西兰公路东犯，直扑咸阳。青马指挥的“陇南兵团”（第一一九军）也积极推进。

面对胡、马要联合反扑的形势，各部队领导都要求乘胜追击，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不使其卷土重来。五月二十五日，彭德怀司令员从太原返回乾县秦家庄的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我们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不必穷追敌人，等华北十八、十九兵团到来再和敌人决战，如果敌人在华北部队来到之前反扑西安，我现有部队以逸待劳，寻找歼敌战机，采取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办法，给胡宗南集团和马继援集团等一个迎头痛击。

为了迷惑敌人，争取时间，野司通知在西安的第六军采取各种办法大造华北兵团入陕作战的舆论。六军就打着华北兵团的番号到处号房子，贴标语，大造声势，当六军副军长张贤约带着北平整编的几个团抵达西安的时候，就

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六月七日十八兵团的先遣师到达，又举行热烈的欢迎。这一系列的活动都通过国民党特务和敌机侦察传给胡宗南，使其犹豫不决，不敢贸然行动。正当我十八、十九兵团的部队大举进入陕西的时候，胡宗南和二马的部队开始联合进行反扑。六月十日，胡宗南集团主力沿渭河以北向东攻击岐山、蔡家坡；马继援集团沿西兰公路向东南进到永寿、崔木镇一线；敌陇南兵团进到凤翔。野司原来的部署是阻胡歼马，以第二军在绛帐、武功阻击胡宗南集团；其他部队集中围歼马继援集团，第三军在乾县；第四军在仪井、临平镇；第一军在扶风、益店镇；第六军留下第十八师守备西安，主力在醴泉、赵村镇集结。为了诱敌深入，并掩护华北兵团集结，准备和敌人展开决战，野司决心改变计划，重新进行部署，只以少数兵力抗击敌军。六月十一日，马继援集团继续向我进攻，敌八十二军先头到达大小竹杆，十一军先头到达监军镇，一二八军先头到达贯头镇。我第六军、第三军、第四军迎头痛击敌军，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按野司部署转移。第三军撤到三原云阳镇地区，六军撤到三原石桥镇、北屯镇地区，第四军撤到泾阳和其以西地区。这一天胡宗南集团没有进攻，第一军也按部署撤到户县以西地区，第二军撤到郿县、周至地区。六月十二日，各军到达指定的地区。华北十八兵团最先抵达的第六十一军守卫咸阳到西安一线。敌人发现我军东移以后，马继援集团误以为我军是败退，即加速向临平镇、监军镇、兴平、咸阳推进；敌陇南兵团沿宝（鸡）咸（阳）公路以北地区向杏林推进；胡宗南集团主力在裴昌会指挥下，由扶风沿宝咸公路以南向武功推进，其三十六军单独经斜峪关沿渭河南岸向西安前进。

我第二军抓住敌三十六军孤军前进的机会，在六月十二日夜将敌军部和一六五师包围在郿县金渠镇地区。经过激烈战斗，到十三日晨将敌一六五师大部歼灭，俘敌少将师长孙铁英以下两千多人。在将要解决战斗的时候，敌第六十五军、三十八军赶来增援，第二军即撤出战斗转移到周至哑柏镇地区。这时，马继援为了争功，亲自率领八十二军三个师，越过宁马第十一军和第一二八军的防线，向咸阳猛扑，企图直取西安，十三日窜到咸阳以北，即对我军进行集团冲锋，我六十一军以炽烈的炮火还击，炮弹在敌群中开花，激战一昼夜，敌人尸横遍野，被击毙两千多人，狼狈退到醴泉一线。马继援仍不死心，命令三个师分两路企图突过泾河，在临泾渡、修石渡又受到我军严重杀伤，只得在骑兵掩护下向醴泉、乾县以北撤退。进到渭河边的胡宗南部队，见马继援部遭到惨重打击，甚为恐慌，在乱打了一阵炮之后，以坦克殿后全线撤退。胡宗南和二马这次反扑西安遂以失败而告终。

这时候，第十八兵团三个军和隶属十八兵团在山西作战的一野第七军、第一军三师、第三军七师已经全部到达三原、西安地区；第十九兵团也已渡过黄河，向三原、富平地区开进。由于华北兵团经过长途行军，需要集结休整，不便立即参加追歼敌军，我军便原地进行战斗准备，陕中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第一野战军共计歼灭敌第五十七军军部，第二一四师、第二一五师、第三十师、第一六五师，第五十三师两个团、两个营，共三万五千六百余人。

西安解放后，陕北榆林这个敌据点被我军长期围困，守军二十二军和我西北军区进行谈判，我军表示保证敌军官在西安的财产安全，并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榆林军民也渴望和平解决，敌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在六月一日终于决心接受和平改编，并在十六日通电起义，榆林宣告解放。



## 第十一章 解放大西北

## 扶郿战役陇东追击

在周士第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和杨得志、李志民率领的第十九兵团到达西安、三原以后，为了适应向大西北进军的需要，六月中旬经中央军委同意，第一野战军成立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第一兵团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七军；第二兵团由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委，辖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的总兵力已达到四十一万余人，彻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我军已占相对优势，加上我军士气高昂，敌军士气低落，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胡宗南和二马反扑西安失败以后，胡宗南理应撤出关中，退守秦岭避免被聚歼；二马也应退回平凉。而胡、马却在渭河之滨的狭长地带布成一个“口袋阵”，二马的八十二军、一二九军在邠县、永寿以东：第十一军、一二八军驻水寿、麟游以北地区。胡宗南在武功以西渭河两岸守备。他们做出这样安排，是因为任何一方都需要联合，才能苟延残喘。如胡不联马，即使退守秦岭，亦不能阻挡我军的重点追歼；马不联胡，即使退守平凉，也难以阻挡我军长驱直入甘肃。只有在麟游和扶风、郿县山区并肩作战，才能避免被我各个击破。但是他们又各怀鬼胎，都幻想借助对方的力量削弱我军，保存自己的实力。胡、马部希望对方首先进到我军攻击，所以两军的部署，都是既可以联合作战，又可以保存自己。所不同的是胡宗南害怕被歼而兵力集中，马家军惧怕被歼而兵力分散。胡宗南集团以五个军配备在扶（风）郿（县）地区的渭河两岸，宝鸡只留一个残师，防御第一线兵力集中，纵深力量薄弱。胡宗南估计我华北两个兵团入陕以后，至少要整训一个月，他不退守秦岭也不致马上受到进攻；万一遭到我军进攻，二马不来援，我军一下子也难歼灭他五个军，他一边抵抗一边撤退也不迟；如果我军先打二马，他可以全力向我军侧击，从中取胜。二马则东起土桥镇，西至崔木镇，前哨活动在永寿以东，主力集结在长武、郿县，分散兵力避免被我军包围聚歼；有利时进出关中援胡，不利时就退守平凉。七月六日，野战军在咸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参加。彭德怀司令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会上提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战略方针。因为我军只占相对优势，二马尚未遭到我军歼灭性打击，战斗力较强，对胡马二敌不能分兵去对付，必须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若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从战场上考虑，把二马歼灭在陕西比让它逃回老窝再打有利，但是打马比打胡费力，敌军兵力分散，不易聚歼。我先打马，胡宗南退向汉中，若我军南下追击，也不易全歼胡部，而二马必然乘机进扰关中，威胁我军后方，增加补给困难“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则较为有利，胡宗南在扶郿地区兵力集中，若我包围该地区，其秦岭以南没有战役预备队可以北援，我军能全歼该敌。虽然胡、马可以南北策应，然而胡马之间有较大空隙，我军可以从容迂回其侧后；二马在向咸阳突击时损失严重，故我围歼胡部，二马不会轻易出援。另外，胡部三个军在渭河北，两个军在渭河南，渭河沿岸没有大军渡河设备，我军发起攻击的时候，南北敌人无法相互支援。权衡利弊，野司决心先打胡宗南集团。

会议研究了全面进攻敌人，发起扶郿战役的作战计划。并向全军发出战斗动员令，决定在完成扶郿战役以后，主力转向甘肃，歼灭青宁二马。野司部署：第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于七月十日进到乾县、醴泉以北一带高地，构筑工事，钳制青、宁二马，确保主攻部队右侧安全。以六十一军卫戍西安，并向西安南山子午镇地区敌人进攻。第二兵团在七月十一日，隐蔽集结在武

功以北的临平镇以东地区，十二日向扶风和扶风以西的益店镇攻击前进，迅速占领扶风西南的罗局镇，协同十八兵团将渭河北岸的敌一一九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压缩包围聚歼。第十八兵团附第七军，在七月十二日沿咸（阳）风（翔）公路和陇海铁路，向武功以南以西的敌人进攻，协同第二兵团聚歼敌人。第一兵团沿渭河南岸、秦岭北麓西进，在七月十二日开始各个歼灭周至、郿县地区的敌第九十、三十六军，然后向宝鸡以南发展进攻，切断敌人南退的路，策应渭河北岸作战。

会议以后，各部队立即组织侦察人员，深入敌区活动，弄清各自进军路线的敌人守备情况。各部队领导深入动员，向指战员们讲清粉碎胡马“口袋阵”的作战方针，要求大家克服盲目轻敌思想，提出了战役指挥和战术要求，号召发扬猛打猛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敢于刺刀见红，坚决打好这一仗。有些部队对各类人员都提出不同口号，政工人员“人人开口，个个鼓动，提高士气，瓦解敌军”；炮兵战士“弹不虚发、百发百中”；侦察人员“胆大机智，准确及时报告情况”；通信人员“迅速准确完成通信联络任务”；医护人员“发扬英勇精神，救护负伤同志”；炊事员“做好饭菜，烧好开水，及时送到前线”；后勤人员“保证弹药粮草供应”；担架人员“英勇抢救伤员，保证不丢一个”；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处处做表率，保证完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还要求全体指战员认真执行民族政策，俘虏政策。经过广泛深入动员，军人大会进行了热烈讨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推动了战前的准备工作。

七月十日，扶郿战役开始。担任钳制二马的十九兵团首先行动，按时进入指定地区，修筑工事，扬言发动进攻，以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行动。第六十一军当晚向西安以南的子午镇发起攻击，守敌十二师向南逃跑，被歼千余人。

七月十日晚，第二兵团第三、四、六军从醴泉、乾县突然出动，越过漆水河绕道西进，冒着伏天酷暑，长途强行军。七月十一日拂晓，部队来不及休息，即攻占青化镇和益店镇，由北向南猛然迂回到敌三十八军、六十五军和一一九军侧后。第四军经过一百五十里急行军，于十二日三时攻占罗局镇、七时占领郿县车站，截断了敌军的退路。第十八兵团十一日分三路由东向西进攻，第六十二军十二日攻克武功，歼敌一部；第六十军十二日插入武功、扶风之间的杏林镇和绛帐镇，歼敌一部。第一兵团从渭河南岸攻击，一部将辛口子、黑山寺守敌歼灭了一部分；主力由长益公路和秦岭北麓齐头并进，十二日歼灭敌第九十军一个师另两个团并占领哑柏镇、横渠镇等要点。战役发展顺利而迅速，一天之内，我军已在西面断敌退路：北面东面已插入敌人纵深，将敌人三个军压缩在罗局镇以东，午并镇以南的渭河滩上。敌人四周只剩渭河南面郿县一个缺口。敌人本应从郿县这个缺口突围，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呢？这是一方面敌人在渭河没有大规模的渡河设备，如果南渡就会被我军压在河边，形成背水作战的危险处境，所以敌人不可能渡河从郿县突围。更主要的是敌人未曾料到我军会那么快就迂回到它的侧背，而且将其扶郿地区兵力全部包围。当我军从敌一一九军阵地侧翼隐蔽通过的时候，敌军长王治岐认为这只是我们的小股地方部队；待我军已插到敌三十八军后面并发起攻击时，敌十八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也认为是我们解放扶风时留下的武工队，趁夜间袭扰；这一情况报告给坐镇宝鸡负责总指挥的裴昌会，他也不相信会有解放军部队跑到三十八军后面去，攻击三十八军军部。这样

敌军就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当我军战斗在敌人纵深进行时，敌人没料到是我军的大举进攻；当判定是我军大举进攻时，也没料到已被我军全部包围。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他给解放军设的“口袋阵”反而成了装自己几个军的口袋。他急忙令敌第六十五军、第三十八军和敌第十八兵团部沿陇海路向宝鸡撤退，他们进到罗局镇就遭到我四军的阻击。坚守罗局镇是这次战役能否全歼河北岸三个敌军的关键，第四军向部队发出：“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四军十师和十一师连续打退敌六十五军、三十八军的十余次轮番冲击，打得敌人横尸遍野。第二十九团五连，最后只剩下五个人，仍然坚守阵地；第三十团的三连和七连，连续九次打退敌人的冲锋，没有后退半步；第三十团三营干部伤亡下级自动代理，负伤的都坚持不下火线，失掉联络的连队自动归并。第四军这次虽然伤亡大一些，但是打出了顽强战斗的作风，为战役的胜利立了大功。十二日中午，野司下令发起总攻，野战军的炮火向渭河北岸的敌军轰击。接着，二兵团的三军、六军和十八兵团各部队向敌人猛攻，敌军被打得一片混乱，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敌前线指挥官李振、王治岐等都丢下部队各自逃命。南岸的第一兵团通过连续不断的沼泽水网地带，长途行军追歼南岸敌军，十二日下午占领郿县，迅速派出部队控制渭河河滩。这时，渭河北岸的敌军已面临被全歼，一些退到郿县对岸的敌官兵，纷纷跳入渭河，拚命向南泗渡，想夺路逃跑，正好被第一兵团的部队截住，被俘八千多人。午夜，第十八兵团和第二兵团全歼敌军，胜利会师。南岸的敌军第三十六军和第九十军残部，向南窜进秦岭。我第二兵团乘胜向西挺进，第四军在十四日攻克宝鸡，守敌向南逃跑；第三军占领凤翔。第一兵团也沿渭河以南向西追击，十三日在马营镇地区围歼敌第五十三师一部，十四日攻占益门镇。

在扶郿战役进行中，马继援部虽曾集中在永寿、崔木镇，派出的小股骑兵侦察骚扰都被我十九兵团大部歼灭了。当胡宗南集团通过电台求援时，马继援便迅速后退到泾川、长武、灵台一线。

这次战役共歼敌第十八兵团部、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一九军三个军部，第二十四师、第五十五师、第一六师、第一七七师、第一八七师、第一九一师、第二四四师、第二四七师、第十二师师部和一个团、第六十一师两个团，共计四万四千余人。解放了八座县城和八百里秦川西部广大地区。这是西北战场的空前胜利，根本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我军已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扶郿战役发起之前，毛主席曾电示：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了使其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宗南不致早日入川，一野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宗南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扶郿战役以后，胡宗南集团残部退入秦岭山区，南宁二马撤到西兰公路平凉地区，野司决定转向陇东，追歼二马。七月八日，野司在虢镇北三里的文广村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确定打马阻胡的策略，以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在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使敌人误以为我军企图进攻秦岭；第一兵团附六十二军为左路，第二兵团为中路，第十九兵团附陇东地方部队为右路，挥师向甘肃进军，进攻青、宁二马。

扶郿战役以后，二马也以为我军要南下秦岭追击胡宗南，所以陈兵不动，企图在甘肃、宁夏的咽喉平凉地区和我军决战。二马在静宁召开军事会议，商定平凉决战计划。但是宁夏马鸿逵没当上甘肃省主席，这个职位也要被马

步芳抢去了，内心非常不满，会上马步芳提出的决战计划显然是让宁马打头阵，胜败都消耗宁马。因此，马鸿逵命令宁马的临时总指挥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要见机行事，保存实力，退守宁夏。

七月二十四日我军向陇东挺进。右路十九兵团收复郿县、枸邑，二十五日占灵台，二十六日克长武，二十七日占泾川、正宁、宁县。左路一兵团也于二十五日占陇县。青宁二马一直节节后退，宁马已向平凉以西退走，青马除骑兵十四旅在固关掩护外，主力也撤到静宁地区。这样敌人的“平凉决战”宣告流产。

二马各保他的老窝，我们也改变方针，由右路十九兵团沿西兰公路前进，以一部出六盘山钳制宁马，中路第二兵团向通渭进攻，左路第一兵团向天水、陇西发展。第十九兵团解放镇原并进入平凉，陇东地方部队解放了庆阳和西峰镇，第二兵团解放安口窑、华亭、化平。第一兵团在二十八日晨向扼守陇山要隘固关的敌骑兵第十四旅进攻，敌人逃向三轿子以南，被我军围歼在该地区，我军进占清水县。正在我军迫近天水，解放平凉的时候，马鸿逵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的电令公布，马鸿逵知道这不过是个空头主席，其用意只是命令他坚决战斗而已。马鸿逵决定在三关口、瓦亭、任山河地区用几个团稍事抵抗，以保住宁夏的大门，并掩护宁马主力退却，迟滞我军向宁夏进攻。第十九兵团在八月一日继续推进，第六十四军和一八八师、骑兵第二旅，击溃了任山河地区守敌，歼敌五千多人。二日解放固原，到十一日抵达黑城镇、海原、豫旺堡地区。第六十五军占领了瓦亭、三关口，控制了六盘山，三日解放隆德，六日克静宁。第二兵团在八月三日进到莲花镇地区，六日解放通渭。第一兵团消灭了固关的敌人之后，青马再没有进行抵抗，我连续解放了天水、秦安、甘谷、武山。敌第一一九军二四七师的一个团和武山自卫总队起义。至此陇东追击战结束，各兵团就地休整补充。陇东追击战歼敌不多，主要是有些部队指挥员对二马估计太高，指挥过于谨慎，占领敌人阵地没有穷追猛打，而是着重改造工事预防敌人反击，致使敌人能得以逃脱。从扶郿战役到陇东追击，我军进行大兵团作战，较好地解决了团结和供应问题。一是团结，部队多，来自各地，各有不同习惯和作风、特长，野战军政治部紧紧抓住团结的这个环节，战役进行之前，就制订了团结守则八条，进行深入教育，保证了各部队的团结。二是供应，由于人多，需要粮食、弹药数目很大，解放区人民大力支援，在扶郿战役中仅关中新区即支持粮食达十万九千五百斤，军鞋五十五万双，担架九千三百副，大车二千七百辆。刚解放的宝鸡、平凉、陇东新区，也筹粮一万二千万斤。陇东老解放区人民，曾以四十万斤盐，一万斤油，三千只猪羊，支援部队西进。

## 兰州战役

陇东追击之后，得知青马固守兰州，企图与我“决战”，我军稍作休整，审度战局。这时，全国各战场都有新的重要进展，长沙敌军起义，福州解放，大军深入湘南、赣南地区，长江中游的宜昌、沙市、江陵等重要城市相继解放。全国战争的胜利鼓舞了第一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克服困难，追歼二马。自从胡宗南退守秦岭，国民党为了保住西南，拖住第一野战军向四川进军，在广州召开“西北联防会议”，策划所谓兰州决战计划，妄图以青马退守兰州，在兰州城下牵住我军主力，然后宁马出固原转向兰州，胡宗南出陇南，对我军形成包围，一举在兰州外围歼灭我军。蒋介石认为二马受我打击较少，从一九四七年的五万多人扩充到二十一多万人，还有相当实力。马步芳盘踞经营多年的兰州，三面环抱险山，一面是涛涛黄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并有坚固的工事。马步芳认为我军进入他的统治中心兰州就会陷入泥潭，所以他放弃了在六盘山、陇山依山防守的机会，保持兵力，有计划的撤往兰州，诱我“决战”。一野前委分析战局，认为胡宗南背靠四川、过早把他压入四川，对第二野战军入川作战不利，暂时不去管他；同时进攻二马，分散了兵力；如果先打宁马，会给青马动员甘、青和新疆兵力重新部署防守的机会，延误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时间，青马还可能从临洮、武都逃进川北。所以彭德怀和贺龙司令员决心先打青马，后打宁马。彭德怀司令员说：马步芳要在兰州决战消灭我们，这太好了，我们就怕他跑掉，我们来个将计就计，看谁把谁消灭在兰州。在党中央批准了野司的兰州战役计划以后，野司部署以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在海原、固原地区钳制宁马部队，第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附第一兵团的第七军，在西安、宝鸡、天水一线钳制胡宗南残部；以十九兵团两个军为右路，沿西兰公路直趋兰州城东；以第二兵团为中路，由通渭经定西以南直取洮沙，由南向北与十九兵团合歼兰州守敌；以第一兵团附六十二军为左路由甘谷经陇西、临洮、临夏，北渡黄河，直捣马步芳的老窝西宁，切断兰州守敌的退路。命令下达以后，全野战军立即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部队驻地都从上到下开会讨论，直到连队都边动员边研究总结歼灭青马的战术。部队报纸上、墙壁上都是：“打到兰州去，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口号。部队从组织上也作了精简，把笨重的行李、物资和不必要的人员留下来，把机关编成战斗组织，减少了牲口，干部乘骑许多都用来驮弹药，连怎么喝水，怎样宿营事先都做了细致准备。部队还深入进行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八月上旬，二十多万人的大军，冒着酷暑，分三路向兰州进军了。尾随部队前进的还有一支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大车、毛驴驮着弹药和粮食，还有担架大队。从陇东追击到进军甘肃，支前大军由西安向兰州延伸，上千里的供应线上，动员了十五万民工，他们不顾艰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野营露宿，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保证作用，对西北解放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据侦察和缴获的文件看，马步芳的决战计划是：以精锐主力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据守兰州：以九十一军、一二军、八十一军为左翼，在靖远、景泰和打拉池地区防御；以新成立的实际是步兵的骑兵军为右翼，控制临洮、洮沙地区。他的如意算盘是以主力吸引我军主力，然后两翼包抄我军，断我补给退路，会同宁马、胡宗南集团、青海、新疆敌军，一举围歼我军。我右路十九兵团从八月九日出发，他们有坦克、火炮等重武器，沿着西兰公路隆隆开进，于十三日连克西吉和会宁两县城，使宁马大为震惊，给宁马造成我军向宁夏进攻或从兰州东侧迂回过黄河的印象。集结在秦安地区的中路二兵团八月十

日出发，悄悄地经通渭、内官营、新营镇向兰州南面进军，出敌不意地抵达兰州城郊。十九兵团向宁夏方向虚晃一枪之后，沿兰西公路出现在兰州城东。左路第一兵团八月十一日出甘谷、武山，接连解放陇西、漳县、渭源、会川数县，十六日攻克临洮，修复了敌人破坏的大桥，过洮河，二十日解放康乐向临夏进攻。敌右翼的新编骑兵军一触即溃，一部被歼，大部逃散，粉碎了青马包抄我军的企图，也断了青马向川北的退路。第一兵团攻占临夏以后，矛头直指西宁，青马的老窝处于险境。围攻青马的主动权便操在我军手中。我镇守天水的第七军也在八月十一日向敌一一九军进攻，接连夺取礼县、西和，歼敌第二四四师一部，给胡宗南以我军要进攻两当、成县的假象，使他不敢北上。扼守宝鸡的第十八兵团也制定迂回围歼胡宗南集团的秦岭战役计划，并进行隘路、栈道侦察，开展爬山演练，在八月三十日发动进攻。我第十九兵团在八月十四日沿西兰公路拿下定西城，八月二十日到达兰州东南定远镇、乔家营一线。二兵团在十九日攻占兰州南阿干镇、榆中西北九条路口。敌人一直不战而退，是为了集中兵力固守兰州外围的主阵地，我们一些部队领导认为敌人准备弃守兰州，怕失掉战机。部队刚到达兰州外围，不看地形，不侦察敌人火力部署，不组织步炮协同和爆破准备，仓促向敌人的马家山、营盘岭、狗娃山等阵地进攻。经过二十一、二十二两日战斗，部队勇敢顽强地向敌人冲击、拼刺，伤亡很大，却没有夺得敌人一个阵地。青马见我进攻受挫，气焰更嚣张，要求蒋介石派飞机助战，连日组织反冲击。八月二十二日，野司前进到兰州东南的乔家营，彭德怀司令了解到部队轻敌进攻的情况，立即通知各部队停止进攻，扎扎实实地搞三天攻城准备工作。各部队吸取了教训，深入动员，组织侦察地形，摸清道路，并进行沙盘作业，组织骡马和勤杂人员前送物资器材，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是敌人三个主阵地，由敌一师、二四八师、一九师分别固守。山上有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修的永久性国防工事，解放战争中又不断增修钢铁水泥碉堡群，各主要阵地有环山公路连接并通向城里，外面有一两道削壁，高六至十米，削壁中部有暗藏的侧射机枪掩体，削壁外面有几道宽深三米到五米的外壕，各壕间有暗堡和野战工事，并有交通沟和暗道相通。阵地前设有铁丝网，并密布地雷群。另外敌一八一师防守城东的东岗镇，三五七师防守七里河，“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敌骑兵第八师在黄河北岸。敌人背靠黄河天险，主力控制南山主阵地，但东西两翼薄弱，城里再没有预备队。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退路。这样，我军攻取南山是解放兰州的重点，迂回敌人右翼夺取黄河铁桥是全歼兰州守敌的关键。

兰州战役前后的十几天内，彭司令员几乎天大部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报告前线情况，并及时得到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军委同意在八月二十五日发起总攻，决定以六十三军一部进攻东岗镇并在响水河沿河警戒；第六十五军和六十三军一部进攻马家山敌一师阵地，尔后向城东关发展；第六军进攻营盘岭敌第二四八师阵地，尔后向城南关发展；第四军向沈家岭的中狗娃山、下狗娃山敌第一九师阵地进攻，尔后向城西关发展；第三军向七里河进攻，并以一部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一部在七里河地区相机北渡黄河进攻十里店。

八月二十四日，各部队完成攻击准备，部队情绪高涨，老战士争先担任突击队，新战士争取立功，机关勤杂人员部参加抬担架，挖交通壕、前送粮弹等工作。

八月二十五日拂晓，总攻开始，百炮齐鸣。第四军的十师和十一师首先冲向沈家岭的狗娃山。在总攻前两大下起雨来，总攻前雨才止住，战士们踏着泥泞，冒着敌人的炮火还击，英勇地冲向山上。十一师三十一团首先夺得山上一处阵地，接连打退敌人的集团反扑，到中午三十团增援上去的时候，三十一团只打剩一百七十多人。四军和敌人恶战到下午六点，终于把敌人压下山去，拿下了沈家岭。沈家岭战斗中三十一团团团长王学礼，三十团政委李锡贵，三十二团副团长马克忠等许多同志英勇牺牲。

负责攻击南山要点营盘岭的第六军，在二十一日攻击时受到一些损失。营盘岭是皋兰山主峰，工事最强，山顶有一组用钢筋水泥构成的环形集团工事，山崖被削成三道峭壁，每层约三丈高，设了三道防线，两翼也有较强的火力配置。六军吸取了上次进攻兵力分散的教训，这次集中了全军十七门野炮，十五门山炮，还有重迫击炮，团的迫击炮，组成两个火力队。二十五日拂晓，首先集中炮火向敌人工事轰击，敌人的工事大部被摧毁，敌人从正面和侧翼迂回，组织了几次反扑，都被我军炮火准确地轰了回去。接着，步兵发起冲击，直扑山下的下庄，敌人依托残存的掩体和水泥暗堡顽抗，我军几次冲击部被拦阻。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敌人正面第一道削壁炸开一道斜坡，战士们通过这个缺口向山头冲去。后来，第六军电话报告，七连政治指导员曹德荣，舍身炸削壁，为解放兰州英勇牺牲了，战士们高喊着为曹德荣报仇，冲入敌人阵地。敌军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进行了七次反冲击，都被我军击退。下午两点，六军突破了敌人三道削壁，接着以炮火轰击敌人山头环形工事，步兵前仆后继，经过八次冲击，到下午五点，终于攻克了营盘岭敌主阵地。向马家山进攻的第六十五军，在炮火准备一结束，五七七团和五七八团很快就突破了敌人三道外壕，攻占几个地堡。敌人连续组织小群多路的反冲击，五七七团三连二排四个同志坚守了三号碉堡，六连连长和七个战士坚守了七号碉堡，以机枪和手榴弹打退了敌人三十多次反扑。下午五点，六十五军经过激战，将红旗插上马家山顶。与此同时，六十三军一八九师经过一场艰苦激烈的山地攻坚战，打垮了敌人六次大集团反冲击和无数次小的反扑，占领了马家山东南的窦家山敌人阵地。敌人南山主阵地全部被攻占，兰州的屏障垮掉了，马步芳见宁马和胡宗南集团没有出动，知道大势已去，仓皇坐飞机逃跑了，六十五军迅速占领了拱星墩飞机场。主将一跑，敌人全线溃退，企图利用黑夜过黄河铁桥西逃青海。我第三军发觉敌人要逃，迅速发起追击，沿公路直捣兰州西关，七师十九团八连最先向黄河铁桥进攻，桥上车马拥挤，八连借助桥上的灯光，集中火力射击，首先打中敌人一辆卡车，卡车起火封住了敌军的退路，不少人被挤得掉进黄河。三军其他部队也分别在七里河、小西湖、西固一带展开，二十六日凌晨我军完全控制了黄河大铁桥，而从南山溃退的敌人还一个劲向兰州城里跑，第三军七师入城后在中华路和溃敌遭遇，经过激烈巷战和政治喊话，歼灭残敌并占领城内各要点。第六军、四军和十九兵团的部队也先后进入城里，各军互相取得联络以后，继续搜索残敌。二十六日上午发现黄河北岸白塔山仍有敌人往南射击，三军即组织炮火掩护，二十六团过桥攻击，白塔山敌军逃往十里店，我军尾追占领了十里店以北高地。四军三十五团一部也过桥占领了桥北村庄，肃清了桥北残敌。二十六日中午兰州城里的残敌也全部肃清，至此兰州守敌四万余人，除部分随马继援逃走外，全部被歼。侥幸逃出兰州的敌军，到达青海时已有官无兵。其



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携枪带马各自回家或流散成土匪。

青马主力在兰州覆没以后，宁马主力害怕被歼，急忙逃回宁夏中卫、中宁老窝。胡宗南却在二十七日出兵，企图利用我军主力在兰州的时候，趁机攻占宝鸡、天水。胡宗南集团四个军向西和、礼县、宝鸡、虢镇地区发动进攻。二十八日进到宝鸡、虢镇和马头镇以南地区，一部进占陇南的西和。

我十八兵团正拟发动秦岭战役，消灭川陕公路的敌三十八军等部，而敌人已先向我进攻。十八兵团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以六十一军两个师附兵团炮兵团和宝鸡分区部队防守益门镇和虢镇，六十军按战役计划发起攻击，三十日占敌第三十八军驻地黄牛铺、东河桥，侧击进犯宝鸡方向的敌军。敌军遭到打击慌忙南撤，六十军和六十一军全体指战员冒着阴雨，翻山越岭追歼逃敌，一直追到凤县以北的白石铺、安河寺、核桃坝和进口关地区，歼敌近五千人。进占西和的敌人不战而逃。兰州解放以后，野司随即进驻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设在“三爱堂”。为了总结这次战役的作战经验，贯彻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并讨论恢复社会治安秩序等问题，野司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随后成立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由我担任军管会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等同志任副主任。军管会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张德生同志负责。八月三十日，也就是兰州解放第五天，野司决定举行一次隆重的入城式。这一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战士们都早早吃过早饭，欢天喜地，整装待发。兰州市里挂着彩旗，贴满标语，东稍门上有一条标语写着：“天摇了，地动了，兰州人民解放了！”反映了兰州二十多万各族人民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兰州市的工人、商人、学生、市民部手持红绿小旗，早早涌上街头，几十个秧歌队活跃在街头，整个兰州市就象过年一样热闹。彭德怀司令员和野司其他领导同志，同应邀前来的各界代表，各民众团体领导人一起检阅了入城式和游行队伍。八点三十分，隆重的入城式开始，先是步兵，然后是各种炮兵、摩托化步兵、高射炮部队……队伍通过时，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热情的学生把五彩缤纷的鲜花撒在炮车上。

正当兰州军民欢欣鼓舞庆祝的时候，两架国民党飞机窜入兰州上空。但是我们的队伍镇定自若，继续前进，群众也秩序井然。我们游行队伍里，正在行进的高射炮突然开火，一架敌机被击中坠落，另一架赶快溜走了，这成了入城式的一点花絮。

入城式结束以后，彭德怀司令员打破惯例举行一次会餐，彭司令员高兴地对大家说，这次会餐一则庆祝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二则对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表示欢迎。他还说，兰州战役是一场大恶战，但从战略上看，这可能是西北最后一仗了。

兰州军管会当时的任务相当艰巨。起义和投降的放军占我歼敌总数百分之六十，这些人员要安置处理，我们采取集训军官，资遣老弱，使他们各得其所；对城市的旧人员也要逐一安排，使他有饭吃，有出路；更重要的是建立政权，从军队抽调大批干部做地方接管工作，发动群众，清剿残匪，逮捕特务等一系列重大任务。

我第一兵团在二十三日解放临夏以后，在少数民族支援下，修造船筏，渡过黄河继续前进，九月初接连解放民和、甘和镇、平戎邑。青马的残部纷纷投降，马步芳和马继援乘飞机逃往广州，西宁处于一片混乱局面。一兵团把甘南青马有威望的家属组织了一个劝降团，随军到青海劝降，这是个很成

功的经验，这个劝降团不断地揭露青马的反共宣传，而且为我军的行动提供了很大方便。九月五日，第一军解放了西宁，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劝降团动员敌军政官员和散兵到军管会报到，对维持地方秩序，起到很大作用。第三军在九月一日由兰州西进，四日解放了青海、甘肃交界的享堂、乐部和永登。九月八日，逃往西宁北部的敌军师高级军官和少数部队两千多人，在敌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率领下向我缴械投降。九月中旬，在岷县地区的甘肃保安团等五个团在甘肃保安副司令周祥初率领下举行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至此，青海马步芳集团全军覆没，青海全境解放，兰州战役胜利结束。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推翻了马步芳家族在青海、甘南长达数十年的封建统治，为我军向宁夏、新疆挺进，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

## 大西北的解放和剿匪工作

兰州解放，青马灭亡以后，大片新解放区需要巩固，要清剿残敌，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支援战争。野司决定第一军留青海，第七军留天水，第六十二军留临夏、民和地区，第四军的十二师留兰州，以三个军又一个师担任工作队的任务。另外，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第二兵团和第一兵团的第二军进军河西走廊。

九月十四日，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攻占中宁。六十三军在十六日于中卫城对岸的常乐堡歼敌两个团，敌八十一军军长马停清于十八日在中卫接受我军和平条件，宣布起义，改编为解放军独立第二军。我军进展神速宁马总指挥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在十九日乘飞机逃走。敌一二八军军长芦忠良在二十三日作为“全权代表”，代表敌八十一军，十一军和贺兰军，到中卫签字投降。但是敌军指挥大灵，部队一哄而散，四处抢劫不可收拾。卢忠良也不敢回部队，贺兰军军长乘黑夜逃到我们的部队，要求保护。当天银川派来汽车接我们一个团进城维持秩序，第十九兵团随后进入银川，宁马也宣告覆灭了。

第一兵团第二军和第二兵团向西追歼敌军。第二军由西宁出发，越过祁连山，攻古张掖（甘州）歼敌一二 军二四五师，敌九十一军的几个团先后投降。第一、二兵团部队在张掖会师，二十四日，逃到河西走廊的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和敌九十一军、一二 军残部，在我军争取下，在酒泉宣布起义。这时，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鲍尔汉认清了形势，经过我党我军的争取在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先后通电起义。驻新疆的六万多国民党部队官兵选择了北平方式，走和平改编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典礼。我们在兰州也集会庆祝，大家的心情都无比兴奋，当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许多同志都激动得流下热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斗了二十八年，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无数先烈舍生忘死，英勇战斗，洒热血，抛头颅所换来的。我们在西北战场的胜利，使西北各族人民从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下获得解放，从此生活在人民共和国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十月四日，彭德怀司令员从兰州乘汽车出发，六日抵酒泉。他和陶峙岳、包尔汉以及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屈武会谈新疆起义部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等问题。新疆和平解放需要我们迅速进军，改编起义部队，维持社会治安。后勤部门积极组织进军的工具和大量物资，沿途设休息站和补给站。中央军委调给西北四十架苏联航空公司支援的里尔型运输机，还有华东两个汽车团、华北一个汽车团，加上西北的汽车共五百多辆，除一部分入疆以外，其余担任西安和兰州之间的运输。王震同志率第一兵团指挥部和第二军、第六军，通过空运、步行、汽车运输，迅速进入新疆，使和平解放新疆的一系列工作很快完成。

新疆解放以后，西北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但是在陇南、陕南还有胡宗南残部。这时，胡宗南仍作垂死挣扎，组织了川陕甘边绥署，收拾了五个兵团十九个军的番号，约三十万残兵败将，分布在四川、西康两省和陇南、陕南等地。胡宗南准备从西康、云南逃出国境，在边境依附帝国主义长期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第二野战军从贵州入川，迅速切断胡宗南的退路，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拨归第二野战军建制向西南进军，南北夹攻，争取把胡宗南残部

歼灭在成都盆地。另外，一野的第七军和第十九军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起配合十八兵团入川作战，向盘踞在陇南、陕南的敌人发起进攻。

当我各路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发起进攻时，敌军主力已先行逃走，陕南我军迅速解放岚皋、安康、汉阴、凤县、石泉、紫阳、留坝、西乡、宁陕、城固、洋县、沔（勉）县等地，十二月六日第十九军和十八兵团在汉中会师。陇南我军在解放徽县、成县、西和之后，敌王治歧、蒋云台率领第一一九军在武都起义，第七军解放了武都。第十九军在大巴山地区追歼了王凌云率领的敌新编第四、第五、第八军残部六千余人。到此，西北全境获得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我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阎接要任参谋长，王政柱、韩练成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黎化南任后勤部部长，后勤部政委黄静波。并先后成立了三个二级军区，由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马明方、李志民；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新疆军区，由彭德怀兼司令员和政委，副司令员王震、陶峙岳、赛福鼎。下辖六个三级军区和三十二个军分区。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机关设在兰州市。十二月，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赵寿山任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设在西安，彭德怀和习仲勋同志都先后去西安，主持筹划大西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大计。我留在兰州主持西北军区的日常工作。从一九五一年一月起，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的主要任务是剿匪肃特和守卫边防。新疆地区有漫长的边界线，和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接壤，我军进军新疆以后，即很快组织了坚强的边防军，进驻边防线上，警惕地守卫着每一寸国土。西北地区辽阔，民族众多，交通不便。文化和经济落后，封建统治势力很大。解放前就有许多以抢劫为生的惯匪，国民党特务还控制其中一些上匪，以加强其对少数民族的罪恶统治。解放战争中，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残部，溃散为匪的估计有数万人，这些人有些是自己隐蔽起来的，有些是被俘后发路费回家的，有些是受降后发证遣散的。

解放后，国民党匪特便以反动军官为匪首，网罗溃散官兵为骨干，和惯匪、反动会道门头子勾结起来，积极进行密谋策划，四处串连，借我们部队转入整训生产之机，利用宗教和民族隔阂，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在汉民较多的地区造谣说：“回民要造反。”在回族聚居地域则说：“共产党要杀回灭教。”煽动和胁迫部分群众，掀起反革命暴乱。匪特分子做着“敌后游击”，等候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复辟迷梦，他们袭扰驻军和县政权机关，惨杀我政府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挑动民族仇杀，造成地区性的社会混乱，使各族人民再次陷入严重劫难之中。甘肃省境内匪患严重，全省共有六十七股土匪约万余人。临夏地区的宁定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就发生匪特暴乱，被我军将其包围剿灭，残匪共十一股约三千余人分散隐蔽活动；河西走廊有叶长寿、马镇中、韩有禄等股匪三千余人；陇东地区也有股匪两千多人。

青海省地区的上匪马英，原是马步芳骑八旅的旅长，诈降以后，就有组织、有计划地潜伏待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他纠集股匪七百余众，发动叛乱。马英和马海云、冶生华在大通县围攻第三师骑兵营（欠第二连）；马成彪股匪在门源县围攻县政府和骑二连；韩海如股匪在湟中县小峡地区进行疯狂的抢劫烧杀；马录和马彦股匪则乘驻湟中县的部队前去小峡地区之机，抢占湟中县驻地沙鲁尔镇。他们气焰嚣张，互相呼应，矛头指向西宁。第一

军立即派部队投入平息叛乱，分路围剿，将匪众大部消灭，击毙匪首马英、韩海如，残匪溃散在门源西北和贵德东北地区。宁夏境内共发现土匪二十余股，约三千人，几乎遍布宁夏全区。人数较多、为害较大的有：宁马旧部马绍武，该匪向我军投城后又叛变，汇合田子善等股匪共三百余人，占据同心县西南的五当山，自称为“小台湾”，在平（凉）固（原）、银（川）固（原）公路抢劫商运汽车队和骆驼队，破坏交通；张海禄股匪有一百多人，自称“仁义军”，打着国民党军旗，流窜于同心、海原一带，抢掠国家物资；东蒙惯匪德王李守信，原有三千多人，是投日蒙好部队，后被国民党收编，在辽沈战役中被歼一千多人，逃到宁夏阿拉善旗北部的利尔扎庙、拐子湖一带，专门抢劫蒙民财物，该匪有窜扰经验，惯于沙漠地带生活。还有惯匪郭栓子，以“贺兰山王”自居，该匪最为凶残，经常袭扰我区乡人民政府、税务所和工厂，危害极大。陕西省境内，我军在一九四九年已剿除残匪共八千余人，残存的尚有：陕北惯匪高怀雄五百余人；陕南的伪“郑北公署”柯玉珊和川陕边的“川陕鄂绥靖公署”王凌云等部，都是国民党军残部，有较好的武器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肆意抢掠烧杀，群众极为痛恨。陕西全省约有残匪四十余股，三万余人。

新疆地区有乌斯满匪部一千余人，在北疆活动。股匪哈力拜克四百余人，在青海、新疆、西藏边界活动。他们以“保命保教”为口号，欺骗、胁迫哈萨克族群众为匪，不从者则迫害其家人。

一九五一年，美帝国主义派遣第七舰队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继而挑起侵朝战争，把战火燃到鸭绿江边。这时，西北各地股匪，受美蒋特务指使，配合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不断招降纳叛，活动更为猖獗。上匪的种种罪恶行径，激起了西北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和匪特作斗争。

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巩固社会治安，保证解放区内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西北军区决定以剿匪肃特作为当时一切工作的中心，争取尽快彻底歼灭各地股匪。根据党中央关于“军事清剿，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采取“军政兼施，分别对待”的政策，在匪情严重的地区，要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在一般情况下，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本着“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农村，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揭穿敌人的阴谋，广泛发动群众，用政府和军队名义写信向土匪招降，并利用匪属做工作，争取土匪内部的中间分子，以瓦解土匪。军区组织各部队，对较为猖獗、危害严重的股匪，立即集中优势兵力，坚决进行大规模的重点进剿。当时，第二军和第六军驻新疆；第三军驻河西走廊地区，第四军驻临夏，第七军驻天水；第一军驻青海；第六十五军驻宁夏，骑兵第六师驻吴忠堡，骑兵第二旅驻西海固；第十九兵团（欠第六十五军）驻关中，第十九军驻陕南。军区指示各部队在驻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指导思想是有匪就剿，先剿灭大股，后剿灭小股，再搜剿散匪。根据不同股匪特点，不同地区，不同时间，采取不同策略。在战术上或集中主力连续追剿、围剿，或分区分散搜剿，组织武工队清剿和飞行小组游捕、使股匪失去集中活动的的能力。并结合地方政府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进行联剿，造成轰轰烈烈的剿匪肃特斗争。西北各地驻军在接到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发出的剿匪工作指示以后，立即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共同研究，确定当地的剿匪方针，进行工作部署。参加剿匪的部队都进行了深入的动员，

才旨战员们都决心为人民除害，许多连队坚决要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领导干部积极要求到剿匪第一线。各部队行动迅速，除新疆以外，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前，就歼灭了当地主要股匪。陕西省境内，第十九军采取围歼大股土匪，然后争取瓦解小股土匪的方针，以第五十五师的两个团，向通江地区王凌云匪穴展开了多路搜剿。经过十天的大包围、压缩分割的连续战斗，全歼了王凌云匪部，生俘匪首王凌云。陕南群众经常举报匪情、匪踪；使股匪得不到喘息机会。所谓“陕西保安第四旅”、“陕南暂编总队”、“忠义军”等股匪纷纷向汉中军分区投降。安康军分区独立团和白河独立营，联合清剿镇平地区的股匪“鄂陕边自卫总队”，经过三天战斗，全歼该匪，生俘匪首柯玉珊。在群众性的政治瓦解工作中，先后争取陕南其他小股上匪二十一股六千余人投降。在陕北地区，榆林军分区部队配合伊盟骑兵第五师，对高怀雄、张廷芝、奇玉山等匪部连续进行三次进剿，除匪首高怀雄和张廷芝等逃入宁夏以外，匪部一百余人被歼，六百多人在宽大政策感召下投降、自首。陕西股匪基本剿灭。

在宁夏省境内，独立第一师在一月底，首先进剿马绍武、李成福、张海禄股匪，部队对其老窝采取长途奔袭的战术，一昼夜行军九十多公里，突然围歼部分匪徒，又经过七昼夜连续追剿，基本歼灭该股匪，生擒匪首马绍武、李成福等人。二月间，陕北股匪张廷芝二百余骑兵窜到同心县麻黄沟、惠安堡一带，企图和马绍武汇合，独立第一师两个团和骑兵第六师一部迎击该匪，部队以急行军连续五昼夜追击，将这股匪徒包围于太阳山，除匪首张廷芝逃走外，全部被歼。后又包围歼灭流窜到同心的叛匪王敬武部。在剿匪胜利的形势下，德王李守信股匪大部动摇，有九百四十人携带武器、电台投诚。德王李守信、鲍桂庭等三百多骨干分子流窜到额济纳旗被歼灭，李、鲍二匪首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被扣押。宁夏的重点进剿，歼匪众七千八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甘肃省方面，第四军两个师分别进驻临夏、康乐地区，此时上匪已由围攻城镇变为煽动回汉民之间的仇杀，破坏社会秩序，情况极为严重。第四军决心对临夏的马保、马八娃、马英贵三股主要土匪，采取分进合击全面进剿，在聚歼匪众百余人后，马英贵被迫率匪徒九百余人投降，临夏形势便趋向稳定。第三军骑兵团和第七师骑兵大队，在河西走廊地区进剿叶长寿、马镇中、韩有禄等股匪。部队一面追剿，一面通过关系争取，叶长寿等人先后投降。蒙匪德王李守信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被扣后，第三军得悉德王残部沙格拉匪部可能从宁夏逃向祁连山，便以骑兵部队在梧桐井地区伏击，正巧堵住沙格拉匪徒，激战三小时，将其百余人全部歼灭。青海方面，自马英等股匪被平息后，惯匪马忠义（马老五）在化隆地区的卡里岗复起作乱，联络人员，收集枪支，图谋组织“新编第八十二军”。第一军对其多次进行政治争取无效，便以第一军的第一师和第二师各一部对其实施军事清剿，经过三天战斗，毙伤匪一百四十余人，俘匪首孟全义以下二百六十余人。马忠义逃到五道岭和股匪马全彪会合，共六百余人。第一军以第一、二、三、六团进行围剿，在马场、旦尼山、峡门，隆化青布集等地连续给以打击，股匪伤亡惨重，疲惫不堪，内部混乱。经过政治争取，匪首马老五、马全彪、韩进禄等先后来降。二月间，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四军十一师配合，剿灭了活动于青海民和和甘肃交界处的王家台子的马希统、马中福股匪及甘肃临夏逃匪一千多人。马希统逃跑，被追击后投降。青海叛乱遂告平息。

在剿灭主要股匪以后，西北军区指示驻军大部转入生产建设和学习、整

训，并密切配合西北各省人民政府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开展减租反霸，进行土地改革等工作。由于我们对匪特的政治背景认识不足，缺乏警惕。过不了多久，某些地区，由于没有根据少数民族特点和群众觉悟程度，不加区别地没收枪支，过早提出减租反霸政策，给匪特以可乘之机。一些匪特隐蔽组织和散匪又恢复活动，搞武装暴乱，劫袭我外出人员和边远地区的地方政府，组织反狱暴动，拦截军车、商车，破坏仓库等等。有些残匪还发展组织，建立据点，在国民党特务指使下，打起各种反动旗号。

根据上述情况，西北军区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又发出剿匪指示。各级都召开了剿匪会议，检查了轻敌思想。一些部队停止生产，立即转入剿匪工作。各地区成立剿匪指挥部，区分了任务；并在一些地区组织了民兵，部署了联防，对各股匪展开积极的侦察和全面清剿。甘肃省平凉地区的匪首马元山，是在四川受胡宗南、马继援派遣潜回平凉活动的。他在平凉搞了四个团的番号二千多人，在化平拼凑了一个团三百多人，又在固原搞了九个团六千余人，马元山自称“忠义救国军司令”，阴谋于当年五月八日在平凉发起暴动，然后攻占西吉、海原固等地。马匪的阴谋被我军侦破，但马元山仍在九日纠集七百多人攻击平凉，我军将匪众击退，并活捉马元山，被蒙骗的群众纷纷离去。这时西海固匪徒一千余人也策应平凉暴乱，骑兵第二旅和回民骑兵团等部立即进剿，以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并举，争取匪首马保元投降，歼匪九百余人，至六月底暴乱基本平息。甘肃部队在临夏地区扑灭了大河家等地四次暴乱阴谋，降匪马保又策动夏河警卫队、康乐警卫队和回民支队一个排叛变为匪。第四军第三十三团、第三十五团对马保、马明义等股匪进行连续合围，最后将其压缩在洮河东岸，大部歼灭。七月初，又连续进剿康乐地区东湾、坏沟一带匪穴，击毙匪首赵凯成，歼二百余人。同时，第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对李彦虎、马子龙、张斌等股匪进行连续进剿，击毙匪首张斌，匪众大部歼灭。甘肃的兰州、武威、化平、天水、临洮等地的所谓“民治党”、“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等暴乱组织部被驻军破获。

在青海省，残匪马录和马成龙在湟中潜逃后，流窜在湟中、贵德之间活动。匪首马德山积极串连组织“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和“反共挺进军”等反革命组织，阴谋在西宁进行反革命暴乱。马德山的阴谋很快被我们侦破，马德山等逃到上五庄一带搞了五百人的反革命武装。六月，第一军骑兵团在包尔图、小峡地区给马德山股匪以连续打击，将其基本歼灭。互助县有鲁顺德、鲁国佐股匪活动，骑兵团在八月间，将鲁顺德、鲁国佐股匪围歼在互助县东北的科胜滩。鲁顺德和鲁国佐逃跑回老家，后被当地民兵击毙。在我军搜剿下，如门源县和甘肃交界地区的冶于明、马二不都的“反共救国军通讯大队”股匪和其他暗中活动的散匪，都吓得销声匿迹。流窜在青甘交界祁连山地区的马成虎匪部慌忙向第三军八师投降。

宁夏方面，惯匪郭栓子向我军投降后又叛变，盘踞在贺兰山中，号称“黑虎军”，我军由于对贺兰山地形不熟悉，投入兵力不足，多次围剿都扑了空，因此该匪更为嚣张，在国民党特务指使下，改称“国民党反苏讨共军”。独一师在以同心县为中心的宁南地区剿匪较为成功。他们在骑六师一部和省军区骑兵支队配合下，在不易控制的重点地区建立联剿联防制度，设立剿匪据点，决心土匪不灭，据点不撤。六月，独一师以九个连分四路合围张海禄、杨伯义股匪，毙伤降匪一百多人，生俘匪首张海禄，杨伯义逃脱。从七月开始，独一师组织小分队、武工队搜剿散匪，到八月捉获散匪二百多人。

新疆乌斯满匪帮是伙政治土匪，他们受美蒋特务、美国前驻迪化（今乌鲁木齐）领事马克南操纵，趁我进疆部队忙于整编起义部队和建政、生产，而各族人民对共产党、解放军尚不了解的时候，在一九五一年初，策动起义的骑七师部分反动军官叛变，并欺骗煽动哈萨克族牧民叛乱。他们散播说：“汉人是哈萨克的仇敌，解放军要杀哈萨克，要抢走全部牛羊，只有跟乌斯满才有出路。”等等。同时，起义的原国民党哈密专员尧乐博斯也叛变和乌斯满相勾结。乌匪部最多时达四万多人，除一部分惯匪和起义后又叛变的国民党部队外，多数是被蒙骗、裹胁的少数民族群众。乌尧匪帮图谋夺取迪化，把新疆变成美蒋“反共反人民”的基地。三月底，他们开始对驻守哈密东北沁城、小堡、伊吾等地的部队进行袭击，驻军和当地政府人员受到一些损失，第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和随员在指挥围剿途中被匪徒伏击牺牲。在此严重情况下，新疆军区迅速组建了剿匪指挥部，以第二军、第五军、第六军各一部及迪化公安营等一万余人，配备装甲汽车四十一辆、汽车二百辆，侦察飞机一架，从四月份起，对乌、尧匪部大举进剿。乌斯满匪部有沙漠作战经验，也能吃苦，但被裹胁的群众携家带口整天流浪，不能持久行军作战。四月十四日，我军以七个营的兵力分两路从镇西奇台出发，突击乌斯满匪穴大小红柳峡，部队冒着鹅毛大雪和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沿途和上匪战斗，消灭了部分匪众，乌斯满带几百名亲信突围逃走。部队将缴获的无主牛羊三万多只，通知哈族牧民认领。起初一些牧民还不敢认领，后来才陆续来领走牛羊，部队还送给牧民一些砖茶、白面和花布，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这样匪帮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我驻守伊吾的第十六军四十六团二连从三月二十九日起被尧乐博斯匪部围攻，该连连续打退了土匪的猛攻，粉碎了他们的诱降阴谋，孤军奋战了四十二天。五月七日，第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赶到，立即解除了伊吾的围，并乘胜端了尧匪的老窝，歼匪二百多人，匪首尧乐博斯带着几名亲属逃到国外。五月十四日，我军以两个团兵力及装甲汽车、飞机配合下，包围乌斯满匪部于黑山头，毙伤匪一百五十多人，乌斯满匪部逃往北塔山。我军紧紧追击，从北塔山追到准噶尔盆地，横穿二百五十公里大沙漠，给乌匪部以歼灭性打击，俘匪首贾尼术汗，乌斯满带着残部几百人，于七月下旬逃到安西、敦煌。新疆部队经过几个月追剿，解放了少数民族部落两万多人。

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到七月，半年多时间里，参加清剿的部队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很大胜利。在剿匪的同时发动群众成立农会，组织民族团结委员会和民兵，建立情报网和剿匪保家联防等一系列工作，并开展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和生产救灾等，解决广大群众的困难。一些地区纠正了剿匪初期执行政策过于宽大的偏差，坚决镇压了一批匪首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给人民以鼓舞，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但是西北地区广阔，特别是游牧民族地区，人烟稀少，气候变化无常，交通不便，有时群众被匪特逼走，我们就得不到群众支持，摸不到匪踪，地理不熟，联络、补给都很困难，加之匪特多为骑兵，流窜迅速，我们在一个省进剿，他们就逃到另一个省，这样到一九五一年八月，经过分区进剿，还有残匪二百一十二股，约一万多人。在把大股土匪歼灭或击溃以后，小股土匪慑于我强大军事压力，不敢与我公开对抗了，乃缩小目标，分散活动，避我锋芒，保存实力。有的窜入边远山区，或流入少数民族地区，继续顽抗。军区决定由集中优势兵力的重点进剿、全面清剿转为分区驻剿，以分片包干的办法，使分散活动的土匪无法集股再起。



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以争取零星股匪投诚。一九五〇年十月初，彭德怀司令员受命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执行抗美援朝任务。在这之前，他曾深入新疆、甘肃、青海、宁夏检查工作，我多次随行。每到一地，他都表彰当地驻军取得剿匪的成绩，指示要坚持下去，彻底根绝匪患。他指出肃清匪特，是关系西北的社会秩序安定，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大事。他还要求所有领导同志，认真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忠实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培养各少数民族自己的优秀干部，把各民族人民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军区指示各省驻军，对一些顽匪坚决继续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提出要坚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以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方针。随着一些部队执行抗美援朝任务，军区相应的统一调整了部署。

一九五〇年九月，宁夏省军区决定以一九四师、一九五师为主，对恶贯满盈的郭栓子股匪进行大力清剿。一部分部队控制贺兰山的隘口、要道，主力向土匪集中的地区清剿，最后围攻郭栓子隐匿的大西峰沟，剿灭了该股匪，活捉了郭栓子，只有个别匪徒漏网。宁夏驻军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二月，继续对残余匪特进行了五十余次围剿，捕捉、俘虏了张成皋等匪徒一百七十余名，肃清了宁夏的匪患。

陕西省委和驻军，组织了川陕鄂、川陕甘联防剿匪指挥部，关中靠近秦岭各县组织了剿匪委员会，在各地委统一领导下，歼灭残匪一千余人。甘肃方面，第八师在八月和九月先后两次合围河西地区先密寺残匪，俘匪首马彦彪、苏虎、刘玉、赵扎提等。青海方面，骑兵团从八月十一日起，对马德山、冶鼎全匪部四百余人连续追击，匪徒窜到甘、青交界的祁连山地区。第三师和炮团接着追剿了四天，除马德山带十余人逃跑外，其余全部就歼。十月，第二师五团和武工队配合，对马录、马成龙进行两次围剿，歼灭了大部，生俘了马成龙。马录带少数匪徒逃到门源扎巴图沟，被第三师侦察连和第九团三营歼灭，马录被击毙。在新疆地区，军区调集了两个骑兵团、三个步兵团，在其他驻军配合下，在七月开始追剿盘踞在乌鲁木齐南山的乌拉考伯、司德克等股匪，歼匪一千多人，解放了哈族十六个部落，群众一万余人。到一九五〇年底，匪特活动地区缩小到甘肃、青海、新疆交界的柴达木盆地，有乌斯满、毕善禄、胡赛克、哈里伯克等四股残匪，共约五千八百余人。军区决定组织甘、新、青三省会剿，彻底剿灭这些残匪，由第三军军长黄新廷担任三省会剿总指挥，从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抽了四个骑兵团，一个骆驼团，五个步兵连参加。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底，连续在柴达木盆地的戈壁荒漠上追剿残匪，终于将残匪全部肃清，并在海子地区活捉了匪首乌斯满。西北地区解放以后，初步建立基层政权，但群众觉悟低，匪特利用封建会道门和宗教统治，发展组织，扩张其社会基础。因此在驻剿期间，除了军事打击以外，着重在政治上彻底挖除匪根，包括减租反霸、土改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工作，启发群众觉悟，开展群众性的剿匪肃特运动。

解放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极为落后，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有些牧民给牧主、部落长干了一辈子活，除了一个破帐篷、一个铁锅以外，一无所有。我们按照党的民族政策组织生产救灾，实行借贷，帮助群众办各种经济和文化福利事业，少数民族的疑惧、戒备心理逐步解除，民族隔阂慢慢消除，群众再也不跟匪特走了。如在新疆的剿匪战斗结束后，部队即配合县、区人

民政府组织了哈族工作团，进行宣传解释，救济贫苦人民，将被劫牲畜归还原主，照顾与安置无法生活的匪首家属，安定了哈族群众生活，群众积极检举坏人，彻底肃清隐藏的匪特。

在剿匪过程中，我们争取团结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让上层进步人士参加政权工作，以各种方式和他们交朋友，如开阿訇座谈会，交待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阿訇们看到解放军为民除害、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看到政府和部队尊重民族风俗习惯，都深受感动。他们主动宣讲，说匪特不符合伊斯兰教义，要匪属召回亲人，在瓦解匪特中做了许多工作。

再是，我们加强了汗办俘训班的工作。土匪的习性和一般的国民党官兵不同，多是流氓成性，释放了以后不久又会结伙重起。所以必须经过俘训班教育，释放时坚持做到“四保”，即阿訇保，乡干部保，群众保，家属保。保证不再为匪。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到一九五一年三月，西北军区总共剿灭土匪七万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三万五千余支，粉碎了美蒋图谋在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迷梦，基本肃清了西北境内敌人的残余力量。此后，还平息了青海地区头人项谦的叛乱。一九五三年五月间，最后清剿了青甘地区的政治土匪马元祥、马良。马元祥是被俘后遣散的国民党军官，后受国民党空投的特务控制指挥，自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起，流窜在青海、甘肃南部和川西北地区，发展队伍，进行破坏活动。一九五三年三月，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共同行动，围剿歼灭了这两股残匪，俘获国民党空投的特务“西北联络专员”程毓杰等多人。此外，经过重点进剿和分区驻剿，残存的隐藏特务、漏网匪首等冥顽不化的反革命分子，大多具有隐蔽斗争的反动经验。各地区采取结合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运动，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检举揭发、铲除匪特赖以存身的社会条件。各部队都派出一定数量的工作队，积极参加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调动了广大群众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一旦发现匪情，立即报案，配合搜捕，从而根除匪患。西北军区各部队在剿匪肃特斗争中，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牢固地树立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而且主要是工作队的思想；以剿匪安民为己任，同时加强了自身建设。部队协助地方党和政府，建立和巩固了各级人民政权及党的各级组织，建立了地方武装，培养了大批地方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使西北地区的减租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很快赶上了全国其他地区的进度。剿匪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多年未残害人民的惯匪势力，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图谋利用匪特作为反攻大陆内线力量的阴谋。剿匪斗争取得了民族团结，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使饱受苦难的大西北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剿匪斗争的胜利，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为大西北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清除了障碍，有力地支援与配合了抗美援朝运动。

在艰苦的剿匪斗争中，西北军区部队、地方部队的不少优秀指战员，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人民民主专政而光荣献身。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大西北各族人民的心中。

在剿匪斗争的同时，西北各部队建立了许多不同规模的军垦农场、牧场、军马场，当年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但解决了部队的供应，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发展了各地经济，改善了军民生活。

一九五三年三月，为了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西北军区按中央军委命令抽出一部分部队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进藏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在七八月间分两路从青海和新疆出发，战胜了道路艰险、高原缺氧和物资供应

不足的严重困难，沿途加强了民族政策和纪律教育，严格地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胜利地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任务。

## 第十二章 在总参谋部

## 我军正规化建设初期

一九五二年十月，我接到中央的命令，任命我为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我立即从兰州动身前往北京报到。建国后，徐向前同志任总参谋长。因为他身体有病，总长的职务一直由聂荣臻副总长代理。一九五二年，中央正式指定聂荣臻同志为代总参谋长。那时，总参谋部机构精干，人员不多，工作效率都很高。在组织解放战争后期作战的同时，还担负着抗美援朝作战和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聂代总长工作很细致，各项工作部亲自过问，终因劳累过度，在一九五二年九月病倒了。这时，彭德怀同志从朝鲜回国，中央决定让他留在北京，主持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工作，仍兼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我到北京的当天，即去向彭德怀同志报到，他说，现在军队正面临由战争时期转入正规化建设时期，需要严格的进行训练和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军事人才，因此调我来负责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方面的工作。我虽然在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但对于抓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却没有经验，我向彭总表示怕完不成任务。彭德怀同志说，搞军队正规化训练，我们都缺乏经验，好在有苏联顾问帮助，可以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我未到总参之前，全军的训练和院校工作，主要由肖克同志领导的军训部直接管。我来以后，仍主要依靠肖克同志和他建立的机构开展工作。

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同美国军队在朝鲜打仗，美军除占领我台湾省外，还从海上对我国实行封锁。为了和美帝对抗，在国际上，我们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在各方面都强调向苏联学习。在建军的一系列问题上，也开始了向苏联军队学习的新阶段。如编制体制，条令教程，供给保障等等，基本上都仿效苏军的做法。另外，全军正逐步引进苏式的武器装备，在换装之前，部队需要训练使用这些装备的技术骨干。我到总部一上班，正赶上军训部在北京昌平区举办全军的师教导队长集训班，教练使用苏式郭留诺夫重机枪、五七无座力炮和捷克恰列夫轻机枪等武器。我到集训班看了看，集训班的领导同志介绍了学员的思想情况，谈到不少同志对苏联的东西持怀疑态度。后来我给集训班全体同志讲话时，针对这些思想情况，强调了学习苏联军队经验的意义，并提出在开始学习的时候，要坚持不走样地学；要把苏联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学到手，即使当前用不上也不要紧；要坚持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等等。这些话对于克服当时的经验主义思想障碍，虽有一定积极意义，当时也没有谁提出反对意见，但事后严格推敲起来，不仅不全面，还引起一些不良后果。

在聂代总长领导下，一九五二年以前，已经建立了一批军事院校。在南京成立了以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由宋时轮任校长的总高级步校。其他还有航空学校、海军学校、防空学校、炮兵学校、坦克学校、工兵学校、通信学校、防化学校和军医院校。各军区也组建了步兵学校等。我到军委军校部以后，继续执行原定建立各技术兵种院校的计划，使之形成培养各级各类人才的院校体系，进一步统一教育内容和计划。凡组建新的院校，我都尽可能参加从选校址，到调配领导成员、制定教学计划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学习现代化正规院校管理的知识，取得经验。

在一九五二年底和一九五三年初，彭德怀同志到各地视察。他勘察了辽东半岛，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进行了军事部署，预防美军可能在志愿军侧后实施登陆；针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他勘察了华东地区的海岸和

岛屿，布置防务，预防蒋介石军队策应美军的行动，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在彭总外出期间，粟裕副总参谋长主管作战的工作，黄克诚副总参谋长主管总后勤部的工作，我除了负责军训和院校工作以外，还兼管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这时，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在研究制定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要大力缩减军费开支，以便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基础。彭德怀同志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研究修订军队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确定一方面精简军事系统的人员，缩减军费开支，以支援国家建设；一方面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具体计划包括：减少国外订货，有重点地进行采购，各特种兵主要是在现有基础上抓培养干部的技术兵员。同时，改革一些重要的制度。现在看，这一段时间，是全面照搬苏军经验的阶段，比如将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准备实行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勋章奖章制；总部的机构除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外，陆续增设了武装力量监察部、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军械部和总财务部；明确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而这一中心工作的中心，又是培养干部等。当时，在军委和总部工作的聂荣臻、罗荣桓、贺龙、黄克诚等同志，部具体分工负责一项制度的制订工作，彭德怀同志负责各项制度的统一和协调。在彭德怀、聂荣臻同志领导下，我具体分管院校、军训、人民武装和兵役制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对我来说都是新问题，只能依靠军训部、军校部和人民武装部的同志来开展工作。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同志逝世，中央决定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葬礼，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随团前往，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活动，受到了苏联朋友的友好接待，也促进了自己向苏联学习的心情。这一段时间，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特别强调要搞好和苏联子家的关系，遇到矛盾要多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这一年春天，由我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军院校会议，第一、二次全军院校会议是由肖克同志主持召开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主管院校的负责同志和各院校的负责同志。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继续贯彻学习苏联军事院校的办学经验。继续贯彻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的要求。并强调院校要以教学为中心，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应该是抓教学。按苏联军队院校管理体制，总参谋部只管参谋学院和陆军院校。彭德怀同志对我说，我们的军校部不能只管总参直属的院校，必须按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力求把全军的院校都管起来。后来的实践证明，全管起来很不容易。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彭德怀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仍然极为关心院校的工作，他说：“军队有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指挥干部和专家来掌握使用，再好的武器也是一堆废物。这些干部和专家必须依靠学校来加强培养。”这样，军队在已有学校的基础上，又陆续筹建起高等军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工程兵学院、电信工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研究机关，组成了军队培养训练各类干部和开展科学研究的完整体系。彭德怀同志还多次指示，过去缴获了新式武器都首先装备部队，今后有了新式装备要优先分配给院校。至于购买外国先进武器，如果是为了装备部队，就尽量不买或少买，如果是为了学校教学需要，就必须想办法尽快买来，使学校训练走到部队前面，以带动整个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学员来源方面，在抗美援朝时，又一次掀起地方

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源源不断地给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彭德怀同志两次指示全军挑选年轻的战斗骨干进学校学习，他说：“战争时期那种舍不得把最好的干部送到学校学习的旧观念必须改变，一定要调最好的干部到学校去工作，去学习。”在军委的直接指导下，我军的院校建设五十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部队训练方向，我们强调了要培养严格执行部队各种条令的正规作风；抓提高部队的各种技术水平和掌握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的能力，并着重抓合同战术的演习，着眼于提高各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一九五三年以前，全军还抓了向文化进军，办了各级文化速成中学，对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起了很大作用。以后逐步把军事训练的时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分别减为百分之二十，开始了以军事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各军兵种和各类干部的在职训练也走上了正规，按年度颁发在职干部的训练计划和大纲，规定了各级各类干部和士兵的训练时间、内容、要求，以及检查考核的办法。这种在职训练带有普及性，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的原则，重点解决急需的知识和技能，使之和部队开展的正规训练相适应。

兵役制度的改革方案，是聂荣臻同志主持制订的，在一九五二年以前已经建立了人民武装部，傅秋涛同志任部长，统一领导全国的民兵工作和兵没工作，各省军区、军分区和县人民武装部管所属范围的兵役和民兵工作。在全国各地部开展了民兵训练工作，特别是边远地区和边海防地区，军民联防对国防建设起到很大作用。我到总参以后，除了参加义务兵役法的制订外，主要是抓了义务兵役制的宣传和教育，为实行义务兵设法做舆论准备。

## 在训练总监部

一九五五年四月，军委决定成立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军委任命刘伯承同志为训练总监部部长，由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而且身体不好，军委让叶剑英同志代理训练总监部部长职务。我兼任副部长，被任命为副部长的还有肖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郭天民同志。训练总监部下设计划监察部、陆军训练部、院校管理部、科学条令部、军外训练部和军事出版部等部门。训练总监部组成后，继续重点抓军队院校的建设。叶剑英同志曾说：“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而部队训练的重点又主要是干部，因此担负训练干部任务的学校工作，就成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他多次出席院校工作会议，对院校训练给予具体的指导，具体参与制定全军院校培养干部的规划。在院校建设方面，叶剑英同志经常强调的问题，一个是加强对院校的领导，一个是理顺培训干部的体制。他指出要办好院校，首先要加强各总部、各军兵种对院校的领导，再是各院校党委和首长加强对本校训练工作的领导，才能保证提高教员和学员的质量，训练出合格的学员。早在一九五六年，叶剑英同志就提出军队院校要坚持“三级制”和“两股绳”的训练体制。所谓“三级制”，就是：第一级由士兵、军士晋升为尉官时，或没有受过正规院校训练的尉级军官，必须进中级指挥学校接受由单兵教练到营战术的完成教育；第二级是由尉官晋升校官，或在尉官、校官任职期间内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干部，必须进军事学院（包括军兵种学院）学习诸兵种合同战术；第三级是校官晋升将官，或军以上军官在任职期间没有进过正规院校学习的干部，必须进高等军事学院受一次完成训练，学习战设法、战略学等基本军事理论。除完成教育采用这“三级制”多外，另外同时建立速成训练制度，将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这就是“两股绳”。速成训练，主要根据战术、技术的发展，有重点地、短期解决军官的深造和提高问题。

此外，叶剑英同志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他指出，现代战争有三个特性，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一九五六年全军都加强了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的训练。初步取得了现代条件下合同战术训练的经验。

一九五六年六月，党中央为纪念建党三十五周年，向全国发出了一个指示，号召学习五个文件，其中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与时局》等毛主席的著作。要求通过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克服主观主义（指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特别是克服在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训练总监部开办了读书班，通过学习这五个文件，不少同志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反思，认为我军的训练工作中，有生搬硬套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大家分析了苏联和中国国情不同之处，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成长过程之中有不同的传统，两国军队的装备水平也有很大差距，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全套照搬苏军的制度，不能照抄照用苏军的理论。我通过学习和思考，觉得这些同志的意见是可取的，几年来我军的训练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我们在学习苏军经验时，未能强调很好地结合我国我军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选择地学习的态度。同时也认识到，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因此，我们不宜偏重追究责任，而应该很好地吸取经验教训。当时，我提出几点意见和部里的其它几位领导同志商量。一是战略方针和训练方针的关系。在一九五



六年三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同志重申了我们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具体内容包括：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等等。这个方针是依据我国的工业化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军队的装备仍处于敌优我劣的情况提出的。当时曾有的同志说，考虑到中苏同盟，中国和苏联加在一起，从总体上看我们优于敌人。这里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的原理，我们制定战略方针，固然应该考虑到苏联的援助，但这是外因，不能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根本依据，而只能从我国内部情况作根本的依据。因为这种援助数量的多少，范围的大小，时间的迟早，是受世界局势的变化制约的，事先难以作出准确的估计。战略方针决定训练方针，对原子武器的防护（包括攻防作战）教育，无疑是对的，对高、上级干部进行一些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攻防作战训练也是需要的；但应该考虑到，要使我们的军队完全象苏军那样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短期内是达不到的。这不是苏联会不会给我们几枚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还须具备其他许多条件。如部队机械化，制空权，通畅的运输线，足够的经常不断的弹药和装备的补充，这些都不能只决定于外援。因此，我主张按“敌有我无”为背景进行战术训练，“敌有我无”训练好了，到“敌有我”时，问题比较好解决。当时，我提出，应根据我军的战略方针和各部队担任不同任务的实际情况，具体解决训练工作中一系列问题。如战术训练和作战任务如何紧密结合的问题；平原和山地作战训练的比重问题，水网、稻田、江河战斗的地位问题；海洋防御的战术问题；要塞守备部队独立作战的战术问题；要塞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相结合的战术问题；机动部队（兵团）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如何形成优势的问题等等。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使我们的训练符合于战略方针的要求。二是战略和战役、战术的关系。毛主席指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因此，战役战术训练必须适应战略方针的要求。所谓适应并不是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战役战术训练上就应该多搞防御，战略上以劣胜优，战术上也应该如此。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理解。事实上只有在战役战术上采取进攻战才能适合战略上的积极防御，只有在战役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才能达到战略上以劣胜优的目的。这又不等于说，在战略上小米加步枪的经验，在战术上就不适用了，在战役战术训练上就不需要考虑了。因为过去战争中我们战役战术上都采取了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只是由于战略形势的不同，所能形成的战役战术优势程度就有差别，所采取的战术也不完全一样。既然在战略上我只能以劣胜优，反映在战役战术上的优势必然是有限度的。就战斗持续的时间来说，短时间可形成优势，但时间长了就可能变为劣势；还可能由于制空权的关系，夜间可形成优势，白天就不一定是优势；就地形条件来说山地要比平地形成优势的机会多一些；就距离敌人远近来讲，近距离的战斗的优势可能多些。其他如运动战比阵地战容易形成优势，突然袭击比直接接触下进攻的优势可能要大等。当然，这种一定限度的优势，随着战争的发展是会变化的，由于不断的胜利，终会由一定限度的优势转化为全面的优势。由此看来，战役战术必须服从战略并为战略服务。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的经验，不仅在战略上是适用的，而且在战役战术训练上也必须考虑进去，加以体现。否则虽然口头上承认训练方针要符合战略方针，实际上仍然会使训练工作和战略方针脱节。

三是战术和技术的关系。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战术反过来又向技术提出要求，并影响和刺激技术的改进和发展。但不等于说技术是先进的，战术就一定是先进的。事实上我军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技术装备比敌人落后，可是我们的战略战术却比任何敌人都高明。我军的技术装备低劣，财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消灭强大的敌人，壮大自己，赢得战争的胜利。在历史上我军技术装备虽然一直都是落后的，但是我们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独特的经验，加之毛主席在许多军事著作中充分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阐明了我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虽然我们的军事学术目前还有某些缺陷，但从思想体系来看，则是非常先进的。有了先进技术只能提供产生先进军事学术的客观可能性，要把这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具备其它许多条件。比如人心的向背，战争经验的多少，以及能否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总结这些经验等等。因此，决定战术先进与否就不仅仅是技术，人及其主观的能动性是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基本条件。因此我军虽然缺乏先进技术装备，但只要根据客观情况，正确地反映战争的规律，军事理论就是先进的，优越的。拿它来指导战争就能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否则即使有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作基础，也不可能产生先进的军事学术。假若机械地认为，技术是先进的，战术也一定是先进的。或者认为技术落后，战术也一定落后，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唯武器论的泥坑里去。除了训练方针不能照搬苏军的以外，经过几年实践，使我认识到苏军的有些条令、制度也不完全适合我国我军的实际。诸如一长制、领导机构的设置，考试方式的“三堂会审”，“六小时一贯制”等，都不应完全照搬。这些认识的变化，在我来说有个学习渐进的过程，开始提“不走样地学”等口号，没有强调有选择地学，对训练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照搬照套，对于教条主义倾向的出现，我是有责任的，也是有教训的。正是因为初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教训，我在训练总监部一些内部会议上，提出“存有教条主义，应该反对教条主义”。但是部里有的领导同志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误认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否定几年来训练工作方面的成绩，并主张应继续强调全面地学习苏联经验，应该提出注意的倒是反对保守主义，反对经验主义。更多的人对开展这两种观点的讨论，感到忧虑，认为会造成部队和学校在训练指导思想上的混乱。这种讨论当时只是在训练总监部内部进行，有一次《战斗训练》杂志社召开全军通讯报导业务会议，我去讲话提出应该在训练实践中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倾向，训总另一位领导同志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这样就把训总领导层争论的问题公开到部外去了，参加会议的报导骨干都是很敏感的，很快在全军范围内出现了究竟应该反教条主义还是反经验主义的议论。在此之前，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五个文件联系实际时，也出现了争论，集中表现在战役系学习的我军一批高级干部，在学习战役法之后，认为我军装备还较落后，如果打起仗来，必须以劣势对优势，还得使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打法。大家还认为讲战例不能只讲苏德战争的十次打击，还应该讲我们解放战争后期的三大战役等等，迫切地要求在战役教学中做出适当的改革措施。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员和学员也认为，实际工作中照搬照套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是存在的。当时，刘伯承院长在外地养病，大家对刘帅是体谅和尊重的，主要意见是针对当时在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提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作为代表参加了

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一月，我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校开了若干次座谈会。那时，刘帅依然在外地养病，因此没有机会向他请示和听取他的意见。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写了一份比较系统的报告，主要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这篇报告后来以文章形式摘要登在《解放军报》上。

一九五七年二月，彭德怀同志和陈赓代总长、总政谭政主任等去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构筑情况，也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彭德怀同志和学院各方面人员进行了交谈。事后他对学员讲了一次话，又以同样内容向党中央和军委作了书面报告。既肯定了学院的成绩，也指出了教学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作为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承担了责任。随后，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军委随即批示同意学院的决定，并指出在执行中须向群众反复讲清楚，不要追究责任，不然就会出现偏差。同时指出教条主义现象，不仅在学院教学中存在，在全军许多工作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当时《八一杂志》全文刊登了彭德怀同志的报告，学院的决定和军委的批示。

一九五七年三月，叶剑英同志主持训练总监部党委扩大会议，围绕训练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开展学术讨论。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个月，大家充分地发表了意见，虽有争论，但气氛尚好，是一次学术性较强的会议。会议没有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但大多数同志认为。现在时代不同了，装备改变了，作战方法和训练方法也应随着改变。既应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也要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我军的优良传统，几十年革命战争的经验，一定要坚持，要发扬。绝不能把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丢掉。叶剑英同志在最后的发言中，肯定了会议的成就，认为每个人的发言都包含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内容，并要求大家深入学习，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叶剑英同志那时主要的精力，是忙于筹建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院的筹建，是叶剑英同志经过长期酝酿以后，在一九五六年向军委正式建议的。当年十二月军委批准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黄克诚和我任副主任，彭绍辉、甘泗淇、洪学智、余秋里等任委员。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调配干部，修建营房。并制定军事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指导思想、组织规程、编制体制等。经过一年多筹备，建院工作逐步就绪，组成了军事科学院的临时党委，叶剑英同志任党委书记、院长兼政委，委员有宋时轮、彭绍辉、杨至诚、钟期光等，筹备委员会的工作随即结束。

一九五七年底，叶剑英同志离开训练总监部去主持军事科学院的工作，军委任命肖克同志为训练总监部部长，我也不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回总参谋部任专职副总长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二月，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反对生产建设中的浪费现象和保守思想。当时，训练总监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认为，训练工作中的保守思想，主要表现为拒绝学习苏联的经验，死抱着我军过去的经验不放。几天之内，训总院内贴满了大字报，而且指名道姓地写道：军内保守的代表人物就是张宗逊。那时，正值反“右派”之后，“左”的思潮已经影响到各个方面，训总个别领导同志把头年关于训练方针的讨论，也说成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掀起一场政治风波。三月，训总决定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肃清我的“保守思

想影响”，并要求我到会听取意见，当时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同志把训总的要求告诉了我。黄克诚同志说，既然他们要你去，你就去吧！听一听都讲些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那里讲。于是我又奉命重回离别了三个月的训总听取批判，当时，我在组织上、行政上已同训总无任何关系，既无权参与会议的领导，也无法获得会外的任何信息，只能只身坐在被告席上挨批。发言者的帽子不断升级，从“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到“反苏”、“右派”等等。被点名批判的还有孙毅、彭施鲁（在我兼任院校部部长时他们曾任副部长和处长）等几个同志。我听了一个月批判之后，作了一个发言，对军事训练中产生教条主义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并重申了我对反教条主义倾向的认识和态度，彭施鲁同志也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这一下子听不到答复性的意见了。正当此时，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发言，主要指的是经济建设中不应该迷信和照搬苏联的经验。成都会议精神一传达，训总四级干部会就很难开下去了，只好宣布暂时休会。五月，我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紧接着从五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在成都会议时决定召开的。当时毛主席指出军队的工作落后于地方，要求通过军委扩大会议以整风的方式来改变落后状态，同时研究军队的整编问题。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其他总部曾列席过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的同志，把训总争论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样军事训练工作中该不该反对教条主义，又变成了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个议题。毛主席在会议的过程中作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批示。训总的主要领导同志在这次会上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由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来，党内实际上滋长青一种过激的情绪，常常把一些工作上的争论，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看待，于是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的同志把教条主义倾向也上升到“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批判，而且把教条主义和正规化等同起来。因为我刚刚在训总四级干部会上挨过批，军委扩大会议上某些同志的发言，虽然偏激，但却与我的观点基本一致。我也作了一次发言，主要阐明如何正确学习外国经验的问题。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在全军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搞成了一场政治运动。以致使凡是负责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被迫检查自己的教条主义问题，有些同志还受到过大的批判。在这种气氛下，刘帅对在军事学院的工作做了自我批评，叶帅也表态说在训总没有交好班。使整个搞训练工作的同志都有一种灰溜溜的心情。这些做法不仅伤害了搞训练工作同志的积极性，而且打乱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对军队训练和院校教育造成很大损害，给全军建设带来了不良后果。

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军委决定撤销训练总监部，训总各部合编为院校管理、军事训练、军事出版三个部，分别由郭天民、李作鹏、孙毅任部长，划归总参建制，分工由我主管。

训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是批判我的经验主义，接着又批判肖克同志的教条主义，许多同志跟着表了态，甚至说了过头话，互相伤了感情。后来撤销训总，编为三个部归我主管，由于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细，不少同志心情不够舒畅，成为后来特别是“文革”中折腾的原因之一。

## 全军大比武前后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叶剑英同志在武汉主持召开了全军编写条令座谈会，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都有领导同志参加。我也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叶剑英同志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提出了统一规划，全军动手编条令的建议，在全军范围内成立了一个军事科学研究委员会，各主要军区和海军空军成立了分会，各大单位司令部机关部相应建立了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全军动手编写各种条令、条例。编写条令这个巨大工程，很快就在全军铺开，进展迅速。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编写出各种条令和教材达七百多种。在叶剑英同志亲自主持下，经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共同努力，反复修改，先后经军委批准颁发试行的有《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军师战斗条令》、《团营战斗条令》、《步兵战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等全军性的条例条令，为我军的训练、作战、管理提供了依据。一九五九年四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对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蒙古等七国进行访问，我作为团员之一随团出访，我们受到东欧各国人民热情友好的款待，参观了各国的国防设施和军事院校，访问历时一个多月。学到不少东西。回国后，尚未来得及深入研究如何借东欧国家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经验，即发生了中央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同志被免去了军队职务。也曾有人说我从西北到总部长期跟随彭德怀同志，是彭、黄同伙，申言要追查我与彭、黄的关系。由于贺龙、罗荣桓和毛主席的保护，在罗瑞卿同志任总长后，中央仍然任命我当副总长，继续分管全军教育训练并负责协调各兵种的工作。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初期，对教育训练工作基本是不闻不问，我也没有直接去找他汇报请示。按五十年代形成的惯例，每年冬季都要召开一次全军训练工作会议，总结本年的工作，部署下一年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冬的训练工作会议，原定在十二月中旬召开，临开会前，叶帅传达了林彪的几点意见，实际上是互不连贯的几个短句，如：要“少而精”、重点练“打得准、开得动”（叶帅加上“联得上”）、干部“练抽象思维、不搞大演习”，“战术技术都要学活，不要练成木头官、木头兵”等等。为了贯彻这些指示，须重新修改已准备好的会议文件，为此会议推迟了一个星期。在会议前后，军训部部长李作鹏借机提出要求，会议要深入批判彭黄，肃清彭黄在训练工作中的影响，并应重新评价一九五八年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议。当年他是训总陆军训练部的部长，是反“保守”的积极分子，所以在会上会下捣腾，企图煽动一些人追查我同彭黄的关系。当时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去向他请示汇报。贺总说，李作鹏他会讲，你也可以敞开来讲嘛，从正面阐明林彪的指示，你让他打这面旗干什么？我又向罗瑞卿总长作了汇报，罗总长说：“军训会议不能为训总四级干部会议翻案”。最后叶剑英同志到会讲了话，李作鹏才收敛一些。

一九六年初，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由叶剑英同志任主任，栗裕（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和我任副主任。这样，叶剑英同志在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又正式继续领导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他在军事训练会议上讲话时，给全军军事训练明确了方针和任务。他指出：军事训练是我军建设和战争准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训练工作有四个内容（政治、文化、战术、技术），四个对象（学校、部队、机关干部、军外）。八月，他参加全军第八次院校会议，要求全军各院校，在教

学中更好地体现以我为主，围绕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作风和教学制度进行改革。以后，叶剑英同志还先后检查了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肯定了这两所学院在教学改革中取得的成绩，并针对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叶剑英同志主持抓了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和西安空军第四高级专科学校两个现场会议。长沙政干校的经验是领导班子革命化搞得好的，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搞好教学，继承发扬“抗大”作风，依靠群众，大家办校，推动了教学改革。空军四高专则给全军工程技术院校教学改革提供了经验，他们在技术教学中，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解决问题，敢于打破旧框框，缩短学制，更新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成果。一九六五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军院校政治教育教学改革会议，主要回顾了“抗大”的办校基本经验，发扬“抗大”的精神和作风，办“抗大”式的学校。八月，在大连又召开了全军指挥院校的教学改革会议。这一时期，院校的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在部队军事训练工作方面，在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领导下，我们一直抓部队的基础训练和训练改革。叶剑英同志多次指出技术决定战术、技术训练是战术训练的基础，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学会正确运用战术。战术是人掌握和运用武器遂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也只有学会掌握战斗行动的原则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技术上的效能。因此，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要很好结合起来。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带着军训部和军校部的同志到全国部队和院校督促检查基础训练，有时分成几路，进行调查研究，主要寻求抓基础训练的好方法和编写基本教材。

一九六二年春，我召集有关军区和院校的同志，在南京编写分队战术教材，南京军区主管训练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对我说，他们在第十二军发现了一个战术训练搞得好的小分队，领导这个小分队的同志叫郭兴福，建议我去看看。我同王必成同志一起看了之后，同意他们在南京军区推广，并继续总结经验。郭兴福是某团二连连长，他的教学法在一九六一年就引起所在部队领导的注意，郭兴福所在的军领导在一九六一年决定在该军范俐内推广。一九六二年，南京军区开始在杭州、镇江等地连续召开了几次现场会议，并要郭兴福同志到各部队巡回表演，使南京军区的训练工作出现了一片活跃的新气象。

郭兴福既发扬了我军练兵的传统方法又有所创造，既有政治工作又有群众路线，他提出带着阶级仇恨和敌情练兵，把对敌人的仇恨集中在刺刀尖上，要把连队练得思想红、作风硬，并实行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谁的意见正确就照谁的意见办。一九六三年秋，总参军训部发了一期《军训简报》，报道了郭兴福教学法，并决定在镇江召开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会。叶剑英同志看了这期简报以后，非常关注。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到南京和主管训练的干部座谈，了解情况。二十四日到镇江参加现场表演会，参观了郭兴福和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所涌现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汇报表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叶剑英同志认为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郭兴福个人努力的结果。叶剑英同志将郭兴福教学法归纳成五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

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传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这些方法，不仅适用部队，也适合于学校。现场会后，叶剑英同志正式向军委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毛主席看到报告以后，在“练得……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一句下面，重重的划了一条红杠，赞扬叶剑英同志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对郭兴福教学法作了充分的肯定。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一月底，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代表军委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军训练会议，对开展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号召全军各大单位以军事训练的优异成绩，参加全军各部队包括民兵在内的大比武。这样，就在全军掀起了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开展大比武的群众运动。

在各军区、各军兵种掀起群众性练兵运动以后，叶剑英同志进一步总结和充实郭兴福教学法的成功经验，整理出《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经军委批准颁发全军实行。我跟随叶帅和罗总长分别视察了广州军区、北京军区、海军的练兵情况，跑遍了全国许多部队，参观了各种“郭兴福尖子”分队的表演，在肯定了全军大比武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要克服锦标主义、弄虚作假和搞花架子等毛病。我们在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时，也发现有些单位工作不扎实，有拼凑尖子等现象，于是由军训部发了通知，及时指导练兵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在南京召开的全军军训会议上，曾预想“十一”前后在北京举行全军比武大会，但在筹备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一个能容陆、海、空军以及各兵种真枪实弹的比武场地。于是经请示叶帅和罗总长批准，改为分区举行，即除海空军单独举行以外，各大军区分为三个区（北京、沈阳、济南军区在北京举行，广州、福州、南京军区在信阳举行，昆明、成都、兰州军区在水举行）分别举行。六月初我同罗总长到济南去看济南军区比武准备情况。一天我接到贺龙同志办公室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毛主席在一份比武简报上批：此等好事，为什么不告诉我，能不能让我也看看。我和罗总长一听说毛主席要看比武，心里非常高兴，罗总长和我商量抽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尖子”分队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两个单位参加的项目要大致相等。于是罗总长先回北京做准备，并负责挑选北京军区的项目，我留在济南帮助挑选济南军区的项目，为了赶时间，有的分队用专机送到北京。我也在十三日赶回北京，亲自到各个场地检查落实。六月十五日、十六日，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军区的“尖子”的汇报表演，一起观看的还有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同志。毛主席看后很高兴，拿着国产的半自动步枪瞄来瞄去，还在模拟人象的砂袋上打了几拳。毛主席称赞“尖子”表演很好，并指出光有“尖子”还不够，要很快抓紧做好普及“尖子”经验的工作。毛主席还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说：“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呀！从而促进了全党抓军事，全党抓训练，成为我军训练史上的黄金时代。

为了庆祝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军事训练，《解放军报》在六月十八、十九、二十日三天连续发表消息和社论，称这次检阅军训是我军建军

史的光辉篇章。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彩色记录片，真实地记录了毛主席同各位老师以及罗总长谈笑风生的情景。当时，只有林彪不在场，他在一九五九年任军委第一副主席以来，一直称病，但是有关全军训练的各项活动，我们都主动地向他报告。这次毛主席检阅军事训练，整个活动安排，也部及时地向他报告，但他称病不出席。当全国全军轰轰烈烈地宣传此事时，他又因没有他的镜头而恼火，并把这股火发到我的头上。说我通过大比武，突出罗瑞卿，贬低他林彪。从那以后，林彪对我主管的军训工作，不断地挑剔、责难。

通过比武活动，检阅了成绩，交流了经验，发现了典型，树立了标兵，使部队的训练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练兵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果，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正当全军大比武活动，按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军深入普及的时候，林彪派叶群等人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广州军区某部去蹲点，表面说是去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去编造大比武的“罪证”。到十二月下旬，他们终于编造出一个大比武“冲击了政治”，“犯了方向错误”的调查报告。林彪办公室给总参打来电话，说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上出了偏差，一九六五年的军事训练要降温。在按林彪旨意起草的一九六五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稿中，罗列了训练工作的一大堆罪名。并由总政的一位副主任传话给我，要赶快作自我批评，我感到很为难，也想不通其中道理。这时正开军委办公会扩大会议，对一九六四年军事训练工作到底应该怎么估计，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也都议论纷纷，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等同志气愤他说，谁向林反映训练冲击了政治，谁就是别有用心。罗总长在会上引用某军区领导的话说，大比武是政治挂帅、发动群众的成果。罗总长把会议的意见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说各军区和军兵种领导同志都想不通，只好假惺惺地说：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可以修改，元旦社论稿你们也可以修改嘛。于是，后来就把“偏差”改为“苗头”，并对训练工作讲了一些肯定的话。这就是后来批判罗瑞卿时，所说的“篡改林总讲话”的真象。林彪的暂时退却是为了更疯狂的反扑，后来林彪利用职权，到处说军事训练的坏话，挑动政治部门找训练部门的岔子，威胁利诱。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诬陷罗瑞卿同志通过搞比武制造舆论篡军反党活动，从此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下去了，使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所有搞训练抓教学的同志，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迫检查“冲击政治”。不少同志因此被罢了官。

叶剑英同志对林彪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一九六五年初他对我们说，毛主席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们到处搞调查，你们也可以去调查嘛，看看军事训练究竟冲击了政治没有？遵照叶帅指示，我和军训部组织工作组下部队调查，普遍反映是根本不存在军事冲击政治的问题。三月中旬，我从福州军区部队调查后回到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叶帅作了汇报，谈了部队中由于所谓“冲击政治”在军政部门、军政干部之间引起的矛盾。那时林彪也在上海，叶帅让我去向林汇报。我给林的秘书打了电话，让他报告林彪安排我汇报，并先把我在福州军区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送了去。等了几天，林彪的秘书来电话，推说林近日身体不好、不能听汇报。实际上很可能是看了我的讲话记录以后，感到不对他的口味，避而不见。

九月十七日，叶帅在听取军训部汇报军训情况时，又指出：“郭兴福教学法，不是郭兴福一个人创造的，是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智慧的表现，是



我军几十年训练工作的总结，是毛主席练兵思想的继承和发扬。郭兴福教学方法还是要继续推广，并使它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在林彪一再干扰和破坏下，叶剑英同志的正确见解和中肯意见，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

林彪不但在部队训练中干扰破坏，从一九六四年底又插手阻挠和干扰院校的工作。一九六五年初，根据林彪的倡议，军委决定在全军院校开展一次整风运动。并把所谓“冲击政治”问题，列为整风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反对大比武到院校整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一伙始终把矛头指向我和总参军训部，因为我们一直在彭德怀、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领导下积极工作，我也就成了彭德怀、罗瑞卿的“帮凶”。并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我残酷打击、无情斗争。先是林彪的住地毛家湾党支部贴出大字报，把我定为“反对突出政治”的急先锋，大会批、小会斗，唆使一些人把我绑架到测绘学院秘密关押审查。接着，调子越升越高，什么“罗瑞卿的同伙”、“彭德怀的黑干将”、“贺龙的心腹”、“三反分子”等等。抄家、罚跪、抹黑脸、戴高帽子游街。无所不施其极，欲置死地而后快。我在难以忍受屈辱的时候，暗暗地激励自己，无论如何要挺住，绝不能自杀，坚信历史真相终有一天会弄清楚。

一九七一年一月，毛主席问黄永胜，张宗逊上哪里去了，黄当面扯谎，说在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员。随后，黄永胜就派人来和我谈话，说是军委的决定，必须马上到济南军区报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下放到了济南军区。我离开了工作生活长达二十年的总参谋部。九月十三日，林彪叛逃摔死后，我的冤情才基本弄清。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找我谈话，中央军委调我任总后勤部部长。

## 后 记

这几年，有不少党史军史资料征集部门向我了解有关历史问题，并要我写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回忆录，在编辑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完成了这本书。我原没有写回忆录的准备，因为我想，自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参加了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以后在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师的指挥下，进行战斗，做了些具体工作，我个人经历没有什么可写的。再者曾经和我一起战斗的无数同志，为了革命事业而献身，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要写应该写他们。可是因为时间久远，他们的姓名大都想不起来了，一些事件的细节也记不清楚，加之手头没有保存多少资料，写起来确有不少困难。后来，我为几种军史资料丛书写过几篇回忆文章，送廖汉生、黄新廷、王政柱、黄新义等老同志看过，他们以为写得还实在。我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以个人的有限经历为线索，粗略地记述我参加过的战斗、战役和工作过的部门情况，供读者和党史、军史部门参考。书中的史实难免有遗漏、差误之处，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如陆枫、李玉治、许忠敬、李志中等同志提供了不少回忆素材；总后党史办关庆留及贾秀清、李德金同志为收集、核对资料和文字整理做了许多工作；责任编辑王长龙同志为成书出版给予很大帮助。这里，对帮助我写作这本回忆录的同志们，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张宗逊

一九八八年三月

